RAND CORPORATION

OBJECTIVE ANALYSIS. EFFECTIVE SOLUTIONS.

蘭德 公司是一家致力通過研究與分析來改善政策和決策的非營利性研究機構。

作為蘭德公司的一項公共服務，本電子文檔可在 www.rand.org 下載。

轉至文檔

更多信息

請瀏覽蘭德公司網站 www.rand.org

瀏覽 文件詳情（英文）

有限電子版發行權

本文件和文中所載商標受後文通知中所提及法律的保護。本電子文檔的知識產權歸蘭德公司所有，不得用於商業用途。未經授權，嚴禁在非蘭德公司所屬網站發佈蘭德公司的電子文檔。蘭德公司的電子文檔受版權法的保護。未經許可，不得複製或以其他形式將蘭德公司的任何研究文獻用於商業用途。有關翻印和鏈接授權的信息，請查詢蘭德公司涉及 授權許可 的網頁.

中共的國際行為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積極參與、善用機會、手段多樣

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麥艾文 Evan S. Medeiros 著
國防部 譯印

軍官團教育參考叢書一623

中共的國際行為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積極參與、善用機會、手段多樣

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麥艾文(Evans S. Medeiros)著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印

原書名：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作　者：
Evan S. Medeiros
出版時間：
2009
出 版 者：
RAND Corporation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by Evan S. Medeiros
©Copyright 2009 RAND Corpor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序

近年來，中共不斷擴大參與國際活動的範疇，已經成為全球事務最新且最重大的趨勢。我們可以看到中共積極投入的身影遍及世界各地，涵蓋過去對北京當局而言，利益無足輕重的地區。中共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態度驟升，影響層面相當廣泛，外界不禁因此感到困惑，中共的意圖究竟是什麼，其對美國國家安全利益又會產生何種意涵。美國決策者和戰略家很希望能夠更加瞭解中共如何界定其國際目標，如何追求，成效如何，以及中共是否盤算著逐步削弱美國的權力和影響力。

為深入瞭解這些議題，本專題研究將分析中共國際行為的內涵、特性和實際執行情況，檢視中共如何看待自身所處的安全環境，如何界定外交政策目標，如何追求這些目標，以及對美國經濟和安全利益可能造成什麼影響。中共國際行為改變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光是想要加以分析就已經令人裹足不前，更別提想要澈底加以瞭解。這份研究的目標正是希望藉由相關的評估，讓大家更瞭解中共的國際行為，以及背後的意義。

本研究將有助於美國決策者及戰略家所關注的美「中」關係處理、對「中」策略發展，以及確保中共積極參與全球活動不致削弱美

國外交政策目標，亦可幫助美「中」雙方善用機會，擴大和加深雙邊合作。

「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目前已經發表許多研究報告，不斷探討中共在軍事和外交上，持續增長的權力和影響力，會對美國安全產生何種影響。本專題研究係上述整體研究的一部分，由蘭德公司「空軍專案處」(Project AIR FORCE)戰略暨準則計畫，在「美國空軍作戰計畫暨聯合事務處長」(U.S. Air Force's Director of Operational Plans and Joint Matters, AF/A5X)和「太平洋空軍司令」(Combatant Commander of the Pacific Air Force, PACAF/CC)贊助下，以「美『中』安全關係：聚焦及超越台海」(The U.S.-China Security Relationship: Taiwan and Beyond)為題所進行的研究。論述內容植基於蘭德公司空軍專案處過去的研究成果，包括：

- 麥艾文、克雷恩(Keith Crane)、何理凱(Eric Heginbotham)、萊文(Norman D. Levin)、拉威爾(Julia F. Lowell)、羅巴沙(Angel Rabassa)和西昂(Somi Seong)所著，《太平洋現勢：美國東亞盟國和安全夥伴對中共崛起的反應》(*Pacific Currents: The Responses of U.S. Allies and Security Partner in East Asia to China's Rise*)，編號MG-736-AF，2008年出版。
- 克里夫(Roger Cliff)、伯勒斯(Mark Burles)、雀斯(Michael Chase)、伊頓(Derek Eaton)、波爾彼特(Kevin Pollpeter)所著，《深入龍潭：中共反介入戰略及其對美國的意涵》(*Entering the Dragon's Lair: Chinese Anti-Access Strateg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編號MG-524-AF，2007年出版。

- 克里夫和席拉帕克(David A. Shlapak)所著，《台灣地位爭議解決後的美「中」關係》(*U.S.-China Relations After Resolution of Taiwan's Status*)，編號MG-567-AF，2007年出版。
- 麥艾文、克里夫、克萊恩(Keith Crane)和毛文杰(James C. Mulvenon)所著，《中共國防工業的新方向》(*A New Direction for China's Defense Industry*)，編號MG-334-AF，2005年出版。
- 克萊恩、克里夫、麥艾文、毛文杰和歐夫霍特(William H. Overholt)所著，《現代化中共軍力：機會與限制》(*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編號MG-260-AF，2005年出版。

蘭德公司空軍專案處

空軍專案處是蘭德公司的一個部門，係由聯邦政府所資助成立的美國空軍研究暨發展中心，專門負責從事研究與分析工作。該處針對影響當前及未來航太部隊之發展、運用、戰備與支援等政策方案進行獨立分析，俾提供美國空軍參考。研究工作分成四個計畫進行：軍事現代化及運用；人力、人事和訓練；資源管理；戰略暨準則。

從本公司網站可以取得更多空軍專案處的相關資訊，網址：http://www.rand.org/paf/

目錄

序 …… 3

摘要 …… 13

謝辭 …… 23

縮略語 …… 25

第一章　前言 …… 27

第二章　中共外交政策觀點 …… 33

三片透鏡 …… 33

國家復興 …… 33

受害者心態 …… 35

防禦性安全觀 …… 36

長期外交要務 …… 37

主權和領土完整 …… 38

經濟發展 …… 38

國際地位 …… 40

第三章　中國大陸國際安全環境現勢觀點 …… 47

大國衝突 …… 48

全球化和多極化 …… 51

全球化 …… 52

多極化 …… 53

美國權力和強國關係 …… 55

非傳統安全挑戰 …… 60

能源安全風險 …… 62

中共在國際事務的崛起 …… 64

第四章　中共外交政策目標 …… 73

洞悉官方政策 …… 73
全方位外交 …… 74
和平發展 …… 75
和諧世界 …… 76
核心外交目標 …… 78
經濟發展 …… 78
安全保證 …… 79
對抗遏制 …… 80
擴大和分散天然資源獲取管道 …… 83
壓縮中華民國國際空間 …… 85

第五章　中國大陸擴大外交手段 …… 91

經濟外交 …… 91
多種手段 …… 92
發展模式選項 …… 98
領導外交 …… 99
多邊外交 …… 105
戰略夥伴關係 …… 108
軍事外交 …… 114

第六章　中共外交行動 …… 121

外交關係的政策架構 …… 121
大國關係 …… 123
美國 …… 124
俄羅斯 …… 128
日本 …… 135
歐洲 …… 139

亞洲區域外交 …… 148
東亞 …… 149
中亞 …… 154
南亞 …… 162
亞洲以外的區域外交 …… 167
非洲和拉丁美洲 …… 167
中東 …… 178
多邊外交 …… 185
中共在聯合國 …… 185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活動 …… 188

第七章　中共外交挑戰 …… 219

內部情勢轉變和外交政策決定 …… 219
浮現的挑戰 …… 221

第八章　結論 …… 229

對區域和全球穩定的意涵 …… 231
多樣化 …… 234
中共外交轉變 …… 235
對美國安全利益的意涵 …… 236
全球挑戰 …… 237
美國的中共政策挑戰 …… 239
區域挑戰 …… 239
反事實分析法 …… 241
中國大陸未來的變化？ …… 245
政策建議 …… 249

參考書目 …… 255

圖1.1 中共國際行為圖解 …… 29
圖5.1 中共年度海外直接投資總額(1990－2007年) …… 96
圖5.2 中共領導人海外出訪(1949－2006年)…… 100
圖5.3 中共領導人出訪區域分佈(1949－2006年)…… 101
圖5.4 中共領導人出訪區域時期分析(1949－2006年)…… 102
圖5.5 中共特使代表出訪外國次數(1993－2007年)…… 105
圖5.6 中共對發展中國家軍售概況(2000－2007年)…… 116
圖6.1 俄羅斯對中共軍備出口狀況(1999-2008年)…… 132

表5.1 中共自由貿易協定現況一覽表 …… 92
表5.2 中共參加國際組織成員一覽表 …… 106
表5.3 中共成立國際組織一覽表 …… 107
表5.4 中共戰略夥伴關係一覽表 …… 110
表6.1 中共領導人造訪非洲1996-2009 …… 176
表6.2 中共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情況 …… 190
表6.3 中共在聯合國安理會針對蘇丹的投票 …… 192
表6.4 中共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否決票 …… 200

摘要

中共現今已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全球參與者，其重要性也正與日俱增。除了涉足了那些過去對中共而言，利益無足輕重的區域和議題，亦開始有效運用以往未曾使用的工具。整體而言，中共的存在早就是一個事實，因此無需一再強調如何讓中共融入當今國際社會的規範、規則及制度。重點在於，中共正在改變世人對中共的觀點，也正在對國際關係和機構產生影響力。中共的國際行為無疑正改變著當前國際體系的動態，但並非改變其結構。

中共對全球事務的「觀點」、「目標」和「政策」，是其積極參與全球活動的主要動力，其中有些存在已久，有些則是近期才出現。近十年來，中共的外交目標及政策已經有所演變，然而相較之下，政策的改變多於目標的更動。也就是說，中共已經發展出一套有別於以往的外交戰略，幾乎對每個國家都各有其應對方式。中共的外交戰略可分為多個層次，每個層次都可以讓我們更瞭解中共的總體外交政策。本專題研究將會針對這些層次進行分析，評估中共在落實這些戰略時將會面臨何種挑戰，以及會對美國利益和政策帶來何種意涵。

中共外交政策觀點

中共的國際行為至少受到三片歷史透鏡所影響。這三片歷史透鏡影響了中共對安全環境的觀點，以及自身在國際事務的角色定位。第一，儘管中共從來沒有表達何謂強權，但仍然希望「回復」區域大國的地位，進而最終成為世界強國。中共決策者和分析家把中國崛起稱為「復興」和「振興」。第二，許多中共人士認為他們的國家是「百年國恥」受害者，被西方和其他外國強權玩弄於股掌之間，尤其是日本。這種受害心態讓中共對於遭到外國強權打壓或主權遭受侵犯(現實或想像)顯得格外敏感。第三，中共有一種防禦性的安全觀，這種安全觀源自歷史性的憂慮，唯恐外國強權利用中共內部弱點，對其採取抑制和脅迫的行動。

中共長期存在的外交要務，也影響其國際行為。這些外交要務包括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促進經濟發展，以及獲取國際的尊重和地位。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來，這三項外交要務便共同驅策著中共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然而，這三項戰略優先要務的政策表現，以及領導人對它們的相對重視程度，過去30年間始終不盡相同。(詳見第二章)

中國大陸國際安全環境現勢觀點

中共對安全環境的看法，主要集中在兩個層面。第一，普遍認為要成功邁向強國之路，就必須和國際社會接軌，而且這種關係應遠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還要緊密。第二，對本身經濟和安全利益構成

威脅的範圍和嚴重程度，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對某些人而言，中共目前處在過去從未具備的安全環境，但是對其他人而言，中共目前所面臨的安全威脅，不論是數量和型態都在持續增加，使得這些人士對未來深感不安。

在權衡局勢之後，中共領導人做出結論，認為目前外部安全環境相對有利，而未來15到20年光景則代表著「戰略性的機會之窗」。中共可以藉著這個機會，透過持續進行的經濟、社會、軍事和政治發展，達成國家復興首要目標。如果可以的話，中共決策者希望透過外交手段，盡量擴大這片機會之窗。

中共對安全環境的主要觀點，包括以下六項：

- **不會發生大國戰爭：**大國之間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很低，因此未來15到20年將是中共持續發展和進行現代化的關鍵時期。
- **全球化：**藉由國際之間的經濟和政治互動，提升中共在全球經濟的重要性，並且加深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但全球化也將對中共造成一些限制。
- **全球均勢：**國際格局邁向多極化的腳步正在加快；儘管美國仍然掌握著主導世局的優勢，但較之以往已然呈現逐漸下滑。美國是中共進行復興大業的潛在威脅，但也是中共達成此項目標的核心夥伴。
- **非傳統安全挑戰：**中共面臨各式各樣的非傳統安全挑戰，包括恐怖主義、武器擴散、毒品交易和販賣人口、環境惡化、傳染病擴散和天然災害。這些挑戰將重新界定中共與亞洲及全球各個大國之間的關係，包含透過創造實質合作機會

的關係變化。

- **能源危機意識：**中共以兩個觀點看待能源安全問題：價格變動及運輸安全。中共自認在這兩方面都相當脆弱，驅使中共致力擴大原油和天然氣資源的獲取管道，特別是中東和非洲。
- **中共崛起：**中共決策者認為「中共崛起」是全球經濟和安全事務的影響因素。中共對自身的外交勢力和影響力所及之處逐漸感到自信，認為其已經成功緩和外界，尤其是亞洲各國對「中國威脅」的恐懼。(詳見第三章)

中共外交政策目標

中共決策者已經制訂一套外交政策戰略，試圖完成五項特定目標：經濟成長與發展、安全保證(譯註：消除中國威脅論)、對抗外國抑制行為、資源多樣化、壓縮中華民國的國際空間。隨著中共更加融入國際體系，這些外交目標在近十年來，已經獲得相當程度的擴展。

第一，正如中共決策者數十年來反復重申的內容，中共試圖維持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為國內持續改革和發展創造條件。此種聚焦於國內需求的觀點，可見諸於下列日漸多變的對外表現：例如中共積極透過外交手段，擴展市場、投資、科技和天然資源的獲取管道。第二，中共不斷試圖向亞洲國家及國際體系保證，其持續增長的國力將不會損害其他國家的經濟及安全利益。第三，中共的外交，尤其是對亞洲的外交，將尋求降低其他國家對中共的復興施以

圍堵、抑制或各種牽制手段的能力或意願，不論其為單獨或集體方式。第四，中共正在建立政治關係，以分散能源和其他天然資源的獲得管道，重點地區包括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而能源安全的確保則包含分散供應來源和運輸路線。第五，中共試圖壓縮中華民國的國際空間，限制其他國家賦予中華民國合法地位的能力。(詳見第四章)

中共外交行動

為了實現這五項外交政策目標，中共已經發展和推行一些全新且有效的方法。在運用這些新方法時，中共也顯得更為自信、更有彈性、更有創意且更為篤定。中共已經與部分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建立了「戰略夥伴關係」，且開始和幾個主要大國進行高層「戰略對話」，並積極參與各個區域和某些功能性議題的多邊機構。中共在當今區域組織和新區域組織的形成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儼然已成為中共外交上的主要事項。中共經濟外交的手法日益健全且面向廣泛，除了雙邊貿易外，也在海外進行直接投資、金融協定、發展援助和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俾促進達成經濟「兼」政治目標。目前，中共軍事外交部分還結合了擴大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高層軍方人員交流、聯合演習、聯合教育訓練。而致力推展這些軍事外交之主要目的，則是為了向其他國家進行安全保證。(詳見第五、六章)

中共外交挑戰

北京當局所面臨的各種挑戰，將對中共達成外交目標的能力造成阻力，同時也可能導致外界對於中共的意圖產生誤解。首先，隨著中共站上全球舞台且影響力與日俱增之時，中共的鄰國和其他國家可能會對北京有著更多期待。目前尚不清楚中共是否準備回應這些要求，因為中共其實害怕累積太多負擔；這已引起外界紛紛質疑中共是否可預期和信賴。其次，中共處理中華民國問題的手段有時缺乏彈性且帶有攻擊性，損害其展現溫和與善意的形象。再者，中共嚴峻的統治難題多如亂麻，可能致使中共政權無法妥善處理內部問題，進而禍延鄰國。這些統治缺失將惡化中共兌現承諾的能力，使得中共看起來似乎是一個不可靠的政權。最後一項挑戰在於中共決策機制的弱點。資訊過度保密以及文官、情報和軍事機構之間缺乏協調，妨礙了中共快速和有效因應國際危機的能力。(詳見第七章)

中共國際行為重要發現

中共已經廣泛運用(確切的說是巧妙利用)現有國際體制來實現其外交政策目標。對中共而言，運用當今國際體系推展利益是機會大於限制。中共的國際行為已經不再受到意識形態所驅使，亦不再為了想要取得新的領土、建立制衡聯盟、推動經濟發展或全球安全的模式，而推行革命性外交政策。中共並不希望摧毀或澈底改變目前的全球規範、規則及制度，而是尋求掌控它們以促進自身利益

——這種作法至目前為止，對北京而言可謂成效卓著。

此外，中共對某些現狀的近況也感到不滿，例如台灣地位未定，以及美國在全球安全「兼顧」經濟事務的掌控地位。對此，北京的回應方式是回歸體系運作，以解決其所關切的議題；包括試圖削弱美國的相對權力和影響力，特別是美國直接影響中共利益的行動。中共目前並不打算為了建立國際新秩序，而試圖與美國對抗。但是中共的確對美國的某些利益構成挑戰，尤其是在亞洲。整體來說，中共在追求此方面及其他目標時，偶而會出現專斷的行為，但鮮少具有侵略性。中共的作法已朝向吸引與結合其他國家，而非直接挑戰他們的利益：與其對立，不如吸引。中共企圖在亞洲建立一個吸引其他國家，讓他們產生依賴，從而尊敬北京的環境。中共認為，如此才能儘量減少他國的抑制行為並擴大其行動自由。

由於背景因素改變，中共正精心設計一套方法，使其追求經濟繁榮、確保安全環境、提升國際地位的管道更加多元，這個趨勢將對中共的全球影響力和美「中」關係具有重大意涵。為了促進國家發展，中共正透過外交手段擴大市場、投資、科技和資源的獲取管道。中共正在發展新的外交關係，並擴張本身在包含全球和區域組織等數個權力中心的既有外交關係。並且希望能運用各種國際地位和法律資源，進一步放大其訴求。

中共領導人透過國內事務的各種面向，持續推展他們的外交政策和外交關係，並運用外交政策協助解決國內經濟和社會發展日趨複雜的事務。然而，這並不代表中共是個自我孤立的封閉國家，或者把外交事務視為第二要務。若抱持這種心態，中共的國際行為根本無法進一步推展。

對中共而言，現在即便是地方性的行動也必須以全球為著眼。中共國內事務與國際事務愈形緊密的連結，已成為最近十年的新面向，而中共在國際上的行為也將持續受到此種連結關係所驅策。中共維持經濟成長和國內穩定這兩個雙重目標(藉此延續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地位)仍然是其外在行為的主要動機。

中共隨著其全球形象提升，希望能在塑造全球規則、規範和制度的重要角色上，擁有「一席之地」。這很明顯反映在中共的多邊外交工作上：建立新的國際組織，並且擴大自身對現有國際組織的參與度。未來幾年，中共在外交工作上，會更加凸顯自己身為議程及規則制定者的角色。然而，目前中共制定規則的實際作為相當有限。儘管中共表明參與此類過程的意願，但仍無法釐清究竟希望推動什麼樣的新規則或新規範。直到現在，北京幾乎沒有提出任何確切的新主張，亦未曾打算利用其所建立的組織，取代現存制度或與之抗衡。而其他亞洲國家則同樣對中共積極參與外交的行為抱持謹慎的態度，同時也企圖限制中共藉由參與這些國際組織擴張影響力。

此外，中共的國際行為其實尚處於過渡階段。目前中共的觀點、目標及政策可謂確定，但仍在持續演變之中。中共決策者心中擁有明確的目標，但他們還在摸索邁向新興強國之路，思考面對全新的影響力、責任、期待和限制。中共國際行為將會更加受到國內要務和全球安全環境變化的驅策及限制。中共的外交政策反映內部和外部需求的拉扯，而且兩股力量的數量和變化會越來越大。最終，這些需求將會決定未來中共國際行為的內涵與特性，導致時而看似矛盾或不一致的行為。(詳見第八章)

對美國安全利益的意涵

中共並不尋求取代美國在全球的主導地位。其菁英分子目前亦不希望中共成為與美國旗鼓相當的全球領導者，亦即對等的競爭對手。他們認為國家內部的挑戰過大，沒有足夠的資源，也無法承擔這種角色所需面臨的風險及責任。他們擔心這種全球角色可能會大量分散國家發展所需資源，甚至在區域間激起對抗中共的反應。可以確定的是，中共領導人樂見一個更加多極化的世界，一個多邊主義盛行，而美國權力受到限縮的時代。中共最終希望能成為世界強國，儘管這樣的期待相當籠統，亦沒有明確定義。中共領導人雖認為外國把中共視為強國，就是肯定中共的成就，但是，他們也擔心隨之而來的負擔及代價。

中共的一些外交政策行動，目的是削弱美國在某些區域及組織的相對影響力。在這項努力上，俄羅斯將會成為中共的重要夥伴。然而，這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仍然相當複雜，他們現在不可能組成一個對抗美國的統一戰線。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中共外交政策最具競爭性的地方顯然是在亞太區域，因為中共一向將此區域視為其戰略周邊。中共目前並未試著將美國趕出這個區域，因為中共領導人瞭解這麼做代價太大，失敗的可能性也很高。部分中共決策者承認美國的安全承諾會帶來穩定；惟中共仍然希望限制美國遏制中共的能力。也就是說，中共尋求其行動自由的最大化，當美國企圖遏制中共時，將可運用各種方式與之對抗。因此，若美國直接危害中共利益(特別是核心利益)，中共就會設法挑戰美國的影響力，

但是中共並不想與美國進行正面對抗或是將美國趕出這個區域。

更進一步來說，中共多樣化的戰略，正改變美「中」關係的經營方式。由於中共增進繁榮、確保安全及提升國際地位的資源已更加豐富(此時，中共感覺美國相對的衰弱)，北京變得不太願意對美國投其所好，而且更有能力抗衡來自華府的壓力，甚至能夠形成勢均力敵。美國以雙邊外交為主，藉以形塑中共國際行為的傳統方法，已經面臨新的瓶頸。

中共在亞太區域的優勢，漸漸改變了美國在該地區盟邦與友邦關係的本質。當中共在經濟、金融和軍事事務的重要性上升時，美國的盟邦與友邦對華府的需求與期待亦會有所改變。在某些情況下，美國的政策及安全承諾將變得更為重要，因為這可以讓亞洲國家更有自信與中共交往。然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想要在美國和中共之間做出選擇；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想要讓美國離開而由中共主導這個區域；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想要跟抑制中共的行為有所牽連。所以當中共持續放大他們的經濟發展和區域安全規畫時，華府將很難與亞太區域內的盟邦、友邦及其他國家、甚至區域外國家，發展出排他性的互動與合作。(詳見第八章)

謝辭

本專題的研究、編輯和排版工作，完全受惠於許多蘭德公司同事的熱心協助。張建來(音譯，Jianglai Zhang)和沙蘭德(Matt Southerland)大力幫忙蒐集、處理和分析大量中共外交政策各種觀點的資料。由於他們的勤勉不懈，使得本專題研究的內容更添豐富。海格(Beth Hague)在各章節中提供的資訊，亦讓此書增色不少。蘭德公司的同事何理凱、席拉巴克(David Shlapak)和赫亭(Sarah Harting)反覆閱讀草稿，協助修飾論點，使立論更加清晰透徹。

許多中共官員和學者為官方外交事務口號的「真實意義」提供精闢寶貴的翻譯見解，並針對中共國際行為的背後動機提出看法。本人由衷感謝他們願意撥冗參與討論，但不便在此透露他們的姓名。

史文(Michael Swaine)和萊文(Norman Levin)詳盡的審閱初稿，讓此研究受惠良多；希爾(Paul Heer)也為初稿提供寶貴意見。凱特(Megan Katt)和哈特(Jessica Hart)協助校對、編排，並製成各式版本。貝羅辛(Patricia Bedrosian)的費心編輯，讓此研究更加嚴謹。感謝上述人員對本專題研究的協助，此份研究如果有任何謬誤之處，應該由本人承擔全責。

縮略語

ACD	Asian Cooperation Dialogue	亞洲合作對話
APEC	Asian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亞太經合會
ARF	ASEAN Regional Forum	東協區域論壇
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東南亞國協
b/d	barrels per day	每日桶數
BFA	Boao Forum for Asia	亞洲博鰲論壇
CACF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rum	中非合作論壇
CCP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中國共產黨
CD	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	裁軍會議
CEPA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China-Taiwan]	(中共與台灣)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STO	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	集體安全條約組織
EAC	East Asian Community	東亞共同體
EAS	East Asian Summit	東亞高峰會
EU	European Union	歐盟
FBIS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國外廣播情報處
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海外直接投資
FTA	free trade agreement	自由貿易協定
GCC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波灣合作理事會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國內生產毛額
GMS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
IADB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美洲開發銀行

IAEA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國際原子能總署
MES	market-economy status	市場經濟地位
MINURSO	Mission for the Referendum in Western Sahara	西撒哈拉公民投票特派團
NATO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PC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NPT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禁止核武擴散條約
OAS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美洲國家組織
ODA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官方發展援助
ODI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海外直接投資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SC	Open Source Center	公開資料中心
PLA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解放軍
PRC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人民共和國
RMB	renminbi [China]	(中共)人民幣
SAARC	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南亞區域合作協會
SCO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上海合作組織
UK	United Kingdom	英國
U.N.	United Nations	聯合國
UNAMIS	U.N. Advance Mission in the Sudan	聯合國在蘇丹促進任務
UNMIS	U.N. Mission in the Sudan	聯合國駐蘇丹部隊
UNPKO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聯合國維和行動
UNSC	U.N. Security Council	聯合國安理會
U.S.	United States	美國
WM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貿易組織

第一章
前言

近十年來，中國大陸的經濟和外交利益已經逐步擴張到亞太區域之外，目前甚至已經擴及全球。中共活躍於現今某些議題和區域，對照中共過去的外交考量，這些區域的重要性尚屬次要，特別是拉丁美洲和中東。中共外交正影響全球體系幾乎所有階層的國際關係行為；而其相關決策也影響著國際的觀點、關係、組織、進程。中共已然成為國際體系處理(假如未能解決)許多傳統和非傳統安全議題的核心。[1] 在其戰略周邊，也就是亞洲，中共已成為強權，深入參與經濟和安全事務的各個層面。成為改變區域秩序關鍵力量的中共，更將於未來進一步確保其在亞洲的核心地位。

這些趨勢引發下列問題：中共躋身區域強權並參與全球事務的目標是什麼？中共將如何實現這些目標及對各個區域的影響為何？中共的國際行為將會朝著什麼方向行進？隨著經濟和軍事能力增強，其外在利益和外交政策將會如何改變？最後，中共外交政策的目標是否符合美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

某種程度而言，中共領導階層早已明確回應這些問題。中共決策者表示「和平、發展與合作」是中共外交政策的主要特性，他們主張中共外交政策旨在「爭取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為全面建設

小康社會創造條件」。最近，中共領導人表明堅持在「和平發展」之國際戰略下，建構一個「和諧的世界」。[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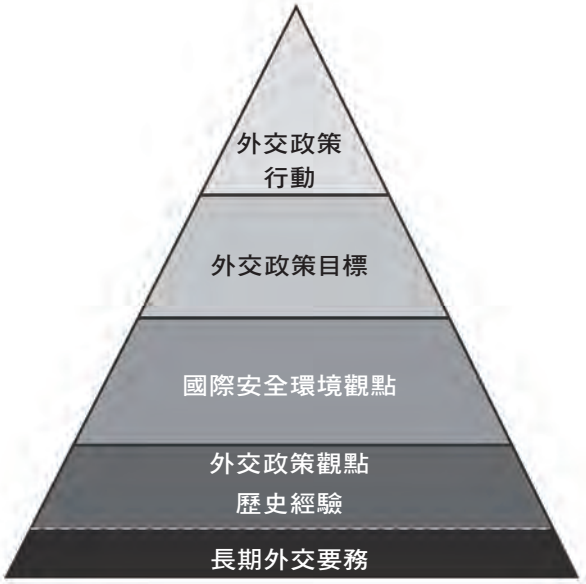
中共政府部門對其外交政策進行公開討論時，這些口號總是朗朗上口。然而，這些口號與政策顯然並不能令人信服，致使外界對中共感到困擾及疑慮。中共這些目標並非蓄意不實，或以巧言包裝公然抑制美國的「真實」意圖；而是未充分說明龐雜的各項利益和行動。中共的官方態度對於外交政策相關層面的觀點、動機及政策顯得相當保守；然而，正是這些觀點、動機及政策，共同建構了中共的國際行為。由於這種保守態度，外界當然無法掌握中共外交事務的動態，亦難以從外部解讀中共的行為。因此，想要回答中共現在和未來的意圖為何，分析家必須回到研究機構，把中共的發言、分析和行動(以及這些事項所隱含的各種動機)詳細予以組織，如此才能瞭解中共身為區域強權和參與全球事務的目標為何。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本專題研究將檢視中共目前及未來的「國際行為」。此處的國際行為泛指一個集合名詞，包含中共的外交「關係」(雙邊和多邊)，以及用來實現外交關係的外交「政策」。本研究亦將探究中共對於區域和全球利益的想法為何，而追求這些利益的戰略及政策，又將對亞洲和全球產生何種直接的意涵。此外，瞭解中共外交政策所隱含的觀點、戰略及手段，亦可闡明中共國際行為的未來走向。

本專題研究將中共國際行為分為幾個層次，俾於各層次增進我們對中共當前外交行動和未來方向的瞭解。這些層次包括：(1)中共決策者藉由歷史「透鏡」所看到的世界，以及中共在其中的角色。(2)中共對當前國際安全環境的觀點。(3)中共外交政策的目標。(4)

中共追求目標的特定外交政策行動(詳如圖1.1)。考量中共國際行為改變的幅度及速度，此種分層方式試圖提供一個分析架構和分類模式，用以評估中共目前及未來的外交意圖，以及可能對美國產生的意涵。然而此種分層方式並非試圖解釋中共外交和國家安全政策的所有層面。例如，本專題研究並不會談論中共軍事現代化，以及中共在東亞的軍事行動，這類題目已經超出本研究的分析範圍，屬於另一項獨立研究的題目。[3]

圖1.1 中共國際行為圖解



資料來源：RAND MG850-1.1

為了研究中共國際行為，本專題研究廣泛引用中共公開著作及西方分析家的看法。這些原始資料由大量的訪談構成，時間範圍涵蓋2005至2008年，人員包括參與中共外交和國際安全事務研究及決策的官員、分析家及學者。

本專題研究除了前言和總結之外，包含六個獨立章節。接續前言，第二章將透過各種透鏡，檢視中共決策者和分析家思考中共在全球事務中的角色。這些透鏡源自中國悠久的歷史和長期存在的國家重要任務，說明及反映出中共歷來外交決策過程的傾向，而且也代表中共國際行為長期以來的特性。第三章探討中共

對當前國際安全環境的觀點，特別聚焦於其所認知的挑戰。第四、五、六章接續探討中共身為國際行為者的現行外交「目標」，以及北京當局為達成目標所採取的特定「政策」。中共外交行動的意義及關聯性將會接續上述章節的鋪排加以陳述。

承接第二章到第六章的分析，第七章著重探討中共追求遠程和近程目標時所將面臨的多種挑戰。本專題研究的結論部分(第八章)，將扼要說明這份專題研究的諸多論點，據以針對當前及未來中共國際行為的內容，作出分析判斷。該章節置重點於美「中」全球利益的聚合與分歧，進而評析美「中」關係後續各項發展。

註釋

1 Avery Goldstein,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Robert G. Sutter, *China's Rise in Asia: Promise and Perils*, Oxford, UK: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中共對國家目標的評析，請見閻學通，《國際政治與中國》，北京，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但有一些學者，例如羅勃特・塞特（Robert Sutter）認為中共的區域和全球影響力的有關說法已被過度誇大。Robert Sutter, " China's Rise in Asia—Promises, 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Honolulu, Hawaii: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February 2005.

2 中共官員針對中共外交政策的用詞，取自楊潔篪，〈改革開放依賴的中國外交〉，《求是》（網路版），第18期（2008年9月16日關於和平發展，請見《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北京，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5年12月。關於和諧世界的建構，請見Bonnie Glaser and Evan S. Medeiros, "The Changing Ecology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China: The Ascension and Demise of the Theory of 'Peaceful Rise' " *China Quarterly*, Vol.190, June 2007, pp.291-310.

3 這份專題研究的內容包含中共軍事外交，因為在中共塑造外部安全環境的作為上，這是相對較新且重要的部分。（詳見第五章）

第二章
中共外交政策觀點

中共的國際行為主要受到三片關鍵性的歷史「透鏡」所影響。中共決策者在審視外部環境，思考該在國際事務中扮演什麼角色，以及如何推展政策行動時，這三片透鏡左右了他們的觀點，反映出中共對國際體系及其國際地位的成見，同時也傳遞了中共對其國家角色概念的主張；但這些想法卻幾乎未曾經由官員正式傳達，亦未記載於官方文件，而是普遍存在於中共對外交關係和外交政策的研究、分析和決策之中。[1]

三片透鏡

國家復興

首先，中國大陸人民普遍相信中國正處於重新取得過去「大國」地位的道路上。中共決策者、分析家和媒體將其現在的崛起形容為回到以大國身分處於世界正確地位的「復興」或「振興」。他們經常談論中國在漢朝、唐朝和明末清初時期對世界的巨大影響力，即便當時中國與古希臘、羅馬帝國、拜占庭或印度的接觸非常有限。[2] 中共《環球時報》曾發表評論表示：「中國正處在一個『大而趨強』的歷史進程中。」[3] 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當前國力持續上

升，意味著中國第四盛世即將來臨；他們指出在過去的朝代中，中國是個高度進步、文化燦爛和科技先進的社會，對全球經濟擁有重大貢獻，因此地位受到國際景仰和尊敬。[4]

當談論到上述中國歷代盛世時，中共決策者和分析家咸認中國從未以武力及壓迫手段進行霸權統治(亦即「霸道」的概念)，而是個溫和且仁愛的泱泱大國(亦即「王道」的概念)，以道德優越、文化豐富、經濟繁榮和科技發達來吸引其他國家。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中國正在回復成為仁愛的泱泱大國，擺脫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持續一百五十年之久的衰敗歷史。[5]

此外，雖然如今大多數中國人認為中共正邁向「大國」之路，但是決策者和學者並未明確定義何謂「大國」。中共對「大國」的觀點，似乎意味著任何重大國際決定，只要影響中共利益(依據中共自己定義的利益)，中共都必須參與(依據中共的主觀認定)。其他大國的敬重，亦是中共討論何謂國際體系中的大國時，一貫存在的特性。直到目前為止，除了防止受到外強欺壓和提升綜合國力之外，中共的評論文章很少討論將以大國身分做些什麼。

中國過去是個溫和強權的主張，並非僅是中國人基於民族主義的自誇之詞(儘管有那麼一點)，更是中國人認為中國有權在全球角色中佔有一席之地的主流意識。憑藉擁有大量人口、悠久的歷史、豐富的文化傳統、龐大且融入全球的經濟規模、聯合國安理會(UNSC)常任理事國和核子武器，讓中共自認確實有理由是個大國。重要的是，由於認為中國過去是個「偉大」的強權，因此中共自然希望目前在國際事務上的地位提升，能得到其他國家應有的對待。清華大學學者閻學通就這麼表示：

> 中國崛起是必然的事實……(中國人)認為中國的衰敗是應該改正的歷史錯誤……中國人認為中國崛起只是重新得到中國失去的國際地位，而不是獲得新的事物……中國人認為中國崛起的目的是恢復平等地位，而不是超越其他國家。[6]

受害者心態

中共相關文獻裡的第二種觀點認為，他們是受到西方列強和其他外國強權(尤其是日本)欺凌的受害者，承受了「百年國恥」。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不斷受到外權侵略、割據和削弱，直到毛澤東在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後才告結束。這是大多數中國人揮之不去的歷史記憶，影響他們的觀點和國家認同；中共自從建政以來就不斷鼓勵這樣的說法，讓人民對中共產生認同，並當做助長中共合法地位的工具。中共還宣稱將會保護中國，避免受到外國的西化或分化。

這種受害之說的流傳，造成中共對於任何侵犯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潛在可能十分敏感；亦造成中共在國際事務和外交工作上，強烈重視平等對待、互相尊重和內政不受干涉等原則。[7] 這也增強了中共對於恢復大國地位的想法更加覺得理所當然。的確，中共的受害者心態和恢復大國地位的努力是一體兩面，共同驅使中共致力在現代國際關係中重獲「正確角色」。[8]

此種受害心態近年來已有所演變。中共官員和學者所討論的「大國心態」，已著重於強調中共經濟發展上的重大成就和國際事務上逐漸提升的地位。然而，受害者的論調仍然存在，而民族主義

色彩強烈的辭令也總是表現在中共的外交事務上；當美「中」和美日關係之間發生危機時，這種心態對於公眾意見和政府決策有著相當明顯的影響力。[9]

防禦性安全觀

防禦性安全觀是中共考量對外事務的第三種普遍看法。此項觀點存在已久，其歷史背景為害怕外國強權試圖抑制中共(崛起)，對其進行壓迫(在危機發生時)，或是利用中共內部問題，趁火打劫。這種憂懼源自於中共官方的歷史觀，清算著自從鴉片戰爭以來外國強權對中國的侵略和西化，以及冷戰時期美國及蘇聯企圖阻撓中共發展核武和統一台灣的目標。中共利用這種歷史論述來支持自己的合法統治地位，讓人民認為共產黨是讓中國免於衰弱和分裂的救星，但後遺症是對外國的意圖存有很深的不安全感。

這些不安全感不僅充分反映在中共各種官方政策上，同時對於瞭解中共領導人的外交意圖也至為重要。中共領導階層公開表示「中共從未尋求霸權和進行擴張」，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崇尚和平」、「重視防禦」和「團結統一」。[10] 中共領導階層強調在本質上並不會對其他國家構成威脅，然而卻在歷史上不斷面臨周邊國家和大國為了區域利益所帶來的安全威脅。中共聲稱他們從未企圖奪取、侵略或占領其他國家的領土。他們經常強調過去因為領土爭議動用武力的紀錄相當有限，就算動用武力，目的也只是為了懲罰外國率先挑起的爭端。談到過去軍事干預行動時(例如韓戰、中印戰爭和越戰)，這些論點普遍出現在中共的歷史文獻，宣稱中共進行的是「防禦性」軍事行動，而且爭端是由激進的外國對手挑起(這些說法在西方歷史學家之間

引發爭議)。

這種防禦性安全觀顯示，中共在政策上高度重視周邊充分安全，特別是和邊疆防禦及領土完整有關的議題。中共領導人相當擔心外國政府會使用武力或其他壓迫手段(例如禁運或貿易制裁)，強迫中共做出違背心意的決定，特別是在發生軍事危機之時。舉例而言，中共核武原則的文獻就一再強調必須持有足夠的核武能力，以避免受到核武對手脅迫。顯然中共並非針對避戰的軍事目的，例如核子大戰，而要求持有大量和多樣化的核武。[11]

在外交事務上，中共已經開始著重思考「安全困境」的問題，這無疑是中共在思維上的重要演進。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中共的官員和學者逐漸理解其某些行動(用來保護中共的安全利益)，已經被周邊國家視為威脅；中共決策者開始瞭解他們的「防禦性」行動，會刺激其他國家做出一些反應，造成東亞安全競賽，不利於區域穩定。[12] 中共這項認知，促使其在外交工作上更加重視安全保證的推展，這個主題將在後續內容中深入說明。

長期外交要務

中共這三片歷史透鏡進一步影響其存在已久的外交要務：主權和領土完整、經濟發展、國際尊重和地位。相較於抽象的歷史透鏡，這些要務顯得相當具體，並從1949年建政以來，就一直驅策著中共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這些外交要務其實早在1978年之後便已存在，然最近25年以來，在政策上的表現不盡相同，領導人所重視的面向也各有所變化，而且將會持續不同。相較於毛澤東的外交政

策重視主權、領土完整和國際地位(與他的其他革命思想相比較)，改革時期的中共領導人明確且持續將外交關係置重點於國家經濟發展。[13]

主權和領土完整

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是中共的核心國家利益，其外交政策則明確表現出追求邊境安全、促進統一台灣、限縮中共領土的外在威脅(包括領海主權宣示)，並期望將外國對中共發展和內政的干預減至最低。[14] 中共與14個國家接壤，其海岸線長度大約1萬4,500公里。過去60年來，中共和主要鄰國曾發生過數次領土及領海的衝突。處理這些領土爭議以及防止外強入侵，已成為中共外交工作的當務之急。1980年代成功交涉收回香港和澳門，就經常被視為是鄧小平在外交政策上的重大成就。當然，確保大陸最終能夠統一台灣，也是中共長久以來，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主要目標。

近年來，中共認為「分裂集團」，諸如新疆信奉回教的維吾爾族和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已對其領土完整構成內在威脅。中共當前外交政策特重對抗恐怖主義，就是希望避免這些集團與基地組織，或其他擁有高度能力的恐怖集團相互聯繫。中共內部所形成的外交政策共識，亦將以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為優先。[15]

經濟發展

改革開放時期，經濟發展已經成為外交政策的優先項目。為了改善中國大陸人民的生活水準，提升中共的「綜合國力」，完成大國復興之業，中共過去30年來一直致力確保穩定的外部環境。鄧

小平曾經在1992年指出「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句名言至今對中共的外交政策仍然影響深遠。中共總理溫家寶就表示：「發展是硬道理，不僅是解決國內一切問題的基礎，也是增強我國外交實力的基礎。國家間的競爭，基礎在實力。」[16] 中共社科院知名的國際關係學者王逸舟詳細解釋了經濟發展與外交政策的邏輯關係：

> 對於中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不是任何外敵的入侵或其他戰爭，而是中國自身能否保持穩定、有序、健康的發展……。政治發展、文明發展、社會發展、價值發展，這些都是發展範疇的題中應有之義。在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前提下，上述全方位立體化的發展，將使中國在新世紀大大提升自己的國際位置上的層級和影響力，中國外交的施展自然也有會更加堅實雄厚的力量基石。因此，盡一切努力保障中國的發展，既是內政的需要，也是外交本身的需要。[17]

強調改革發展的前25年(至2002年左右)，中共的政策主要放在求得人民「溫飽」，亦即達到所有人民吃飽穿暖的經濟發展程度。2002年11月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第十六大)，江澤民宣布中共已達到該種程度；隨後他設定新的發展目標，宣示中共未來20年內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儘管江澤民談話的真實含意尚待釐清，但這通常意指中共試圖在2020年成為擁有大量中產階級，穩定繁榮的中等強國。

中共能否持續掌握中國大陸的統治權，有賴於經濟持續發展。中共持續提升中國大陸生活水準的能力，已經成為中共維持執政合法性的基本條件。在中共意識形態基礎逐漸消蝕之際，經濟發展

的思維已經取而代之，因此中共領導階層必須為人民提供更多經濟發展機會，才能繼續掌權。

國際地位

中共決策者和學者長期認為，中共應是受到國際敬重的大國，並以此等地位視為其國際行為的核心要素。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來，其領導階層論及中共的國際地位時，傳統上總會強調中共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擁有核武、幅員廣大、人口眾多，以及具有歷史傳承的亞洲主要強權。隨著毛澤東時代過去，改革開放時期到來，特別是自從蘇聯瓦解和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後，中共對國際地位的觀點已經有所改變；惟中共領導人仍然堅持，甚至執著認為，上述特質是中共成為大國的指標。[18] 雖然不清楚中共領導人如何權衡隨著時間變化的國際地位，但全力提升國際地位一直都是其制定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19]

同樣的，基於對國際地位的強調，中共在國際政治上相當重視形象和聲譽問題。中共在意形象是希望被接納為國際社會成員，避免被排斥或孤立，特別是在國際組織內部。[20] 此外，中共重視聲譽，是因為相信只要聲譽受到正面評價，就可以從貿易、援助、科技和投資的管道中獲取實質利益。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中共積極透過外交手段重建國際形象和國際聲譽，正是因為中共外交政策相當重視這些象徵和實質利益。從1990年代開始，中共政府致力樹立「負責任的大國」地位，就是這個傳統外交要務的最新表現。[21]

鑑於中共過去一直想在國際體系中爭取強權地位，縱橫捭闔於各大強權之間，現在轉而重視國際地位的非物質特性，外界不禁

感到有所疑問。[22] 其實，這是因為很多中共戰略家認為國際地位也會影響中共能否在世界權力核心中佔有一席之地，對確保中共權力和影響力的增長至關重大。中共決策者和學者認為，提升中共國際地位非常重要，因為中共在全球的政治影響力持續增加，已經引起其他國家關切。換句話說，提升中共的形象和聲譽(包括相關政策)將有助中共緩和外界對「中國威脅論」的擔心，使中共成為強大、富裕和深具影響力的國際成員時，不至於面臨太多障礙。[23]

中共致力獲得國際敬重和提升國際地位，也表現在各種政策和行動上，包括中共對國際規則、規範和制度的支持。中共決策者和學者經常談論中共在國際組織中扮演了更積極和建設性的角色，例如聯合國安理會、世界貿易組織和各種區域安全機構，意圖彰顯中共是一股穩定且著重經濟發展的力量。中共分析家經常表示，中共積極參與多邊機構和非傳統安全議題，就是要成為負責任的大國。根據中共大使王毅的說法，這種行動提升了中共的國際地位，並且構成「中國邁向世界一流大國行列的試金石」。[24]

註釋

1 有關中共外交政策的歷史影響，詳見牛軍，《從延安走向世界：中國共產黨對外關係的源起》，in Steven I. Levin, ed. and trans., Norwalk, Conn.: Eastbridge Books, 2005; John Garver, " The Legacy of the Pas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93, pp.2–30; Michael H. Hunt, *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especially Chapter Eight; and John K. Fairbank,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1–19.

2 有關中國過去身為大國的簡史，詳見Michael D. Swaine and Ashley J. 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MR-1121-AF, 2000, pp.21–96.

3 〈大國的負責與大國的心態〉，《環球時報》，2005年8月15日。

4 Yan Xuetong,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Power State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 No.1, 2006, pp.5–33; Wang Gungwu, "The Fourth Rise of China: Cultural Implications,"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2, No. 2, September 2004, pp.311–322; and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5 Yan Xuetong, "The Rise of China in Chinese Ey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0, No.25, February 2001, pp.33–39; 黃仁偉，《中國崛起的時間和空間》，上海，中國：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2；門洪華，《中國：大國崛起》，杭州，中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胡鞍鋼，《大國戰略：利益與使命》，遼寧，中國：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亦見Swaine and Tellis, 2000.

關於中國過去四個鼎盛時期，詳見Wang Gungwu, 2004。關於中共對霸權的看法，請見David Shambough, "Chinese Hegemony over East Asia by 2015,"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Summer 1997, pp.7–28.

6 Yan Xuetong, 2001, p.35.

7 中共並不是惟一因為受害者心態對主權特別敏感的國家。南韓和北韓也有同樣的看法。

8 Peter Hayes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Swaine and Tellis, 2000, pp.9–20; and Hunt, 1996, pp.3–28.

9 關於「大國心態」的議題，詳見金熙德，〈中國需要大國心態〉，《環球時報》，2002年9月12日，第4版；以及葉自成、李穎，〈中國所以必須建大國外交心態〉，《環球時報》，2001年7月20日。中國大陸人士對中共「弱國心態」的直率見解，請見吳建民，〈中國摒棄弱國心態還有長路要走〉，《中國青年報》，2006年3月21日，此篇文章作者引用公開資料中心(Open Source Center, OSC)的翻譯版本，OSC前身為國外廣播情報處(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FBIS)。

10 2002年11月，江澤民在第十六大進行工作報告時，首次使用這種用詞。亦可參考潘相陳編，《最高決策：1989之後共和國的方略》，北京，中國：中央黨史出版社，2004年，第783–806頁。

11 Swaine and Tellis, 2000, pp.1–20; and Michael D. Swaine, "China: Exploiting a Strategic Opening," in Ashley J. Tellis and Michael Wills, eds., *Strategic Asia 2004–2005*, Seattle, Wash.: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04, pp.67–101.關於中共發展核武的動機，詳見John Lewis and Xue Litai, *China Builds the Bomb*,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2 關於中共政策造成的安全困境，請見Zhang Yunling and Tang Shiping, " 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in Shambaugh, 2006, p.49.兩位作者聲稱1970年代晚期，中共剛開始走進國際社會之時，鄧小平就已經受到李光耀提醒，了解這種安全困境。但如果是這樣，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中共針對東南亞的外部行為和決策，顯然沒有顧及到這種安全困境。這種情況到1990年代中期才有所改善。Goldstein, 2005, and Michael Glosny, "Heading Toward a Win-Win Futur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hina's Policy Toward Southeast Asia," *Asian Security*, Vol.2, No.1 2006, pp.24–57.

13 王逸舟，〈樹立世紀之交的國家安全觀〉，《瞭望周刊》，1999年9月13日，作者引用「公開資料中心」(OSC)的翻譯版本；王逸舟，〈面向21世紀的中國外交：三種需求的尋求及其平衡〉，《戰略與管理》，1999年12月，作者引用公開資料中心的翻譯版本。

14 M. Taylor Fravel, " Regime In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plaining China's Compromises in Territorial Dispu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0, No.2, November 2005, pp.46–83; and Allen Carlson, *Unifying China, Integrating with the World: Securing Chinese Sovereignty in the Reform Er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49–91.

15 Huang Renwei, "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for a Rising China," *SASS Papers*, No.9,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Press, 2003, p.98.

16 溫家寶，〈關於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新華社》，2007年2月26日，作者引用公開資料中心的翻譯版本。

17 王逸舟，1999年。

18 Fairbank, 1968, pp.1–19; Yong Deng, "Better Than Power: International Statu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Yong Deng and Fei-Ling Wang, eds., *China Rising: Power and Motivation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pp.51–72; Wang Hongying, "National Image Building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1, No.1, March 2003, pp.46–72;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有趣的是，中共目前認為「綜合國力」是國際地位組成要素，詳見Michael Pillsbury,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C.: Not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03–258.

19 這個看法強烈顯示在Yong Deng, *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 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0 Johnston, 2008; Johnston在第三章特別提到形象和聲譽是截然不同的概念。聲譽帶有較多的工具傾向，希望透過社會認可行動方式得到其他國家接受，進而獲得一些實質利益。相對之下，形象本身就是追求目標，為了得到國際社會接受，表現出來的特性和特徵必須符合社會期待。

21 Alastair Iain Johnson, "International Structures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4th ed.,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8b, pp.55–90; 近期樹立形象和聲譽的外交工作，詳見〈大國的負責與大國的心態〉，2005年。

22 Thomas Christensen, "Chinese Realpolitik: Reading Beijing's World-View,"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6;更清楚的論述，詳見Alastair Iain Johns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a.

23 〈王毅談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外交政策〉，2004年9月4日；黃仁偉，2003年；王紅纓，2003年，第46–72頁。

24 關於國際地位的問題，詳見〈王毅談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外交政策〉，2004年；王逸舟，1999b。

第三章
中國大陸國際安全環境現勢觀點

中共高層對於外交政策的制定，係以外部安全環境評估所積累的經驗為基礎。當中共內部針對外交目標與政策方向進行論辯時，外部安全環境評估往往扮演整體考量的角色；因此，若安全環境的觀點改變，中共國際行為亦將隨之產生變化。[1] 本章將就六大主流觀點，探討中共決策者與分析家當前所特重之安全環境面向。[2]

在此之前，首先必須先針對兩項影響中共當前安全環境觀點的基本主張加以說明。第一項廣為接受的主張為，中共未來必將(並且會逐漸增加)與國際社會緊密連結。中共領導階層瞭解中共現行之成長模式與全球化進程息息相關，因此無法自外於國際社會。欲達成國家復興目標，中共亟須仰賴持續而密切與全球和區域強權、市場及組織產生互動。2008年中共國防白皮書指出：「中國的前途命運日益緊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運聯繫在一起。中國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繁榮穩定也離不開中國。」[3] 儘管2008年秋天發生全球金融危機，造成中共經濟成長急速下滑，胡錦濤仍然在200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再度確認，中共融入全球經濟的方向正確且應該持續進行。[4]

第二項主張則是，中共高層和學者普遍無法確定威脅的範圍和程度。對某些人而言，中共目前正處於兩百年來最安全的環境之中，全球影響力和國際地位都在持續上升。但也有人認為，中共仍然面臨多種安全威脅且數量漸增，正挑戰中共完成大國復興使命的能力。此兩種觀點之間的相互較勁，體現在中共主要的安全評估中(例如每兩年撰寫一次的國防白皮書)；但這些辯論實際反映在中共政策上卻相當有限。由於領導階層強調決策共識，並且在中國共產黨內部推動思想統一，故在實際決策上，此種辯論所造成的影響已經獲得相當程度的和緩。[5] 中共的評估報告(包括公開和內部)最終對此所做出的結論是，應在外部威脅和機會之間取得相對平衡，而這樣的結論也就成為中共看待未來國際安全環境的重要指標。

中共當局目前的立場，持平而言是認為正處於「有利」持續成長和發展的外部安全環境。如同後續文章所表述，整體考量多項因素後，中共領導階層相信當前環境應可為中共持續發展綜合國力和建設「小康社會」提供20年的戰略機會之窗。如果可以的話，中共高層希望盡可能延長這項契機的時間。

大國衝突

中共對於外部環境的評估，其中一個主要且持續存在的特徵，就是認為大國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很低，因此國家發展不致於受到影響。2008年中共國防白皮書就指出：「維護和平、制約戰爭的因素持續增長……世界性的全面大規模戰爭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可以避免。」[6] 但是，這並不表示中共戰略家認為美「中」之間不可能因為台灣問題爆發

戰爭(不可否認，共軍正在針對這個突發事件積極準備中)，而是代表就一般情勢而言，中共認為主要強權之間的關係已經有所改變，彼此發生武裝衝突的危機自從冷戰過後，已經得到緩和。

這個重要結論，剛開始是由鄧小平於1980年代中期提出，和毛澤東認為世界可能「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評估完全不同。鄧小平的結論顛覆了毛澤東的悲觀看法，為其邁向國際主義的外交政策、促進經濟發展的理念奠定基礎。這項初步的定調其後由中共高層在1985年進一步加以整理，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體」。鄧小平在1980和1990年代不斷提及此項核心結論，使之成為改革時期外交政策的論述基礎；中共外交政策談話至今仍然延用這套論述。[7]

隨著1990年代晚期美「中」關係急速惡化(起因於包含中共貝爾格勒大使館遭美軍意外轟炸的數起事件)，中共內部針對「和平與發展」是否仍然適用於描述其外部安全環境，發生過一場重大辯論。在內部進行充分討論後，中共領導人做出結論，指出這項核心假設仍然沒有改變。[8] 根據這項戰略性結論，江澤民於2002年第十六大宣稱，未來20年將是中共成長發展的「戰略機遇期」。江澤民對外部環境的描述獲得胡錦濤確認，成為延續改革時期外交政策的理論依據，進而促使中共穩定進行經濟發展，或者廣義而言，積累中共的綜合國力。[9] 前中共大使沈國放就在2007年6月的演講中表示：

> 本世紀20年是中國必須緊緊抓住且可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它對於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具有戰略意義。中國的外交政策、方針

> 策略及外交活動都是圍繞這個目標制定和進行的，一切外交工作都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10]

儘管主要大國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很低，中共仍持續關注許多正在滋生的威脅，對中共、亞洲和全球穩定所產生的影響。2008年中共國防白皮書就針對這些威脅做出全盤評估：

> 世界和平與發展面臨諸多難題和挑戰。圍繞戰略資源、戰略要地和戰略主導權的爭奪加劇，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地區動盪擴散，熱點問題增多，局部衝突和戰爭此起彼伏。發端於美國的金融危機影響加深，世界經濟發展中的能源、糧食等問題嚴峻，深層次矛盾凸顯，經濟風險的聯動性、系統性、全球性特點明顯。恐怖主義、環境災難、氣候變化、嚴重疫病、跨國犯罪、海盜等問題日益突出。[11]

中共戰略家引證2000年代美國與歐盟，以及美俄之間的緊張關係，指出大國之間的衝突及矛盾正在加深，這些衝突將成為全球紛擾的來源。許多中共分析家將這些衝突主要歸因於美國實行「單邊主義」政策。中共國防白皮書，包括2008年發行的版本，不斷提到「霸權政治」是使國際安全事務不穩定的力量；這點反映中共普遍對美國外交政策與作為所抱持的看法。[12] 中共前國務院副總理及資深外交政策官員錢其琛的一份簡短發言(一個事後公開的內部直率談話中)，可以充分代表中共菁英分子如何看待目前的大國關係：

> 美國要搞單邊主義，但難以包打天下。……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大國關係將繼續保持既合作又競爭、既借重又牽制、既較量又妥協的態勢，其中合作的趨勢大於衝突的趨勢，大國之間將保持一種穩定的相互關係。[13]

從中共最新三份國防白皮書中，我們可以發現另一個中共相當關心的現象，即國際政治漸趨軍事化將成為區域和全球不穩定的來源。2008年中共國防白皮書提供了近幾年來最為明確的分析評估：「軍事安全因素對國際關係的影響上升。在綜合國力競爭和科學技術發展的推動下，國際軍事競爭更加激烈……。各國更加重視以軍事手段配合外交鬥爭，一些地區局部軍備競賽升溫，國際軍控和防擴散體制面臨重大挑戰。」[14]

對中共而言，這些趨勢反映了主要強權之間的關係，直接影響中共對亞洲安全穩定的評估(這個區域對中共具有最高的戰略重要性)。儘管「亞太安全形勢總體穩定」已經成為經濟日益相互依存和多邊組織影響力的來源，中共高層仍然相當關心美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2008年中共國防白皮書就指出：「美國保持對亞太地區的戰略關注和投入，強化軍事同盟，調整軍事部署，增強軍事能力。」[15] 此外，中共亦擔心宗教、種族、資源和領土爭議，可能會在中共周邊地區激起有限、局部的衝突。

全球化和多極化

中共如何看待全球化的影響，以及國際關係趨向多極化發展，

係中共解讀其外部安全環境的核心要件。他們以對這兩種趨勢的定見，做為測度經濟實力、全球相互依存度，以及持續發展所需戰略空間與時間的重要指標。

全球化

中共決策者和學者指出，全球化已然於冷戰結束後重新界定國際間的政經互動關係，對中共而言，此種現象將導致機會與限制並存。兩者相較之下，他們認為全球化提供的機會大於限制。全球化強化了經濟實力的重要性，加深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提高了經濟互惠合作的機會。因此，中共高層強調在全球化的世界，應該重視經濟外交的價值，並具備「軟實力」。他們認為這些趨勢有助於中共從中獲益，使其得以擴張影響力。針對中共如何看待全球化帶來的正面影響，沈國放如此表示：

> 以全球化為代表的歷史大趨勢及其造成的體系轉型在根本上是有利於中國和平發展的，給中國帶來更大戰略空間和迴旋餘地。
>
> 一方面，全球化下各國各經濟體相互依存不斷加深，各國更加重視並加強經濟外交，世界各國和各民族之間利益多元化、政治多極化和文化多樣性趨勢在不斷加深。
>
> 另一方面，全球化造成的衝擊改變著世界政治和地區政治，塑造著新的國家行為，也向世界各國提出了構建和諧世界的要求。規則全球化時代外交新思維已成為世界各國矚目的一個新課題。[16]

同時，中共分析家亦注意到全球化的代價和危機：全球化讓經濟和社會的不公平現象更加惡化，已發展國家從包含中共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獲得不均衡的利益，導致發展中國家受到西方經濟和科技優勢的支配，逐漸形成「南北關係」緊張和「新經濟殖民主義」。對中共而言，這些趨勢並不全然有害。南北關係緊張和不公平現象，讓中共得以在全球化受益國和受害國之間，扮演雙方的橋樑，因為中共有能力同時和兩大集團進行溝通。對中共而言，這個角色可以提升中共的信譽，擴張其在發展中國家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力。[17]

多極化

冷戰結束之後，中共分析家大多預測世界將從兩極體系快速進入先是由美國主導的單極體系，最終成為多極體系的世界格局。然而令中共失望的是，1990年代大國之間朝向多極體系演進的速度，遠遠慢於預期。中共決策者對於美國維持單極主導地位的能力，既驚訝又關切。中共許多分析家原本認為冷戰結束後，亦即1990年代早期的「國際格局」應該是「一超多強」，而且最終成為多極體系是大勢所趨。但是到了1990年代晚期，由於美國出乎意料地持續掌控世界經濟和軍事權力的主導地位，中共人士普遍把國際格局修正為「一超更強，多強不強」。[18] 多極體系發展緩慢，以及特別是美國維持全球主導地位的能力和單方面使用武力促進利益的傾向，已經成為中共高層和戰略家長期關注的對象。

然而，此種觀點不久便發生變化。近五年來，許多中共人士評估認為，全球秩序的鐘擺，必將大幅擺向多極體系。這是目前中共

官方的決策，亦是中共在政策制定及執行上的重大發展。胡錦濤2007年10月在第十七大所發表的報告，是迄今最樂觀的評估，報告中提及：「世界多極化不可逆轉。」這個觀點比江澤民在2002年第十六大所做的報告更加明確，因為江澤民認為多極化的「趨勢」是在「曲折中發展」。[19] (他在1997年第十五大報告時，保守地宣稱：「世界格局正在走向多極化。」)[20]

中共決策者和學者現在普遍認為，美國在某些事務上的相對影響力逐漸降低，因此多極化的趨勢正在加速推進。在多極化的評估中，中共指出美國是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而且經濟發展已經相對下滑。世界各國對美國感到不滿，並且刻意疏遠美國，一方面這是因為美國入侵伊拉克，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美國對恐怖主義發動全球戰爭。中共決策者和分析家認為，美國針對恐怖主義所發動的全球戰爭行為，削弱了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甚至國際合法性。一位中共資深外交官就指出：「美國單極獨霸戰略不斷遭挫，對外戰略有所收縮。」[21] 如今許多中共分析家和學者估計，真正的多極體系可能會在往後20到30年成形。

此外，中共認為多極化體系加速推進，新興強權亦在其中扮演重要推手，例如印度、巴西、墨西哥和中共以及「二十國集團」(G-20)等相關組織。中共外交官員就表示：「新興地區大國和區域集團加速崛起，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增加。」[22] 儘管中共戰略家瞭解多極體系出現仍需等候一段時間，但是他們認為新興的強權和相關國際組織將加速推進這個趨勢。2008年中共國防白皮書確認了這個觀點：

> 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深入發展。全球工業化、信息化進程加快，經濟合作方興未艾，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互聯互動進一步增強。國際戰略力量消長變化加快，大國之間合作與借重上升、競爭與制衡繼續發展，新興發展中大國群體性崛起，國際體系孕育著深刻調整。[23]

美國權力和強國關係

中共第三項主流觀點的界定與當今國際體系主要大國之間的權力分布有關。中共向來以講求「現實政治」聞名，這種考量對其決策者具有深刻影響。中共分析家經常討論評估國際之間單極體系和多極體系相互較勁的力道。如同上述，儘管過去曾經遭受挫敗，中共決策者仍然認為目前的趨勢明顯有利於多極體系成形，因為新興強權正在茁壯，美國國力相對之下則逐漸萎縮。中共對於強國關係的分析，非常著重於美國權力的消長、美國在全球政治的角色和美「中」關係。

美國目前在國際事務的相對主導地位，讓中共決策者相當不安、積怨已久，並稱之為霸權；其地位引起了中共決策者不同程度的關切。[24] 最普遍的情況是，許多中共人士擔心美國將企圖遏制中共的經濟、外交和軍事能力的發展，尤其是其遏制手段影響到中共在東亞的地位時。這種觀點普遍存在於決策者、學者、軍官和一般人民的意見之中。2008年中共國防白皮書就指出：「『美國保持對亞太地區的戰略關注和投入，強化軍事同盟，調整軍事部署，增強軍事能力……。』令中共面臨『外部的戰略防範和牽制』」。[25]

中共普遍關切美國的戰略意圖，尤其是涉及台灣的問題時，便特別敏感。美「中」之間對台灣地位的明顯差異是中共最為密切關注的議題，因為此點牽動其核心國家利益，也是最可能爆發武裝衝突的因素。美國和中共都在為這樣的衝突進行軍事準備，凸顯出互相視對方為潛在敵人的程度。大多數中共人士認為美國對台政策，特別是美國對台進行軍售，是企圖阻撓兩岸統一，以避免中共崛起最終使得美國相形失色。因此，中共認為，美國的主要戰略目標是阻礙與侷限中共崛起，而反對美國對台政策則是一項重要因素(但不是惟一因素)。

除了台灣問題之外，許多中共人士認為華府自視道德優於北京，拒絕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統治地位，並且企圖把民主制度強加於中共。他們覺得美國基於自身的優越感，因而偏好採取單邊行動和強制外交，試圖長期確保美國在國際事務上的主導地位。

中共對美國意圖的敏感與高度關切雖鮮少由官方「直接」表達，但是這些主題不斷出現在學者和分析家的著述之中，而且討論範圍遠超過軍事層面。[26] 中共許多人士把美國對「中」政策和相關辯論，例如重新評估「人民幣」的幣值、中共經濟改革、雙邊貿易逆差、中共在東亞扮演的角色，或是人民解放軍現代化，解釋為美國削弱中共和遏制崛起的作為。即使是中共主流派的重要國際關係學者黃仁偉也這麼形容美國政策：

> 美國試圖以它主導的國際規則來「規範」和限制中國的國際行為，延緩中國的發展速度，防止進而消弭中國挑戰美國霸權的潛在威脅……。

> 美國企圖提高中國進入國際體系的「民主標準」，通過西方價值觀滲透把中國從「異質異類」轉變為「同質同類」；同時利用國際體系對國家主權的侵蝕，使美國和西方力量日益影響中國的內部進程。[27]

於是，許多中共戰略家把美國政策描述為交往與遏制「並存」(相對重要性會隨著時間改變)，並將中共視為亦敵亦友。這個看法在中共決策者和學者之間已經成為定論。[28]

儘管提出這些關切，中共決策者和外交政策分析家現在還強調華府在管理全球經濟和安全挑戰上，對北京的依賴持續加深。這個看法始於本世紀初期，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機對美國經濟造成損害和G-20機制成形之後(中共自認在其中扮演主導角色)，這個看法更為明顯。針對此項觀點，黃仁偉提出以下總結：

> 一方面，美國力圖利用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來控制作為「異類」的社會主義中國，在把中國納入這個體系的同時限制中國的國際空間，防止中國的迅速崛起對美國的霸權地位構成挑戰。中美之間在國際體系轉型的發展方向和力量結構定位上存在著長期的、根本性的戰略分歧。
>
> 另一方面，中國在維持國際體系的穩定性方面，顯示出越來越重要的建設性作用，使美國意識到中國不是冷戰時期的蘇聯，不是與現存國際體系相對抗的破壞性力量。在美國維持其霸權的代價越來越高的情況下，它不得不考慮與中國合作來分擔維護國際體系的成本。[29]

中共對美國的主導地位和可能的遏制戰略表達關切之時，亦

承認美國對中共達成國家復興之最終目標依然相當重要。儘管因為感覺美國已經相對衰弱而不盡情願，但許多中共人士了解中共要達到發展目標，就必須和美國維持穩定的關係；至少與美國維持敵對關係，可能會讓中共脫離目前的發展軌道。針對中共對美國和美「中」關係看法的複雜性，中共學者王緝思這麼表示：

> 最近幾年，美國給中國人士的印象持續擴大。美國讓中國人士同時擁有許多不同的印象：曾經被中國打敗的紙老虎和因為驕傲及過度擴張導致國力下滑；影響世界和平穩定的獨霸強權；侵犯中國領土完整和阻礙國家統一的對手；驅動全球經濟，並且持續擴大對中國經濟影響力的經濟引擎；令人嚮往的社會，孕育出世界上最先進的科技和教育體制；中國可以學習的現代化模式；意識形態的驅動力量，可能改變中國的政治命運。[30]

儘管對美國擁有這些矛盾的看法，許多中共人士還是把美「中」關係視為「重中之重」。在1990年代進行政策制定之時，江澤民特別強調主導中共外交政策的美國因素。[31] 進入胡錦濤時期之後，我們並不清楚美國是否仍是主導因素。從2002年開始，胡錦濤稍微改變了美「中」關係和中共外交政策。即使不是更多，他也是把同等心思放在中共與亞洲鄰國之間的關係。胡錦濤比較重視和美國開展實質關係，而不是使用一些情緒性的字眼，使中共看起來似乎更能忍受雙方的緊張關係，並抗拒美國的要求，但同樣也更願意在現存和新領域間的共同利益上擴大實質合作。

中共主流的戰略家認為，持平而論，即便世界上權力形式相當

廣泛，同時還有其他許多重要的關係，包括和其他國家、國家集團和國際組織之間的關係，但相較之下，美「中」關係仍是中共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如此衡量美「中」關係，主要源自三個觀點。[32] 第一，美國一直是中共在經濟發展上(貿易、投資和科技)的關鍵來源。舉例而言，美國向來是中共做大的貿易夥伴，中共持有最多美國政府債券，而且是美國成長速度最快的出口市場。中美之間經濟相互依賴的程度很高，這種情況在未來20年不太可能產生重大改變。

第二，美國為亞洲區域安全穩定和航行自由提供重要的國際「公共財」，使中共可以從中獲得好處。中共亦暗自承認美國的軍事同盟、安全承諾和前進部署，對亞洲的區域穩定有重大貢獻，有助於中共過去30年的經濟改革和發展。[33] 但此種觀點在近幾年已經開始消失，因為中共變得更加關注美國企圖擴張美日同盟，以及美國和印度的安全合作。[34]

第三，中共要致力確保一個穩定和平的安全環境，就必須避免和美國發生衝突，或是在地緣政治上公然對抗。和美國進行重大戰略競爭或是直接爆發軍事衝突，將嚴重破壞中共的安全環境(這比和任何一個國家爆發衝突都還要嚴重)。此種情況如果轉趨惡化，則可能會導致中共將國家資源從經濟發展轉移至軍事現代化，這是中共領導人所不樂見的結果。中共學者在相關文章中提及，中共崛起需要「時間」和「空間」，並且必須和美國維持穩定關係，這兩項都相當重要。當然，中共分析家亦認為儘管中共崛起必須和美國維持穩定的關係(即便不是友好)，但這並非是一個全然的關係。[35]

為了和美國在各種利益之間達到平衡，部分中共戰略家主張中共可以試著接受美國稱霸的現實，同時反對其霸權行徑。換句話

說，只要不直接危害到中共利益，中共可以接受單極強權的世界格局。這項區隔使中共決策者和分析家得以在美「中」關係穩定的需要，和關切美國主導地位及華府單邊使用武力之間取得平衡。至於這個構想在中共高層領導人之間是否被廣泛接受，目前尚不得而知。[36]

從2004到2005年這段時間，中共對美國權力及其對中共造成的影響，已經不再像過去那麼敏感關注，因為中共分析家認為美國在政治上已經受到許多國家排斥，美國的影響力正在減弱，其相對的衰退也在加速。例如，中共分析家不斷談到美國的全球地位受到中東情勢制約。黃仁偉對此表示：

> 於是，美國正在陷入挑戰國際體系的怪圈，它維持現存國際體系的戰略資產和破壞這個體系的戰略負債相抵，已經越來越入不敷出，從而動搖其帝國霸權的基礎。這是當代國際體系轉型中一個非常特殊而重要的現象，也是中國參與和融入國際體系的重要戰略機遇。[37]

非傳統安全挑戰

最近五年，特別是發生911恐怖攻擊之後，中共官方和分析家已經開始重視非傳統安全挑戰可能對中共帶來利益的威脅，包括恐怖主義、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毒品走私和人口販賣、環境惡化、傳染病擴散和天然災害。中共領導階層、決策者和分析家認為這些威脅的出現，可能且已經直接劇烈影響中共的外部安全環境。沈國放就認為：

> 非傳統安全威脅更加突出，各種新的全球性、跨國性問題層出不窮，能源市場價格高拉波動、氣候變暖、生態危機、貧富差距、跨國犯罪、重大傳染性疾病頻發，國際安全形勢不容樂觀。[38]

十年前，很少會有中共領導階層對此表示關切，但是今日他們已普遍接受這種看法。這種轉變很大部分來自中共自身處理此種非傳統危機的經驗，例如911事件、2003年爆發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持續不斷的禽流感問題、愛滋病在中國大陸快速蔓延的危機和區域核子擴散。中共外交部就提到非傳統安全問題「空前複雜和具破壞力……直接威脅世界和平及安全。」[39] 2006年7月，胡錦濤在俄羅斯舉辦的八大工業國(G-8)高峰會演說中，就鎖定這些問題，指出防範非傳統安全威脅是國家政策的優先項目，並且大致提出處理這種挑戰的方案。這是第一次有中共最高領導人如此詳細談論非傳統挑戰。[40]

中共在2000年代初期之所以突然重視非傳統安全挑戰，自有其策略性考量。第一，911事件之後，北京開始強調反對恐怖主義和武器擴散，是希望為穩定和擴大美「中」關係奠定基礎。中共決策者認為911事件和美國國家安全優先項目產生改變，為維持雙邊更加長期的穩定關係提供難得的機會。中共領導人相信911事件之後美國優先項目改變，使中共得以不再成為美國國家安全計畫的焦點對象。的確，中共決策者和分析家目前就不斷強調美國「仰仗」與中共合作，共同處理非傳統安全挑戰。[41]

第二，中共相當重視藉由非傳統安全挑戰議題，與東亞鄰國尤

其是區域論壇進行互動，以提升其影響力。中共已經就非傳統安全挑戰議題，和許多亞洲國家進行雙邊及多邊會談，做為擴大政軍交流範圍的基礎；北京業已就諸如爆發傳染病的處理方式，擴大和東亞周邊國家的外交實質合作。此外，中共就非傳統挑戰進行的雙邊和多邊對話，有助於中共對周邊國家營造溫和及合作形象。這種對話亦可凸顯中共和美國近幾年重視和東南亞國家，就反恐議題進行區域安全對話和聯合作戰行動的差異。中共希望強化參與「亞洲的」國家安全概念，這個概念不只關係到軍事安全，還包括東南亞國家重視的優先議題，例如國內穩定、經濟發展，並且以共識為基礎解決兩國爭端。

能源安全風險[42]

中共強烈關切能源供應問題的時間相對較晚，但卻是影響其國際行為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和中亞、中東及非洲重要供應國的關係。2000年代初期，當中共的經濟成長和能源需求「翻兩翻」時，中共進口石油和天然氣的需要，便成為相當急迫的議題。1980至2000年這段時期，中共的國內生產毛額(GDP)雖然快速成長，但能源需求增長相對較慢。到了2001年，中共經濟成長的速度超乎預期，使經濟活動仰賴的能源供應呈現相當緊張的狀態，能源需求成長速度已經超越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這種倍數成長的情況，導致能源需求急劇攀升，包括工業活動和運輸的需要。即便中共在1993年正式成為石油淨進口國，過去卻沒有基於國家快速成長，妥善防備可能造成的能源緊張。這個情況導致許多省份短缺石油和煤，而且發

電量長期不足。這種對能源物資需求急劇攀升和相對的不足，將能源安全議題推入中共外交政策議程，使中共能源公司瘋狂想要確保能源供應管道。[43]

在中國大陸，能源安全牽涉到兩個問題：價格變動和運輸安全。中共認為自身在這兩方面都相當脆弱，而這種看法亦塑造了中共的外交政策。中共對能源安全政策之所以如此認真重視(剛開始還有點慌亂)，主要原因是中共對原油的需求快速成長，進而增加對進口原油的依賴。中共在2001年每天需要進口160萬桶原油，到2007年已經增加到410萬桶；而這種消耗程度，中共原本預期至2020年才會達到。中共在2003年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耗國(僅次於美國)，並且在2004年成為世界第三大石油進口國(僅次美國和日本)。[44] 2008年，中共國家石油需求總量的45%仰賴進口，其中76%的原油來自中東和非洲(光是中東就占45%)。[45] 這些數字還應該這麼繼續談下去：進口原油只能滿足中共10%的能源總需求。

至少有三個地緣政治考量，驅使中共相當關注運輸安全。[46] 第一，中東並不穩定(中共最依賴這個地區的原油進口)，而且能源供應中斷的風險很高(相較之下，非洲就沒有那麼不穩定)。2003年伊拉克戰爭後，中共分析家特別關心中共對中東石油的依賴。中共部分人士認為，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很大程度上是美國希望控制伊拉克的石油資產，並且增加美國操控全球石油市場的籌碼。中共一份重要分析報告就這麼斷定：「毫無疑問，美國打贏伊拉克戰爭之後，明顯強化對世界石油資源的控制。」[47] 順著這個思考邏輯，中共分析家評估認為，美國在中東大量駐軍，使中共未來石油供應被美

國硬生切斷的可能性大幅上升。第二，從中東和其他地區進口石油需要長程的海上運輸，但中共卻無法獨立提供保護。麻六甲海峽對中共來說是海上運輸進口石油的關鍵通道，但中共海軍卻沒有維持海上秩序的能力。根據媒體報導，部分中共決策者將這個弱點稱為中共的「麻六甲困境」，儘管尚不清楚這個特殊用語的出處和真實情況為何。[48] 第三個海上運輸的弱點，是中共有90%的石油進口仰賴外國油輪公司。這三個令人擔心的情況，驅使中共致力透過外交手段，獲得產區更靠近中國大陸的能源，並藉由輸油管和陸上運輸方式，免去被中途切斷的可能性。

中共在國際事務的崛起[49]

「中國崛起」於國際事務，是中共觀察當前安全環境時，全新且廣泛存在的要素。「中國崛起」這個概念不只影響其制定政策，也是中共全球外交的主題焦點。從決策者和分析家的評論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共對自身成就和全球影響力充滿自信。許多中共人士認為，當世界變得更多極化且美國權勢相對衰弱之時，中共已經成為更具影響力的國際成員。中共前副總理錢其琛在內部談話中就這麼表示：

> 可以說，21世紀不可能是「美國世紀」。不是美國人不想，而是它不能。這在伊拉克問題上已經得到說明。美國要搞單邊主義，但難以包打天下……。談到新世紀的國際關係，不能不談到中國。中國是當今世界最為活躍的一支力量。我國的迅速發展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50]

中共會如此自信，部分原因是他們認為許多周邊國家在貿易和投資上，對中共的依賴持續加深。中共分析家把中國大陸說成「巨大世界市場」、「巨大商業船艦」或是「商業巨人」，在世界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藉由其巨大規模和遍佈全球的經濟力量，中共相信他們在亞洲和其他地區，已經擁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中共2008年國防白皮書就這麼表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成就舉世矚目。」[51] 另一份外交部文件也指出：「中國強大的經濟潛能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體系轉型的背景下獲得釋放。」[52]

除了經濟力量的感受之外，中共決策者和分析家亦重視積極參與多邊組織，以及在諸如北韓核武危機等區域安全事務的管理角色，以積累更多地緣政治影響力。2008年國防白皮書就首次強調這種看法：「中國在多邊事務中積極發揮建設性作用，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顯著提高。」中共一份重要分析報告指出，中共積極參與區域議題將促成「亞洲出現新的地緣政治形態。」[53] 中共學者黃仁偉則提出更廣泛的說法：「在國際體系轉型的主要動力中，中國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力，中國實際上已經成為國際體系轉型的主要參與者和建設者。」[54]

以這些成就為基礎，中共分析家和決策者現在經常討論如何運用全新的國際地位，形塑主要國際組織的規則和規範，使其和中共利益相符。[55] 沈國放在2007年6月的演講中，針對這些論點做出以下總結：

> 中國經濟快速成長，政治與外交影響力逐步擴大，綜合國力大幅增強，國際地位明顯提高，對國際格局正在產生深遠影響……。自身

> 具有的獨特優勢和影響力要求我們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
> 中國應該通過在各類磋商和國際規則制定中發揮實質性作用，增強議程設置能力，提高利用規則能力，更積極主動參與國際事務和多邊制度的建設。[56]

中共分析家認為，中共致力「崛起」，並沒有引起全球反彈：已經有效降低亞洲各國對中共經濟和軍事力量崛起的恐懼。中共分析家強調，中共在外交事務上講求合作，施行的戰略是融入當前國際體系，並且反對推翻此種體系的企圖。這些分析亦經常強調中共講求「共同利益」和「新安全觀」，凸顯中共對經濟相互依存、區域整合和多邊安全合作的重視。因此，中共許多分析家認為中共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在國際關係中大幅成長，其軟實力雖然尚在初始階段，但已經與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和反恐政策所激起的國際不滿，形成強烈對比。[57]

中共分析家接著指出，在國內經濟發展和融入全球的崛起道路上，並非完全沒有代價和風險。中共決策者非常瞭解過去崛起強權所經歷過的問題，因此他們特別希望避免像日本帝國、1930年代德國和20世紀蘇聯一樣，使用容易引起衝突的方式。基於這些考量，中共領導核心在外交口號上，最終選擇以「和平發展」替代之前使用的「和平崛起」；後者較有傲慢和對抗的意味在裡頭。[58]

最後則是，中共分析家也意識到，透過國際貿易和外國投資追求國內發展，而將經濟資產過度集中在東南沿海，已使得其防範海上威脅的能力更加脆弱。其他弱點還包括：中共仰賴外部需求

(主要來自美國和歐盟)支撐經濟成長、仰賴全球海運線進行貿易活動，以及日漸需要開放來自外國的投資、技術、天然資源以促進經濟現代化。因此，儘管中共分析家瞭解中共國際地位增長並與全球經濟整合，能為其帶來許多利益，但也承認此狀態有其風險和弱點。

註釋

1 針對中共如何評估自己的外部環境，下列著作提供有趣的論點，請見Tang Shiping, "A Systematic Theory of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27, No.1, March 2004, pp.1–34; and Tang Shiping, "From Offensive to Defensive Realism: A Social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Security Strategy," in Robert S. Ross and Zhu Feng, eds., *China's Ascent: 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41–162.

2 這個章節引用大量中共人士對國際環境的評估，包括張幼文、黃仁偉合編，《2008中國國際地位報告》，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8年；張幼文、黃仁偉編，《2007中國國際地位報告》，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7年；張幼文、黃仁偉合編，《2005中國國際地位報告》，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5年；張幼文、黃仁偉合編，《2004中國國際地位報告》，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4年；《2004–2005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北京，中國：時事出版社，2005年；《2003–2004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北京，中國：時事出版社，2004年；以及《2001–2002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北京，中國：時事出版社，2002年。
官方評估包括《2008年中國的國防》，北京，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9年1月；《2006年中國的國防》，北京，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6年12月；《2004年中國的國防》，北京，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4年12月；以及《2002年中國的國防》，北京，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2年10月

3 《2008年中國的國防》，2009年。

4 車玉明和周英峰，〈中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聚焦「保增長」〉，《新華社》，2008年12月8日，作者引用公開資料中心(OSC)翻譯版本。

5 針對安全環境的看法，外交部和軍方並沒有存在明顯的分歧。這種分歧涉及整個政府機構、軍方和研究單位。本章註釋2所提到的著作內容，有很清楚的分析。

6 《2008年中國的國防》，2009年。

7 鄧小平對外交事務的官方思維，下列著作做了詳細且深入的回顧，請參考宮力，〈鄧小平對美政策思想與中美關係〉，《國際問題研究》，2004年第6期，第13–17頁；亦可參考Ren Xiao,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etical Discourse in China: A*

Preliminary Analysis, Sigur Center Asia Papers, No.9, Washington, D.C.: Ellio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00; and Zhang Wankun Frankl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Strategies Under Mao and Deng: A Systematic Comparative Analysis*, Public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Working Paper Series,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8.

8 關於「和平與發展」的初步探討，請見David Finkelstein, *China Reconsiders Its National Security: The Great Peace and Development Debate of 1999*, Alexandria, Va.: The CNA Corporation, December 2000. 想要了解中共為何需要這種理論性評估，對中共有什麼價值，請見Ren Xiao, 2000。

9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報告於中共第十六大會議，2002年11月8日。

10 沈國放，〈中國新外交的理念與實踐〉，《世界知識》，2007年第13期，第43頁。此文為2007年中國國際問題論壇「和諧世界理論與中國新外交」的主題發言，由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主辦，2007年6月在北京召開。

11 《2008年中國的國防》，2009年。

12 《2006年中國的國防》，2006年。

13 錢其琛，〈新世紀的國際關係〉，《學習時報》，2004年10月18日。這篇演說對美國外交政策大加批判，原本僅供中共黨校使用且無意公開。同年，這篇文章卻意外被刊載在中國日報。

14 2004年國防白皮書提到「軍事因素對國際格局和國家安全的影響上升」以及「軍事力量對保障國家安全的作用進一步凸顯」；兩句用詞的內涵都是從之前的評估轉變而來；2006年國防白皮書提到「世界新軍事變革向縱深發展，以信息化為主要特徵的軍事競爭加劇。《2004年中國的國防》，2004年；《2006年中國的國防》，2006年；《2008年中國的國防》，2009年。

15 《2008年中國的國防》，2009年。

16 沈國放，2007年。

17 《2003–2004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2004年，第124–143、198–200、240–254頁。亦可參考沈國放，2007年，第42–43頁。

18 2005年6月，作者在北京及上海和中共分析家及學者進行訪談；關於第一個用詞，請見Phillip Saunders, " China's America Watchers," *China Quarterly*, Vol.161, March

2000, pp.41–65.

19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報告於中共第十七大會議，2007年10月15日。

20 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報告於中共第十五大會議，1997年9月12日。

21 沈國放，2007年，第42頁。

22 沈國放，2007年，第42頁。

23 《2008年中國的國防》，2009年。

24 中共對美國主導地位的各種關切，詳述於潘相陳，2004年，第807–813 頁; Yong Dong, "Hegemony on the Offensive: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U.S. Global Strateg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16, No.3, 2001, pp.343–365; Jia Qingguo, "Learning to Live with the Hegemony: Evolution of China's Policy Toward the U.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4, No.44, August 2005a, pp.395–407; Samantha Blum, "Chinese Views of U.S. Hegemon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2, No.35, 2003, pp.239–264; Wang Jisi, "China's Search for Stability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84, No.5, September/October 2005, pp.39–48.

25 《2008年中國的國防》，2009年。

26 潘相陳，2004年；黃仁偉，〈國際體系轉型與中國和平發展道路〉，《國際體系與中國的軟力量》，上海，中國：時事出版社，2006年；鄧勇，2001年；Blum, 2003.

27 黃仁偉，2006年。

28 潘相陳，2004年。

29 黃仁偉，2006年。

30 王緝思，"Reflecting on China," *American Interest*, Summer 2006.

31 中共的官方看法和其它重要外交政策用語，編列於潘相陳，2004年，第783頁。

32 黃仁偉，2006年；賈國慶，2005年a；王緝思，2005年。

33 王緝思，2005年；賈國慶，2005年a。

34 關於這點，請見Wu Xinbo, " The End of the Silver Lining: A Chinese View of the U.S.-Japanese Allianc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9, No.1, Winter 2005/06, pp.119–130.當然，也有一些中共人士認為美國的區域軍事同盟只會對中共造成安全威脅。

35 黃仁偉，2006年。

36 王緝思，〈美國霸權的邏輯〉，《美國研究》，第17期第3卷（2003年秋季號），第28–40頁。亦可參考王緝思，2005年；以及賈國慶，2005年a。

37 黃仁偉，2006年。

38 沈國放，2007年，第42頁。

39 《中國外交》（2004年英文版），北京，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第6頁。

40 G-8高峰會期間，中共於聖彼德堡參加成員國和發展中國家的對話會議。因為中共並非G-8成員，所以這份演說只能在此背景之下進行發表。〈胡錦濤在八國集團同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會議上的書面講話〉，《新華社》，2006年7月17日，作者引用公開資料中心翻譯版本。

41 此種觀點詳述於Swaine, 2004, pp.67–101.

42 這個部份引用下列資料來源：張幼文和黃仁偉編，《2004中國國際地位報告》，2004年，第249–271頁；《2003–2004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2004年，第210–221頁；《2004–2005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2005年，第45–62頁。

43 Erica Downs, “China’s Energy Ris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March 27, 2009; Erica Downs, *China*, the Brookings Foreign Policy Studies Security Serie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December 2006b.

44 然而，我們需要放眼全球，對這個數字做進一步探究。2005年，美國石油消耗的增加量更勝中共。同時，根據國際能源署的統計數字，中共在2005年每天消耗660萬桶石油，只有美國2,080萬桶的三分之一；中共每天進口300萬桶石油，只有美國1,350萬桶的四分之一。

45 田春榮，〈2006年中國石油進出國概況分析〉，《國際石油經濟》，第3期，2007年，第16–17頁。

46 除非有特別指明，不然這個部分大至是引用下列資料：《2001–2002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第五章，2002年；《2003–2004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第十章，2004年；《2004–2005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第二章，2005年；以及張幼文和黃仁偉，2004年，第249–271頁。

47 例如，某位分析家認為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是一石三鳥的戰略：「第一，美國可以保證自己的石油供應。第二，可以避免伊斯蘭極端勢力合流，防止『石油武器』被運用來危害美國經濟。第三，控制伊拉克石油供應有助於完成美國全球戰略」，

張幼文和黃仁偉，2004年，第249–271頁。

48 Ian Storey, “China’s ‘Malacca Dilemma,’” *China Brief*,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Vol.6, Issue 8, April 12, 2006.

49 這個部分大量引用張幼文和黃仁偉，2004年，特別是前言和第一章；亦可參見黃仁偉，2003年。

50 錢其琛，2004年。

51 《2008年中國的國防》，2009年。

52 沈國放，2007年，第42頁。

53 楊潔篪，2008年，第91頁。

54 黃仁偉，2006年。

55 溫家寶，2007年。

56 沈國放，2007年，第42頁。

57 黃仁偉，2006年、2003年；張幼文和黃仁偉合編，《2005中國國際地位報告》，2005年；溫家寶，2003年。

58 中共的相關辯論，請見Glaser and Medeiros, 2007.

第四章
中共外交政策目標

中共目前有五項外交政策「目標」，包括促進經濟發展、再三保證安全、對抗遏制、分散天然資源獲取管道，以及壓縮中華民國國際空間。而這五項外交目標事實上是來自中共透過其歷史透鏡對世界的觀察、長期以來的外交要務，以及如何看待當前安全環境所共同呈現出來的結果。這五項目標和中共長期以來的外交要務有所不同，因為這些目標更加明確，更能反映當前觀點；也因此更能配合內部或外部情況，靈活做出調整。

這些目標是建構中共當前國際行為的核心要素。在多數情況下，這些目標會反映在中共對安全環境的回應上，也會在中共形塑經濟發展、維護主權和提升國際地位的環境時反映出來。中共政府部門的談話或出版品有時會透露部分外交政策目標，但這並非全部；其他目標必須從中共的文獻和政府行動來進行推斷。重要的是，隨著國內和區域局勢及時間變化，中共對各個外交政策目標的重視程度有所差異；這些差異將留待本書第五章和第六章，分析中共外交政策行動時再來解釋。

洞悉官方政策

分析當前中共外交政策目標之前，必須先瞭解中共官方對於指導外交政策戰略方針的正式說法或「提法」；中共外交政策的概念主體就是由這些「用詞」所建構。瞭解這些概念非常重要，因為吾人可以從中看出中共高層如何界定和陳述外交目標，以及如何和其他國家進行溝通。

分析中共「外交工作」指導方針的意涵和價值之前，必須先做出兩點提醒。第一，這些指導方針的概念會持續發展，並且和之前的提法產生差異。也就是說，這些「用詞」的意涵會隨著時間而改變。在共產黨內部，這種指導方針甫經提出之時，往往不具太大意涵（而且通常和前任領導人的提法大致相同）；然而，經過實踐和局勢改變之後，會進一步得到發展。有些指導方針則會逐漸被淘汰，但很少被立即推翻（如此才不會顯得不尊重前任領導人）。

第二，這些指導方針必須在黨「堅持原則，但保持彈性」的傳統定見下運作，中共領導人因而得以在效忠共產黨的政治前提下，偶而採取和指導方針抵觸的作法。這種實踐方式在列寧主義政治系統相當常見，但是儘管解釋上可以保持彈性，然而這些指導方針不論是對外交政策做出限制還是推動，仍有其一貫的實質影響力。

形成中共當前外交政策的基礎，至少可區分為下列三個概念：

全方位外交

中共高層用「全方位外交」一詞，來陳述其更為積極而穩固的外交政策。剛開始探討這個用詞的價值時，聽起來相當空泛，而且

官方解釋付之闕如，但是針對中共文章進行分析後，可以發現這個用詞使中共外交政策具有特殊且全新(或重新強調)的層面。「全方位外交」政策意指中共當前作法已經和過去的指導原則有所不同，例如，不會著重意識形態採取「一邊倒」的方式。[1] 這個用詞目的是為了強化(包含內部及外界的)想法，使他們瞭解中共外交政策將持續置重點於保護中共的國家利益(例如主權、發展和尊重)，而不再像過去總是受到意識形態的羈絆。全方位外交也意味著中共外交政策本質會更為廣泛：其將與世界各國交往，包括已發展和發展中國家，並遍及各個區域，例如非洲、中東、拉丁美洲、歐洲和亞洲。中共外交政策將樂於接受所有國際關係的互動模式(雙邊、多邊和區域)，包含經濟、政治、軍事、科技、文化、教育和觀光事務。中共2006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報告就這麼指出：「中國已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2] 因此，全方位外交是為了傳達，中共領導階層支持高度參與國際及非意識形態的外交政策。

和平發展

如同第三章所述，自1980年代中期開始，中共領導階層就已經將「和平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體」，定調為中共改革時期的基礎外交政策。最近幾年，這個基本用詞衍生為兩種新型式。中共領導階層現在強調「和平、發展與合作」三位一體是中共外交的基本原則；增加「合作」一詞是胡錦濤的創新意見，目的是為了強調中共會與多邊組織合作的承諾。其次則是中共領導階層在多邊和雙邊外交上，亦日益重視「經濟發展」這個主題。中共積極和外國發展經濟關

係、改變對外援助作法、開展雙邊經貿和金融對話、積極參與聯合國事務，充分體現「發展」一詞做為指導方針的重要性。此外，「和平發展」概念已於2004年成為中共外交政策的重要正式用詞。該用詞顯示中共致力避免犯下過去崛起強權所犯的錯誤，希望透過積極參與國際政治的方向和作法，向其他國家作出安全保證。藉由這個概念，中共正向外國傳達在它走入國際體系的同時，將會充分重視其他國家的利益，不會以軍事競爭為手段，達成國家復興的目標。[3]

和諧世界

胡錦濤從2005年開始呼籲在國際事務上建立「和諧世界」。這項原則是將胡錦濤建構國內「和諧社會」的政策，進一步推行於國際。目前，「和諧世界」和「和諧社會」的意涵尚未明確。由於這完全是胡錦濤個人提出的意見，因此在2012年第五代領導人接班之前，「和諧世界」或許會成為中共外交的關鍵原則。[4] 儘管這項原則發表的時間很早，但胡錦濤對和諧世界的願景，直到2006年8月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召開時，才有進一步發展。對胡錦濤而言，和諧世界意指世界各國相互尊重國家主權、包容差異(包括國家政治體制和價值觀)，並且以公平分配經濟利益的原則推動國家發展。儘管這些想法是中共傳統的外交原則，但仍然反映胡錦濤在外交政策上，界定一套不同策略所做的努力。[5]

胡錦濤的「和諧世界」概念是否或如何見諸於實質外交政策，將隨著時間演進而得到答案。此概念包含兩個層面：第一，和諧世界觀意味著中共領導人將不再以反動好戰的傳統觀點看待外交事

務，並用來與諸多外國強權(例如霸權和強權政治)進行「鬥爭」。這項轉變始於2006年外事工作會議，此後愈來愈多跡象指出，此轉變正在產生作用，吾人至少可以在官方的發言看見端倪。胡錦濤在第十七大發表的工作報告中，首開前例未提及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這個用語最早是由鄧小平在1988年的報告中提出，其後在各次黨代表大會報告上都會出現，幾乎已經成為中共外交政策的標準詞彙。胡錦濤在2007年的報告中，對當前國際體系使用了較不具挑釁意味的用語取而代之，其表示中共將「推動國際秩序朝向更加公正公平的方向發展」。[6] 此外，目前中共媒體已經很少使用「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這個用詞，並將其視為外交工作的「任務」；而是使用「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這個新說法。[7] 中共官員目前亦對「多極化」主張採取輕描淡寫的態度，因為部分中共人士認為這會被視為意圖暗中遏制和抗衡美國。針對此點，中共政府部門目前在談論國際關係時，一般只是主張擴大「多邊主義」，因為如同上述，這已經是胡錦濤的重要外交論調。[8]

胡錦濤「和諧世界」概念的第二個層面是強調中共已經與國際社會緊密連結。他希望中共各單位都能更加體認運用緊密鏈結國內與國際事務的方式，推動整個政府更好的政策協調。據說他認為中共外交工作過去出現許多問題，正是因為缺乏這種協調。媒體報導，2006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中，「國內國外，兩個大局」是會議最終報告的關鍵用詞。[9] 換句話說，惟有國內成員(例如，參與海外活動的法人機構)能夠理解外交政策的全面性；同時，中共外交政策亦能對國內經濟發展產生直接且實質的助益，才能推動所謂的和諧世界。

核心外交目標

經濟發展

中共外交政策和外交關係始終受到一項持續且一貫的經濟思維所驅策。此項思維可以從兩個層面來探討，一個較為傳統，另一個相對較新。第一，中共領導階層在過去30年經常提到，中共必須維持一個有利於國內持續改革、發展和現代化的國際環境。這個目標由鄧小平擬定，已經成為整個改革時期的核心外交政策目標。[10]此口號不只具有宣傳效果，背後更有其真實意涵。中共外交政策希望把周邊威脅降到最低(例如俄羅斯、東亞、南亞和中亞地區)，避免國家資源偏離經濟改革，使中共領導階層窮於應付阻礙發展的挑戰。由於維持健全成長與均衡發展，攸關中共統治合法性能否延續，因此中共外交政策力圖穩定區域安全環境，儘早化解威脅於形成之初(例如領土爭議和跨國威脅)，俾確保領導階層可以持續專注經濟發展和提升其綜合國力。

隨著中共對安全環境和國家利益的想法產生改變，他們對這個核心目標的解釋亦已有所變化。為了追求經濟發展，中共現在需要花費更多心思處理跨國問題，例如使中共與鄰國關係更加複雜的環境和衛生危機。其中對抗恐怖主義則是最為具體的跨國問題，因為中共相當關切新疆和中亞的回教分離主義分子，會嚴重影響國內情勢。

第二，中共國內經濟思維在外交上愈發明顯的表徵，為運用外交政策擴大貿易、援助、投資、資源、科技，特別是增進和維持雙邊

政治關係的管道，以確保這些關鍵資源能夠源源不絕輸入與推動經濟成長；吾人可由許多新的跡象看出中共亟欲滿足國內成長與發展長期存在的外交要務。簡言之，中共要滿足國內經濟發展需要，就必須以全球為思考。就此而言，中共領導階層已將「經濟外交」列為中共外交政策新的最高優先事項。隨著中共經濟成長、全球化持續推進，其外交政策不再只是著眼於維護主權、區域安全和國際地位，而是希望能從外交加強為國內發展做出特殊貢獻。中共大使吳建民就曾表示，「五十年前，如果大使講經濟會被嘲笑，現在大使如果不懂經濟將會成為笑柄。」[11]

安全保證

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中共領導階層和分析家察覺其某些特殊政策，例如爭取南海爭議領土及1995–1996年在台海試射飛彈，已經引起亞洲鄰國關切北京的意圖，因為他們認為中共這些行為具有侵犯和威脅意味。2000年代早期，中共決策者再次注意到其經濟快速成長和軍事能力擴張，也已經引起其他亞洲強權和廣大國際社會不同程度的關切。由於逐漸感受到外國關切的壓力，中共因此決定對亞洲國家採取安全保證的區域戰略，使他們瞭解中共不僅不會危害他們的經濟和安全利益，還會有所貢獻。簡言之，中共希望讓其他國家感覺中共的崛起是個機會，而不是威脅。[12]

中共隨後實行許多針對化解其他國家憂慮的特定政策，試圖藉此塑造溫和區域成員的形象，扮演「負責任的大國」，讓其他國家相信與中共交往可以得到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好處。某種程度上，這種想法驅使中共積極參與過去長期忽視的亞洲多邊經濟和安全

組織。有關這個全新的安全保證戰略，將在第六章做進一步細部討論。從中共著名的「大周邊外交」區域政策大綱，我們可以看出很多安全保證的作為。[13] 中共於2003–2004年提出「和平崛起」/「和平發展戰略」，正是因為中共意識到這種安全困境變動，故而必須藉由安全保證來化解區域國家的憂慮。[14]

中共進行安全保證是因為擔心亞洲鄰國對這些議題的關切，會在區域內引發遏制中共或是採取聯合制衡的行動。對中共戰略家的思維演進而言，他們已然體認中共在此類亞洲安全困境持續變動中的角色，以及中共的動作已影響各國觀感。這個想法和過去幾年明顯不同，因為中共不再只是一昧抗拒鄰國各種攸關安全的關切，而總是用中共是個「愛好和平的國家」，追求平等、互利和雙贏合作等詞語加以搪塞。[15]

對抗遏制

中共第三個外交政策目標稱為對抗圍堵或對抗「遏制」。[16] 此目標涉及中共採取相關政策，降低其他國家遏制中共的意願或能力，以維持中共的影響力及參與全球事務的自主性。如同第三章所見，中共決策者、分析家和一般大眾認為，美國許多政策旨在阻礙或防止中共崛起成為強國。他們最為關切美國外交和國防政策可能產生的遏制行為(儘管他們亦關切美國的經濟政策)；許多中共人士相信美國正運用其亞洲聯盟和區域軍事部署圍堵中共。此類關切表現最為明顯之處散見於中共相關評論上，包含美日聯盟關係改變、美台軍事互動、正在成形的美印戰略關係、美國在中亞的軍事部署和美國在西太平洋增加軍事武力。

中共的主流評論便做出此等表示：「美國組建針對中共的亞洲『小北約』的努力始終沒有放棄，力圖造成日本等地區大國對中共的戰略牽制均勢。同時，美國要求中共提高軍事透明度，以便對中共的戰略動機和能力具有更清晰的瞭解。」[17] 在美「中」針對貿易和金融議題進行協商期間，中共決策者和分析家亦表達了同樣的關切。他們認為美國這些高姿態的政策，例如要求提高人民幣值和開放金融自由，是為了限制中共的成長。[18]

中共決策者很少以官方政策的形式，公開對美國意圖表示關切，因為這可能會被視為與美國進行對抗。取代此種關切的表達多半為主張更加「多極化」、建立「民主化國際關係」和建構「和諧世界」的聲明。中共發表這些聲明，其實是要暗中反對美國的單極地位和單邊政策；許多中共人士認為美國改變他國政體和採取制壓的行動，並不受國際法和國際機構認可。[19]

中共對美國的關切可謂完全反映在它的國際行為上；積極透過外交手段，促進與世界各國(特別是亞洲國家)的政治關係，希望共同建立一個環境，使美國無法透過外交和軍事合作遏制中共行動自由，特別是無法和其他亞洲國家共同制衡或遏制中共。最特殊的是，中共外交政策試圖建立一種雙邊外交關係，俾讓區域各國決策者能夠深刻感受中共對區域和全球關鍵問題的看法，特別是台灣議題。黃仁偉對此提出以下見解：

> 中國進入和參與國際體系轉型，有效戰略時空將大大拓寬，霸權國的對華圍堵戰略無法實施，經濟外交和多邊外交成為中國外交戰略框架的突破點和支撐點，亞洲地區合作機制成為中國創新國際秩序

> 的重要實踐……。
>
> 思考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係，就可以得出一個基本觀點：發展與其他後起大國的共同利益，既是防止美國拉攏其他大國構築遏制中國的戰略聯盟的需要，也是保持國際體系平穩轉型的需要。[20]

當然，對抗圍堵並非中共全球或亞洲外交事務的主要目標。若是如此，則中共在外交事務上，極可能會針對美國和其區域聯盟採取更加對峙的行動，例如積極把美國盟友從美國身邊拉攏過來，讓他們知道中共亦是個可供選擇的安全夥伴。但是中共並沒有這麼做，中共外交政策強調經濟機會和擴大多邊合作。特殊之處在於，中共希望擴大現存或建立全新的多邊組織，發展東亞區域秩序，使美國所能扮演的角色受到限制，稀釋美國的影響力。中共採取循序漸進的作法，避免和美國及其盟友進行直接對抗。因此，雖然對抗遏制是中共明確的外交目標，但是中共並不希望凸顯對抗政策，讓外界感到中共重視的是安全合作及零和互動。未來，如果美「中」關係更加競爭，中共區域影響力大幅增強，或是北京認為已經不需要和華府維持穩定關係，中共才有可能針對這個目標做出更強烈的表達。

避免與美國正面對抗是中共在對抗圍堵／遏制戰略上至為重要的關鍵，因為採取正面對抗很可能會適得其反。中共不希望讓外界認為，其積極尋求削弱美國在亞洲的權力和影響力，或是最終要把美國趕出這個區域。這種作法可能會貿然引發中共與美國及其部分盟友之間的全面對抗，使中共無法維持穩定的周邊環境。事實上，許多中共戰略家公開承認，美國在亞洲的駐軍和安全承諾有助

區域穩定，如果這種協議瓦解，中共(甚至區域)可能因此受害。[21] 然而，中共決策者及分析人士始終相當關切美國在亞洲的軍事態勢，而且近來關切的程度顯得更加激烈，因為美國正在擴大美日和美澳同盟，以及和兩個同盟之間的三邊合作範圍，而美國和印度及新加坡的安全合作關係也在增加之中。

中共外交政策因而在這個問題上面臨重大困境。一方面，中共必須爭取國家振興所需要的時間和空間；然而要這麼做，中共也知道必須讓其他國家無法對其外交政策或經濟發展目標採取遏制行動。另一方面，北京執行對抗遏制政策時，又必須避免激化其他國家的敵意，迫使中共脫離外交政策目標的追求軌道。中共在處理區域外交政策和美「中」關係時，這是個相當重大的挑戰，必須做好微妙的平衡動作。有幾項因素可能會影響中共如何掌握這些平衡動作：美「中」關係是否相對穩定、中共對美國亞洲目標的認知、美國對中共區域外交的認知，以及區域各國適應中共或與其保持疏遠的程度。

擴大和分散天然資源獲取管道

擴大和分散天然資源(特別是碳氫化合物能源)的獲取管道，是中共外交政策相對較新的目標。[22] 2000年代早期，中共國內生產毛額不僅快速成長(從2002年的8%到2007年的12%)，經濟成長伴隨而來的資源緊張也在增加(以每單位國內生產毛額所需消耗的資源計算)。這種情況迫使中共必須走向海外尋找資源，以支持國內連續性的經濟成長。除了石油和天然氣之外，中共還大量增加鐵礦、銅礦、木材、水泥、大豆和錳礦的進口數量。雖然國內生產毛額成

長近年呈現下滑(2009年可能會下滑到6-8%)，加上能源使用效率提升及成長模式改變，使中共資源緊張程度得以舒緩，但這些改變並非一蹴可幾，而且最需要改變的重點是以碳氫化合物資源和重汙染工業的需求為主，例如鋼鐵和水泥生產。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推測，中共在未來十五年對這些資源的需求量還會大幅增加。2006–2020年，估計中共對進口需求的成長幅度分別為：鐵礦380%、大豆80%、煤礦7,400%、銅礦600%、錳礦30%、木材330%。[23] 因此，中共急切希望擴大這些戰略資源的獲取管道，積極經營資源豐富地區的外交工作，例如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

對中共而言，資源安全包括分散供應來源和運輸路線。如同前章所述，此項目標背後有其供需邏輯的存在。就需求面而言，中共對安全而穩定的資源進口管道持續增加需求，即使是在相對於全球不景氣的時期亦是如此。就供應面而言，中共決策者相當關切中共過度依賴某些地區的能源供應，特別是其45%的原油仰賴從中東進口。[24]

我們可以從中共外交工作中，看出其對能源供應的焦慮程度。為了確保能源和天然資源供應無虞，中共正積極透過各個層級的交流合作、運用各種外交工具，拓展或建立全新的政治關係。近五年來，中共與沙烏地阿拉伯及其他波斯灣國家(例如阿曼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關係迅速擴張便是例證。為了確保能持續優先獲得資源，中共亦力求穩定某些關鍵的雙邊關係。因此，中共致力提升其與次撒哈拉地區非洲國家的關係，並且包庇重要供應國的人權問題，使其免於面臨國際指責壓力，其中最明顯的就是蘇丹、辛巴威和烏茲別克。中共亦提升沿著關鍵海洋和陸地運輸線國家的雙

邊關係，例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沿著麻六甲海峽、倫巴克島[Lombok]、桑達島[Sunda]）和中亞的哈薩克。中共此舉正是希望降低運輸路線被切斷的可能性，包括遭到外國禁運措施。[25]

壓縮中華民國國際空間

本章最後要提到的中共外交政策目標，雖然並非全新，但卻絕對重要，那便是壓縮中華民國國際空間和限制其他國家授予中華民國合法地位。這是中共存在已久的戰略作為，也是其防止台獨的眾多手段之一，其最終目標則是為了達成統一。從中共的多邊和雙邊外交，我們可以明顯看到中共企圖消除中華民國國際空間的意圖；而且這種現象已經存在數十年。此戰略亦促使中共反對中華民國加入某些重要的多邊組織，諸如聯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因為這代表默認中華民國合法地位。

在雙邊外交上，中共會採取一些行動，讓許多國家放棄台北轉而承認北京。中華民國目前有23個邦交國，範圍遍佈拉丁美洲(12個)、非洲(4個)、南太平洋/大洋洲(6個)，以及教廷(梵蒂岡)。[26] 中共的行徑已經造成兩岸之間競爭，也就是所謂的「金援外交」。中共希望藉由提供大量援助和其他財政誘因(例如在多明尼加共和國興建體育館)，說服一些國家在外交上放棄台北轉而承認北京；相反的，中華民國也在做同樣的事情。最近十年，中共收買邦交國的作法益發嚴重，因為中共的財政資源已經大幅增加，對中華民國國際活動的關切亦持續加深。2008年，媒體揭露哥斯大黎加在2007年6月之所以同意轉向承認中共，是因為中共利用龐大的外匯準備，私下保證會提供1億3,000萬美金的援助，並且答應購買3億美金的哥

斯大黎加政府債券。[27] 中共已經鎖定許多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希望促使他們改變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而且得手次數不斷增加。從2003年開始，哥斯大黎加、查德、格瑞納達、馬拉威、賴比瑞亞，以及塞內加爾相繼轉向承認中共。某些拉丁美洲國家，例如巴拉圭和巴拿馬，也在認真思考是否要改變外交承認。但是，自從馬英九在2008年3月當選總統之後，中共和中華民國隨即在2008下半年協議外交休兵，以塑造有利兩岸信心建立的環境。

註釋

1 例如，1950年代，中共追求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1960年代，中共針對美國和蘇聯採行「兩個拳頭打人」的原則；1970年代採用「一條線」外交原則，與美國合作圍堵蘇聯；1980年代，中共逐漸從這種意識形態主導的外交政策，轉向「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Zhang Wankun Frankl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Strategies under Mao and Deng: A Systematic Comparative Analysis*, Public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Working Paper Series,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Hong Kong, 1998.
當然，西方研究認為，儘管1950、1960和1970年代冷戰時期中共外交政策的用字遣詞似乎是意識形態取向，但國家利益的考量亦影響著中共的決定。換句話說，中共外交政策並不像我們所聽到的，完全以意識形態為主。針對這點，請見Peter Van Ness, *Revolutio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eking's Support for Wars of National Liberation*,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2 〈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在京舉行；胡錦濤、溫家寶作重要講話；吳邦國、賈慶林、曾慶紅、黃菊、吳官正、李長春、羅幹出席會議〉，《新華社》，2006年8月23日，作者引用公開資料中心翻譯版本；〈堅持和平發展道路　推動建設和諧世界〉，《人民日報》，2006年8月24日，作者引用公開資料中心翻譯版本。

3 希望深入了解這個口號，可以參考*China's Peaceful Rise: Speeches of Zheng Bijian 1997-2005*,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5.

4 Bonnie Glaster, "Ensuring the 'Go Abroad Policy Serve China's Domestic Priorities," *China Brief*,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Vol.7, No.5, March 8, 2007.

5 〈堅持和平發展道路　推動建設和諧世界〉，2006年。這篇社論係於2006年8月21–23日北京舉行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之後發表。

6 Michael Glosny向作者提供這個寶貴看法。

7 〈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在京舉行〉，2006年；〈堅持和平發展道路　推動建設和諧世界〉，2006年。針對年度國防白皮書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發現這種語言上的改變。

8 2005和2008年，在北京、上海和中共官員學者進行訪談。

9 2006年6月和11月與中共官員學者進行訪談；〈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在京舉行〉，2006年；Glaser, 2007.

10 楊潔篪，2008年。

11 Chen Hui, "China's Diplomacy Is Moving Toward All Spectrum—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Wu Jianmin(吳建民), Director of the Foreign Affairs Institute, and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cum Spokesperson of the CPPCC,"《中國經濟導報》，2005年7月16日，作者引用公開資料中心翻譯版本。

12 Zhang Yunling(張蘊嶺)and Tang Shiping(唐世平), 2006, pp.48–70; Tang Shiping, "Projecting China's Foreign Policy: Projecting Factors and Scenarios," in Jae Ho Chung, ed., *Charting China's Futur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pp.129–145; Jia Qingguo(賈慶國), "Peaceful Development: China's Policy of Reassuranc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59, No.4, December 2005b, pp.493–507; and Goldstein, 2005, pp.102–176.

13 Jia Qingguo(賈慶國), 2005b; and Cui Tiankai(崔天凱),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Asia and China's Policy," speech delivered at Hong Kong University, Hong Kong, February 4, 2005.

14 Zheng Bijian(鄭必堅),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Foreign Affairs*, Vol.85, No.5, September/October 2005, pp.18-24.

15 Zhang Yunling and Tang Shiping, 2006; Jia Qingguo, 2005b; and Goldstein, 2005, pp.102–176.

16 有鑑於這個外交政策帶有競爭意味，因此幾乎沒有任何中共決策者或分析家願意公開評論。目前相關文件仍保留在政府內部，因此公開資料亦不是很多。這部分論點主要引用2005、2006、2008年，作者於北京、上海和華府與中共學者的談話。他們表示，中共認為美國的對「中」政策是交往與遏制並重，也就是「亦敵亦友」的關係。然而當論及中共如何回應美國這種對「中」政策時，相關分析嘎然而止。若要取得美「中」關係的權威看法，請參見潘相陳編，《最高決策：1989之後共和國的方略》，2004年，第807–813頁。

17 黃仁偉，2006年；若要更廣泛了解，請參見潘相陳，2004年，第807–813頁。

18 大多數評論美中經濟議題的中共文章都抱持這種看法。2008年6月，作者在北京和上海進行訪談。

19 前外交部長在中共黨校發表的演講是個例外，這篇文章原本並不打算公布。錢其琛明確提到中共相當關切美國在全球扮演的角色，以及對「公平正義國際秩序」所產生的威脅（錢其琛，2004年）。

20 黃仁偉，2006年。

21 Wang Jisi(王緝思), “China’s Changing Role in Asia,” in Kokubun Ryosei and Wang Jisi, eds., *The Rise of China and a Changing East Asian Order*, Tokyo, Japan: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04; Wu Xinbo, 2005/06; and Wang Jisi, 2005.

22 〈國際能源安全形勢與中國能源外交〉，《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2004-2005》，2005年，第45–62頁；和Downs, 2006b.

23 德意志銀行針對中共資源需求的報告，被引用於Chris Alden and Andy Rothman, *China and Africa: Special Report*, CLSA Asia-Pacific Markets, September 2008, p.4.

24 Downs, 2006b; Yitzhak Shichor, “Blocking the Hormuz Strait: China’s Energy Dilemma,” *China Brief*,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Vol.8, No.18, September 23, 2008; Erica Downs, “The Chinese Energy Security Debate,” *China Quarterly*, No.177, March 2004, pp.21–41; 張幼文和黃仁偉，2007年，第99–106頁。

25 Downs, 2006b, p.31; and Gabriel B. Collins and William S. Murray, “No Oil for the Lamps of China?”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61, No.2, Spring 2008, pp.70–95.

26 這些邦交國名單包括帛琉共和國(1999年)、吐瓦魯(1979年)、馬紹爾群島(1998年)、索羅門群島(1983年)、吉里巴斯共和國(2003年)、諾魯(1980–2002年，2005年)、瓜地馬拉共和國(1960年）、巴拉圭共和國(1957年)、聖文森(1981年)、貝里斯(1989年)、薩爾瓦多共和國(1961年)、海地共和國(1956年）、尼加拉瓜共和國(1990年)、多明尼加共和國(1957年)、宏都拉斯共和國(1965年）、巴拿馬共和國(1954年)、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1983年)、聖露西亞(1984–1997年，2007年)、布吉納法索(1994年)、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1997年)、史瓦濟蘭王國(1968年)、甘比亞共和國（1995年）、教廷(1942年）。這些資料取自中華民國(台灣)外交部網站。

27 Graham Bowley, “Cash Helped China Win Costa Rica’s Recognition,”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2, 2008.

第五章
中國大陸擴大外交手段

過去十年，中共國際行為最顯著的特性，便是從事外交目標的政策手段不斷擴增。本專題研究將這些手段分為五類：經濟外交、領導外交、多邊外交、戰略夥伴，以及軍事外交。在許多情況下，這些手段的運用可謂相互重疊且相互支援；為了方便進行分析，謹就這五類外交手段的特徵論述如下。

經濟外交

胡錦濤執政時期，經濟外交已經成為中共的外交政策主軸。經濟外交意指運用貿易、投資和更多的財經政策支持中共外交目標，同時以傳統外交推動中共的經濟發展，例如確保能夠進入外國市場。這兩種經濟外交的方式，對中共來說可能相當新穎，因為中共過去習慣把外交和經濟，看成兩個毫不相干的事務。2004年8月國務院會議上，中共總理溫家寶正式強調這個概念的重要性，被認為是這個概念獲得落實的里程碑。2004年12月，這個想法在中共外交部舉辦的「外交與經濟研討會」得到進一步發展。在這個研討會上，外交部部長助理呂國增針對「經濟導向的外交工作對國家發展的貢獻」做出如下解釋：

> 國際和國內形勢的新發展對我們的各項工作都提出了更高的標準，要求我們進一步貫徹科學發展觀，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牢牢把握住新世紀的發展機遇，努力建設小康社會。……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外交工作的內涵和功能也在變化，內容從傳統的政治、安全問題向經濟、文化等領域擴大。外交在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同時，加強維護國家的經濟利益、促進國內發展的任務日益加重。[1]

多種手段

中共經濟外交包含許多工作層面。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中共開始倡議、協商，或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以2009年為例，中共便已經和智利、香港、澳門、巴基斯坦、新加坡、秘魯和紐西蘭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且與其他部分國家及團體進行協商中，特別是澳洲和波灣合作理事會。[2] 中共目前已經和東協十國簽署最大宗的自由貿易協定，並於2010年開始執行，而相關「早收清單」的關稅開放措施，則早已於2004年達成協議(詳如表5.1)。

中共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有利於三個外交政策目標，包括：(1)擴大中共獲得市場、投資和科技的管道；(2)獲得戰略資源管道；(3)讓

表5.1　中共自由貿易協定現況一覽表

國家	協定／協商情況
東協	2004年11月，中共和東協簽訂貨物協定，並且於2005年7月開始調降90%的貨品關稅。2007年7月，雙方一項內容涵蓋服務貿易的協定正式生效，其中建設、環保、觀光、運輸和教育等項目亦包含在內。此外，雙方更針對投資和擴大服務範圍進行對話，俾利於2010年全面開放自由貿易協定。
澳洲	2005年5月雙方開始協商，至今仍未結束。澳洲希望針對綜合協定進行協商，但中共則希望先從貨物協定開始，逐步進行協商。

智利	2005年11月，中共和智利簽署一項貨物貿易協定，希望在2015年以前免除97%貨品關稅。2008年4月，雙方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投資協定則尚在進行協商。
哥斯大黎加	2008年7月，已經完成聯合可行性研究。
波灣合作理事會	2005年4月，中共和波灣合作理事會同意針對貨物協定進行協商，隨後並針對服務貿易進行協商。2006年雙方正式進入協商階段，至今尚未結束。
香港(特別行政區)	2003年6月，中共和香港達成「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這是一項綜合性的自由貿易協定，目前涵蓋香港的所有貨物和27個服務行業。
冰島	2006年3月，雙方開始進行自由貿易協定可行性評估，2007年4月針對綜合性自由貿易協定進行協商，目前尚未達成任何協定。
印度	2005年，雙方成立任務小組進行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行性評估。這項評估將於2008年完成，但協商初期並沒有達成任何決定。
澳門(特別行政區)	2003年10月，中共和澳門簽署「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並於2004年1月開始執行。澳門所有貨物都可以零關稅進入中國大陸，26個服務行業在中國大陸享有優惠待遇。
紐西蘭	2004年11月，雙方開始進行協商。2008年4月雙方簽署協定，並且於2008年10月執行。這項協定使商品和服務自由化，並且隨著時間逐步改變。
挪威	2007年7月，挪威發起自由貿易協定可行性評估，至今尚未結束。
巴基斯坦	2006年11月，中共和巴基斯坦簽署一項貨物及投資協定，希望在2011年以前，達到85–90%的關稅開放目標。2009年2月，雙方簽署服務貿易協定。
祕魯	2008年11月，雙方協商完成商品和貿易協定，並且於2009年4月正式簽署。
新加坡	2006年10月，雙方開始針對商品和服務貿易協定進行協商，並且於2008年10月正式簽署；2009年1月1日開始執行。這項自由貿易協定，將包含中共和東協的投資協定條款。
南非	雙方於2006年開始協商，而且中共在2006年自願限制紡織品出口。媒體指出這項協商已被擱置。
南部非洲關稅同盟	雙方於2004年6月開始進行協商，但至今幾乎鮮有進展。史瓦濟蘭與中華民國的關係是主要障礙。
南韓	2004年開始自由貿易協定研究，2007年7月雙方可行性評估團隊進行會談。儘管北京對首爾施壓，但直到2009年春天，南韓都尚未同意協商。

資料來源：各種媒體報導；中共商務部，並參考中國自由貿易區服務網，資料日期不詳。
註：南部非洲關稅同盟包括波札那、賴索托、納米比亞、南非和史瓦濟蘭。

其他國家放心中共成長並不會危害他們的經濟利益。從戰術層面來看，中共已經成功運用自由貿易協定，讓許多國家承認中共具有世界貿易組織規範的市場經濟地位。中共對澳洲等某些國家便是以開啟自由貿易協定的協商作業，做為要求市場經濟地位的條件。以2009年初為例，已有近80個國家承認中共擁有世界貿易組織規範的市場經濟地位，但是美國、日本和歐盟至今仍然拒絕承認。對中共來說，市場經濟地位極為重要，象徵著經濟改革的成功，同時亦可避免其他國家依照世界貿易組織規定，對中共施以處罰，課徵反傾銷和反補貼稅。

中共的經濟外交亦包含幾個金融層面工作。2006年初，中共開始和許多國家進行「金融對話」，意見交換內容超越傳統的雙邊貿易和投資議題。這個新的對話管道特別為財政部門和中央銀行設立，內容涵蓋總體經濟政策、國家金融和稅賦政策，以及匯率調整工作。迄目前為止，中共已經和美國、英國、德國、巴西、印度、俄羅斯和日本建立此種對話管道。[3] 此外，中共亦和幾個全球重要而健全的經濟體進行高層經濟對話，包括美國、日本、英國和歐盟。

2008年底和2009年初，中共進一步推展金融外交，迅速和六個國家簽署貨幣交換協定，總值6,500億人民幣；簽署貨幣交換協定的目的，是希望方便這些國家取得人民幣，在全球經濟衰退的情況下促進貿易往來，因應美元不足的情況。中共人民銀行的網站就指出：「中央銀行運用貨幣交換處理短期流通問題，妥善應對當前危機並保障金融體系穩定。」以2009年4月為例，中共和阿根廷(700億人民幣)、香港金融管理局(2,000億人民幣)、馬來西亞(800億人民幣)、白俄羅斯(200億人民幣)、南韓(1,800億人民幣)和印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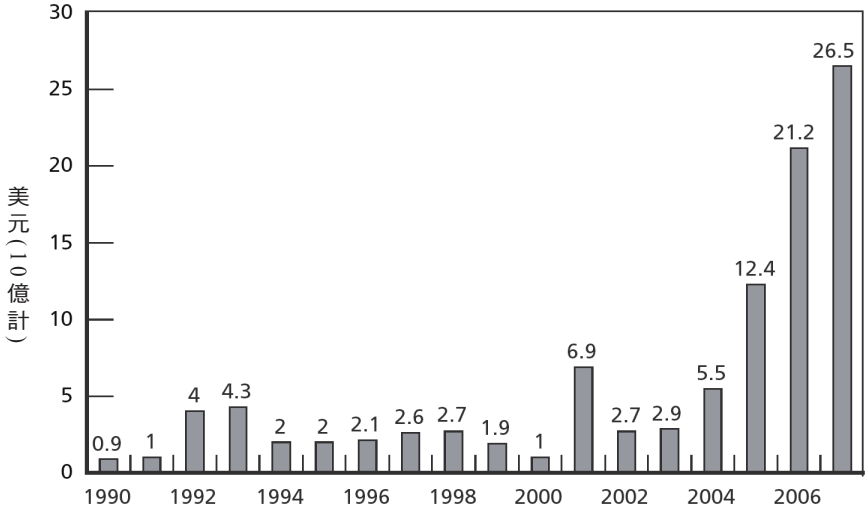
(1,000億人民幣)簽署貨幣交換協定。[4]

此外，中共亦持續增加海外直接投資，2007年全球總計累積達到1,179億美元。[5] 海外直接投資大量迅速增加，部分是因為受到國家政策指導。1990年代晚期中共制定「走出去」戰略，並於2003年加強要求中共的企業走向全球市場，擴大利潤和學習具備全球競爭力，並且盡可能建立國際品牌。中共以國營為主體的企業，已經對外投資運輸、基礎建設和電信事業。在部分情況下，中共其他企業也會運用這些投資方案，爭取進口優惠的能源和戰略物資；然而有些投資卻是以不惜血本的方式取得特定國家的物資。此種方法已運用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共亦藉由其持續增加海外直接投資，顯示其對他國經濟成長所做的貢獻，從而向各國進行安全保證，並擴大中共的影響力 (詳如圖5.1)。[6]

對外援助是中共經濟外交的第四項重要工作。中共對外援助包括發展和人道援助，其中後者是較新的工作。中共的發展援助採取贈與、貸款和技術援助的方式進行，有點類似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所定義的官方發展援助。根據美國國會研究處的報告，若使用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標準，中共的發展援助「只占全球援助的一小部分」。[7] 然而，計算中共的對外援助時，我們應該把國家資助或補助的海外投資列入考慮；這類援助通常由中國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提供，而這些機構並不屬於原有的對外援助機構。因此如果把海外投資列入計算，中共「將成為對外援助的主要來源」。[8]

目前尚不清楚中共國務院如何組織和指導對外援助機構，從表面上看，這些機構似乎是各自為政和缺乏整合。中共政府過去並沒有精確定義對外援助或公開綜合統計數字，這造成研究上的計

圖5.1　中共年度海外直接投資總額(1990–2007年)



資料來源：中共商務部

RAND MG850–5.1

算困難，且分析亦難以連貫。直到2002年，負責編列對外援助預算的中共商務部才公開對外援助統計數字。[9] 根據商務部官方提供的圖表，2002年中共對外援助金額為6億277萬美元；2003年為6億3,036萬美元；2004年為7億3,100萬美元；[10] 2005年為9億2,200萬美元；2006年為11億美元。[11] 根據美國國會研究處的資料，中共這些對外援助的統計數字被嚴重低估，因為很多援助項目，例如海外投資計畫的財政補助，並沒有被包含在內。國會研究處的報告指出：「中共在非洲、拉丁美洲和東南亞的對外援助和政府支持的經濟建設計畫，金額已經從2002年的10億美元，驟增到2006年的275億美元，和2007年的250億美元。」[12]

自2004年底開始，中共對外援助金額開始迅速攀升，北京當局

希望運用援助方式，建立和維持它與亞洲鄰國，特別是非洲國家的政治關係。2004年，中共向菲律賓承諾提供4億美元優惠貸款，做為新建鐵路第一階段的財政援助。此外，中共還承諾減免東南亞貧窮國家(例如柬埔寨和寮國)的貸款債務；2005和2006年，胡錦濤承諾減免非洲國家過去貸款，金額超過100億美元。特別的是，2006年11月北京舉辦「中」非合作論壇期間，中共向全體非洲國家宣布一項發展援助計畫，其中包含八個方案，分成多年實施。這項援助計畫希望2009年中共對非洲國家的援助規模比2006年增加一倍、提供50億美元優惠貸款給在非洲設立公司的中共企業、免除重債窮國的貸款債務、大量進行各項技術援助。[13] 2007年6月，中共同意減免伊拉克前政府累積將近1,000萬美元的債務，包括政府之間的債務以及伊拉克政府和中共國營事業之間的債務。有趣的是，一年以後，伊拉克便為了獲得油田開採技術援助，和中共國營企業簽署2003年以來首件重大石油交易；據報導，這項交易價值30億美元。[14]

雖然中共對外援助向來以發展援助為主(通常是藉此為中國大陸的企業建立市場管道)，但是人道救援也逐漸成為對外援助的新要項。2004–2005年，為了回應東南亞海嘯帶來的災難，中共政府捐助8,300萬美元，這在當時是中共有史以來最大筆的人道援助金額。2006年初，媒體報導中共政府於2005年提供(但不見得真的有貢獻)大量人道援助：包含提供三個大型災難救援工作(例如印度洋海嘯、巴基斯坦地震、卡翠娜風災救援工作)將近10億人民幣(1億2,345萬美元)，以及向北韓、越南、羅馬尼亞、伊朗、幾內亞比索和厄瓜多提供數目較小的援助。中共官員表示政府已經建立一套「緊急回應機制」，讓未來災難救援展開更加迅速。[15]

發展模式選項

目前外界相當關注，中共是否會透過經濟外交工作，向外推銷其經濟快速且持續成長的經驗，使之成為西方發展模式的替代選擇，從而形成「北京共識」和「華府共識」之間的理念競爭。儘管中共明顯重視運用各種經濟和財政政策促進利益，但目前尚不清楚中共是否已有一套特殊的發展模式可供外國複製，亦不清楚中共是否正推銷自己，做為美國或西方發展模式的替代選擇。

中共最近30年的經濟政策和其他亞洲國家相比，並沒有什麼特殊之處，而且中共的政策可以說和華府共識相當一致。中共混合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日本、新加坡、南韓和台灣發展經驗相當類似(但並不完全一樣)，都是在國有經濟和國家引導之下促進工業發展，建立龐大的出口市場並開放外國投資，而且南韓和台灣在經濟發展的前幾十年，其實也是由一黨獨大的政府進行統治。

中共的發展模式亦和華府共識的關鍵特性相符；中共重視減少財政赤字、漸進式的結構改革、私有化、促進貿易發展、基礎建設、勞工訓練和創新。[16] 中共受益於一些得天獨厚的特殊條件，例如從大規模農業經濟轉向工業經濟，使生產力能夠大量釋放；過去數量龐大、工資低廉的勞工，目前技術水準已經逐漸得到提升(但是工資仍然相對低廉)；龐大具吸引力的國內市場；重視商業競爭的企業家傳統精神。

出於某些原因，中共領導人鮮少聲明中共特色的發展模式可供外國學習，反而是傾向強調中共的特殊情況。中共領導人相當樂意

和發展中國家分享其經驗(包括成功和失敗的),並強調西方發展理念的缺點。[17] 但是他們仍然不願表達發展中國家可以和應該複製中共的成功經驗。中共會採取這種外交態度,部分是希望展現出合作的一面,避免把自己的理念強加於別的國家。一些中共人士擔心,推廣北京共識可能會和美國及其他西方強權產生正面對抗,破壞中共的安全保證戰略。對中共來說,透過西方記者宣揚北京共識的發展理念,會比中共決策者自己提出更具實質效果。[18] 所以,沒有一位中共高層領導人,包括國家主席、總理或外交部長,會公開推廣自身的發展理念,反而是傾向強調中共的特殊情況。

中共之所以某些程度上會被認為正在推廣發展模式,是因為許多發展中國家相當欽佩中共的經濟發展成就,並且公開表示支持「中共模式」。例如,在2006年北京舉辦的「中」非合作論壇,儘管幾乎沒有採取仿效中共政策的實際行動,但很多非洲國家提到他們希望複製中共的發展經驗。一些發展中國家,例如巴西和委內瑞拉,正在尋找對抗西方經濟政策的共同夥伴,因此他們把目標鎖定中共;儘管中共支持他們,這些國家仍然希望拉攏中共,一起對抗這些經濟政策和作法。中共相當希望透過貿易及金融互動(如同上述內容),以及擴大在國際金融機構所扮演的角色,增進自身在全球經濟的影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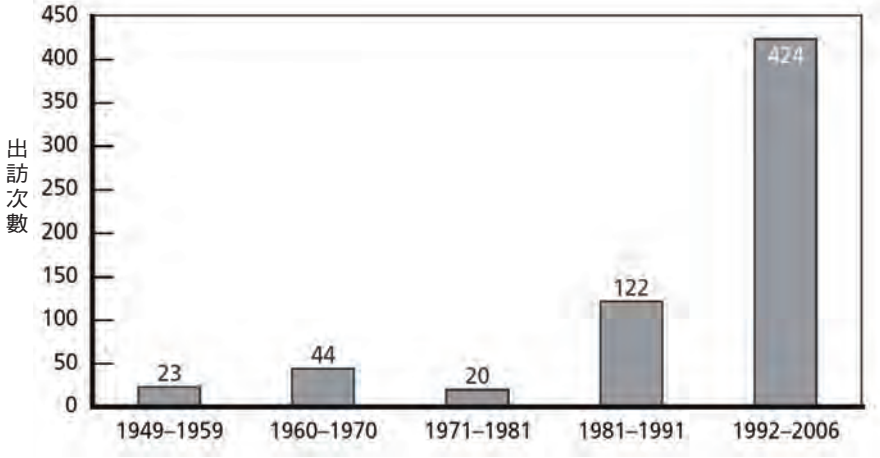
領導外交

中共政黨和國家的高層領導人現在時常飛往海外追求中共外交目標,部分中共人士將此新趨勢稱為「領導外交」。儘管世界各

國領袖都在從事這種活動，但中共卻是從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胡錦濤時期，領導高層出訪的次數和頻率才大幅增加。中共高層出訪行程在1978年以前相對較少，而且明顯沒有特定模式。在江澤民領導下，中共第三代領導人增加了出訪次數。如圖5.2顯示，自從1992年以來，中共高層領導人(包括國家主席、總理、人民大會委員長和全國政協主席)的海外行程急劇增加，從1981–1991年的122次，增加到1992–2006年的424次。

圖5.3顯示1949–2006年中共領導人出訪區域的次數分佈，從中我們更可看出中共長久以來的外交優先次序：亞洲數十年來，都是中共外交核心地區(出訪250次)，其次是歐洲(196次)、非洲(92次)、拉丁美洲(50次)、大洋洲(26次)和北美洲(19次)。圖表後段顯示北美

圖5.2　中共領導人海外出訪(1949–200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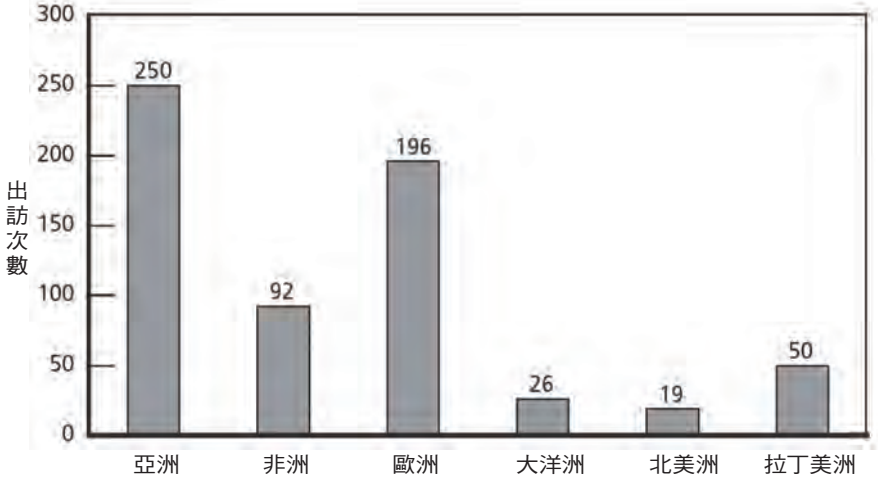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張清敏和劉兵，〈首腦出訪與中國外交〉，《國際政治研究》，第106期(2008年4月)，第3頁。
RAND MG850-5.2

洲出訪次數只有19次，這應該不會令人感到意外，因為美「中」關係在冷戰時期處於凍結狀態。根據中共學者劉兵與張清敏的研究，1949–1991年間，中共重要領導人只有出訪北美7次；相較之下，亞洲98次、歐洲54次、非洲31次。[19] 1992–2006年，重要領導人出訪亞洲、歐洲和拉丁美洲的增加次數最為明顯(詳如圖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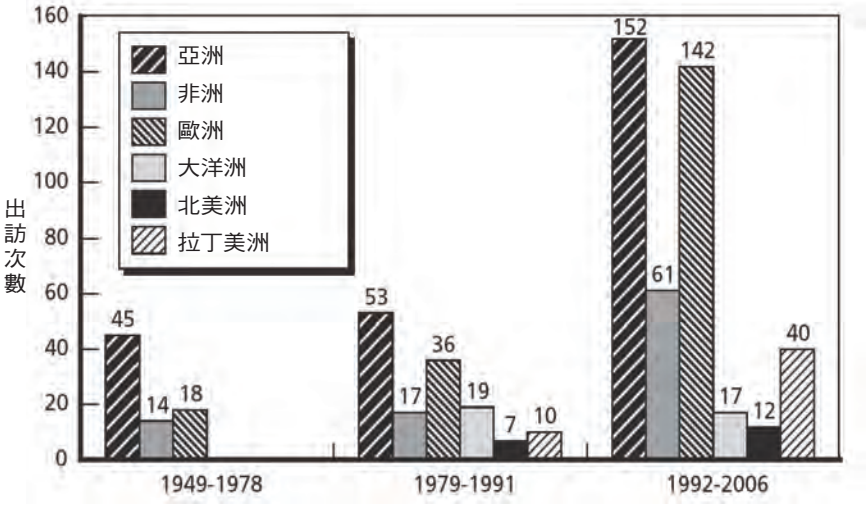
最近十年，中共領導高層都會定期出訪，俾推動列為最高優先的外交目標。[20] 2003–2008年，許多中共政治局官員出訪北韓，部分原因正是希望處理北韓核子危機，交涉六方會談的協商進程。中共總理溫家寶頻繁進行海外出訪，目的就是為了在第一線擴展中共與東亞、南亞國家之間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中共爆發SARS期間，溫家寶特地飛往泰國，向鄰國保證中共正採取嚴厲措

圖5.3 中共領導人出訪區域分佈(1949–2006年)



資料來源：張清敏和劉兵，2008年，第7頁。
RAND MG850-5.3

圖5.4　中共領導人出訪區域時期分析(1949–2006年)



資料來源：張清敏和劉兵，2008年，第7頁。
RAND MG850-5.4

施控制疫情擴散。從此，溫家寶便成為東協加三(東協加上中共、日本和南韓)年度周會，以及東亞高峰會的中共最高代表。2007年，溫家寶在大陸南寧舉辦「中共—東協建立對話關係15周年紀念峰會」，意在凸顯中共和東協國家彼此之間的重要性。溫家寶亦親赴第一線拉攏印度；2005年4月，他出訪印度進行兩國高層晤面，開創長期敵對國家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首例。然而更重要的是，2007年4月，溫家寶出訪日本進行「破冰」之旅，為彼此艱澀的關係注入穩定的泉源。

除了亞洲議題之外，2008年發生全球金融危機，溫家寶亦是中共進行危機處理的關鍵人物。2009年初，溫家寶代表中共出席在瑞士達沃斯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他公開向國際社會保證，中共2009

年經濟成長率將會達到8%，挑戰大多數的國際預測。達沃斯會議結束後，他接著造訪歐盟許多重要國家首都，包括柏林、布魯塞爾(歐盟總部)、馬德里和倫敦。[21] 2006年，溫家寶以一個星期出訪非洲7個國家，為2006年11月中共主辦的「中」非峰會進行準備。最後，計有48個非洲國家出席該次「中」非峰會。此外，在中國共產黨內部排名第二，任職人民大會委員長的吳邦國亦時常飛往海外，和其他國家的民主議會建立對話，促進中共人民大會在國內和外國人民心中的合法性。

自2002年掌權以來，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時常進行重大出訪，擴大中共在發展中國家(主要是非洲、中東、中亞和拉丁美洲)的存在和影響力，特別是增進中共戰略礦物和能源物資的獲取管道。胡錦濤四度出訪非洲(2002、2006、2007和2009年)，二度造訪拉丁美洲(2004和2008年)，直接擴大中共和這些地區的經濟互動。[22] 胡錦濤這四次非洲行程，總共造訪了18個非洲國家，成為歷史上中共國家主席最關注的地區。2009年初，胡錦濤造訪4個資源並不豐沛的非洲國家，包括塞內加爾、馬利、坦尚尼亞和模里西斯，意圖向外界證明中共的非洲外交並不全然只是為了獲得天然資源。出訪這4個國家之前，胡錦濤於2007年就曾以更多的時間，向7個非洲國家進行為期12天的訪問，包括蘇丹和辛巴威這種具爭議性的國家。

此外，胡錦濤亦積極經營中共與前蘇聯國家的關係。自2002年以來，他幾乎每年出訪俄羅斯，並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年度峰會。2007和2008年，他親赴吉爾吉斯、哈薩克、塔吉克和土庫曼等國進行訪問。

每當中共希望對國家、國家集團或國際議題提高承諾，國家主

席就會出於戰略目的出訪海外。2003年，中共與歐盟建立「戰略夥伴關係」時，胡錦濤第一次亦是唯一一次(至目前為止)出席「中」歐峰會；這個時期，北京希望利用泛大西洋的緊張關係，推進「中」歐之間在國際議題上的合作。1998年江澤民出訪日本，普遍被兩國視為外交失敗，因為他向日本民眾大談歷史問題。後來，再也沒有中共最高領導人踏上日本領土，直到2008年5月，胡錦濤赴日本進行訪問，全力推進中日關係正常化。即便中共不是八大工業國集團的正式成員，胡錦濤仍然每年代表中共出席會議。2008年11月和2009年4月，胡錦濤還分別出席在華府及倫敦舉行的G-20高峰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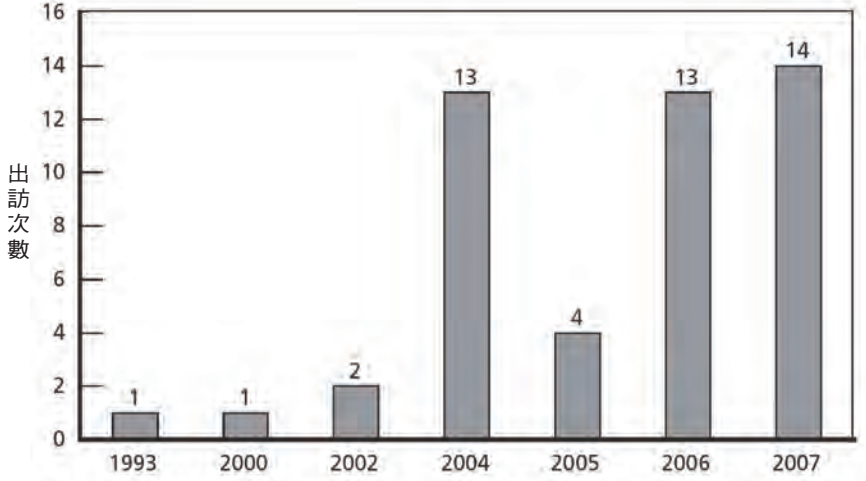
胡錦濤和溫家寶的可能繼任者亦跟隨領導外交的潮流。被外界視為胡錦濤繼任者的習近平同樣相當重視藉由海外出訪，增進中共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2008年擔任國家副主席期間，他首度出訪北韓、蒙古和三個中東國家(沙烏地阿拉伯、葉門和卡達)。之後在同年，他出訪5個拉丁美洲國家(墨西哥、牙買加、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巴西)及馬爾他。2009年2月，習近平再度出訪委內瑞拉這個中共第八大原油進口國。2008年12月，副總理李克強首度出訪科威特和印尼。

中共領導外交的另一個工作層面，是指派或運用「特使代表」處理中共外交政策所面臨到的疑難議題。自1993年起，中共多次指派特使代表遠赴世界各地。中共第一次指派特使代表，是受命處理北韓核子議題。中共迄今已經指派代表處理非洲／蘇丹、中東議題，並且於2009年指派代表處理阿富汗／巴基斯坦問題。如圖5.5顯示，2006和2007年，中共特使代表對外訪問的次數明顯增加，代表中共領導人對這個新外交工具的興趣已經大幅上升。

多邊外交

參與多邊國際組織對中共而言，是全新、重要而且可以靈活運用的外交手段(詳如表5.2和5.3)。很明顯的，中共認為參與國際組織有助於推動它所期盼的多極世界，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和建立和諧世界。《2008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就針對這點，清楚提到中共「在多邊事務中積極發揮建設性作用，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顯著提高。」[23] 從更為手段性的角度來看，中共把多邊組織當成不斷進行安全保證的機構，可以獲得關鍵經濟投入管道，限制美國在某些地區的影響力，擴大中共在區域的綜合影響力。事實上，在全世

圖5.5 中共特使代表出訪外國次數(1993–2007年)



資料來源：李志斐，〈冷戰後的中國特使外交〉，《國際關係學院學報》，2008年第3期(2008年5 月)，第26頁。
註：依照海外出訪次數計算。
RAND MG850-5.5

表5.2　中共參加國際組織成員一覽表

區域組織	參加層級	開始日期	會員
東亞			
東協	對話夥伴	1996年7月	東協、中共；就是著名的東協加一
東協加三	會員	1997年12月	東協、中共、日本和南韓
東協區域論壇	會員	1994年7月	總共23個國家，包括10個東協國家(汶萊、緬甸、柬埔寨、印尼、寮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和11個對話夥伴(澳洲、加拿大、中共、歐盟、印度、日本、紐西蘭、北韓、俄羅斯、南韓、美國)以及蒙古和巴布亞紐幾內亞
亞太經合會	會員	1991年11月	澳洲、汶萊、加拿大、智利、香港、印尼、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紐西蘭、巴布亞紐幾內亞、中共、祕魯、菲律賓、俄羅斯、新加坡、南韓、中華台北、泰國、美國和越南
東亞高峰會	創始會員	2005年12月	十個東協國家和澳洲、中共、印度、日本、紐西蘭、俄羅斯和南韓
亞洲合作對話	創始會員	2002年6月	巴林、孟加拉、不丹、汶萊、柬埔寨、中共、印度、印尼、伊朗、日本、哈薩克、科威特、寮國、馬來西亞、蒙古、緬甸、阿曼、巴基斯坦、菲律賓、卡達、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新加坡、南韓、斯里蘭卡、塔吉克、泰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烏茲別克和越南
南亞			
南亞區域合作協會	觀察員	2005年11月	阿富汗、孟加拉、不丹、印度、馬爾地夫、尼泊爾、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
中亞			
上海合作組織	創始會員	2001年6月	哈薩克、吉爾吉斯、中共、俄羅斯、塔吉克和烏茲別克
拉丁美洲			
美洲國家組織	觀察員	2004年5月	35個美洲獨立國家
非洲			
「中」非合作論壇	創始會員	2000年10月	45個非洲國家
中東			
波灣合作理事會	合作夥伴，尚在進行自由貿易協定協商	2004年7月	巴林、科威特、阿曼、卡達、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	創始會員	2004年9月	中共和22個阿拉伯聯盟國家

表5.3 中共成立國際組織一覽表

區域組織	開始日期	部長/高層會議	成員
上海合作組織	1996年4月(2001年6月舉辦上海五國會議)	2009年6月舉辦九國高峰會；許多其他部長級會議	哈薩克、吉爾吉斯、中共、俄羅斯、塔吉克和烏茲別克
「中」非合作論壇	2000年10月	2000年10月和2003年12月舉辦前兩次部長級會議；2006年11月在北京舉辦第三次部長級會議和第一次高峰會；2009年底，在埃及舉辦第四次部長級會議	45個非洲國家
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	2004年9月	2004年9月和2006年5月舉辦兩次部長級會議	22個阿拉伯聯盟國家
博鰲亞洲論壇	2001年2月	已經舉辦9次年度會議	屬於非政府論壇，會員身分不限國家

界各個地區，中共已經成為創立各種多邊論壇的關鍵角色，進而使中共領導人在這些機構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東亞是中共最積極參與多邊組織及最具成效的地區。[24] 自1990年代早期，中共便積極參與亞太經合會(1991年)、東協區域論壇(1994年)、東協加一(東協加中共)(1996年)、東協加三(1997年)和東亞高峰會(2005年)。參與這些多邊組織有助於中共建立正面形象、促進經濟合作，以及擴大區域影響力。2003年，中共是協商北韓無核化，成立六方會談並維繫進程的關鍵國家。2002年，中共是「亞洲合作對話」的創始會員，這個機制旨在促進各區域組織之間的對話，例如東協、南亞區域合作協會和波灣合作理事會。

中共亦致力擴大區域性非政府互動。2001年，一群海內外華人商界名流共同建立博鰲亞洲論壇。這是一個以海南島為根據地，非

官方、非營利的國際組織，模式仿效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如同達沃斯會議，在博鰲亞洲論壇上，亞洲高層官員、商業領袖和學者冠蓋雲集。2003年，中共就是在博鰲亞洲論壇，首次提出「和平崛起／和平發展」的外交戰略。

除了東亞地區之外，1996年，中共首次舉辦「上海五國」會議，成員包括中共、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和塔吉克；這個論壇隨後在2001年成為更為正式的「上海合作組織」，並增加烏茲別克為成員國。2005年，中共和美國同時成為南亞區域合作協會的正式觀察員。[25] (作為條件交換，中共亦支持印度成為上海合作組織的觀察員。)

中共關注的焦點還不只是亞洲地區。中共於2000年成立「中」非合作論壇；截至目前為止，這個論壇已經舉行過三次部長級會議，其中2006年底，共有48個國家領導高層在北京與會。2004年，中共成立「中國—阿拉伯合作論壇」，至今已經舉辦兩次部長級會議。在拉丁美洲，中共亦參與很多重要區域論壇。2008年，中共成為美洲開發銀行的正式會員，並且成為美洲國家組織的觀察員。中共已經和里約集團、南方共同市場、加勒比海共同體和拉丁美洲會議建立對話關係。[26]

戰略夥伴關係

透過與個別國家及國家集團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中共希望藉由發展這套外交機制擴大其國際影響力。表5.4彙整了中共與各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

對中共而言，「戰略夥伴關係」的意涵不同於西方國家。[27] 中

共並不會把這種關係視為準軍事同盟關係，基於「戰略」乙詞來處理各種安全及軍事合作事務。在中共的外交政策詞彙中，將夥伴關係冠上戰略一詞，反而是有兩個原因：(1)其廣泛包含所有層面的雙邊關係(例如經濟、文化、政治和安全)，以及(2)兩個國家同意就雙邊關係做出長期承諾，雙邊問題將以此背景進行評估；重要的是，就算偶而陷入緊張，也不會影響兩國關係走向。建立戰略夥伴關係，讓中共得以提升和夥伴國家(或集團)之間的互動層級，並設定交涉的範圍、內容和步調。這種思維邏輯可以解釋中共為何要四處和不同國家、國家集團和多邊組織建立這種戰略夥伴關係。[28]

戰略夥伴關係涉及的內容相當廣泛，中共主要著重在幾個主題，包括透過貿易及投資進行經濟合作的發展機會；協商國際事務，例如在聯合國採取相同外交政策立場；針對非傳統安全議題進行合作；增加多邊組織的影響力；針對聯合國的國際關係原則和法律規定相互背書；推廣中共「民主及平等的國際關係」理念。[29]

中共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亦懷有更多特定目標。中共運用戰略夥伴關係擴大經濟機會(特別是獲取國家市場、投資和天然資源的優惠管道)、穩定和形塑中共的區域安全環境、減少外界對中共的遏制，以及提升負責任大國的國際信譽。重要的是，北京可以運用這些外交關係，在雙邊互動中進行折衝，充分就雙方所望的合作標準進行協商，讓對方更容易接受中共的外交目標。

近年來，中共亦和這些國家進行「戰略對話」，更加顯示中共希望加深雙方的政治關係，產生更多的影響力和著力點。這些對話通常是出現在副外長層級，內容包含各種安全議題，例如軍備控制、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非傳統安全挑戰和長期領土爭

表5.4 中共戰略夥伴關係一覽表

國家	規劃	日期/地點	聯合軍演	承認中共為「市場經濟」
大國／已開發國家				
俄羅斯	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睦鄰友好合作條約	1996／2001年江澤民和葉爾欽進行高層晤面	和平使命2005；和平使命2007	2004年9月
法國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1997年	聯合海上搜救演習(2004和2007年)	
義大利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2004年溫家寶出訪		
英國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2004年溫家寶出訪	聯合海上搜救演習(2004年)	
加拿大	戰略夥伴關係	2005年胡錦濤出訪		
葡萄牙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2005年溫家寶出訪		
西班牙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2005年胡錦濤出訪		
德國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具有全球責任的戰略夥伴關係	2006年梅克爾造訪中國大陸		
南韓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2008年總統李明博第一次造訪中國大陸		2005年11月
發展中國家				
巴西	長期穩定的戰略夥伴關係	1996年江澤民出訪		2004年11月
墨西哥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2003年		
阿根廷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2005年胡錦濤出訪		2004年11月
委內瑞拉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2005年胡錦濤出訪		2004年12月

印度	和平繁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2005年溫家寶出訪	聯合海上搜救演習(2003和2005年)；聯合反恐演習(2007和2008年)	
哈薩克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2005年胡錦濤出訪	與上海合作組織國家進行反恐演習(2003年)	
印尼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2005年胡錦濤出訪		2004年9月
南非	戰略夥伴關係	2004年曾慶紅出訪；於2006年6月擴大		2004年6月
奈及利亞	戰略夥伴關係	2005年奧巴聖喬(Obasanjo)總統訪問中國大陸		2004年12月
阿爾及利亞	戰略夥伴關係	2004年胡錦濤訪問阿爾及利亞		2006年11月
越南	全面合作夥伴關係	2008年越共總書記農德孟造訪中國大陸	東京灣聯合海上巡邏(2007年)	2004年9月
多邊組織／區域				
非洲	21世紀持續發展戰略夥伴關係	2000年北京第一次中非合作論壇		貝南、剛果共和國、吉布地、奈及利吉、多哥、南非和蘇利南
歐盟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2003年第六屆中歐峰會		無
東協	和平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	2003年在印尼峇里島第九次東協加一會議		2004年9月，東協10國承認中共具有市場經濟地位

資料來源：引用許多Lexis-Nexis新聞資料庫的英文報導和中共媒體資料。
註：依「戰略」、「夥伴」和「關係」進行中文檢索。

議。中共在1996年與俄羅斯進行高層晤面之後，首次建立此種溝通管道，但在當時並不叫做「戰略對話」，直到多年後才賦予這個稱號；而中共和法國也曾經在1990年代末期進行過類似的對話模式。2005年，中共開始擴大戰略對話機制，首次於該年和美國、印度、英國、日本和歐盟進行戰略對話。2006年，中共和德國在北京進行雙邊高峰會後，亦承諾展開年度戰略對話。

就不同程度而言，中共和主要大國，例如俄羅斯、法國和歐盟建立戰略夥伴關係，是為了擴展經濟關係、促進其他權力中心在全球政治的發展，以及尋求其他國家支持中共所期盼的多極全球秩序。雖然這些大型夥伴關係並不足以建立反美聯盟以平衡美國權力，卻能使中共擁有更大的選擇空間，可以促進一個有利環境，用以遏制美國的單邊行動，特別是美國權力影響到中共利益之時。[30] 中共這類外交行動並不會刻意凸顯反美因素，但是中共對美國單邊主義感到不安，的確是促使其建立戰略夥伴關係背後的原因之一。我們從2003年泛大西洋地區陷入緊張關係之際，歐盟和中共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並發表歐盟—中共聯合聲明，以及2005年7月所發表的俄羅斯—中共聯合公報與上海合作組織元首宣言，便可以清楚看到反對美國單邊主義的內容和動機。

雖然中共和主要大國已經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但受制於兩個考量因素，使他們無法成為有效平衡美國權力的機制。第一個考量因素是，中共和這些大國(特別是俄羅斯和印度)雖然有共同利益，但亦有利益分歧的地方，每個議題情況都不盡相同。中共與這些國家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並沒有一套中心政治或戰略邏輯，可使他們堅決聯合起來對抗美國。的確，除了俄羅斯有可能之外，多數中

共戰略夥伴並沒有興趣建立「堅實」聯盟抗衡美國。這些國家和美國正面交往可以得到許多利益，而且儘管和中共建立戰略夥伴關係有很多合作面向，但是他們在經濟和安全問題仍然彼此充滿緊張關係。例如，中共和俄羅斯或許在遏制美國對全球和中亞影響力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但是針對中亞能源供應管道和中共在俄羅斯遠東地區的影響力，兩國之間在經濟議題和安全問題上亦有利益分歧的地方。[31] 此外，根據過去經驗顯示，俄羅斯對中共而言根本不是個可靠的夥伴。2008年夏天，俄羅斯和喬治亞之間因為領土爭議爆發衝突，中共不願支持俄羅斯立場，顯示「中」俄戰略夥伴關係有其侷限之處。

第二個考量因素是，中共外交政策在歷史上從來不仰賴盟邦(甚至是堅定的雙邊夥伴關係)。中共講求獨立，不願依賴盟邦的歷史傳統，讓人不禁懷疑中共現在對盟邦的信賴程度到底有多少。儘管過去中共曾經和其他國家建立盟邦關係(例如1950年代的「中」蘇同盟)，但中共從未對盟邦完全放心；反而是北京當局傾向在外交上選擇自主，讓自己擁有更大的影響力和隨機應變的能力。[32] 此種長久以來的外交傾向，顯見於中共菁英分子強烈關切中共與全球各國相互依賴，以及伴隨全球化而來的國家安全挑戰，將導致經濟與安全門戶洞開的弱點。[33] 這個歷史傾向進一步在2001年得到確認，因為即便911恐怖攻擊事件尚未發生，俄羅斯仍然從即將形成的「中」俄聯合反美立場，轉而尋求與美國恢復更加友好關係。特別是俄羅斯在聯合反對美國飛彈防禦政策上退縮，無疑是一種背棄中共的行為。

這些事件因而顯示出中共戰略夥伴關係的第三個可能限制：

多數大國和美國交往所具有的重大利益更勝於中共。不論是公然還是暗自抗衡，許多國家並不希望因為與中共直接或間接合作遏制美國，損害與美國之間的友好關係。

軍事外交[34]

軍事外交已經在中共國際行為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2004年是關鍵的轉折點，中共於該年國防白皮書指出軍事外交已經成為「戰略層級」的國家政策。[35] 在此重要決定之後，解放軍便開始透過增加雙邊或多邊軍事互動，擴大與東亞、中亞、南亞鄰國，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治關係。中共顯然希望運用軍事外交向亞洲國家進行安全保證、揭開解放軍的神秘面紗、以軍事擴大其影響力、向軍事強國學習軍事經驗和知識，並形塑友國對中共的認知。

儘管解放軍對於國防資訊向來相當保密，因此這些軍事交流的內容仍然相當有限；但整體來說，中共軍事交流不斷擴大。依據《2008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

> 中國已與150多個國家建立軍事關係，在109個國家設立武官處，有98個國家在中國設立武官處。近兩年，人民解放軍高級軍事代表團出訪40多個國家，有60多個國家的國防部長、總參謀長來訪。
>
> ……
>
> 兩年來[2006－2008年]向30多個國家派出軍事留學生900餘名。20所軍隊院校分別與美國、俄羅斯、日本、巴基斯坦等20多個國家的相應院校建立和保持了校際對口交流關係。共接納130多個國家的4,000餘名軍事人員到中國軍隊院校學習。[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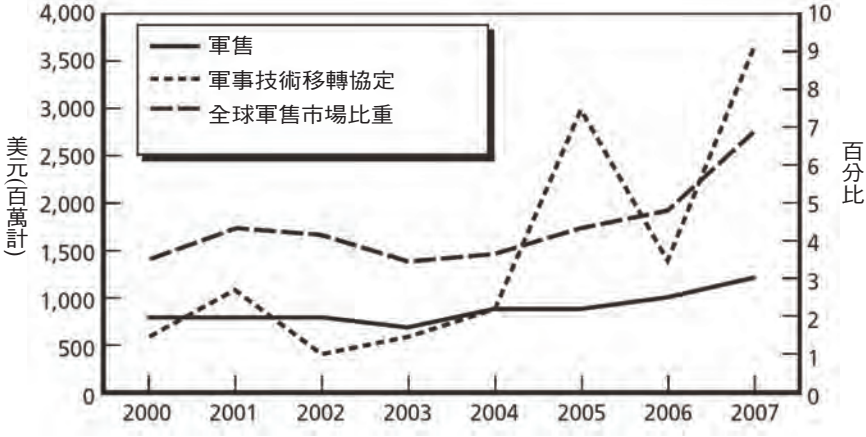
中共不斷擴大軍事外交，是希望運用這種交流方式，經營與其他國家的安全關係。此種互動可能會隨著時間而變得更加具體，這取決於中共的外交目標，以及其他國家是否願意和解放軍增加互動。

此外，中共現在每年和所有亞洲鄰國、部分歐洲和非洲國家，以及諸如美國及俄羅斯等主要大國進行「定期的」國防交流；甚至和一些提供國防諮詢的國家進行情報交換。中共國防外交亦逐漸開始重視聯合演習；從2002至2008年，解放軍已經和超過20個國家，進行40次以上的聯合軍事演習和訓練。這些演訓活動對解放軍來說，是全新的事務，而且實施的次數不斷增加。[37] 中共除了邀請其他國家參加其軍事演習，也派員觀察西方重大軍事演習，例如美國太平洋司令部於2006年在關島附近海域舉行的「勇敢之盾」(Valiant Shield)軍事演習。[38]

作為軍事外交的一部分，中共持續出售傳統武器給固定幾個小國，區域遍及亞洲(例如緬甸、柬埔寨、巴基斯坦和泰國)、非洲的次撒哈拉地區(例如蘇丹和辛巴威)和中東(例如阿爾及利亞、埃及和伊朗)。但若以全球來看，過去十年，中共軍備輸出仍然相當有限，每年大約介於5–10億美元之間。中共目前是供應發展中國家武器的第五或第六大輸出國，只占全球市場的3%–5%(儘管2007年小幅上升到7%)。美國和俄羅斯的軍備出口仍然主導全球市場。(詳如圖5.6)

中共軍備出口並沒有帶給中共太大的政治影響力，只是反映出這些進口國獲取武器的管道有限或資金相當缺乏。中共武器雖

圖5.6 中共對發展中國家軍售概況(2000–2007年)



資料來源：Richard F. Grimmett, Conventional Arms Transfers to Developing Nations, 2000–2007,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Washington , D.C.: Library of Congress, October 2008.
RAND MG850-5.6

然相對便宜但是性能並不可靠，因此很多國家根本看不上中共武器。這些國家可以從全球市場獲得更先進的武器，中共很難透過軍售促進其長期戰略夥伴關係；除了巴基斯坦長期和中共進行國防工業合作是個部分的例外。中共武器最吸引兩種國家：無法負擔更先進武器的貧窮小國(主要在非洲)，以及像緬甸和蘇丹這種面臨武器禁運的國家。因此，中共近十年來只能賣武器給相同的幾個國家，而且偶而才能獲得一次訂單。未來幾年，如果中共發展出新一代系統，並且願意出售解放軍目前的先進武器，便可能提升武器的競爭力，向其他國家進行軍售。此事如果成真，則軍售便有可能提升其他國家與中共之間的安全合作，並成為中共影響力的來源。

註釋

1 呂國增，外交部長助理，〈大力加強經濟外交工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服務〉，發表於外交與經濟研討會，2004年 12月18日。

2 《中國自由貿易區服務網》最新資料，中共商務部，資料日期未註明。

3 Sun Lei, "China Plans Financial Diplomacy, Seeks Right to Have Say in Economic and Trade Matters," 《21世紀經濟報導》，2006年4月26日，作者引用公開資料中心翻譯版本。

4 Belinda Cao and Judy Chen, "China Will Expand Currency Swap Accords to Help Trade," *Bloomberg News*, March 31, 2009.

5 內文資料引自《200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北京，中國：中共商務部，2008年9月27日。

6 截至2004年，中共海外直接投資總計達到370億美元。"China Makes More Overseas Investment in 2005 Mainly in Asia," 《人民日報網路版》，2006年2月11日，作者引用公開資料中心翻譯版本。

7 Thomas Lum, Hannah Fischer, Julissa Gomez-Granger, and Anne Leland, *China Foreign Aid Activities in Africa,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ast Asi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February 2009, p. i.

8 Lum et al., 2009, p. i.

9 Michael A. Glosney, *Meeting the Development Challenge in the 21st Century: American and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Foreign Aid*, China Policy Series, Policy Brief 21, New York: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August 2006b.

10 這些資料引自Phillip C. Saunders, *China's Global Activism: Strategy, Drivers and Tools*, Institute of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 4,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June 2006, p. 14; 亦請參見《2006年中國統計年鑑》北京，中國：中國統計出版社，2007年。
這些資料在統計年鑑原本是以人民幣計算。2005年是以1美元兌8.1元人民幣(2005年12月15日)換算，2006年是以1美元兌7.8元人民幣(2006年12月15日)換算。匯率來自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資料。

11 《2006年中國統計年鑑》，2006年；和《2007年中國統計年鑑》，2007年。

12 Lum et al., 2009, p. i.

13 根據新華社的報導，這八項特別措施包括：(1)到2009年中共對非洲國家的援助規模比2006年增加1倍；(2)今後3年內向非洲國家提供30億美元的優惠貸款和20億美元的優惠出口買方信貸；(3)為鼓勵和支援中共企業到非洲投資，設立中非發展基金，基金總額逐步達到50億美元；(4)為支援非洲國家聯合自強和一體化進程，援助建設非洲聯盟會議中心；(5)免除同中共有外交關係的所有非洲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截至2005年底到期的政府無息貸款債務；(6)進一步向非洲開放市場，把同中共有外交關係的非洲最不發達國家輸華商品零關稅待遇受惠商品由190個稅目擴大到440多個；(7)今後3年內在非洲國家建立3到5個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8)今後3年內為非洲培訓培養1萬5,000名各類人才；向非洲派遣100名高級農業技術專家；在非洲建立10個有特色的農業技術示範中心；為非洲援助30所醫院，並提供3億元人民幣無償援款幫助非洲防治瘧疾，用於提供青蒿素藥品及設立30個抗瘧中心；向非洲派遣300名青年志願者；為非洲援助100所農村學校；在2009年之前，向非洲留學生提供中國政府獎學金名額由目前的每年2,000人次增加到4,000人次。"Backgrounder: Eight Steps China Will Take to Boost China-Africa Strategic Partnership," 新華社，2007年1月30日。

14 Erica Goode and Riyadh Mohammed, "Iraq Signs Oil Deal with China Worth up to $3 Billion," *New York Times*, August 28, 2008.

15 Cary Huang, "Record $1 Billion Yuan in International Aid Granted by Beijing in 2005,"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19, 2006; 這是時任商務部部長助理陳健召開記者會的報導。

16 當然，中共的經濟發展方式和華府共識的典型模式亦有很多重大差異。中共市場經濟改革的速度和範圍，比華府共識講求的震盪療法來得漸進和局部。改革開放30年後，中共雖然已經縮小國有經濟規模，但整體仍然相當龐大。例如中共目前最大的銀行仍然是國有銀行，大多數的借貸亦受到國家指導。

17 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共評批美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的處理方式，就是中共樂意指出西方經濟政策失敗之處的明顯例子。

18 Joshua Ramos Coo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 Notes on the New Physics of Chinese Power*, London, UK: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19 這些資料引自張清敏和劉兵，2008年，第3頁。

20 Scott L. Kastner and Phillip C. Saunders, "Testing Chinese Diplomatic Priorities: The Correlates of Leadership Travel Abroad Under Jiang Zemin and Hu Jintao," 美國政治科學學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年度會議未出版的報告, Boston, Mass., August 30, 2008.

21 Andrew Edgecliffe-Johnson, Gillian Tett, John Thornhill, and Catherine Belton, "Wen and Putin Criticize Western Leaders at Davos,"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9, 2009.

22 中共領導人出訪的資料，請見Saunders, 2006, pp.21–22.

23 《2008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2009年。

24 中共如何參與和運用像聯合國這種全球多邊組織，會在後續文章談到。

25 中共和美國都在2005年成為觀察員。其它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的觀察員包括日本、南韓和歐盟。在2007年的會議上，伊朗提出成為觀察員的要求，但直到2008秋天都尚未通過。

26 David Shambaugh, "China's New Foray into Latin America," *YaleGlobal Online*, November 17, 2008.

27 若希望大致了解中共對戰略夥伴的思維，請見葉江，〈略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全方位外交中的大國戰略調整〉，《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第8期(2008年8月)，第38–44頁。

28 2005、2006和2008年，在上海及北京與中共學者和官員進行訪談。

29 中共建立這些夥伴關係或與戰略夥伴進行雙邊會議之後，會發表一些文件。這些主題是作者閱讀這些文件與官方聲明之後所得到的看法。

30 發動科索沃和伊拉克戰爭、北約擴張、推行防擴散安全倡議，以及美國退出反彈道飛彈條約，都是美國行為影響到中共利益的明顯例子。

31 中俄之間的利益分歧，請見Paul Goble, "Only Interest Are Permanent: Russian-Chinese Relation as a Challenge to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這是美中經濟暨安全審議委員會針對「中共增長的全球影響力：目標和戰略」(China's Growing Global Influence: Objectives and Strategies)舉行聽證會的證詞。

32 Fairbank, 1968; Garver, 1993, pp2–30; Andrew J. Nathan and Robert S. Ross, *Great Wall and Empty Fortress*,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 1997; Harry Harding, "China's Cooperative Behavior,"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1994, pp.375–400; and

David Shambaugh, "Patterns of Interaction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1994, pp.197–223.

33 Yong Deng and Thomas G. Moore, "China Views Globalization: Toward a New Great-Power Politics?"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7, No.3, Summer 2004, pp.117–136.

34 本節引用多份中共國防白皮書，包括《2002年中國的國防》，2002年；《2004年中國的國防》，2004年；《2006年中國的國防》，2006年；和《2008年中國的國防》，2009年；亦請參見Kenneth W. Allen and Eric A. McVaden, *China's Foreign Military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Henry L. Stimson Center, October 1999.

35 這個主題首次出現在2004年國防白皮書，在「國防政策」底下有「軍事交流與合作」的項目。

36 《2008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2009年。

37 這些演習通常進行海上搜救演練。2005年中俄兩國在山東半島進行大規模兩棲登陸作戰演練是個明顯的例外。陸上聯合演習通常是和中亞國家進行，針對各種情勢進行反恐演練。〈2007中國軍方軍事演習密度頻繁堪稱「軍演年」〉，《中國青年報》，2007年12月28日。

38 根據中共資料，2005年北京軍區司令部舉行「北劍–2005」軍演，邀請來自24個國家共41名軍事觀察員。

第六章
中共外交行動

為追求本書第四章所界定的最高國際目標，中共已然發展並採取諸多有效政策，藉以形塑其外部環境。此點可由中共積極參與國際社會，並靈活運用多樣化的政策而獲得明證：就雙邊關係而言，中共在擴大合作範圍和增進合作品質上顯得相當有系統；在諸多區域和許多功能性議題上，中共展現出令人囑目的態度參與多邊組織；中共的經濟外交顯得相當強大而層面亦相當廣泛；同時中共業已將軍事外交適度納入外交政策之中。本章檢視這些政策行動在中共全球外交中所反映出來的內容與特性。

外交關係的政策架構

近十年來，為了發揮現有及創造全新的影響力，中共已經展開各項外交行動，其中擴大雙邊關係的深度、範圍和品質，則是中共現階段努力的方向。由於中共過去長期偏好雙邊互動，因此這樣的外交趨勢將會一直持續下去，即便中共現在相當重視多邊主義，亦不會有所改變。

「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是中共官員

及學者所引述的雙邊關係指導原則，我們可以從中得知中共領導人如何對各種雙邊關係做出輕重緩急之分。最近幾年，中共又為這個原則增加第四項元素：「多邊是舞台」。2007年10月，胡錦濤在中共第十七大工作報告亦提到這項原則，顯示這些概念對中共有一定的重要性。[1] 中共官員和學者將這四項原則稱為中共外交政策的「四大支柱」。

然而，中共實際的外交政策行為並非一成不變地固守這個原則，中共學者亦在爭論究竟這個原則對於實際的政策制定應該、可以或真的發揮多少指導作用。[2] 特別的是，隨著時間演進和領導人更換，中共重視「大國」和「周邊國家」關係的相對優先順序亦會產生搖擺。中共內部許多分析家認為不應花費太多心力於大國關係，以及與之伴隨而來的國際地位，反而應該著重發展周邊國家關係以確保穩定安全的區域環境。2009年中共的決策過程似乎就是以這種看法為主導。[3] 另一派學者則認為，中共不能只和周邊國家發展關係，卻犧牲與美國、俄羅斯、日本和歐洲國家的關係，因為大國關係對確保穩定區域環境和促進全球穩定繁榮至關重要。從這個角度看，中共和大國發展穩定而友善的關係對中共能否崛起實屬必要，然而由於中共領導人的保留態度，使得此項目標仍然未能獲致充分的推展。[4]

由於這兩項外交要務(例如應該發展大國關係或是區域國家關係)各執一詞，因此中共必須思索如何做出平衡。此外，觀察中共領導人如何處理這種緊張關係，亦可讓我們瞭解中共目前和未來領導人的外交政策取向。[5] 部分中共人士認為，江澤民較為重視增進大國關係，因為他個人喜歡(藉此塑造其政治地位)和大國領導人進行

互動。相對之下，中共分析家認為胡錦濤對於大國的關係似乎採取較為平衡而務實的策略：胡錦濤在必要時刻也會強調大國關係，但他更願意盡最大努力開展亞洲區域外交，以穩定中共周邊(這些地區存在很多危機)和增進中共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6] 本章接下來將會分析中共和這三類國家──大國、周邊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關係。

大國關係[7]

中共領導人在1990年代早期就已經表示「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是指導中共與大國關係的三項原則。[8] 這些原則是中共領導人處理大國關係的整體基本方式，中共政府機關亦參照這些原則制定領導人的外交目標；也因為這些功能定然有其價值和重要性，故而不能將之完全視為宣傳口號。中共和大國的互動模式與此原則大致相同，但是這個原則無法精確解釋中共和美國、俄羅斯及其他國家關係的複雜性和微妙之處。

在中共的大國關係中，經濟聯繫始終扮演著重要角色，特別是和美國、日本及歐盟的關係。中共希望和這些國家拓展關係，是出於一種經濟思維，若要瞭解中共對這些國家的外交政策，就必須對這種思維有所知悉。中共必須和這些國家發展並增進關係，以確保市場、投資和科技的獲取管道。近30年來，美國、歐盟和日本一直是中共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和投資來源。

然而，與這些大國實際進行交往時，中共的言行舉止並沒有完全堅持上述三個原則。儘管中共沒有成立任何同盟，但卻致力遏制

美國的全球影響力，並限制美國和日本在亞洲對其進行遏制。這雖然不是中共主要的國際行為，卻已益發明顯。中共外交行動雖然沒有公然挑戰美國或日本，但如同上述，競爭關係始終存在(各種不同的緊張程度)。

美國

中共與美國的關係相當特殊，不同於與其他大國的動態。自從「中」美關係正常化後，中共大多數外交政策相對之下都把「中」美關係列為優先考量。中共決策者向來認為「中」美關係是北京最重要的外交關係。這是因為：第一，中共認為美國是貿易、投資和科技重要來源；第二，中共認為如果「中」美關係惡化，中共持續國家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將會受到破壞。

「中」美關係在中共與大國關係中的特殊之處，亦在於兩者同時存在大量合作與競爭，包括經濟和安全議題。在某些時候會同時存在緊密合作和劇烈競爭；華府和北京聯手抑制北韓核子計畫時，亦會因為如何解決伊朗核子計畫和雙邊經濟爭議大鬧意見不合。

這種合作與競爭並存的雙邊關係，是「中」美關係的結構特徵。一方面，穩定的雙邊關係對各自經濟和安全利益相當重要；爆發衝突會讓雙方都付出代價。另一方面，北京認為美國全球影響力和美國亞洲政策的某些方面，會對其造成威脅；華府亦同樣關切中共不斷增長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並且對中共的未來意圖感到相當疑惑。由於可能因為中華民國而陷入軍事衝突，因此雙方軍事計畫者都在進行軍事現代化工作；基於這項可能，導致雙方都有不安全感，為雙邊合作關係蒙上一層重大結構性限制的陰影，使美「中」關

係有陷入軍事競賽的危機。中共決策者普遍以「求同存異」來描述微妙且複雜的「中」美關係。[9] 目前，兩國領導人從未提到雙邊關係是「戰略夥伴」，這大部分是因為美國的堅持；相對的，美國和中共決策者會運用一堆形容詞進行描述，例如正面的、具建設性的、合作的、坦率的和全面的。[10]

這種情形會對中共對美政策造成何種影響？中共政策顯示其希望與美國擴大合作機會(以預防立即性的對立持續發展)，並且在可能的範圍內遏制美國。這兩個目標部分可以從中共對「中」美關係的指導原則得到印證：「增加信任，減少麻煩，加強合作，不搞對抗。」這個戰略原則剛開始是由鄧小平於1990年代早期提出。即便官方用語是「發展合作，不搞對抗」，但前述原則大體上仍為江澤民反覆重申，並延續至今。未來，中共將會持續運用這類官方用語，持續按照這個原則指導對美政策。[11]

中共對美政策在2000年代便已反映出此種雙重策略。911恐怖攻擊事件後，美國國家安全要務產生相當大的改變，中共便以此為契機，將雙邊關係推向更鞏固的定位。中共決策者向美國表示希望避免成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從那時開始，中共便希望在諸多方面擴大雙邊合作。儘管中共針對安全議題的各項合作內容和範圍不盡相同，然其決策者與分析家不斷強調「中」美合作打擊全球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高度規格，並視其為穩定雙邊關係的新基礎。[12]

隨著中共在區域和全球的各種利益趨於多樣，中共與美國就非傳統安全議題進行的實際合作亦開始增加。近十年來，美國與中共針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合作議程已日趨緊密，並開始進

行各項新議題的實質合作，包括打擊傳染性疾病、毒品交易、販賣人口及組織犯罪。根據美國政府評估，中共已經對諸多安全議題做出貢獻，包括北韓和伊朗核子計畫；伊拉克和阿富汗政經重建；聯合國安理會就黎巴嫩、緬甸和蘇丹相關問題所進行的協商事宜；以及倡導支持全球衛生與能源安全的各種方案。然而，美國仍有更多事務需要中共的協助。[13]

中共對美政策亦有競爭的一面：反制美國在亞洲甚至全球，為了限制中共能力和影響力所採取的相關措施。[14] 短期內，中共希望建立一種環境，讓美國政策無法挫敗或阻礙中共最高外交政策目標，最終進而能夠完成大國復興。中共亦希望參與各種可能影響其經濟和安全利益的重大決定。一方面，這樣可以監控(主要在亞洲)和弱化美國既有的圍堵政策，並遏制美國在此區域的行動自由，特別是在對中華民國爆發軍事衝突時，阻止美國所採取的區域協防行動，目的是試圖營造高度偏向中共喜好和利益的區域環境。另一方面，中共執行上述政策目標時，亦希望避免公開或恣意與美國的目標發生競爭或是正面抗衡。為了平衡這些競爭目標，中共部分戰略家主張中共可以和霸權共處，但反對霸權行為。此種作法讓中共決策者和分析家得以在穩定「中」美關係的前提下，降低對美國於未來片面運用其主導優勢或權力對付中共的疑慮。[15]

為了降低美國施壓的能力，並創造更大的操作空間，這些對立性目標均可見諸於中共在區域及全球所採取的相關措施。1990年代晚期，為了形塑新的區域安全局勢，中共有許多外交官員運用各種手段，勸誘諸多東亞國家脫離美國的盟友和安全夥伴關係。這也是中共於1997年提倡「新安全觀」的部分原因，希望針對美國在亞洲建立

「輻射型」安全聯盟體系，提供各國一個可資替代的看法。[16] 然而，這項作法大致上是失敗的，因為幾乎沒有任何美國盟友和安全夥伴願意接受中共的提議，他們寧願選擇更可靠的美國安全承諾。有鑑於此，中共最近在亞洲採取下列外交行動以穩定周邊區域。中共在東亞採取更多行動向區域國家進行安全保證，擴大中共在區域組織的角色，並且針對中共對台立場尋求支持。這些行動目的是建立一個區域安全環境，避免其他國家抗衡中共，且更重視中共的觀點。

除了針對亞洲之外，中共抑制美國力量的作為還包含大力呼籲「國際關係民主化」，並以此做為對抗美國主導權力的關鍵用詞。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中共便致力擴展俄羅斯關係，希望以此抗衡美國權力，並且在諸如聯合國安理會這類全球論壇上遏制美國。中共會這麼做，部分是因為其反對北約擴張、美日聯盟加深、北約在科索伏的軍事行動，以及美國的彈道飛彈防禦政策。

最後，中共對美國的政經依賴程度逐漸降低，將會是未來的長期發展趨勢。對此，這或許部分是環境使然，部分則是出自中共的精心設計。當中共擴大參與全球活動並參與多邊組織事務，其追求繁榮、安全和地位的管道亦在增加。從中共近十年來拉攏歐盟和俄羅斯；擴大與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的關係；並積極參與聯合國事務可以看出，中共對美國的政經依賴程度已然逐漸降低。[17] 此種趨勢將會造成中共逐漸認為追求外交政策的目標，無需和美國維持穩定雙邊關係。基此，中共便可能更有意願挑戰美國，抗拒美國在雙方存有爭議時，對其行為進行施壓。

俄羅斯

自從1989年戈巴契夫推動「中」蘇關係正常化以來，雙方關係便產生相當大的改變。北京逐漸並持續提升「中」俄關係，主要原因是基於雙方都相當關切美國權力和美國推廣民主的議題，希望盡可能遏制美國外交和軍事力量。1994年，中共和俄羅斯成為「合作夥伴」，隨後在1996年成為「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並且於2001年簽訂「睦鄰友好合作」條約。這些協定讓雙方得以持續進行高層互動，並成為雙邊關係「最為深厚」的基礎。從1996年開始，「中」俄領導人每年進行高峰會。2003年胡錦濤成為國家領導人後，首趟出訪行程便是俄羅斯。「中」俄聯合成立後來於2001年擴大的上海合作組織(雖然這亦是雙方較勁的場所)。2004年，雙方邊境爭議終於塵埃落定。2005年，兩國首次於山東省東部海岸舉辦大規模聯合兩棲登陸演習，並且於2007年在俄羅斯境內舉辦第二次聯合軍演(這次只有陸軍參加)，第三次聯合軍演則於2009年夏末舉行。中共戰略家認為，這些協定、條約和相關事件，代表雙方關係已經進入相當制度化的階段。[18]

此種關係尚有許多重要層面。俄羅斯在物質上對中共現代化需求貢獻良多；從冷戰結束後開始，俄羅斯便是中共許多精密及必要武器系統的主要供應來源(例如現代防空系統、先進戰機、多功能型驅逐艦、潛艦和超音速攻船巡弋飛彈)，在中共進行軍事現代化計畫的關鍵時刻，填補了共軍戰力上的重大缺口。2007年，俄羅斯是中共第四大原油供應國，占進口比重9%。當中共石油進口增加，並且希望分散油源供應管道，特別是非海運管道時，能源貿易便成為雙邊關係的全新面向。

中共渴望兩國合作處理共同面臨的全球和區域安全挑戰，始終是其積極提升「中」俄關係的最大原因(即便雙方已擴大進行能源合作)。[19] 中共分析家一直是從中共在全球大國體系中的相對地位來看待「中」俄關係；對中共而言，與俄羅斯合作有助於推廣多極化和多邊主義，從而降低美國的影響力。俄羅斯領導人和中共菁英一樣，都對美國的權力和相對主導地位感到不滿，特別是美國偏好軍事同盟、政權輪替、民主推廣、單邊外交與單邊軍事行動。某份中共權威研究分析就這麼指出：

> 在國際問題上兩國的共識增多。兩國都反對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主張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全球發展。都反對單極世界，認為多極世界是歷史發展的潮流。兩國都認為，堅持冷戰思維和干涉別國內政的勢力，是世界不穩定的主要根源。[20]

基於這些關切，中共分析家和官員認為提升「中」俄關係，將有助降低美國脅迫中共和俄羅斯的能力，遏制美國整體影響力，並且讓兩國與華府進行互動時擁有更多籌碼。上述研究分析對此表示：

> 兩國都希望在一些地區限制美國的影響，都希望維護中亞和朝鮮半島的穩定，都希望日本奉行和平和非武裝政策。
>
> 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對穩定動盪多變的世界局勢，促進多極格局的形成將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
> 中俄關係的發展與兩國面臨的壓力有很大的關係，美國在戰略上的

> 擠壓對中俄關係的發展起了催化劑的作用。
>
> 中俄兩國的這種處境，促使雙方加強合作，相互支持，以鞏固各自在國際舞台上的大國地位。
>
> 美國越是對中俄關係穩定發展產生顧忌，中俄就越要鞏固這種關係，這是……打破美國單邊主義、霸權主義的有效手段。[21]

「中」美關係陷入緊張時期，剛好就是「中」俄關係明顯加強的時候(從1996年底成為合作夥伴到2001年初簽訂條約)，進一步反映這個思維。同樣的，2000年代晚期，兩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的關鍵爭議上，基於遏制美國倡議的共同目的，亦日益趨於密切合作。就聯合國針對北韓核子議題，俄羅斯支持中共立場；相對的，中共則在伊朗問題上，支持俄羅斯立場。2006和2007年，「中」俄兩國在聯合國安理會進行投票時，幾乎完全採取相同立場，包括否決權的動用。[22] 因為兩國同樣相當關切美國權力，許多中共人士希望俄羅斯能在「中」美之間因為中華民國議題發生衝突時支持中共；中共分析家便指出，2005年進行兩棲聯合演習，代表兩國軍事合作已經得到加強，能夠在台海危機時產生作用。[23]

俄羅斯和中共在中亞的共同目標為降低美國駐軍和民主推廣作為；兩國都擔心美國軍隊會持續駐紮中亞，亦相當關切美國推動民主制度的「顏色革命」。因此，兩國支持2005年上海合作組織高峰會的聲明：俄羅斯和烏茲別克倡議美軍退出中亞的時程表。

然而，「中」俄兩國在中亞亦有相互競爭的一面。俄羅斯擔心中共在此區域擴大貿易和能源互動後，假以時日會在區域內成為支

配者。俄羅斯仍然憂慮上海合作組織會成為中共促進北京區域安全議程與經濟利益的工具；而中共則對俄羅斯有同樣的關切，特別是能源取得的議題。在上海合作組織內部，兩國相互利用影響力，避免對方主導這個組織；同時，多數中亞國家亦游走於兩國之間，從中獲取最大利益。2008年峰會期間，針對南奧賽提亞和阿布哈茲獨立問題，沒有任何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願意支持俄羅斯立場，顯示俄羅斯在該組織內部的影響力有限。[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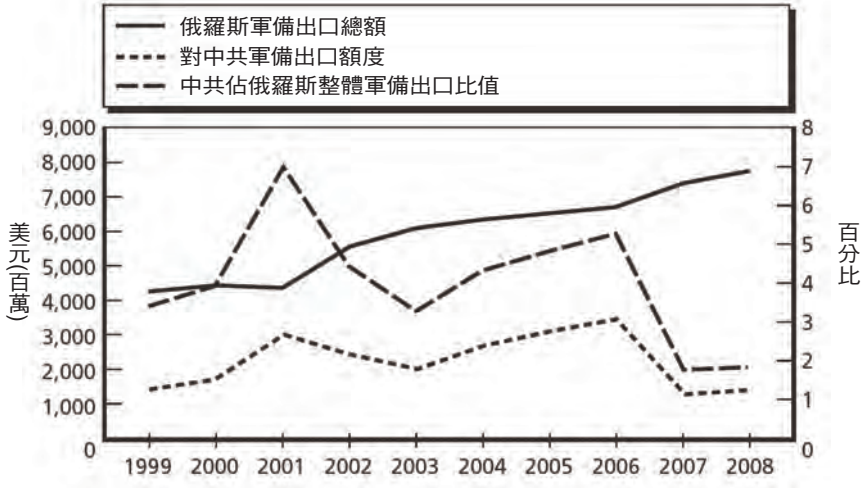
「中」俄兩國之間的互動隱然存在緊張之處。「中」俄之間與其他諸如美國等國家的關係不同，兩國社會和文化接觸的層級很低，為雙方關係帶來負面的刻板印象(特別是俄羅斯對於中共主導東西伯利亞地區的恐懼感)。相較於民間的接觸，高層之間的外交和軍事互動顯得更有制度。最明顯的例子便是俄文並不受到中共人民喜愛。2007年，中共大約有4萬名大學生和8萬名中等學校學生學習俄文，但學英文的學生卻超過2億人。[25] 中共分析家已經注意到這種限度，並且在他們的評論中明白指出：「由於社會制度的差異，以及改革背景與思路的不同，雙方也存在著一些交叉與碰撞。」[26] 這種情況將會妨礙兩國發展更緊密的關係與準聯盟的政策合作。

「中」俄關係尚有一些重大限制。不像中共與其他大國的關係，中共與俄羅斯的經濟關係雖然有所增長，但仍然相當有限。俄羅斯在經濟上，從來就不是中共的主要貿易夥伴或主要投資國。2007年，「中」俄雙邊最高貿易額度僅480億美元；但相較之下，同年歐盟是3,560億美元，美國是3,020億美元，日本則是2,360億美元。[27] 同樣的，中共在俄羅斯全球貿易所占的比重，始終大於俄羅斯對中共的比重。若以貿易金額來看，兩國經濟關係有超過十年時

間都是以軍備貿易為主，但是這種情況正在改變，因為中共開始從俄羅斯進口更多原油和出口更多加工製品。

這種雙邊貿易模式亦是兩國緊張關係的來源；俄羅斯希望向中共出口更多附加價值的資本財貨(例如裝備和機器)，但也擔心俄羅斯市場充斥中共廉價的進口消費品。當全球石油價格於2008年後期下滑，雙邊貿易額的增長速度便開始趨緩。此外，由於「中」俄兩國軍備貿易關係產生根本性的轉變，中共向俄羅斯購買重要武器載具亦達到極限。2008年，俄羅斯出售給共軍的武器大約是14億美元，不到2006年的三分之一。俄羅斯消息來源指出未來幾年這種情

圖6.1 俄羅斯對中共軍備出口狀況(1999-2008年)



資料來源：1999至2007年的資料取自「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學院」(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arch Institute, SIPRI)2009年4月軍備交易資料庫(Arms Transfer Database)。2008年資料取自媒體相關報導，以及Igor Chernyak, "Interview with Rosoboroneksport General Director Anatolly Isaykin," *Rossiyskaya Gazeta*, April 10, 2009，作者引用公開資料中心翻譯版本。
RAND MG850-6.1

況都不會有任何突破(如圖6.1)。此種改變之所以會產生，是因為中共軍力結構的重大缺口大多已經得到填補。中共益發希望能夠和俄羅斯簽訂共同生產武器與科技分享協定(以武器載具的半成品為主)，使其能夠進一步發展已經獲致提升的國防工業。目前尚不清楚俄羅斯的相關公司是否願意將設計和製造技術分享給中共；然而中共仿造俄羅斯軍事裝備和科技，已經引起俄羅斯國防企業強烈關切，限制了進一步合作的空間。2008年12月，兩國舉行延宕已久的軍事技術合作聯合委員會，期間「中」俄兩國簽署一份智慧財產保護協定，但卻沒有達成新的軍售合約。未來，持續觀察「中」俄軍備貿易的互動趨勢，將可以有效檢視雙方廣泛政治關係是否趨於良好。[28]

對中共而言，「中」俄間長期以來的緊張關係主要來自俄羅斯的可信度令中共存疑。此種情況已然，並將持續使得北京和莫斯科無法進行深度合作，特別是當某些見解不一的新議題摻雜在雙方關係時。在中共眼裡，不論是和過去蘇聯或現在俄羅斯的交往關係，中共遭到背棄的例子不勝枚舉。2001年911恐怖攻擊事件之後，普丁在政策上轉向美國，而這在中共眼中無異於「對華關係被置於次要地位。」[29] 而此種情形就發生在「中」俄條約簽訂不到幾個月後。俄羅斯態度轉變的個案之一，便是普丁放棄與中共聯合反對美國飛彈防禦政策，特別是美國退出「反彈道飛彈條約」，讓中共變成率先發聲的反對者，因而處在一個相當尷尬的立場。幾年之後，北京和莫斯科感到美國偏好單邊行動和漠視國際體制，俄羅斯又針對北韓和伊朗等關鍵議題與中共再度結盟，共同遏制美國。

然而，中共仍然相當關切俄羅斯的可信度，而俄羅斯亦仍有與

中共相互競爭的想法。中共希望能在俄羅斯發展一條從西伯利亞到中國大陸東北方的石油管線，卻面臨許多困難。1995年，雙方首次提議簽署雙邊協定，興建一條從安加斯克到大慶的石油管線；然而，俄羅斯的立場在2003年卻開始動搖，因為日本亦向俄羅斯喊價，興建一條從西伯利亞到納科德卡的替代管線。尤科斯(Yukos)石油公司執行長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一向是所謂「安大線」的主要擁護者；然而，隨著他被依貪汙罪監禁之後，安大線計畫亦被束諸高閣，此事件被解讀為克里姆林宮政治對手所採取的動作。最終的結果是，前項計畫便被東西伯利亞–太平洋管線取代，僅興建一條支線到中國大陸。這項計畫的第一階段已經完成(從伊爾庫斯克到靠近中國大陸邊界的斯科瓦羅迪諾)，但俄羅斯尚未開始興建斯科瓦羅迪諾到中國大陸的支線。北京在2009年2月向俄羅斯提供250億美元貸款，可能會加速這項計畫工作；這筆貸款意在協助俄羅斯公司建造支線，並進行東西伯利亞環境保護，並預計於2010或2011年完成這條通達中共的支線。[30]

此外，中共官員和分析家相當清楚俄羅斯內部盛行「中國威脅論」。北京認為，這不只是一般大眾和媒體的看法，就連一些政治官員亦抱持同樣看法。俄羅斯相當關切中共持續增長的經濟和軍事權力，以及中國大陸人民大量移民俄羅斯的遠東地區。儘管中共決策者和分析家對這種看法加以駁斥，但他們仍然瞭解這其實反映出俄羅斯菁英分子對中共既愛且恨，擔心俄羅斯正在培養未來的戰略競爭對手。這種情況讓中共對俄羅斯是否會遵守條約所訂定的「中」俄戰略夥伴關係感到相當疑慮。中共領導人知道，俄羅斯願意把最先進的武器賣給印度，但不會賣給中共。近年來雙方在

軍備貿易關係上的磨擦和遲緩，顯示雙方其實猜忌日深。如同上文所述，中共和俄羅斯在中亞及上海合作組織內部亦有彼此競爭的一面；隨著中共逐漸強化和中亞國家的能源交易，此種競爭將會日益激烈。[31]

最後，中共人士認為，「中」俄之間的「外交文化」不同，因此中共必須謹慎看待俄羅斯的可信度：俄羅斯試圖再度成為全球超級強權，傾向正面對抗美國；相較之下，中共聲稱目前並沒有這種野心，而且傾向用技巧性的方式遏制美國。俄羅斯此種野心受到中共分析家密切注意，並成為他們在國際安全事務上檢視進一步合作的關鍵變數。[32]

日本

在中共與大國的關係中，「中」日關係的調整或許最為深層。對中共而言，「中」日關係在1980和1990年代期間相對穩定友好，經濟合作持續增長；但後來卻「轉變」成即使經濟互動規模龐大，雙方敵意卻不斷拉高層級，整體而言不甚穩定，並且相互競爭區域領導權。然而，從2000年代中期開始，中共對日政策開始著重建立更穩定的雙邊關係，而日本亦抱持同樣態度。中共對日政策的演進，是因為不希望一般大眾的反日情緒愈演愈烈，導致「中」日關係急速惡化；同樣的，日本亦擔心反中情緒會在日本發酵。

從歷史的角度觀察，中共對日政策主要受到某種經濟思維所影響，這種經濟思維少有爭議，而且數十年來幾乎是主導「中」日關係的全部。即便雙方在1972年才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然而在1950、1960，乃至1970年代，日本亦未曾斷絕對中共的貿易。進入改革開

放之後，日本已然成為中共重要的貿易和直接投資來源；或許關鍵之處在於，日本每年都會以捐贈及補助貸款的方式，向中共進行海外發展援助。此外，包括汽車、造船和消費性電子產品等中共視為工業現代化的核心部分，日本公司亦為相關生產設備、專業知識及科技的重要供應來源。

中共對日本帝國歷史的憤怒和反日民族主義，在1980和1990年代並未成為限制雙邊的重要因素，即使這種歷史情緒突然爆發，中共領導階層亦會加以控管。[33] 雖然中共菁英分子和一般社會大眾相當不信任日本的意圖，且擔心日本會重蹈軍國主義覆轍，雙方關係亦少有安全競賽的問題，但中共改革開放的頭20年，兩國的國際目標均相當節制，而且雙方都專注於促進區域穩定和經濟發展。長期存在的領土爭議和歷史問題，在兩國有限的野心及注重互利經濟合作的前提下，得以侷限在可控制範圍內。

「中」日關係從1990年代晚期開始變得較為緊張、競爭和不穩。兩國都開始界定更加廣泛的外部利益，也都在進行軍事現代化，使兩國都對彼此感到威脅。中共領導人開始提出要在亞洲崛起的論述，並且在區域安全事務上變得更加積極。當日本軍隊開始參與由美國領導的全球軍事行動，並且和美國共同發展飛彈防禦能力，中共外交政策菁英便開始質疑美日同盟所能形成的制約效果。由於美國鼓勵日本軍隊應該承擔更廣泛的責任，因此日本領導人亦希望在區域和全球安全事務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隨著中共經濟和貿易持續增長，中共亦在區域經貿事務上尋求領導地位，然而這亦是日本垂涎已久且處心積慮想得到的位置。兩國同時朝此目標前進的結果，已經在實質上激發彼此相互競爭區域領導權。因此，中

共現今對日政策和範圍更大的區域外交政策，相當關切如何在東亞占據比日本更重要的地位。[34]

中共和日本的國內政治情勢亦激化了浮現中的競爭關係，並衍生難以掌握的狀況。兩國內部政局的改變，使得雙方為了維護自身權益，而為仇日和反中創造空間與機會。不同以往之處在於，兩國在制定對中或對日政策時，民間聲浪已經開始扮演重要角色。中共內部曾經就對日政策方向進行多次辯論，主題圍繞於「歷史議題」在「中」日關係的相對重要性。隨著國內時空環境改變，領土爭議和長期存在的歷史問題便開始浮現，進一步激化區域領導權的競爭。在很多情況下，這些國內情勢限制了雙方領導人穩定關係的能力。[35]

諷刺的是，在這個競爭過程中，兩國貿易和投資仍然快速增加。1996到2006年，日本對中貿易(包括香港)驟升239%；相對之下，日本全球貿易只增加45%(不包括對「中」貿易)。這段期間，日本對美國貿易也只增加12%。2006年日本對中共貿易占日本全球貿易的17%，包括14%的出口比重，以及21%的進口比重。和美日貿易不同的是，日本對中共貿易相對平衡且高度互補。對中共貿易出口增加，讓日本得以在2005到2008年，從連續十年的經濟不景氣中迅速恢復；這種結果是北京沒有注意到的。[36]

這種看似矛盾的趨勢會對中共對日政策和「中」日關係造成什麼影響？答案是中共仍會持續尋求與日本的貿易和投資機會，但不會像過去一樣無條件維持正面的對日關係(為了累積經濟收益)，而是在歷史和領土等關鍵爭議，更加維護自身權益。中共在經濟上較不依賴日本，對自身的經濟力量和區域影響力更有自信，而且更加擔心日本的意圖。中共公開反對並阻止日本企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

的常任理事國。中共在東海部署海軍艦艇警戒存有爭議的碳氫化合物資源(例如春曉油田)，並且在這些爭議地區進行石油鑽探。在雙邊關係中，中共變得更加維護自身利益，並敦促日本做出退讓。

然而，更多的跡象顯示中共對日政策正在改變，而此種改變雖然看似緩慢，其結果卻相當重大。中共領導人體認到2001至2005年這段期間，雙邊關係急轉直下，已經在國內產生政治風險，並且付出相當大的外交和經濟代價。因此從2006年開始，中共領導人做出最大努力穩定雙邊關係；胡錦濤和溫家寶相繼造訪日本，並且款待回訪的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安倍晉三和麻生太郎。2007年5月，溫家寶於日本國會發表演說，同時向兩國民眾播放。在這篇演說中，他對日本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的政治和經濟成就表示肯定；而這篇演說也釋出北京方面有意拋開過去歷史議題的態度。更具體的是，儘管靠近東海爭議區的天然氣平台已經完成，中共仍然對全面開採動作有所節制，並和日本協商一個暫時性架構處理這項爭議；但是，反日民族主義將因而對中共領導人造成更多限制。

兩國關係變得更加競爭或陷入立即衝突的看法並非不可能；然而持續增長的雙邊經濟關係或在東亞促進更深的經濟整合，是北京和東京的重大共同利益，亦是雙方維持關係的原因和動力。重要的是，北京已經開始對反日煽動者(例如維護釣魚台主權團體)採取行動所可能製造的麻煩加以限制。在2005年4月的反日騷動中，北京當局便迅速逮補非法攻擊日本工廠的首腦分子。中共進一步和日本及南韓簽訂一項三方投資協定，增進投資氛圍和保護日韓兩國在中國大陸的商業活動。2007年，中共亦支持美國、中共和日本進行三方外交對話的提議。

雙方領導人在2009年中，開始嘗試促成一項穩定兩國競爭和緊張關係的雙邊政治關係架構。然而，雙方在促成這項架構過程中，仍然面臨下列現實挑戰：兩國民眾依舊存有很深的敵意；幾乎沒有任何一項複雜的領土爭議能看見解決的方案，而彼此在區域間的競爭關係仍是暗潮洶湧；雙方可能再度上演1990年代晚期和2000年代早期導致雙邊關係惡化的國內政治情勢。因此，北京和東京是否能夠重新建構長期穩定關係，端視雙方領導人是否願意在緊張關係突然爆發時，付出最大的努力和必要的政治資源。

歐洲[37]

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中共對歐盟及其會員國的外交關係已有相當大的演進。歐盟是中共相當大的出口市場，亦是海外投資和先進生產裝備及技術的關鍵來源(包括軍事現代化的潛在性)。歐盟增加諸多會員國後，已經在2004年成為中共最大的貿易夥伴。[38]此外，歐洲國家一直是中共發展援助的重要來源。儘管對於目標的見解各有不同，許多歐洲國家領導人至少在口頭上，支持中共增進「多極化」國際秩序的看法。這些特性讓中共在過去十年更加注重「中」歐關係，雖然交往的結果對北京當局而言，不盡相同。

隨著「中」歐關係持續發展，雙方關係已經變得益發複雜且爭論不斷，特別是彼此都對另一方有更多期待的時候。歷史上，經濟互動是雙方能夠維持友好與穩定關係的基礎，但現在因為包含市場進入，以及龐大且持續增長的貿易赤字和中共匯率政策等問題，雙方爭議不斷。歐洲勞工勢力在經濟議題上所承受與施加的壓力持續增加，使得歐盟領導人在面對這些議題時形成相當大的政治

障礙。中共各種人權上的相關政策(例如西藏)以及某些外交工作(例如援助非洲),已經在公眾間再度引發爭議。受到國內政治環境刺激,歐盟領導人現在已經變得更願意針對這些爭議與中共進行對抗。對中共和歐盟而言,其與美國的關係始終籠罩著中共與歐盟的雙邊關係,通常使中共難以影響歐盟的各項政策。[39]

三階段演進。自從1975年中共和當時的歐洲共同體建立關係,雙方歷經三個階段的演進。[40] 在每個階段,中共都有不同的外交目標和政策,並產生不同的效果。第一階段,也就是1975–1995年這段期間,雙邊關係並沒有出色的發展,彼此亦沒有將對方視為外交要務。歐洲是中共第二,偶而還會排到第三重視的地區。[41] 1980年代,因為彼此在政策上並沒有太大的歧異,雙方得以在貨物貿易主導下,擴大共同利益。中共外交策略將重點置於歐洲提供的發展援助、商業投資和技術轉移。許多歐洲決策者希望藉由扶植中共經濟發展,為新興市場開創契機。部分歐洲人士相信,此種發展可以帶領中共進行政治改革,而中共亦樂於藉由這種想法從中獲利。對中共而言,歐盟是海外投資和相關生產設備的重要來源,也是建立或重建諸多重要工業,包括汽車(例如福斯汽車)和輕、重工業(例如西門子)的重要來源。歐盟國家和中共交往以商業動機為主,除重視擴大貿易和投資機會,也鼓勵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建立正式關係20年後(許多重要歐洲共同體／歐盟國家早於1950年代就和中共建立外交關係),歐盟終於在1995年首次針對中共發表戰略報告。

第二階段是1995到2005年,這段期間「中」歐關係的品質不斷提升。在這十年當中,特別是中共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貨物貿易迅速增加。歐盟執行委員會針對整體「中」歐關係,

和中共進行四次「溝通」(1995、1998、2001和2006年),並且發表兩份「國家戰略報告」(2002年和2007年)。歐盟執行委員會和歐盟成員國,總計提供中共數十億歐元的發展援助。歐盟理事會(歐盟最高政治機構)的相關政治議案亦納入與中共有關的議題,包括反擴散、人權、能源政策和氣候變化。歐盟理事會就相關議案和中共進行27次以上的「部門對話」,歐盟執行委員會與中共相關政府部門的互動關係因而得以擴大。[42]

2000年代初期,泛大西洋國家之間明顯浮現緊張關係(特別是伊拉克戰爭之後),中共便希望藉此機會全力擴展「中」歐關係。2003年發生許多特殊事件,包括:中共發表第一份歐盟政策白皮書;指派一名部長專責處理歐盟關係;打破往例由胡錦濤出席「中」歐峰會;隨後並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中共亦全力催促歐盟解除1989年以來對其實施的武器禁運。

第三階段是從2005年持續到現在,這段期間「中」歐關係變得較為凝重。中共與歐盟之間的蜜月期已經結束,並且在經濟和外交議題上產生諸多爭議。[43] 2005年,針對紡織品貿易訂定的「多種纖維協定」期滿,歐盟再次對中共紡織品做出進口配額,避免中共紡織品大量流入而衝擊歐盟市場。其中某些是首次面臨的緊張爭議,有賴雙方不斷進行面對面的直接對話。同樣也是2005年,中共積極敦促歐盟解除武器禁運,但並沒有成功;而中共也在法國和德國支持下,變得更為反對美國、北歐和東歐國家,最後連英國也一併反對。

在此關係緊張的背景下,雙方引發一連串的經濟政策爭議,包括市場進入、人民幣低估、貿易赤字持續增加,以及中共食品和產

品安全標準低落。2005年，英國工黨的梅德森(Peter Mandelson)成為歐盟執行委員會貿易委員後，極力主張與中共進行協商應採取更為堅決的態度。例如，2007年11月「中」歐高峰會上，梅德森和其他委員就使用嚴厲的口吻，針對雙方經濟關係的種種問題，公開與中共進行對抗。2007年峰會公報中，歐盟針對這些議題和西藏問題批評中共；這份公報直到峰會結束後第四天才發表，顯示雙方協商過程並不順利。2008年，中共以當時的歐盟主席薩科奇(Nicholas Sarkozy)接見達賴喇嘛為由，取消年度「中」歐峰會。這一連串事件讓北京和布魯塞爾的決策者意識到雙方關係有所侷限，而彼此間的不實期待亦可能招致危險，特別是中共期望利用歐盟的力量一起抗衡美國。因此，中共開始改變對歐戰略，開始把重點放在和歐盟各別國家經營雙邊關係，而非將歐盟視為一個整體。中共採取「分而治之」的方法，運用各別國家的差異，推進北京的議程和利益。

解釋中共的動機。中共對歐政策，以及中共和歐盟之間的關係會產生此種演進，可以由許多考量因素加以解釋。其中，經濟動機是中共長期以來朝此方向前進的動力；即使彼此的爭議持續增加，中共仍然希望持續和歐洲保持經濟關係。如同美國，歐洲一直是中共重要且持續增長的出口市場。歐盟27個國家是中共最大的貿易夥伴。[44] 2007年，中共最重要的歐盟貿易夥伴(依序)是德國、荷蘭、英國、法國和義大利。身為一個集團，歐盟亦較美國提供更多海外直接投資給中共。歐洲對中共提供最多海外直接投資的國家(依序)是德國、荷蘭、英國、法國和義大利。[45] 此外，歐盟國家仍然是中共獲得科技轉移的重要來源；例如德國是中共最大的機械設備供應

來源，數量比日本還多。但是，雙方經濟合作亦有其限制。例如，中共試圖推動歐盟授予其在世界貿易組織規定下的「市場經濟地位」，但卻沒有成功。中共希望獲得這種地位，是因為中共商品可以更容易進入歐洲市場，讓歐盟國家難以課徵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歐盟國家是否及如何授予中共市場經濟地位(在中國大陸入世協定中所律訂的期限之前)，將是雙方關係的重要指標。

歐盟在經濟互動上，始終對中共管控發展所面對的挑戰，保持一貫的協助立場。歐盟及其會員國向中共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提供大量科技協助和金融援助。多年以來，歐盟援助計畫一直把重點放在提升中共基礎建設和農村發展；然而此種援助計畫自2002年起，便開始轉向著重社會和經濟改革、環保和永續發展，以及增進政府管理與法治。歐盟首份「2002至2006年對中國的國家戰略報告」中，歐盟執行委員會向中共分配2.5億歐元的援助；而在其最新版的「2007至2013年對中國的國家戰略報告」中，則將於計畫內的七年期程中，向中共分配2.25億歐元的援助。[46]

自1980年代起，中共對於歐洲國家的全球政治位置，在觀點上產生了重大演進，而這樣的演進亦改變了中共在與歐盟進行外交合作時的期待。中共人士過去經常提及英國、法國和德國實行帝國主義和殖民政策的歷史，但現在這種言論實際上已經在中共媒體和學者評論之中消失。儘管中共人士仍然相當提防北約(特別是北約擴張)，他們卻主張北約是受到美國「領導」，強調中共提防北約是因為不滿美國單極主導及傾向「霸權」。[47]

由於歐盟國家並不像美國那般對中共的意圖充滿不信任與憂慮，歐洲各國對中共而言，自然在此前提下具有獨特的吸引力。中

共分析人士認為，美國想要限制中共崛起，相對之下，他們認為歐盟決策者希望和中共交往並促進中共的穩定發展。在中共眼中，歐盟國家並未大力支持具侵略性的民主推廣議程，或在亞洲擁有廣泛的安全利益；而這兩件事情正是加深美「中」關係互不信任的主要來源。一些歐盟會員國對於中共人權情況和西藏議題相當感冒，但這些不愉快只是一時的，不會成為促進雙方關係的永久障礙。

基於這些原因，許多中共人士在戰略意識上，相信「中」歐關係不似「中」美關係如此競爭。中共認為相較於和美國的關係，歐洲讓北京對於西方世界擁有稍為寬鬆的選擇權。對北京而言，發展更緊密的「中」歐關係，可以適切分散其經濟成長、安全和國際合法地位的相關資源。

因此，從1990年代晚期開始，中歐外交互動的質與量便開始上升，成為中共外交要務。根據美國對中共外交做出的研究，2000到2005年，歐洲是中共主席和總理最常出訪的地區。2002和2004年，中共外交部長造訪歐洲的時間，比任何地區都多。[48] 2003年胡錦濤成為國家主席後，率先出訪英國；相較之下，他在2006年才首次造訪美國。中共和歐盟舉行年度峰會，主要是針對經濟和發展議題進行政治對話，並沒有在安全和軍事議題上錙銖必較。中共和歐盟亦在更大型的歐亞高峰會中，進行兩年一度的元首互動。

中共無法成功說服歐盟取消1989年開始的武器禁運政策，顯示中共對歐盟國家的利益有錯誤看法；這亦讓北京上了一課，使其了解「中」歐關係是有界限的。大約從2003年開始，中共高階官員要求歐盟國家，考慮取消針對國防用途和軍民兩用商品與科技，對中共所實施的貿易禁運。美國入侵伊拉克後，中共明確希望利用泛大

西洋的緊張關係，推進這個特定目標。在法德兩國元首支持下(特別是席哈克和施若德)，中共決策者主張禁運政策是「中」歐關係獲得提升的「象徵性障礙」，而這些目標均是中共在2003年「中」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建立時所提出的訴求。中共希望運用戰略夥伴關係，推進歐盟解除武器禁運，而這通常是中共在建立戰略夥伴關係時所欲達成的目的。2005年下半年，由於美國強烈反對，且歐盟會員國之間意見不同，中共這項努力最終還是付諸流水。2005年春天中共提出反分裂法後(目標包括提供中共對台動武「法理」依據)，歐盟變得強烈反對取消禁運，並且持續至今。儘管歐盟決策者還是會提到移除武器禁運是最終目標，但諸多歐盟會員國(不分新舊)仍然表示強烈反對。[49]

對北京而言，取消武器禁運的努力以失敗收場，讓其得到幾項教訓：泛大西洋的關係相當穩健，即使彼此激烈爭執的時期亦是如此；中共對歐盟影響力有實質上的限制，特別是無法影響泛大西洋關係；在歐盟27國當中，只有德法兩國支持是不夠的；不論是用含蓄或是明顯的方式，歐盟和會員國相當顧忌捲入中共為了限制美國所採取的一切作為；而美國在中共相關議題上，對歐洲決策者一直相當具有影響力。[50]

有別於和歐盟執行委員會及歐洲議會的互動，中共一直努力擴大與歐盟主要會員國的關係。中共已經和諸多主要歐盟國家達成雙邊「戰略夥伴關係」，包括法國、德國、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國(如表5.4)。中共亦與英國、法國、義大利、德國和波蘭進行「戰略對話」，針對安全相關議題進行討論。議題整體著重在軍備控制和禁止擴散、國際安全環境評估、人權和法治。2007年，中共

與英國及歐盟建立高層經濟對話，模式類似與美國進行的對話。從2005年開始，中共對歐戰略著重與歐盟國家發展雙邊關係，這種趨勢直到現在都沒有改變。中共對於和歐盟在布魯塞爾所進行的互動感到相當挫敗，並進而了解和個別國家進行雙邊互動，可以獲得更多影響力，包含挑撥歐洲各國間的關係。

持平而論，除了英國和法國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外，北京並沒有把歐盟或歐洲個別國家視為全球或亞洲安全議題的重要角色。北京希望歐洲國家不要過問台灣問題。例如2007年「中」歐高峰會針對最後公報進行協商時，雙方就曾經爆發磨擦，因為中共不滿歐盟過問中華民國問題。其結果是，即便和中共進行安全或國防對話的國家持續增多，實質內容卻不深入。北京方面認為藉由這樣的互動方式可以讓歐盟更加理解中共，同時限縮美國思維或政策摻雜其中的機會；而中共決策者仍在思考與歐洲之間究竟可以進行多少實質合作。北京方面認為，在援助非洲和禁止擴散議題上，歐洲國家占據領導地位，因此中共決策者在這些議題上，更加重視歐洲國家的觀點。

即使中共和主要歐盟國家擁有共同的外交目標，雙方仍然缺乏堅實的政策合作。席哈克執政時期，法國是北京關係最密切的歐盟國家，因為北京和巴黎都對小布希政府破壞國際制度的單邊行動感到不滿。然而，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雙方仍然缺乏堅實的政策合作。以2002和2003年美國對伊拉克政策為例，法國就遠遠談不上像中共那般亟欲對抗美國。法國總統薩科奇就任後就改變席哈克以往強烈想與中共進行合作的意圖；隨後，雙方針對薩科奇是否參加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式和法國西藏政策，產生一連串爭議，促

使雙方在2008年開始走向分歧。[51]

部分歐洲國家，特別是北歐國家，仍然對中共的人權紀錄有所批評；然而多年來，歐洲國家並不願在聯合國支持美國抨擊中共的人權作法。許多歐洲國家和中共進行雙邊人權對話(如同歐盟執行委員會)，但少有國家因為政策歧異與中共進行對抗。然而，這種情況或許正在改變；2008年，德國和英國最高領導人不約而同均以接見達賴喇嘛的方式，對西藏政策與中共進行對抗。其中較引人矚目的是，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在2007年9月接見達賴喇嘛後，成為北京猛烈批評的目標，雙方關係亦因此凍結將近一年之久。2008年春天，部分歐盟領導人，特別是法國總統薩科奇，表示他們出席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典禮的條件，是中共改變對待藏人的方式及政策。此外，如同上文所述，薩科奇接見達賴喇嘛後，中共取消了2008年12月的「中」歐高峰會。

中共過去和東歐國家的穩健關係(例如捷克、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現在亦明顯鬆動。這些國家開始靠攏美國、加入北約，並且在武器禁運及飛彈防禦政策上支持美國。最引人矚目的是，阿爾巴尼亞這個中共冷戰時期的長期盟友，在2006年收留幾位剛從關達納摩灣恐怖分子拘留中心釋放的維吾爾族回教徒。北京顯然無法施壓華府，遣返這些維吾爾族人士進行審判。儘管中共消費品出口東歐市場快速增加，但東歐國家與中共的經貿關係依然相對薄弱。

從2000年開始，中共與歐洲國家相互之間的軍事外交在質與量上都有所增加。採取此種行為的動機，部分是為了加速共軍的現代化及不斷成長的需求。共軍認為，和歐洲軍方互動有特殊價值，

因為可以藉以學習歐洲先進部隊的準則、訓練、戰術和相關作業程序，同時也可能有機會學習北約的作戰方式。這些互動包括高層政策討論及專業的軍事教育訓練交流活動。一些歐洲國家，例如法國和英國，已經和共軍進行一些基礎與課目性的軍事演習，而且大部分著重在海上安全(例如援救行動)。由於中共國防工業現代化與共軍先進武器的需求大量增加，歐洲國防工業仍將持續對中共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而且因為中共不再購買現成的武器系統，因此中共的軍方和國防企業希望歐洲公司可以提供先進武器的次系統與相關技術，協助中共擁有自行設計建造下一代武器系統的能力。[52]

亞洲區域外交

在中共國際行為中，其與亞洲鄰國互動的政策，可謂最為積極且最具創新。中共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對中共五項外交政策目標至為重大，特別是經濟發展這項國家核心要務。中共目前「周邊外交」的來源，可以追溯至1990年代，也就是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後，中共希望重新建立其在國際上的正統地位。[53] 從那時起，中共便大幅擴張周邊外交的範圍和內涵，也因而改善其與多數東亞、南亞和中亞國家的關係。要說中共與亞洲周邊國家關係非常深厚，一點也不誇張；但須注意，這並不代表中共和亞洲各國增進關係時一直相當順遂，或者沒有政治的對抗勢力。許多與中共為鄰的周邊國家私底下對中共經濟和軍事力量，以及未來的野心感到存疑，因此這些國家和北京交往時，態度顯得相當猶豫。[54]

東亞

環視亞洲，中共與東亞國家關係的擴張程度最為廣泛。中共致力擴大與東亞國家的關係是基於四項目標：擴大中共市場和投資的獲得管道；向周邊國家保證中共崛起不會對他們造成經濟和軍事威脅；擴大提升發展所需的天然資源和科技的獲取管道；削弱美國領導各國遏制中共經濟、外交和軍事影響力的各種措施。從這個角度來看，近十年來，中共已將東亞的區域外交列為北京整體國際戰略的首要考量。

從1990年代初期開始，也就是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共發展出一套能夠促進和東亞國家更加全面交往的初期戰略和政策，這項努力在1990年代逐漸擴張並且持續到最近十年。當中共在國際上被相對孤立的那段期間，中共首先以「睦鄰友好外交」政策來爭取支持。[55] 為了執行這項政策，中共在1990年代初期和諸多東亞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做為突破相對孤立的起步；中共亦開始參與一些區域組織，例如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從2000年開始，這項「周邊外交」受到全新重視，成為所謂的「大周邊外交」。

2000年代，中共刻意擁抱東亞的決策，背後其實有其廣泛的政治基礎；更特別的是，這是經過中共高層討論後所同意的政策。[56] 2002年第十六大的報告中，中共針對區域外交發表關鍵的八字方針：「與鄰為善，以鄰為伴。」中共外交部的亞洲專家王毅大使表示，這是中共高層報告第一次提到區域合作話題。為了達成這項指導方針，根據王毅的說法，中共各級領導人更進一步採用「睦鄰、安鄰、富鄰」政策，以加強中共與亞洲周邊國家的「合作與協調」。以下將說明這些重要政策的各種面向；而中共東亞外交的未來動向，則將

取決於這些方針和政策的任何改變。

最近十年，中共與東亞國家的經濟互動快速起飛，並成為中共與此區域交往的領頭羊。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機和全球貿易流動迅速下降之前，中共貿易總額半數是在此區域內(以加工貿易的區域網為主)，而且比例逐年攀升。中共和東協的商品貿易從1991年的60億美元，提升到2007年的2,025億美元。中共與東南亞國家的貿易成長速度亦較美國更加快速。許多人推測，中共將成為東協的最大貿易夥伴。[57] 2004年，中共成為日本和南韓的最大貿易夥伴，2007年，中共超越日本，成為澳洲的最大貿易夥伴。相較於中共與美國、歐盟的不平衡貿易，中共增加對東亞國家的進出口貿易，爭議較少，模式亦更容易維持。[58]

中共最龐大的貿易方案之一，是2002年發起的「中共—東協自由貿易協定」。這項協定於2010年開始執行，並且於2015年移除所有會員國之間的關稅。[59] 這項區域協定最終將擁有超過17億人口，各國國內生產毛額總計將達到2兆美元。這項貿易協定開始於2004年晚期，會員國之間相互提出「早收清單」，要求針對部分農產品降低關稅。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後，中共—東協之間的貿易額預估將擴大至1.2兆；這將是世界第三大貿易市場，僅次於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歐盟。

除了貿易之外，中共對東南亞進行海外直接投資的擴增程度，也和中共對全球海外投資的成長幅度相同。根據中共資料，年度投資從2005年的1.5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9.7億美元，中共對東協國家的投資總額，則從2005年的12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39億美元。[60] 大約十年前，也就是1996年，中共全球海外直接投資額度約

為3億美元。對照當年中共全球海外極少的直接投資，這項數據顯得格外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和美國、日本和歐盟會員國的投資總額相比，這個數據就相形失色。2006年，中共對東協國家投資(根據東協資料)只占區域投資總額的1.8%，相較之下，美國投資占7.4%，日本占20.6%，歐盟占25.5%。[61]

中共亦擴大與東南亞大陸的次區域合作。中共是「大湄公河次區域」(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GMS)經濟合作計畫相當活躍的會員，這項計畫在會員國之間促成各種新的水權協議和運輸協定。由於中共南方省分希望在東南亞大陸賴以維生的河流上游興建水壩，水權議題亦逐漸造成緊張關係。[62] 中共在寮國和緬甸北方有大量民間貿易和移民，中共對這些國家的運輸基礎建設投資亦特別顯著。透過運輸建設加強聯繫，中共進入東南亞市場和海港變得更為容易，這對中共來說，有其經濟和戰略價值。[63]

在安全和外交政策議題上，中共採取一連串精心設計的步驟，以持續性的腳步和全新方式，與東亞國家進行全面交往，這種方式一般被稱為「魅力攻勢」(charm offensive)。[64] 中共採取此種作為旨在追求兩大主要目標：安全保證和對抗圍堵。在雙邊和多邊的組合下，中共所推廣的國家安全概念已超越傳統軍事安全，進一步包含經濟安全和國家發展問題。這種更廣泛的國家安全概念，引起東南亞國家的強烈共鳴，使中共得以向他們進行安全保證，讓他們瞭解中共對國家安全的看法與他們一致。中共這些構想也和美國外交政策目標形成強烈對比，因為美國在小布希政府時期，將國家安全的重點鎖定在反恐任務和軍事層面之上。[65]

中共擁抱東亞多邊安全機構的動作，不僅成為其在東亞政策

上最為重大與長遠的構成要件，也代表著過去操作實務的改變。1990年代早期，中共對此種形式的論壇充滿顧忌，將其視為其他國家批評和聯合對付中共的場所；然而，北京現在認為參與多邊論壇，可以形塑國際規則、增進周邊國家關係、管控中共國力增長所引發的關切，同時就其認知範圍，限縮美國對於中共影響力所採取的遏制行為。中共已經參與所有重要的東亞區域組織，包括東協區域論壇、亞太經合會、東協加一(中共)、東協加三(中共、南韓和日本)和東亞高峰會(如表5.2)。以東亞高峰會為例，儘管中共起初懷有擔任領導者或至少參與領導的野心，但經過審慎評估後，中共還是接受讓東協國家主導這個新多邊論壇。2006年，中共在中國大陸南方和東協國家共同主辦「中共—東協建立對話關係十五周年紀念峰會」，做為中共外交成功的部分證明。在此會議上，總理溫家寶表示中共與東協「共同渡過消除猜忌的經驗，進行發展對話和增進互信」，並總結中共與東協的關係，是處於「歷史最佳狀態」。[66]

中共進行安全保證的作為，主要是希望處理過去與東協國家的緊張關係。中共已經解決許多邊境爭議，擱置其他陸地和海洋領土衝突。[67] 2002年11月，中共同意簽署東協的「南中國海行為準則宣言」，避免南沙群島的海洋領土爭議升級。(值得注意的是，這項協定並沒有包括中共和越南競相宣示主權的西沙群島。)北京亦於2003年簽署友好合作條約，象徵其接受東協和平解決爭議的安全規範。中共是第一個採取這個步驟的非東協國家，而印度隨後也比照此作法。同樣在2003年，中共和東協簽署「戰略夥伴聯合宣言」，象徵中共承諾就區域安全議題進行長期合作。

就某種程度而言，中共的實際行為反映這些承諾。在處理海洋

領土爭議上，中共於2004年同意和菲律賓在南海聯合進行海底資源探勘，越南亦在2005年加入這個為期三年的研究。北京同意就原本劃定的海界進行海域聯合巡邏，例如與越南在東京灣的聯合巡邏。[68]

目前並不清楚北京付出這些努力的最終目標為何。中共可能希望以雙邊模式，分別與菲律賓及越南處理這些爭議，進而降低東協採取多邊模式處理海洋領土爭議的影響力，避免這些小國聯合起來對付北京。中共其他海洋領土爭議，例如和日本的釣魚台及東海天然氣爭議，不僅尚未解決，近年來情況甚至更為加劇。雙方仍有可能因此引發武裝衝突。

為處理東北亞議題，中共已然成為參與相關國際組織籌設工作的關鍵支持者，其作業模式原則上將比照解除北韓核武問題的六方會談。2007年2月，已經有一組工作團隊在六方會談內部成立，專責建立東北亞區域安全機制。[69] 中共對於有關區域架構的議題顯得相當熱衷。中共剛開始的時候非常支持舉辦東亞峰會，並將其視為建構東亞共同體的第一步；然而，由於東協各國強烈主導峰會計畫，降低中共塑造這個新機構的相對影響力，中共對此會議的熱情 (北京方面原本所表達支持的是擴張泛亞洲區域主義)亦慢慢消失。東協國家和日本相互合作，選定會議場所、制定議程，並且擴大參與名單，讓印度、澳洲和紐西蘭加入峰會。這個峰會於2005年12月在吉隆坡召開，並同時進行東協加一和東協加三部長級會議。[70]

此外，中共亦經多方協調，努力促成能夠提升此區域雙邊關係的「戰略夥伴」。儘管這項外交行動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但這是中共努力提升外交和安全對話的基礎，藉此吸引區域國家，最終

向各國進行安全保證。目前戰略夥伴關係的實質內容主要是針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議題，在外交官員和重要政治領袖之間進行高層互訪(或進行「戰略對話」)。

為了因應「中國威脅論」，中共開始重視非傳統安全挑戰，並成為向亞洲周邊國家進行安全保證的主軸。這些作為旨在加強區域安全合作，同時與美國的外交政策形成對比。而總體目標則是希望能夠強化中共的吸引力與擴張影響力，同時將中共的影響力進一步注入區域安全討論之中。[71]

中共努力增進區域關係之時，共軍亦加速與東亞周邊國家進行軍事互動。[72] 此等配套作為旨在控管區域國家對於中共的觀點，向亞洲國家保證共軍現代化並不會對他們的安全產生威脅。例如從2008年開始，中共軍事領導人就開始小心翼翼的讓周邊國家意識到中共打算部署航母的計畫。共軍似乎亦利用軍事對話蒐集這些國家與美國的軍事互動資訊，特別是與美國進行大規模訓練和軍備轉移的亞洲盟國。

中共區域軍事外交的形態愈發多樣，功能亦日益健全。中共目前已經和多數東北亞和東南亞國家進行高層軍事交流；其亦允許周邊國家的軍事官員觀摩中共軍事演習；並首次邀請少數國家參與共軍的聯合軍演；中共海軍艦隊造訪區域國家較以往更為常見；中共和亞洲國家進行軍事學術和事務交流的次數逐漸增加；中共向柬埔寨、印尼、菲律賓等其他區域國家亦進行大量軍售。

中亞[73]

過去十年，中共和中亞國家的關係已經產生漸進但卻重大的

演進；這些次區域國家對中共國內經濟和安全利益日益重要。因此，中共開始投入大量外交和財政資源，增進獲得天然資源的管道、限制美國(某種程度而言，也包含俄羅斯)影響力、打擊恐怖主義、穩定整體區域局勢。

1990年代初期，中共和這些前蘇聯國家建立外交關係時，中共相對之下較不重視與這些國家的關係。北京對該區域的政策當時主要著重在增進區域穩定、邊境安全，以及獲得能源物資。1990年代初期，中共和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展開邊境協議，以劃界方式解決重大領土衝突；在部分案例中，中共只能得到50%或更少的爭議領土。[74] 隨著中共在1993年成為淨石油輸入國，其開始尋求更多的外國原油和天然氣資源。中共希望藉著互通有無的交往模式創造經濟互利的契機。此時打擊恐怖主義政策尚未浮出檯面，直到1990年代晚期，中共才開始和中亞國家合作，打擊在中亞地區生活並接受訓練的維吾爾族回教分裂主義分子。

相對於中共與東亞國家的關係，中共和中亞國家的貿易規模較小，而且直到目前都是如此。在資源貿易主導下，中共和中亞國家的經濟關係已逐漸擴張。中共和五個中亞國家的貿易總額，從蘇聯剛解體時非常低的數字，到2008年已增加到超過300億美元。儘管起初的基本數字很低，然而光是2004到2008年這段期間，中共和中亞的貿易總額就成長了四倍。惟即便在貿易增加的情況下，目前中共和中亞地區的貿易額度，依然大約只占其貿易總額的1.3%。中共在此區域的最大貿易夥伴是哈薩克，佔中共在該區進口總額的90%(其中原油佔50%以上)。中共對此區域的主要出口項目為消費性商品，額度是進口額的四倍。[75] 對中共而言，雖然能源以外的貿

易並不是非常重要，但這對中亞國家的經濟卻至關重要。中共是中亞國家最重要的出口市場，除俄羅斯之外，這些國家只能仰賴中共的道路、鐵路和海港，對世界其他地區進行出口貿易，從而降低對俄羅斯的依賴。

中共對中亞投資的重點放在交通、通信和能源等基礎建設發展。中共協助哈薩克、土庫曼興建石油和天然氣管線；協助哈薩克、吉爾吉斯興建鐵路及各種道路和橋樑；協助塔吉克、烏茲別克推動水力發電計畫。北京利用投資這些基礎建設獲得天然資源，並活絡此地區的各種商業互動。北京亦希望重振歐亞貿易路線，分散貿易夥伴，讓中國大陸西方，特別是新疆省，能夠有效融入中共的經濟發展。對中亞國家而言，中共的投資別具吸引力；因為中共為了營造善意氛圍，對於該區域政府各項計畫給予相當的投資，不論這些計畫是否真的能夠對經濟發展做出貢獻。相對之下，西方投資者根本不願意這麼做，因此加強了中共的相對吸引力。[76]

從2001年開始，中共外交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中亞地區。就現階段而言，北京當局一方面希望能夠改善貿易和投資關係，另一方面，則希望藉著加強此等區域關係，降低美國和俄羅斯的影響力。中共仍然相當關切穆斯林的恐怖分子在中亞地區從事訓練和活動。中共已經適度擴大和中亞國家進行安全和軍事合作，避免區域動盪影響新疆地區。[77]

能源安全和對抗美國影響力，之所以成為中共在中亞地區最高的外交優先目標，主要受到兩起重大事件所影響：美國於911恐怖攻擊事件後在中亞地區的軍事部署，以及以美國為首入侵伊拉克的行動。中共希望拓展中東國家以外的石油和天然氣供應管道；中

亞地區和中國大陸的相對距離較近，可以利用陸上管線運輸能源物資，因此對中共別具吸引力。此外，中共分析家認為美國在中亞的駐軍，讓中共「處於不利的戰略環境」，中共需避免中亞國家倒向美國或任何單一強權(例如俄羅斯)。[78] 許多中共人士認為，美國在東亞的駐軍，將同時對聯軍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以及美國在此地區尋求霸權產生助益。中共軍事評論員不斷推論，為了進一步遏制中共，美國不會撤除此地區的駐軍。2005年秋天，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首次造訪中共期間，共軍官員就特別向他提出這種可能性。共軍內部普遍認為，美國在中亞地區更為積極的軍事參與，可能是為了向中共施壓，特別是在危機發生之時。然而，他們卻很少進一步論述美國如何，以及為什麼要向中共施壓。

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以及2004年中亞發生政治動盪之後，中共分析家開始對美國駐軍的議題變得特別關切。烏克蘭、喬治亞和吉爾吉斯的顏色革命，更是拉高了他們原有的焦慮，因為他們認為美國就算不是一手主導，也是這些事件的幕後黑手。許多中共人士擔心，這種革命會擴及整個中亞地區。部分中共人士認為，美國政府單位和非政府組織存在於中亞的事實，有可能會把此種革命運動推向中國大陸。[79]

中共已然展開並持續混合運用雙邊和多邊倡議，擴大其在中亞的存在和影響力。中共一改1990年代早期迄今的忽略態度，開始和中亞國家提升雙邊政治關係。中共努力提升雙邊政治關係的最佳體現，莫過於2005年5月，烏茲別克總統卡里莫夫(Karimov)造訪北京。不到兩個星期以前，烏茲別克政府安全部隊才在安集延市(Andijon)向反對政權的抗議民眾開火，但造訪期間兩國不但對安

集延事件隻字未提，還簽署一項關於「友好合作夥伴關係」的條約(取代更普遍的聯合聲明)，這是1992年雙方關係正常化以來簽署的第一份條約。[80] 這趟行程中，中共和烏茲別克亦簽署一份六億美元的協定，由中共協助烏茲別克發展油田。[81] 在烏茲別克因為安集延事件飽受國際壓力之時，中共採取這些措施為烏茲別克領導人帶來政治和經濟機會。對區域決策者而言，中共對待烏茲別克領導人的方式，和美國批評安集延事件處理方式及他們普遍不佳的人權紀錄，形成強烈對比。

中共努力增進和哈薩克的政治經濟關係，並且取得許多成就。中共和哈薩克的雙邊活動，主要是希望透過增進雙邊關係，取得哈薩克的能源物資。2004和2005年，中共高層領導人和哈薩克的相對人士進行多次晤面；特別的是，自從2004年，胡錦濤和哈薩克總統至少已經進行三次會面。2005年7月胡錦濤訪問哈薩克，雙邊關係被提升到「戰略夥伴關係」層次(在中亞國家是第一個)，並達成聯合興建油管和擴大貿易關係的商業協定。2005年，中共成功以歷來最高價格，買下哈薩克大片天然氣田股份。中共石油公司同意以41.8億美元買下哈薩克石油(PetroKazakhstan)這間參與競標的地區商業公司。這是中共最大規模的跨境投資之一。[82] 2006年5月，一條由中共出資興建、長達970公里的管線，開始從哈薩克中部輸送原油到中國大陸西部，並且計劃將規模擴大三倍，從裏海輸送石油。這條管線最終設計運送2,000萬噸石油，幾乎占2007年中共原油進口的10%。[83]

領導層外交已經成為中共在中亞國家發展雙邊關係的關鍵機制。除了上述提到的訪問行程，溫家寶也在2007年造訪俄羅斯、烏

茲別克和土庫曼，並且達成重大經濟交易。2007年胡錦濤到吉爾吉斯和哈薩克進行國是訪問，並且於2008年到塔吉克和土庫曼；兩次訪問行程都和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的行程相連。中共國家主席每年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別具意義，因為這是一個安排至區域重要國家進行國是訪問的重要場合。

除了雙邊外交，中共也發展和擴大上海合作組織，俾推進區域利益。上海合作組織是中共參與中亞經濟和安全政治的主要媒介。中共希望運用上海合作組織制約美國優勢和限制俄羅斯影響力，因此中共不斷對上海合作組織投入資源，並積極參與該組織。2003年，中共出資在北京成立上海合作組織秘書處；這是2001年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後，第一次得到這種財政支持。[84] 2004年6月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期間，胡錦濤承諾提供9億美元的優惠出口信貸給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並提到中共將成立特別基金，提供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1,500名學生赴中國大陸接受訓練。他亦呼籲上海合作組織跳脫原有的組織發展舞台；提議組織「轉移重點」，確立「具體目標」並採取「有效措施」。這些說法和行動，強烈顯示中共希望把上海合作組織建設為強大的區域組織，處理所有區域經濟和安全問題。[85] 2005年，中共採取許多步驟，進一步增進上海合作組織的國際重要性。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成為觀察員；上海合作組織獲得聯合國大會觀察員的地位；上海合作組織和東協簽署瞭解備忘錄。

中共在上海合作組織的運作往往必須求取多重目標的平衡。其中最具爭議的是2005年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所簽署的聯合公報，要求美國在阿富汗「積極」的反恐行動結束之時，應限期撤除位於

中亞的軍事基地。這份公報顯示出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共同關切，在此之前，「中」俄兩國舉行峰會，發表「21世紀國際秩序」的聯合聲明，強烈批評美國單獨運用權力、忽視多邊國際組織。儘管烏茲別克和俄羅斯才是限期美國撤軍的始作俑者，但中共似乎也支持這項要求，或至少並未採取明顯的反對立場。同年，中共和俄羅斯以上海合作組織反恐任務的名義，在中國大陸沿海進行大規模聯合兩棲突擊演習。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2005年，2006年上海合作組織峰會聲明較不具對抗性，顯示中共進一步採取平衡性的做法。但是，2006年峰會文件仍然提到類似主題，反對美國在此區域的人權政策，以及小布希政策的民主推廣議程。其表示：「文化傳統、政治和社會體制、價值觀和發展道路……的差異，不應被用於干涉他國內政的藉口」，並直言「社會發展的具體模式不能成為輸出品」。[86]

儘管效果不一，中共亦尋求在中亞地區限制俄羅斯影響力。中共這麼做，是因為俄羅斯企圖主導上海合作組織，並遏制中共的領導地位。鑑於「中」俄戰略夥伴關係、國家軍事科技合作，以及擁有遏制美國單邊主義的共同利益，限制俄羅斯影響力就成了中共能做而不能說的目標。中共不希望惹惱俄羅斯，但亦不希望俄羅斯主導中亞。此時上海合作組織便有助於中共平衡這些目標，因為北京當局可以透過該組織以多邊形式和中亞國家交往。俄羅斯在此區域和這些前蘇聯國家有很深的淵源，同時也更有意願採取正面對抗的手段，因此俄羅斯和美國不同，更有能力管控中共影響力。這種情況讓俄羅斯和中共在中亞地區同時具有許多層面的競爭與合作關係。

有兩個例子可以充分解釋中共和俄羅斯之間糾結的利益關係──兩國之間在區域影響力上微妙的角力。北京多年以來一直抗拒俄羅斯領導的「集體安全條約組織」(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 CSTO)和上海合作組織產生正式連結(CSTO組織包括許多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但俄羅斯卻一直希望朝此方向推動。中共和其他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之所以抱持反對的立場,是因為擔心俄羅斯把上海合作組織界定為反西方安全的機構,而非將其設定為同時兼顧經濟和安全議程的功能。部分報告指出,俄羅斯希望結合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和上海合作組織成為歐亞版的北約。基於不希望上海合作組織成為對抗性的組織,同時為了不讓俄羅斯主導安全議程,中共對此採取相關的抵制行動。[87] 2007年10月,中共的抵制首度遭遇挫敗,因為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和上海合作組織簽署協定,就毒品走私和組織化犯罪等區域安全議題進行合作。2008年,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成功對抗俄羅斯壓力,上海合作組織在該年峰會所發表的聯合聲明,並沒有支持俄羅斯處理喬治亞所屬飛地(enclaves)南奧塞提亞和阿布哈吉亞的立場;這項聲明提到理解俄羅斯立場,便沒有進一步的表態,讓莫斯科感到相當挫折。

整體而言,中共在中亞的多邊和雙邊外交,顯示中共在該區域的利益持續增加。中共把重點放在投資基礎建設、獲得天然資源、擴張政治影響力,以及支持反恐行動。中共外交最主要的重點是建立區域經濟角色,使其能夠獲得區域市場和天然資源。中共將持續關切美國在此區域的軍事和外交存在,並對俄羅斯的強勢態度處處設防。中共將會持續建立上海合作組織的地位和能力,以創造一種最起碼可以遏制,最好甚至能夠削弱美國影響力的環境。中共亦

認為上海合作組織可以防止俄羅斯壟斷區域安全議程和討論。中共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中共能在其間扮演領導角色的安全環境，要解決任何重大議題，都必須得到中共同意。中共似乎不再缺少進一步挑戰美國利益的能量，特別是當其他國家更願意公開對抗和批評美國。將來如果美國的民主推廣作為持續引起北京關注，甚至產生波及中共政治穩定情勢的潛在條件，則北京當局對美國存在的相對容忍度可能就會更小。

展望未來，中共在中亞的政策可能反映出可長可久的特性。中共在此區域有其長遠的利益，而且大部分是以支持中共內部穩定和經濟發展為最高目標。此外，中共有關利益在東亞地區所存在的不穩定與不確定因素，例如中華民國議題和對日關係，並不會影響中共的中亞政策。而美國在中亞地區的存在又受到遠高於東亞地區的限制，因此美國政策損及中共區域利益的程度也較低。最後，關注俄羅斯影響力，但防止和莫斯科產生立即性的對抗，亦仍然是中共的長遠目標。

南亞

中共南亞政策最重大的事件，是以史無前例的創新與敦睦方式處理中印關係。從2001年開始，中共便努力擴大與印度的政治、軍事和經濟關係。此外，中共亦希望處理和巴基斯坦日益複雜、代價高昂的傳統關係。對中共而言，如何妥善平衡處理兩國關係，一直是相當棘手的問題。

中共對印政策會產生如此戲劇性的轉變，主要有三個動機：穩定中共南方邊境以防止威脅產生(例如高度競爭甚至懷有敵意的

印度)、擴大雙邊貿易和投資機會，以及使印度和美國結盟及華府和新德里聯手遏制中共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就最後一項動機而言，中共分析家近十年來對美印安全和軍事關係擴張的關切程度日益增高，認為這是美國試圖平衡中共權力所主導的作為。中共希望藉由擴大與印度的外交、軍事和經濟關係，事先預防和限制這種可能性。中共努力提升「中」印關係(特別是軍事交流)的時間點，剛好就是2001到2002年美印關係產生質變的時間，特別是小布希政府擴大美印防衛合作關係之時，因此絕非巧合。[88] 對於中共處理「中」印關係的動機，美國學者高龍江(John Garver)曾經做出很好的解釋：

> 中共整體戰略目標是說服印度以開放的善意心態，暢通並擴大中共在南亞和印度洋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存在；降低雙方之間的相互猜忌；以及讓印度轉變成為中共的夥伴。如此一來，中共在亞洲的崛起，便不致造成印度和美國結盟與之對抗。但是，轉變印度的態度，使之與中共發展友好關係，並不表示必須在西藏地位及中共與巴基斯坦的戰略連結關係對印度做出讓步，或者限制中共擴大與其他南亞國家的軍事、安全與運輸關係。[89]

對照中共在東亞的外交政策，中共南亞外交主要採雙邊模式進行，部分原因是這個次大陸缺乏強大的多邊組織。中共決策者和印度進行多次公開的高層互訪，並達成多項擴大經濟互動和安全對話的協議或目標。

在雙方朝向敦睦關係發展過程中，其中三次高層互訪顯得特別重要。第一次是2003年6月，中共邀請印度總理瓦傑帕依(Atal

Bihari Vajpayee)訪問中國大陸(同年4月，備受爭議的印度國防部長費南德茲才剛完成此種重大的訪問行程；他曾經公開表示，印度進行核武現代化與因應中共安全威脅有關)。瓦傑帕依造訪期間，雙方達成「關係和全面合作原則」聯合宣言，做為提升雙邊關係的基礎計畫。對兩國關係而言，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因為雙方領導人至少在口頭上表示不會將對方視為威脅，並在雙邊關係上開展新的階段。在此峰會中，瓦傑帕依亦以「穩定和前瞻」形容雙方關係，雙方同意指派「特別代表」協商邊境爭議。儘管會議文件和重大聲明多數和1996年江澤民破冰之行與2002年朱鎔基造訪的內容相似，但瓦傑帕依的訪問終於讓1998年5月核子測試後的「中」印政治緊張關係走向正常化。這趟訪問最重要的成果，是為擴張「中」印關係提供路線圖，讓雙方在隨後幾年有所遵循。[90]

第二是2005年4月溫家寶的訪問，這次訪問可以說是中印關係的分水嶺。溫家寶訪問期間(這是中共總理自2002年朱鎔基造訪以來，首次訪問印度)，雙方同意將雙邊關係從1996年初步提出的「合作與建設性的夥伴關係」(瓦傑帕依於2003年訪問期間曾再度重申)提升到「和平與繁榮的戰略與合作夥伴關係」。這個全新且重要的構想已讓雙方的外交、經濟、軍事交流，達到自2003年瓦傑帕依造訪以來的頂點，包括2005年1月首次進行的「中」印戰略對話。此外，中共學者指出，相較於2002年朱鎔基訪問，以及溫家寶訪問南亞及巴基斯坦的行程，中共媒體對溫家寶訪問印度進行更多報導。[91]

溫家寶這趟訪問的經濟和安全內容特別重大。雙方領導人都注意到2001到2004年這段期間，雙邊貿易成長四倍，從36億美元提升到136億美元，超出早期目標。[92] 雙方領導人亦同意開始針對自由

貿易協定做可行性研究。就在溫家寶訪問之前，中共公開一份承認印度擁有錫金(Sikkim)主權的地圖，會議後的聯合聲明亦表示錫金是印度的一部分。這是中共首次對印度的領土聲明做出承認；1975年以來，中共一直拒絕承認錫金被印度合併的事實。印度和中共決策者亦簽署一份重要文件，略述解決邊境爭議的「指導原則」。溫家寶在訪問期間提到，這是自1981年雙方重啟協商之後，首次達成協商的「政治原則」。

2006年11月，胡錦濤首次造訪印度，顯示中共希望進一步增進雙方關係。這是中共國家領導人過去十年以來首次造訪印度(江澤民在1996年訪問印度)。在此峰會中，胡錦濤列出進一步發展「中」印關係的「五點建議」，試圖解決長期存在、相對缺乏進展的邊境問題。雙方亦同意聯合進行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行性研究。有趣的是，胡錦濤隨後以同樣的時間訪問巴基斯坦。

「中」印之間的安全和軍事互動持續增長，亦顯示雙方關係的本質正在改變。透過這些活動，北京希望向印度保證中共的合作意向，解開共軍的神秘面紗，並降低新德里和美國共同制衡中共權力的意願。2003年4月，印度國防部長訪問中國大陸，中共則於2004年回訪。2004年底，印度陸軍參謀長造訪中國大陸(這項訪問中斷了10年)，2005年5月，中共對等官員梁光烈將軍亦回訪印度；這是七年之中，共軍總參謀長首次訪問印度。印度媒體報導，印度軍事情報首長亦於2005年6月訪問中國大陸。該年底，也就是2005年12月，中共和印度首次進行聯合海上搜救演習。2006年5月，中共和印度簽署首份國防合作瞭解備忘錄，表示未來將進行各種活動，包括「經常性交流……年度國防對話……以及聯合軍事演練。」2007年5月，印

度參謀長辛格(J. J. Singh)訪問中國大陸期間，雙方同意在2007年10月(在中國大陸)進行聯合陸軍反恐演練，隨後是2008年12月(在印度)。[93]

除了軍事互動，針對安全議題的外交合作亦得到擴大。2005年初，中共和印度發起副外交部長層級的年度「戰略對話」。中共同時支持印度和巴基斯坦成為上海合作組織觀察員，中共亦獲得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的觀察員身分。2005年溫家寶行程值得注意的重要大事，是他指出中共將樂觀看待──但並非公開支持──印度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訴求。2005年底，北京亦和新德里進行溝通，表示其反對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擴大，主要是針對日本，而非印度。[94]

中共和印度的雙邊關係亦面臨一些存在已久或全新的挑戰。由於1962年雙方曾經爆發衝突，邊境爭議尚未解決，以及亞洲崛起強權的地位之爭，印度對中共的意圖一直感到不安和懷疑，並成為雙方進一步發展安全關係的阻礙。中共持續對巴基斯坦進行軍事援助，亦是雙方長期關係緊張的根源，因為印度認為中共此舉，目的是抑制印度在南亞的權力；儘管中共已經採取一些步驟，期能進一步在印巴關係之間做出平衡，但印度人卻不這麼認為(例如，中共在1999年卡吉爾危機中，並沒有支持巴基斯坦)此外，兩國對能源進口的需求增加，亦造成雙方關係緊張，因為兩國相互競爭外國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的獲取管道，包括同時鄰近兩國的地區，例如緬甸。[95]「中」印貿易迅速擴大，亦是雙方產生磨擦的來源；印度提出的反傾銷案例，近半數是印度貿易公司和中共商業機關做生意造成。就中共方面而言，中共軟體製造商亦相當關切印度軟體

出口商與之競爭。北京和新德里是否同意針對自由貿易協定進行對話，以及是否達成協議，將考驗兩國能否處理逐漸升高的經濟競爭關係。

亞洲以外的區域外交

非洲和拉丁美洲

中共和非洲及拉丁美洲的外交關係都有相當特殊的歷史背景，但相較之下，中共對非洲外交的歷史淵源更為深厚。毛澤東革命外交政策，中共傾向支持發展中國家，並向非洲國家及支持中共的領導人提供許多物資援助(諸如大型基礎設施)進行革命運動。相較之下，中共和拉丁美洲的政經關係則相當有限，遠比不上非洲。中共和這兩個地區從事外交工作，主要動機都是為了避免這些地區支持美國「帝國主義」和蘇聯「修正主義」(冷戰時期)，同時很重要的一點，便是孤立中華民國。中共和蘇聯不同，北京沒有興趣向外傳播其特殊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模式，即使是坦尚尼亞這種親密的區域國家亦是如此。中共雖然藉由反對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政策而享有道德高度，但相較於革命論調，北京仍然是以自身利益為優先，訂定外交目標。[96] 1970年代後期之後，鄧小平改變意識形態外交，將國家資源轉向內部發展後，中共對非洲和拉丁美洲(原本就數量較少)的物資援助，便開始急劇下降。

中共目前和非洲、拉丁美洲國家的關係，儘管仍是延續以往的區域利益和政策，但仍可說明中共外交政策自改革開放時期以來的演進過程。相較於1980和1990年代，中共和非洲及拉丁美洲的外交

和經濟交往在近十年來已經更為廣泛。對此，中共主要外交動機包含四項：分散中共天然資源的獲取管道，特別是石油和礦物(主要是石油)；擴大進入非洲和拉丁美洲市場，目前這兩個地區購買中共消費品、車輛和傳統武器的數量不斷增加；針對中共致力推廣的多邊主義與建立多極世界尋求支持；進一步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孤立中華民國，因為這裡仍然有許多國家在外交上支持中華民國。[97]

中共的經濟目標。中共積極經營次撒哈拉非洲關係有其持續性的經濟因素。[98] 中共和次撒哈拉非洲的商品貿易，從1995年的30億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450.4億美元，並且從2004年開始以每年40%的速度成長。[99] 中共的非洲進口貿易額，從2001年的45億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63.1億美元，成長485%。在這五年當中，若從經濟價值來看，中共從非洲進口的物資有90%是原油、鐵礦、木材、棉花和粗鑽，並且回頭進口先前出口的商品、金屬品、不銹鋼和菸草。中共不僅集中從非洲進口原物料，貨源也集中在少部分國家。從2001到2006年，中共90%的進口物資主要來自七個國家，包括安哥拉、南非、蘇丹、剛果共和國、赤道幾內亞、加彭和奈及利亞等。中共大部分是從這些國家進口原油，只有南非例外，主要進口項目為金屬。[100]

此外，中共的非洲出口額，從2001年的44.2億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90.4億美元，成長超過330%。中共主要出口棉織品、摩托車、鞋子、人造纖維、電池、廣播設備、電話裝置、電線、刺繡和合成布料。[101] 次撒哈拉非洲國家和世界其他地區許多國家一樣，迅速成為中共消費品的主要出口市場。美國政府官員指出：「中共小型、私人

的投資公司已投資上億美元，在非洲開設紡織、輕型製造、建設和農糧事業。」[102]

「中」非貿易成長雖然令人印象深刻，但若就中共世界貿易總額及全球經濟趨勢而言，其實質內涵仍待進一步評估。就中共整體貿易量而言，中共與次撒哈拉非洲貿易的重要性仍然相當有限；2006年，次撒哈拉地區貿易只占中共世界貿易總額的2.6%。美國官方資料顯示：

> 至2006年，中共和非洲的貿易額比中東或拉丁美洲還低，而且只是亞洲其他地區貿易的一小部分。在投資方面，中共對非洲投資只占中共全球海外直接投資的2.9%。中共在非洲的直接投資總額只占全球海外直接投資的1%。[103]

中共和非洲國家的貿易有許多特性。第一，中共對非洲進出口貿易大幅成長。第二，中共對非洲進口「金額龐大」，主要是因為從安哥拉進口石油。(2007年，從安哥拉進口石油的貿易額，占中共次撒哈拉非洲貿易額的50%以上；中共在次撒哈拉非洲的前五名貿易夥伴中，有四個國家是石油產國。)第三，中共石油進口隨著世界石油價格產生變化，造成「中」非貿易成長起浮不定。第四，中共持續向非洲出口，造成一些次撒哈拉非洲國家對中共產生貿易赤字。於是，如同中共評論家指出，中共對非洲出口並非創造「雙贏」，非洲國家因而產生剝奪感，進而造成政治摩擦。例如，中共向全球出口紡織品已經對許多國家造成傷害，包括肯亞、賴索托、南非和史瓦濟蘭的紡織工廠紛紛倒閉。在某些情況下，中共出口紡織品對非洲

製造商可說是「雙重打擊」：因為中共搶走非洲紡織品的國內和國外市場。

隨著「中」非經濟互動走向以貿易為主，中共亦大幅增加非洲投資。根據中共官方資料，中共對非洲的年度投資，從2003年的7,400萬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5億美元；中共的投資總額從2003年的4.91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44億美元。[104] 然而，中共官方資料似乎遺漏某些重大投資，以致資料並不完整。目前中共有800家以上國營企業在40個非洲國家進行投資計畫。截至2008年底，中共最大的跨境投資，是2007年買下南非標準銀行(Standard Bank of South Africa)20%的股份，據稱這筆交易價值55億美元。[105]

基礎建設計畫是中共對非洲投資相當重要卻很少被外界檢視的部分。中共對非洲基礎建設提供的財政援助，從2001到2003年的10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45億美元──其中以2006年的70億美元最高。這些資金大約有70%流向四個國家：奈及利亞、衣索比亞、安哥拉和蘇丹。投資計畫主要包括兩部分：發電(主要是水力發電)和運輸(主要是鐵路)。中共亦提供衣索比亞、蘇丹、迦納財政援助和裝備，建立國家通信網路系統。中共在非洲國家進行基礎建設投資，為雙方的繁榮產生經濟互補：因為非洲國家面臨基礎建設資金嚴重缺乏的挑戰，而中共建設部門不論規模或競爭力都在全球名列前茅。這種互補關係意味中共目前的基礎建設投資模式將會持續成長。[106]

目前中共對非洲投資最多的項目是資源開採(主要是石油)，但投資規模、技術和成效常常受到誇大。根據世界銀行對中共在非洲投資進行的一項研究，從2001到2005年，中共在15個非洲國家進行

大約100億美元的石油投資，其中最大投資是在安哥拉和蘇丹。然而，若和其他國際石油公司在非洲投資1,680億美元比較，中共就相形失色了。2006年，非洲55%的石油是出口到美國和歐盟，而中共只有占15%。中共石油以外的非洲投資估計達到20億美元，主要是在剛果共和國、加彭、幾內亞、尚比亞和辛巴威開採礦物(例如銅和鐵礦)。有趣的是，不同於部分研究報告的看法，世界銀行某份報告認為，中共在非洲直接投資於資源開採的基礎建設只有7%，中共企業在非洲地區的基礎建設是以淨負投資的方式，確保資源出口到中共。「安哥拉模式」便是一種中共較為普遍的投資型式，也就是中共向非洲國家提供財政援助，非洲國家則以天然資源償還基礎建設的貸款。例如，2007年中共提供剛果共和國90億美元貸款和投資，剛果則以鈷和銅礦償還。[107] 這些交易普遍是由「中國進出口銀行」進行，而不是中共的發展單位。世界銀行報告亦發現，政府向中共企業提供貸款進行各項基礎建設計畫「比起民間部門出資借款更為有利(其贈予成分為36%)，但這還比不上官方發展協助計畫所提供高達66%的贈予成分更具吸引力。」[108]

中共亦以贈予和技術援助方式，向非洲國家提供許多典型的發展援助(不同於國家補助的投資計畫)。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論壇，中共承諾提供廣泛的發展援助，包括贈予、貸款和技術援助；這是中共數十年來最大筆的非洲援助承諾。一位美國分析家如此解釋中共對非洲國家的吸引力：中共提供非洲國家「整套援助」，包括金錢、技術援助，並保護非洲國家免於受到國際組織制裁。[109] 世界銀行報告亦呼應這種感受，指出中共發展援助模式的吸引力：「非洲國家基本上歡迎中共發展援助的新穎方式，因為中共

不會干涉別國國內事務，重視並鞏固發展中國家關係，並提供一個以政府為中心的另類發展模式。」[110]

中共在非洲的貿易、援助和投資，對中共外交政策和西方國家的非洲外交，至少有三項意涵。第一，中共在非洲的各種經濟利益和歷史關係，使人權紀錄受到質疑的政權獲得中共支持，例如蘇丹和辛巴威。由於中共的援助和幫助，使得這些政權免於面臨西方壓力，包括多邊制裁。此種情況也造成西方國家於近年來無法有效施展外交手段，影響或改變這些非洲國家。

然而，由於國際高度關注，中共的非洲外交政策亦逐漸產生轉變。在面臨聯合國和國際壓力下，中共不再無條件支持蘇丹；例如，北京儘管不情願，但其並沒有阻礙(部分案例中，中共甚至支持)聯合國對蘇丹施加有限度的制裁。2007年初，由於中共支持蘇丹政府，非政府國際組織將2008年北京奧運冠上「種族屠殺奧運」或「達夫奧運」稱號，此舉使中共領導人受到刺激而變得更加積極解決蘇丹的人道危機。此外，非洲國家人民對中共商業行為產生負面觀感，亦促使北京外交和經貿領導人在非洲或其他地區從事商業行為和政治關係時，更加注重中共的形象問題。[111]

第二項挑戰是中共的經濟援助削弱西方國家施加壓力的能力，例如國際貨幣基金逐漸無法以限制援助和投資為手段，提升部分非洲國家的管理實務。第三項挑戰是中共對非洲國家的投資，讓西方企業陷入不公平的競爭，因為西方企業無法承受虧損性投資，或者比照中共，以相同模式提供各種援助，進而獲得合約。在非洲的商業競爭中，西方企業往往不具備中共施展影響力所擁有的手段。[112]

中共擴大與拉丁美洲國家交往主要(但並非完全)是出於經濟考量：包括暢通市場、投資和資源的獲取管道。中共在此區域的商業貿易和投資增加，便是此種經濟動機的明證。過去十年，中共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貿易迅速增加，該地區對中共而言也因而變得更為重要。1999到2006年，商業貿易總額從82億美元增加到將近700億美元，成長將近十倍。1999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只占中共全球貿易額的1.7%，到2006年已增加到4%。

1999到2006年間，中共自該區域的進口額，從30億美元增加到將近340億美元。若以產值來看，在2006年，巴西、智利、阿根廷、秘魯和委內瑞拉是中共的主要進口國。中共自該區域進口的主要項目包含鐵、銅、鉛及其他金屬礦物，此外還有大豆、原油和其他燃料礦物與電子裝置。至於生活用品的部分，中共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任何一個國家進口的商品通常只有一兩項。自1999到2006年，中共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出口額，從53億美元增加到358億美元，主要市場是墨西哥、巴西、巴拿馬、智利和阿根廷。這段期間，中共主要出口項目為電子設備、工具機、服裝、鞋類和有機化學產品。[113]

中共和拉丁美洲從事貿易有利有弊。中共為資源豐富的國家帶來機會，例如巴西和阿根廷，但也對生產初級商品的國家帶來激烈競爭，例如墨西哥。中共成為全球紡織和服裝主要生產國後，嚴重傷害墨西哥的紡織和服裝工業，切斷了墨西哥在其他國家的紡織市場。[114]

中共對拉丁美洲投資亦不斷增加，目前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古巴和多明尼加共和國、蓋亞那和委內瑞拉等國都有投資計

畫。中共對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委內瑞拉的投資，著重在促進諸如鐵礦、銅礦和石油(委內瑞拉)等天然資源的獲取管道；而中共的投資項目也因此集中在採礦、運輸、製造和石油產業。從2003到2007年，中共年度投資從10億美元增加到49億美元，其累計投資總額從46億美元增加到247億美元。然而，中共投資金額可能沒有書面所顯示的那麼高。2007年，中共在此區域的海外直接投資有95%流向開曼群島和英屬維京群島，這些國家是著名的避稅天堂。由於中共有大量海外直接投資來自這些國家，代表中共投資者可能將錢匯到國外，再以外資身分回到中國大陸投資，透過提供外國投資者資金，從中獲取利益(例如資金迂迴)。至於其他部分，中共2007年在此區域的非金融性海外直接投資主要流向墨西哥、秘魯、阿根廷、巴西和委內瑞拉。中共在拉丁美洲的非金融性投資，主要是從事資源開採和生產，但亦有些部分是從事生產組裝、通信和紡織業。[115]

中共的外交目標。除了貿易和投資，中共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相關活動，亦反映出特定外交目標。第一，中共強烈希望透過外交減少該等區域對中華民國的支持。2004年原有14個拉丁美洲國家支持中華民國，但哥斯大黎加(2007年)、格瑞那達(2005年)和多米尼克(2004年)轉向承認北京後(聖露西亞於2007年又轉向承認中華民國)，目前中華民國23個邦交國，拉丁美洲國家有12個。[116] 此外，馬拉威(2008年)、查德(2006年)、塞內加爾(2005年)和賴比瑞亞(2003年)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後，中華民國在非洲的邦交國亦逐漸減少為4個。[117]

過去數十年來，中共外交一直以說服、強迫和賄賂手段，改變

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外交忠誠度；但最近幾年，中共提供援助、投資和其他建設性金融誘因的作為逐漸增強。[118] 例如2008年外界發現，2007年6月中共秘密以大量援助誘使哥斯大黎加在外交上轉向承認北京，其中包括以3億美元購買哥斯大黎加政府公債。中共亦積極採取行動，促使巴拉圭、瓜地馬拉和巴拿馬改變外交承認。目前中共已採取較不具對抗性的全新方式增加區域吸引力，例如2004年，儘管海地和中華民國有外交關係，北京仍同意派遣兵力赴海地執行聯合國維和行動。

第二，中共希望藉由建立和維持雙邊關係，獲得非洲和拉丁美洲市場和天然資源。過去三到五年，中共廣泛運用高層外交追求這些目標。2004年，胡錦濤和吳邦國這兩位中共最高層的官員都造訪拉丁美洲。中共領導人亦固定在北京接見拉丁美洲國家領導人。

中共在非洲從事領導外交比拉丁美洲更為密集(如表6.1)。中共領導人透過造訪非洲，處理日趨複雜的經濟和政治議題，並塑造其非洲政策的國際形象(例如蘇丹達夫的人道危機)。如同上述，從2003年開始，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已經造訪非洲4次，足跡遍及18個國家。這是中共領導人有史以來如此密集造訪非洲，顯示中共已將非洲列為最優先的外交順序之中。

2007年2月，胡錦濤前往非洲8個國家進行重大的國是訪問，行程包括蘇丹和辛巴威這種具爭議性的國家。值得注意的是，造訪蘇丹時，胡錦濤第一次公開發表聲明，鼓勵蘇丹政府解決達夫人道危機，包括呼籲蘇丹准許聯合國和非洲聯盟維和部隊進入達夫地區。2006年，胡錦濤和溫家寶分別造訪非洲11個國家；2005年，溫家寶和另一位政治局常委造訪非洲8個國家；2004年，胡錦濤和另外三

表6.1　中共領導人造訪非洲1996-2009

日期	中共領導人	造訪國家
1996年5月	主席江澤民；擔任主席後第一次訪問	埃及、衣索比亞、肯亞、馬利、那米比亞、辛巴威
1997年5 月	總理李鵬	喀麥隆、加彭、莫三比克、奈及利亞、塞席爾、坦尚尼亞、辛巴威
1999年1-2月	副主席胡錦濤；擔任副主席後第一次訪問	象牙海岸、迦納、馬達加斯加、南非
1999年10-11月	主席江澤民	摩洛哥、奈及利亞
2000年4月	主席江澤民；中共主席第一次訪問南非，南非於1998年由中華民國轉而和中共建交。	埃及、南非
2002年4月	主席江澤民	利比亞、奈及利亞、突尼西亞
2002年4月	總理朱鎔基	埃及、肯亞
2002年8-9月	總理朱鎔基	阿爾及利亞、喀麥隆、摩洛哥、南非
2003年12月	總理溫家寶：出席第一屆中非合作論壇	衣索比亞
2004年1-2月	主席胡錦濤	阿爾及利亞、埃及、加彭
2004年6月	副主席曾慶紅	貝南、南非、多哥、突尼西亞
2006年4月	主席胡錦濤	肯亞、摩洛哥、奈及利亞
2006年6月	總理溫家寶	安哥拉、埃及、迦納、剛果民主共和國、南非、坦尚尼亞
2007年1-2月	主席胡錦濤	喀麥隆、賴比瑞亞、莫三比克、那米比亞、塞席爾、蘇丹、尚比亞
2009年2月	主席胡錦濤	馬利、模里西斯、塞內加爾、坦尚尼亞

資料來源：綜整各項媒體報導

位政治局常委亦造訪非洲12個國家。中共領導人造訪非洲的關鍵目標是獲取非洲資源：胡錦濤2004和2006年的非洲行程，都包括像奈及利亞和安哥拉這種石油豐富的非洲國家。然而，胡錦濤最近的行程，也就是2009年初造訪的4個國家，都不是資源豐富的國家，希

望藉此傳達中共重視與非洲國家的長期政治和經濟發展。

中共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外交的第三個目標，是促進發展中國家利益並形塑在國際機構的共同立場。中共一直以「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自居，自然相當保護這些國家的權利。中共推廣共同願景，提倡諸如平等、主權、「雙贏」合作、經濟發展和不干涉內政的外交原則，藉此方式提升中共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利益。中共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柔性選擇」，取代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援助和借款政策，讓中共有時處於領先地位。中共亦運用與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共同立場執行特定外交目標。鑑於國際組織投票時，發展中國家是一股強大勢力，中共希望藉由發展中國家幫助，避免類似先前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對中共做出不利的投票結果。中共如何在聯合國操作發展中國家關係，將留待後文詳細討論。

中共透過加強雙邊和多邊外交追求其政治目標。在非洲，中共已經和南非、奈及利亞和安哥拉，以及整體區域建立「戰略夥伴關係」。2003和2004年，中共和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打造戰略夥伴關係(如表5.4)。北京可能希望藉由和拉丁美洲國家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向美國暗示北京影響力已經伸入美國傳統主導的地區。

中共全力支持發展、主權和多邊主義外交，引起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的共鳴，因為與中共建立關係可以讓他們獲得外交和經濟力量，用以抗衡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不受歡迎的外交政策。委內瑞拉的查維茲(Hugo Chavez)，甚至是巴西總統魯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都利用與北京的關係和美國進行交涉。查維茲多次利用原油作為誘惑，希望把中共拉入反美聯盟但並沒有成功。雖然中共獲

得優惠價格的原油並進行相關投資，但仍然拒絕查維茲的要求，避免加入反美陣營。[119]

中共在這些地區的外交政策亦增加了多邊要素，俾追求和運行外交目標。中共於2000年建立「中」非合作論壇，藉以共同討論區域經濟發展議題，同時「期盼能夠達成廣泛共識，建立21世紀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與經濟秩序。」[120] 這個論壇讓中共得以在非洲領導人間增加政治影響力；例如，中共經常運用「中」非合作論壇會議，推出的重大援助和整體貿易計畫，其在2006年11月所舉行的會議便是如此。[121] 2004年5月，中共成為美洲國家組織觀察員，並藉其地位阻止中華民國加入該組織。2008年，中共終於達成協定，加入美洲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DB)，擴大其在拉丁美洲發展計畫的競標能力，以獲取更多可圖之利。[122]

中東

中共在中東的各項經濟和安全利益正在不斷擴張。對中共決策者而言，這個地區不再只是第三利益，只會偶而予以關注。最近十年，中共開始擴大參與中東事務，提升與若干中東國家的外交、經濟、文化和軍事關係。中共能源需求不斷增加，是提升中東關係的主因之一，但非全然。中共在中東地區發展雙邊和多邊外交，其動機包含：開拓海外市場和投資機會；促進這個對北京而言，地區重要性與日俱增的穩定度；以及形成超越中東地區的多邊外交影響力。[123]

中共決策者對於捲入區域政治仍然顯得小心翼翼，特別是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議題。中共積極參與中東事務，也獲得更多的發言

權，但這也等同宣示要介入更深，即便是受到區域角色牽引所致。此種狀況讓中共在致力擴張中東地區地位與影響力時，逐漸發展成為新的緊張情勢。

中共是從非常低的水平開始擴大與中東地區的交往。2000年代以前，中共很少針對中東事務投入重大政治和外交資源。中共過去缺乏這個地區的各種專門知識，遠比不上對美國和東亞地區瞭解。中共原本在口頭上強烈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國家(主要是在毛澤東時代)，但1980年代這種情況開始改變，因為中共外交政策開始不再那麼強調意識形態，更實際的是，中共希望和以色列建立良好關係，以獲得傳統武器和輸入相關技術(從1980年代開始，以色列便成為中共軍隊的主要裝備供應國之一)。[124]

此外，過去中東對中共而言，並沒有相當高的戰略價值，重要性遠不如東亞和南亞。中共領導人並不關心中東的動盪局勢，這也是他們在中東區域衝突之時，仍然傾向出口武器系統，破壞區域穩定的部分原因。1980和1990年代，中共除了口頭上支持阿拉伯國家，軍售已成為其中東外交政策的主要特徵。中共這麼做主要是為了賺取利潤，但就伊朗的案例而言，中共亦希望運用武器轉移維持區域影響力，和美國進行抗衡。[125] 中共出口重大軍備的案例，包括1980年代在兩伊衝突期間向伊拉克和伊朗出售傳統武器和巡弋飛彈；向沙烏地阿拉伯出售中程飛彈(1987至1988年)；與伊朗進行民用核子合作(據報於1997年結束)；以及對伊朗彈道飛彈和巡弋飛彈計畫進行長期和廣泛的援助。[126]

從1980年代開始，中共與伊朗的關係便是其中東政策最受矚目且最具爭議的部分，但由此亦可看出北京相當清楚且一致的中

東「政策」。對北京而言，中共和伊朗的關係益發重要，因為這牽涉到中共與美國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發展；換言之，在中共眼裡，「中」美關係發展的意涵，從過去乃至現今，均強烈影響著中共和伊朗之間的互動關係。中共和美國對伊朗這個區域角色的意圖和熱衷於武器擴散行為看法明顯不同，不斷引發「中」美關係緊張。相對於美國決策者視伊朗為區域動盪的主要來源(因為其資助恐怖主義和尋求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中共卻以相互得利的軍售關係為基礎，和伊朗尋求穩定良好的關係；且中共和伊朗都視自身及對方為文明大國，共同促進更為多極的國際體系，並對美國抱持懷疑態度。[127] 北京亦時常運用其與伊朗的關係，影響美「中」關係，特別是用以反對美國的對中華民國軍售政策。此種變動關係至今仍有部分維持不變。[128]

相較於過去的中東政策，中共已經和區域國家增加多邊和雙邊互動，而北京當局亦不再像過去一樣扮演消極角色。中共和沙烏地阿拉伯(1999年)及伊朗(2000年)這兩個關鍵國家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同時也在外交上和這兩個國家不斷擴大交流。中共全力促進與沙烏地阿拉伯關係，便是試圖使其區域政經影響力達到多樣化目標的最佳例證。中共在2004年成立「中阿合作論壇」，推展中共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區域政治、貿易、科學、教育、文化和衛生合作。北京和波灣合作理事會維持對話關係；胡錦濤亦在2006年4月和波灣合作理事會領袖會面。美國911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儘管中共不希望在中東和平進程上涉入太深，中共還是指派特使「促進和解和促成對話」。[129] 2006年10月，就在該年夏天「以色列—黎巴嫩」衝突發生後，中共承諾將支援聯合國駐黎巴嫩維和行動臨時部

隊的工兵增加為1,000名；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是在各國(甚至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不願支持和擴大黎巴嫩南部維和行動時，提出這項承諾。[130]

為了增加整體政經影響力(例如贏得競標合約)，中共向很多中東國家提供發展援助和基礎建設資助，特別是巴勒斯坦當局和伊朗。針對伊拉克的未來，中共亦積極參與多邊討論。2007年6月，中共免除數十億貸款，並提供數百萬人道援助，為伊拉克重建做出貢獻。[131] 2008年中，一間中共國營石油公司獲得伊拉克政府首件由外國公司開發伊拉克油田的合約。這種利用發展援助獲得市場的模式，和前述非洲外交相當類似。[132]

是何種動機促成中共政策轉變？中共中東外交的石油和天然氣需求影響因素不斷增加(但這並非惟一因素)。2008年，中共50%的原油進口來自中東，成為中共最依賴的石油進口區域。即便中共從俄羅斯和非洲進口的原油已經大幅增加，這個數據仍然維持數年。[133] 中共石油需求持續上升，帶動石油進口增加，包括從中東進口石油。國際能源總署推測，中共對進口石油的依賴，將從2004年整體需求的46%，增加到2015年的63%，進而增加到2030年的77%。[134] 儘管估計數字不盡相同，但相信還是會有超過半數的石油進口來自中東。[135] 中共對中東主要石油生產國已經出現貿易赤字，特別是沙烏地阿拉伯、伊朗和阿曼。[136] 2007年，這三個國家占中共原油進口的37%。[137] 由此觀之，中共和許多中東國家的貿易顯然是以石油為主，而非以中共出口商品為主。然而，以色列、黎凡特地區、埃及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是這種趨勢的例外。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多年來一直是這個區域最大的中共商品進口國。[138] 隨著中東國家不斷進口

中共科技，中東可能成為有利可圖的出口市場，埃及就是明顯的例子。[139]

中共區域外交顯示能源的相對重要性。中共不斷努力確保伊朗及沙烏地阿拉伯的各項石油和天然氣貿易投資交易，以保障可長可久的資源管道。[140] 2007年12月，「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國石化)這間中共國營石油公司簽署700到1,000億美元交易，以承諾向伊朗購買天然氣做為交換條件，發展伊朗的雅達瓦蘭大(Yadavaran)油田(儘管這項協定尚未完全敲定)。[141] 2006年12月，另一間中共國營公司──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簡稱中國海油)和伊朗簽署瞭解備忘錄，投資160億美元發展北帕爾斯(North Pars)油田，並建設天然氣液化設備。2004年1月，當沙烏地阿拉伯魯卜哈利(Rub al-Khali)地區天然氣開發區域無法獲得國際主要石油公司青睞時，中國石化出手標下這項合約。2006年3月，中國石化、沙烏地阿拉伯石油公司(Saudi Aramco)、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Exxon Mobil)和福建省政府敲定聯合開發協定，擴大福建煉油廠容量，專門處理沙烏地阿拉伯原油。

然而，中共渴望獲得中東能源供應，亦不應被過分誇大為區域外交的動機。儘管中共對進口石油的依賴程度不斷增加，而且有很多原油進口自中東，其已開始採行多樣化國家能源戰略，希望最終能調節石油進口的成長。此外，中共亦努力拓展能源進口管道，避免過度依賴中東這種政治詭譎和外交複雜的區域。中共相當關切中東能源大多必須穿越危險海城的海洋運輸線，因此正在尋找可資替代的能源供應國和能源運輸路線。中共從俄羅斯進口原油的數量很大(2007年達到9%)，而且正在迅速增加(2007年增幅達

25%)。中共在中亞(尤其是哈薩克)擁有很多促成石油和天然氣陸地運輸的投資計畫。[142] 中共原油進口數據某種程度反映這項作為：中共中東原油進口成長率2006年減低至9%，非洲和歐亞地區石油進口成長率則分別為19%和30%。

除了能源安全，北京亦相當關切伊斯蘭極端主義在中東興起。中共擔心中東極端勢力會向新疆維吾爾族回教分裂主義分子提供物資援助，使其得到強化。此種對極端主義和跨國恐怖分子網絡的憂慮，是中共決策者較過去更常對區域動盪表達關切的原因之一。而這些關切也促使中共透過提供更多發展援助，期能營造穩定的區域環境。中共派遣特使到中東地區，甚至參與和平協商進程，例如2007到2008年的「安納波利斯和平進程」(Annapolis Process)。同時，避免捲入中東政治太深，亦是中共決策者的特定目標，因為他們認為解決中東政治太過複雜，而且會大量消耗中共外交資源。最後，中共的中東政策，亦是北京推廣和建立多極國際體系的一環，讓北京得以和發展中國家合作，增進中共在聯合國這種重要多邊組織的地位。[143]

中共的中東政策持續受到「中」美關係和中共對美國區域目標觀點所影響。中共領導人認為，美國在中東存在是華府的戰略利益考量，美國的外交和軍事存在將會持續數十年，而且美國政策是區域穩定的關鍵，同時也是區域更為動盪的來源。中共決策者強烈懷疑美國的長程意圖是主導中東地區，中共領導人亦時常反對美國的特定政策，因為他們認為美國希望藉此達成某些目標(特別是美國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中共戰略家認為，美國入侵伊拉克後，美國領導人窮於應付伊拉克事務(亦消耗美國外交和軍事資源)，為「中」

美關係製造喘息空間，並讓美國注意力轉離東亞。[144]

隨著北京利益逐漸擴張，中共對於中東的外交將變得更加複雜，其對美國區域角色的觀點也將展現出更為平衡的外交行動。一方面，中共希望在遜尼派和什葉派阿拉伯國家之間維持正面關係，另一方面，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之間亦是如此。中共希望避免採取與美國直接對抗的行動，例如高調進行大規模軍售，或是與伊朗建立緊密的聯盟關係。同時，北京希望和中東國家建立和維持政治關係，確保資源和市場取得，即使需要和伊朗這種爭議國家維持關係。北京亦尋求防止美國限制中共施展政經影響力的相關政策；相關措施顯現於中共的區域援助、外交關係擴展，以及不顧美國反對，持續尋求和伊朗進行能源交易與輸出武器技術。聯合國安理會商議伊朗核武計畫時，中共扮演「中間人」的政策，同樣進一步顯示中共致力平衡多重區域目標，一方面，防止武器擴散和區域穩定符合中共利益，另一方面，這樣可以和伊朗維持穩定關係取得能源供應。

整體而言，中共的中東政策逐漸著重於政經關係的多樣化，以保障其在該區域的對等權益。在北京的利益計算中，渴望獲得能源供應扮演主導角色(但並非唯一)。證據顯示，隨著相關物質利益逐漸擴張，中共掌握區域穩定的籌碼亦會增加。換言之，此種情勢的持續發展將使中共在中東外交政策上，得以透過突然停止某些交易，讓北京在處理區域和國際事務上做出貢獻，要求某些國家的行為更為合理(例如伊朗支持恐怖主義和武器擴散)。[145] 在此趨勢之外，中共的中東外交政策尚有更廣泛的內涵：中共外交政策仍然把亞洲周邊國家和大國關係放在第一順位。就中共與發展中國家的

關係而言，即使北京對中東的關注和外交行動正在擴張，中共仍然不會像非洲一樣，將大量政經資源投入中東。

多邊外交

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中共對多邊組織的價值觀，已經從被動和懷疑演變為積極參與。中共決策者現在認為，多邊組織對於推進「多極化」、促進「公正合理國際秩序」和「建立和諧社會」相當重要；多邊主義的重要性已然大幅上升。大約從2002年開始，中共領導人、決策者和國營媒體開始「減少」要求擴大「多極化」及減少「霸權政治」的傳統說法；取而代之的是，他們開始強調以多邊組織處理全球經濟和安全挑戰的角色。[146]

這種說法上的轉變並非只有象徵意義。2004年，中共最高領導人公開推崇「合作」概念，連同「和平與發展」核心理念，成為中共外交的三項明確原則。[147] 其中第三個項目的加入，凸顯中共承諾將多邊主義當做安全保證的機制，亦顯示中共逐漸對運用此種機構感到安心。因此，多邊外交受到中共高層認可，在中共官方外交上有相當穩固的優先政策基礎。最特別的是，多邊主義已經成為胡錦濤的外交政策支柱，藉以和胡錦濤前任領導人的外交政策有所區隔(儘管是以溫和的方式)。[148]

中共在聯合國

中共在聯合國的行為是其傾向運用多邊組織推進外交目標的領導指標。中共已經更為積極且自信地參與聯合國事務，包括聯合

國安理會和聯合國的附屬組織，例如國際原子能總署和裁軍會議。對北京而言，聯合國對於推進多邊主義和建立多極國際體系至關重要。如同胡錦濤於2005年在聯合國60周年會議發表演講時表示：「(我們應)堅持多邊主義，實現共同安全……。聯合國做為集體安全機制的核心，在保障全球安全的國際合作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作用只能加強，不能削弱。」[149]

中共藉由參與聯合國事務追求許多目標。[150] 第一，中共希望穩固聯合國身為多邊組織的最高位階，進而推廣其「國際事務民主化」和建立「公正合理國際秩序」的觀點。[151] 身為擁有否決權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共這個目標並非出於共產式的利他主義，而是為了直接推進中共的外交政策目標。就實務而言，這代表中共會運用其在聯合國的地位，轉變聯合國行動採取中共所反對的行動，並推動其所支持的行動。例如，中共雖然表示大力支持聯合國成為多邊合作的堡壘，但卻基於各種實務上的目的，反對聯合國安理會擴大常任理事國，包括日本、印度和巴西。此外，中共在聯合國安理會竭力遏制和改變美國針對北韓、伊朗、蘇丹和緬甸等爭議性安全議題所持立場，亦顯示出中共希望利用聯合國來推廣其世界觀。

第二，中共向來視聯合國為減少中華民國獲得國際支持，以及催促其他國家轉向和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主要場合。直至目前為止，中共在聯合國安理會投下六次反對票，有兩次是因為反對聯合國維和行動派兵至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雖然目前中共在聯合國處理中華民國議題的外交手法已經較為細緻，但這項動機仍然相當顯著。

第三，中共運用聯合國讓各國接受與尊重其大國形象；近年來，中共運用聯合國安理會的各項行動，希望能參與處理諸如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以及恐怖主義等共同性的全球安全挑戰，藉以證明自己是個「負責任的重要發展中國家」。[152] 這項目標代表中共參與聯合國活動的品質已經有所改善，同時也緩步朝向較為透明公開的政府形象邁進。相較於其他常任理事國，中共拼命對聯合國維和行動做出更多貢獻，此點最能反映出該項動機。此外，中共開始參與聯合國為提升國防透明化所主導的相關作法，每年向聯合國提報國防預算。2008年，中共重返聯合國傳統武器出口登記機制(1997年，中共因為和美國在對中華民國軍售分級問題上存有爭議，退出該項機制)，向聯合國進行年度提報。

最後，中共參與聯合國外交主要卻微妙的動機，是遏制美國所主張的權力，並限制運用美國的方式來解決國際問題。許多中共分析家把聯合國視為節制美國「單邊主義」的機構，藉由提升組織能力，限制美國及其盟邦的特權地位。[153] 在人權、人道問題，以及施加國際處罰和制裁相關議題上，這種情況最為明顯。中共很少公開提及這項目標，但中共在聯合國安理會的諸多行動卻明顯反映這項目標(接下來會詳細討論)，顯示美國和中共對國家主權和干涉他國內政，存有看法上的差異。

近十年來，中共已經開始針對影響其經濟與安全利益的美國政策，採取更為公開的抵制措施，諸如針對美國試圖對蘇丹施予經濟制裁，或是就有關北韓及伊朗禁止擴散議題所採取的制裁行為。中共與俄羅斯試圖聯手在聯合國議會中，針對類似議題發揮更具主導性的影響力，特別是在反對美國的立場上，更於近五年來大幅

增加。

此項目標對北京當局而言，可謂相當複雜而且充滿轉折，主要原因還是在於中共自身外交政策目標所存在的競爭關係，究竟是否要對華府的政策繼續保持沉默，抑或公開與之對抗。當美國於2003年爭取聯合國授權出兵干預伊拉克時，從中共表達低調但「原則上抱持反對立場」的態度，最能看出其對此種對抗力度的拿捏；北京當局任由莫斯科及巴黎帶頭反對美國所採取的行動。自此以後，中共似乎更加容許自己利用聯合國的場合，對美國表達相左意見。北京已然表現出更強的意願，力圖在聯合國安理會中宣示自身的重要地位，並且公開站在反對華府的立場。此點主要源自下列幾項因素的作用所致：中共對自己的國力愈來愈有信心；其更有能力承受美國採取負面反應，同時樂見美國較以往更加需要中共；北京當局認為美國的形象與影響力在小布希主政期間呈現下滑趨勢；以及中共為了避免在反對美國的立場上遭到孤立，而具備與其他國家，例如俄羅斯，進行合作的能力。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活動

中共參與聯合國事務的積極和自信，明顯反映於聯合國安理會的相關活動。接下來會提供許多例子，包括聯合國維和行動、索馬利亞、蘇丹、中華民國和其他聯合國安理會爭議。

維和行動。過去五年，中共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的質和量都有所提升。截至2008年，五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中共對聯合國維和行動所做貢獻最多，其貢獻幾乎比任何北約成員國還多。2008年，所有聯合國成員國中，中共是聯合國維和行動第12大貢獻

國。中共目前在聯合國12個全球維和行動中，部署1,861名軍隊、88名軍事觀察員和208名警察(如表6.2)。[154]

中共首次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是在1990年，但接下來十年，中共的貢獻相當有限，僅在一些聯合國行動中，提供少數軍事觀察員和警察。2000年代，中共迅速提升它的貢獻，從2000年以來提升20倍(相較之下，美國、俄羅斯和英國的貢獻開始下降或未再成長)。中共對聯合國維和行動的貢獻，將近有75%投入非洲，因為中共擴大在蘇丹達夫區、賴比瑞亞和剛果的聯合國維和行動部署。中共的貢獻通常以工程、醫療服務和運輸等功能性事務為主。中共亦是聯合國維和行動的第二大警察派遣國(來自公安部門)。

中共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的質量亦有所提升。2007年9月，聯合國首次指派中共趙京民將軍擔任聯合國「西撒哈拉公民投票特派團」指揮官。根據吉爾(Bates Gill)和黃清浩(音譯，Chin-hao Huang)的研究，「目前至少有三支中共民兵部隊在聯合國總部的武力組建組(Force Generation Unit)、軍事規劃辦公室(Military Planning Service Office)和亞洲暨中東部隊運作辦公室(Operations Office for the Asia and Middle East Division)。[155]

此外，中共的支援行動已經變得更有政治彈性。2004年，即便海地承認中華民國，中共仍然初步派遣130名警察赴海地執行聯合國維和行動，並且於2009年初增加至143名。[156] 這是中共首次採取這個步驟；1990年代晚期，中共在聯合國安理會投下反對票，拒絕授權在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進行維和行動(1997年在瓜地馬拉和1999年在馬其頓)。[157] 吉爾和黃清浩認為，在達夫地區這種高度敏感且影響中共國際形象的人道危機議題上，「北京已經採取更為

表6.2　中共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情況

任務區分	參加時間	非戰鬥部隊人數(當前／累計)	軍事觀察員和參謀軍官人數(當前／累計)	維和警察人數(當前／累計)
聯合國停戰監督組織	1990年4月－現在		2/89	
聯合國伊拉克－科威特觀察任務	1991年4月－2003年10月		0/164	
聯合國西撒哈拉公民投票特派團	1991年9月－現在		13/314	
聯合國柬埔寨臨時全力機構	1992年4月－1993年9月	0/800	0/97	
聯合國莫三比克行動	1993年6月－1994年12月		0/20	
聯合國賴比瑞亞觀察團	1993年11月－1997年9月		0/33	
聯合國阿富汗特派團	1998年5月－2000年1月		0/2	
聯合國獅子山特派團	1998年8月－2005年12月		0/37	
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部	1999年2月－現在		2/11	
聯合國衣索比亞和厄立特里亞特派團	2000年10月－2008年8月		0/49	
聯合國波士尼亞和赫塞哥維納特派團	2001年1月－2002年1月			0/20
聯合國剛果(金夏沙)特派團	2001年4月－現在	218/1,962	16/101	
聯合國東帝汶支援任務團	2002年5月－2005年4月			0/207
聯合國賴比瑞亞特派團	2003年10月－現在	558/3,906	7/70	8/83
聯合國阿富汗援助團	2004年1月－2005年5月			0/3
聯合國象牙海岸行動	2004年3月－現在		7/33	
聯合國科索沃特派團	2004年4月－現在			18/73
聯合國海地穩定特派團	2004年5月－現在			143/916(鎮暴警察)
聯合國蒲隆地行動	2004年6月－2006年9月		0/6	
聯合國蘇丹特派團	2005年5月－現在	435/1,740	23/88	18/47
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	2006年3月－現在	335/1,187	9/24	
聯合國東帝汶綜合特派團	2006年10月－現在		2/7	21/30
聯合國獅子山整合辦公室	2007年2月－2008年2月		0/1	
非洲聯盟－聯合國達夫混合行動	2007年11月－現在	315/315	7/7	
合計(2,157)		1,861	88	208

資料來源：《2008年中國的國防》，2009年，附錄Ⅲ(截至2008年11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中國維和部隊》，2008年；以及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Monthly Summary of Contributors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Personnel, 2008.

積極的方法，支持政治調停的需要，並同意非洲聯盟和聯合國共同派遣維和部隊處理人道危機。2008年初，中共派遣大約140名工兵赴達夫，為國際社會期望的更大規模聯合國部隊進行路線規劃工作。」[158]

索馬利亞。2003和2004年，中共在聯合國安理會主導索馬利亞和平進程協商事宜。中共先於2003年採取迥異以往的步驟，負責和平進程決議事項的主持工作，並因而受派為領袖國，負責「執筆」草擬決議的相關聲明與決議內容。2004年，中共敦促聯合國安理會應時常針對索馬利亞議題，發表幾乎是過去幾年兩倍的主席聲明事項。當聯合國安理會在肯亞奈洛比(Nairobi)舉行特別會議時(該會旨在解決蘇丹達夫地區的人道危機)，中共亦堅持安理會成員優先處理索馬利亞議題。當奈洛比聯合國安理會準備討論蘇丹議題時，中共成功地「先」讓索馬利亞領導人在會議上發表談話。經過中共努力，聯合國安理會針對索馬利亞發表五次主席聲明以及相同次數的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目前並不清楚中共扮演這種積極角色的動機為何，因為中共在索馬利亞沒有重大的經濟和外交利益。可能的解釋是，北京希望增進中共在東非國家間的地位，這個地區和中華民國有一些外交關係，而美國在此區域則長期陷於孤立狀態。[159]

蘇丹。中共積極參與聯合國安理會外交事務中，態度最明顯且最公開的議題，莫過於蘇丹達夫地區人道危機的商議過程。中共不斷運用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地位，避免蘇丹受到國際制裁和其他國際譴責(如表6.3)。

中共阻擋達夫地區議題進入聯合國安理會議程的時間始於

表6.3　中共在聯合國安理會針對蘇丹的投票

聯合國安理會決議	聯合國安理會蘇丹決議的重要內容	中共投票
2004年投票		
1547號決議 2004年6月11日	• 這是聯合國安理會首次針對達夫議題發起決議案。 • 安理會無異議通過決議，派遣一支先遣隊赴蘇丹南部。這支「聯合國在蘇丹促進任務」(UNAMIS)維和部隊受命促成有關團體接觸，並且為設立聯合國和平支援行動(U.N peace support operation)進行準備。 • 這項決議歡迎南北和平協定(North-South peace agreement)，並呼籲有關團體「立刻停止在達夫地區進行戰鬥。」	贊成
1556號決議 2004年7月30日	• 這項決議案對蘇丹所有非政府戰鬥團體發起武器禁運，包括金戈威德民兵組織。 • 安理會威脅蘇丹政府若無法在30天內對金戈威德解除武裝，將根據聯合國憲章第41條「考慮進一步行動」(第41條授與安理會廣泛的非軍事權力，包括「完全或部分中斷經濟關係。」) • 這項決議亦同意非洲聯盟部署防護武力，監視達夫2004年4月的停火協議。	棄權(連同巴基斯坦)
1564號決議 2004年9月18日	• 這項決議指出蘇丹政府無法對金戈威德民兵組織解除武裝、保護平民安全、並對暴力加害者進行審判。 • 這項決議要求會員國支持和擴大非洲聯盟在達夫的任務，並要求針對種族屠殺組成國際調查團。 • 安理會再次威脅若蘇丹政府不遵守相關規定，可能「考慮其他手段」，包括對產油區進行制裁。	棄權(連同阿爾及利亞、俄羅斯與巴基斯坦)
1574號決議 2004年11月19日	• 安理會在奈洛比舉行特別會議，鼓勵喀土穆政府和蘇丹解放軍進行和平對話進程。 • 由於無法施加制裁，安理會藉由提供國際援助，勸誘蘇丹政府和叛軍停止所有暴力活動。 • 這項決議要求非洲聯盟擴大達夫任務，並重視此區域的人權觀察。	贊成
2005年投票		
1585號決議 2005年3月10日	• 延長「聯合國在蘇丹促進任務」維和部隊的任務期限。	贊成
1588號決議 2005年3月17日	• 延長「聯合國在蘇丹促進任務」維和部隊的任務期限。	贊成

1590號決議 2005年3月24日	• 安理會成立聯合國駐蘇丹部隊(UNMIS)，由1萬名聯合國軍隊組成，和非洲聯盟駐蘇丹部隊共同合作。 • 聯合國維和部隊監督停火協定實施，並監督南北全面和平協定，要求武裝部隊「解除軍備、遣散並進行復原工作。」 • 聯合國決定在達夫地區部署軍隊，處理侵犯人權的問題。	贊成
1591號決議 2005年3月29日	• 由於蘇丹全部武裝團體都未能遵守之前的安理會決議案，安理會訂定交通禁令，並凍結蘇丹所有人權侵犯者的資產。 • 這項決議不包括對蘇丹實施石油禁運，因為幾乎確定中共會因此投下反對票。 • 這份文件是之前美國草擬決議的修正版，要求針對達夫地區成立聯合國維和任務並施加制裁，包括凍結該國「經濟資源。」	棄權(連同阿爾及利亞及俄羅斯
1593號決議 2005年3月31日	• 安理會決定將蘇丹達夫地區的人權侵犯者送交國際刑事法庭。安理會成員對送交國際刑事法庭的長期討論就此結束，而美國對行使否決權的威脅亦未付諸行動。 • 通過1953號決議，標示著安理會首次將案件送交國際刑事法庭。	棄權(連同美國、阿爾及利亞及巴西)
1627號決議 2005年9月23日	• 延長聯合國駐蘇丹部隊的任務期限。	贊成
1651號決議 2005年12月21日	• 強調必須尊重《聯合國憲章》中，有關特權和豁免的條款規定，以及《聯合國特權和豁免公約》。 • 延長專家研究小組的任務期限。	贊成
2006年投票		
1663號決議 2006年3月24日	• 這項決議要求秘書長安南在2006年4月24日之前，針對非洲聯盟將維和任務轉移到聯合國部隊，「制定必要的轉移準備計畫」。 • 安理會亦要求聯合國駐蘇丹部隊在移轉期間和非洲部隊密切加強合作。 • 安理會要求安南針對上帝反抗軍(the Lord’s Resistance Army)提出更有效的解決方式，這支以烏干達為基地的叛亂團體遭安理會譴責侵犯人權。	贊成
1665號決議 2006年3月29日	• 延長專家研究小組的任務期限。	贊成
1672號決議 2006年4月25日	• 這項決議對4名被指控犯下戰爭罪的蘇丹人士施加制裁。 • 中共、俄羅斯和卡達棄權，認為這項制裁將會妨礙阿布賈和平協商(Abuja peace negotiations)。 • 這項由美國發起的決議，對兩位叛軍領袖的資產和國際旅行做出限制，一位是前蘇丹空軍參謀長，一位是支持政府的民兵領袖。 • 儘管安理會於2005年3月已經下令對人權侵犯者進行制裁，這次投票卻是首次制裁涉入蘇丹衝突的個別人士。	棄權(連同卡達及俄羅斯)

1679號決議 2006年5月16日	• 這項決議要求加速將蘇丹達夫維和任務由非洲聯盟轉移至更大規模的聯合國部隊。 • 這項美國起草的決議，威脅若有任何團體企圖破壞和妨礙蘇丹政府和蘇丹解放軍的和平協議實施，將會面臨制裁。	贊成
1706號決議 2006年8月31日	• 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七章，安理會擴大對聯合國駐蘇丹部隊進行授權，使其得以使用任何必要方式保護平民免於遭受侵犯。 • 根據這項決議，聯合國應在達夫部署1萬7,000名維和部隊。 • 若喀土穆政府拒絕國際部隊進入其領土，聯合國安理會必須徵求蘇丹政府同意。	棄權(連同卡達及俄羅斯)
1709號決議 2006年9月22日	• 安理會無異議通過決議，延長聯合國駐蘇丹部隊的任務期限到2006年10月8日，希望進一步進行重建工作。 • 秘書長安南先期警告達夫面臨災難後，安理會通過該項延期決議，並以構成「國際和平及安全威脅」這個聯合國憲章第七章的法律用語，形容蘇丹情勢。	贊成
1713號決議 2006年9月29日	• 延長專家小組的任務期限。	贊成
1714號決議 2006年10月6日	• 延長聯合國駐蘇丹部隊的任務期限。	贊成
2007年投票		
1755號決議 2007年4月30日	• 呼籲簽署全面和平協定、達夫和平協定和恩賈梅納(N'Djamena)人道停火協定、東蘇丹和平協定和3月28日公報的所有團體遵守承諾，全面準時實行協定內容。呼籲未簽署達夫和平協定的團體也能準時實行，不要運用各種可能的方式妨礙協定施行，	贊成
1769號決議 2007年7月31日	• 建立非洲聯盟－聯合國達夫混合行動(African Union/United Nations Hybrid operation in Darfur, UNAMID)；非洲聯盟－聯合國達夫混合行動應監控任何可能違反1556號決議，在達夫地區出現的軍備和物資。	贊成
1779號決議 2007年9月28日	• 延長專家小組的任務期限。	贊成
1784號決議 2007年10月31日	• 延長聯合國駐蘇丹部隊的任務期限。	贊成

資料來源：這些決議摘要引自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文本以及全球政策論壇(Global Policy Forum)、聯合國安理會和美國國務院提供的摘要文件。

2004年，即便安南(Kofi Annan)和其他聯合國高層官員在當時呼籲大眾關注那裡浮現的人道危機。[160] 等到達夫議題排入聯合國安理會議程，中共便反對多項草擬決議，讓喀土穆(Khartoum)政府支持金戈威德民兵組織(Janjaweed Militia)在達夫地區活動的行為免於面臨經濟制裁。即便華府方面宣布喀土穆政府的活動構成「種族屠殺」，北京當局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商議過程中，仍威脅否決此類決議案。中共強烈反對諸多決議案，包括對蘇丹產油區進行制裁(例如安理會1564號決議案)、對蘇丹進行武器禁運(例如安理會1556號決議案)、擴大對達夫地區所有團體實施武器禁運，並由聯合國安理會蘇丹制裁委員會(UNSC Sudan Sanctions Committee)發起交通禁令、個人資產凍結等額外措施(例如安理會1591號決議案)，以及將蘇丹議題送交國際刑事法庭(例如安理會1593決議案)。此外，中共亦希望降低這些制裁的範圍(透過巴基斯坦和敘利亞運作，避免自身遭受批評)。聯合國安理會制裁決議的用詞經過調整，包括刪除提及聯合國憲章第七章的內容後，中共最後在這四種制裁決議案中均投下棄權票。北京勉強同意聯合國安理會1590號決議案，同意建立聯合國駐蘇丹部隊並部署一萬名軍事人員。2006年8月，聯合國安理會針對1706號決議案投票，北京再度棄權，該項決議同意擴大原本聯合國駐蘇丹部隊的規模，並要求部署於達夫地區；而該項決議亦受到喀土穆政府反對。北京的立場是聯合國部隊進入達夫地區，必須得到喀土穆政府同意，而直到2007年中之前，聯合國部隊均未獲喀土穆政府同意。[161]

從2006年底開始，北京在解決達夫情勢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包括對蘇丹政府施加壓力。柯慶生(Thomas Christensen)和史

旺(James Swan)兩位副助理國務卿在國會的聯合證詞就指出：

> 從2006年底開始，中國針對達夫情勢和國際社會展開交涉的意願大幅增加，施加外交壓力改變蘇丹政府的行為，並且致力於達夫衝突的政治協商進程。中國投票贊成聯合國安理會1769號決議案，成立聯合國駐達夫混合部隊，但蘇丹政府仍不時遭遇阻礙全面實行。中國承諾提供高達300名軍事工程人員，其中140名已經派遣當地，使中國成為非洲國家以外，第一個派遣軍隊赴達夫地區的國家。中國亦更積極涉入當地的人道危機，提供一些直接援助，並捐贈180萬美元給達夫地區和非洲聯盟特遣部隊。[162]

中共外交官員和分析家相當清楚，北京對達夫危機採取行動，在對外和對內的立場上，各有象徵性和實質性的動機。在對外方面，中共的外交立場高舉著反對外國勢力介入他國內政的旗幟，特別是以侵犯人權和人道危機為立論基礎。許多中共人士擔心，此種施加制裁和武力的正當性可能會在將來指向中共。從更深層面向而言，中共資深學者認為，中共領導人根本無意對國際夥伴的國內政治活動多加干涉；對他們而言，聯合國或雙邊關係交往並未存在普遍適用的價值體系。中共領導人的主要價值是促進經濟成長和發展；中共發展雙邊關係，並不會把重點放在政權合法性和統治行為。[163]

惟有中共對人道議題採取忽略態度，影響其國際形象和促進長期雙邊經濟關係的能力，中共領導人和外交官員才會開始重視這個議題。有很多事件顯示中共便是基於這些考量，才改變其在達

夫危機議題上的立場。2006年底，中共願意施壓蘇丹政府，使其同意國際維和部隊進入達夫地區，大致與非政府組織加強抨擊中共支持喀土穆政府有關，例如將2008年北京奧運貫上「種族屠殺奧運」之名。2006年11月北京舉行中非高峰會，許多非洲領導人對達夫情勢表達關切，亦可能是北京在達夫議題上改變立場的另一個因素。[164]

此外，中共外交官員私下提到，有鑑於中共在蘇丹產油區的涉入甚深，因此與蘇丹有相當大的經濟利益關係。2004和2005年，聯合國針對達夫情勢進行重要辯論時，蘇丹卻是中共前十大原油進口國(大約5%)。蘇丹是中國石化和中國石油兩大國營石油公司大規模投資，也是海外石油產量最多的國家(第二是哈薩克)。因此，中共決策者不願意在渴望增加石油進口管道的非常時刻，另闢關鍵的能源供應來源。[165]

中華民國。孤立中華民國和壓縮中華民國國際空間，在歷史上一直是中共參與聯合國相關活動的動機。1971年以來，中共在聯合國安理會投下六次反對票，有三次是為了阻止聯合國支援與中華民國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166] 中共最近在聯合國反對中華民國的外交動作，已經變得更加精細，且較不具對抗性。中共並未動用否決權(或威脅動用否決權)，而是以調整對聯合國維和行動支持的創新手法，壓縮中華民國國際空間，進而減少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數目。

中共不再對聯合國行動投下反對票(否則聯合國安理會通常會無異議支持)，而是採取較為低調(似乎相當有效)的方法。2003年，中共讓聯合國部署維和穩定部隊到賴比瑞亞的能力複雜化，直到

北京確認新政府將轉向承認中共(由泰勒主持的舊政府從1997年便和中華民國有外交關係)。當泰勒政權垮台、聯合國安理會初步同意成立作戰任務並派遣穩定部隊到賴比瑞亞,中共卻只同意三個月的委任期限,即便維和部隊的初步動員和部署至少就需要六個月的時間。中共隨後會勸說聯合國介入,確保後泰勒政府承認中共。2003年9月,聯合國安理會做出決議案(1509號),授權派遣穩定部隊到賴比瑞亞12個月。一個月後(2003年10月11日),中共與賴比瑞亞便重新建立外交關係。[167]

相對於這個事件,中共亦支持聯合國派遣維和部隊赴海地執行任務,即便海地政府與中華民國有正式外交關係。對北京而言,這項安排並非完全沒有困擾,北京認為海地官員的一些發言是挑釁行為,但北京的支持仍然沒有中斷。

擴大聯合國安理會。2005年初期,中共在聯合國積極的態度與影響力,完全顯現在安理會成員的擴大提案。聯合國過去討論該項改革計畫時(得到77國集團多數支持),中共一向抱持相當消極的態度,其堅決反對2005年4月納入德國、印度、巴西和日本的安理會擴大提案。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最受到中共反對,因為中共認為日本不願面對或適當彌補二次大戰時,占領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殘暴行為,不配在安理會獲得這種地位。支持日本的國家則認為,日本對聯合國的貢獻已經具備成為安理會成員的資格:日本給付19%的聯合國預算,美國給付21%。相較之下,中共只貢獻2%。

中共運用各種創新的外交方法阻擋這項提案。中共外交官員遊說聯合國其他國家從一開始就不要支持該項決議,然後加以反對。中共運用和非洲國家逐漸增加的外交關係,成功地封殺了該項

提案。其鼓勵非洲外交官員堅持該原始提案至少要讓兩個非洲國家加入聯合國安理會成員，「並且」要賦予他們否決權。第二項要求幾乎保證擴大提案會胎死腹中，並且於2005年8月正式結束。[168]

對中共而言，反對安理會擴大亦有其國內因素。日本申請加入安理會成員，在網路上激起大規模請願，紛紛表達反對；這些事件和其他因素綜合起來，造成2005年春季，在北京和上海激起一連串損失達數百萬美元的暴動——包括中共商業。目前並不清楚中共政府是否促成該次群眾運動，在暴動開始後加以操控，或者乾脆採取姑息態度。幾天後，政府當局終於開始壓制上海暴徒，顯示政府雖然認為民氣可用，但最後還是擔心局面失控，變成反政府的抗議行動。

中共在聯合國安理會的自信。除了上述有關中共特殊的國際行為，中共在聯合國安理會的行為還有一項更加明顯的總體趨勢——逐漸增長的自信心以及和俄羅斯就相關政策進行合作。2007年以來，中共在聯合國安理會投下兩次反對票，該項行為相當特殊，因為中共自1971年加入聯合國後，三十年來也只投下四次反對票(如表6.4)。這兩次反對票是回應聯合國安理會就人權問題譴責緬甸(2007年)和辛巴威(2008年)並要求政治改革。在兩個案例中，中共認為人權議題不在聯合國安理會的權責範圍，因為他們沒有造成聯合國憲章所謂的「威脅國際和平及安全。」在兩個案例中，俄羅斯和中共聯合投下反對票，這是它們自1970年代早期以來首次共同合作。即便小布希政府官員知道兩項決議存有高度爭議，而且中共官員已經表示兩項決議將受到俄羅斯、中共和其他國家反對，小布希政府官員仍然堅持推動決議案。[169]

表6.4 中共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否決票

日期	內容	決否的理由	其他國家投否決票
1972 S/10771	孟加拉申請加入聯合國	中共認為孟加拉是巴基斯坦的分裂省份	沒有
1972 S/10786	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修正案(10784)；修正案譴責中東恐怖分子，並要求他們停止行動。	中共支持阿拉伯國家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中共認為這項決議並未採取平衡動作，因為沒有點名以色列採取暴力行動對抗阿拉伯國家。	沒有
1997 S/1997/18	以聯合國駐瓜地馬拉核查團名義派遣軍事觀察員。	瓜地馬拉和中華民國有外交關係且支持中華民國加入聯合國。	沒有
1999 S/1999/201	延長聯合國駐馬其頓預防部署部隊的期限。	馬其頓和中華民國有外交關係。	沒有
2007 S/2007/14	要求緬甸停止侵犯少數族群並給予政治自由。	緬甸問題並沒有「造成國際和平和安全威脅」，因此不在聯合國安理會的職權範圍。	俄羅斯、南非
2008 S/2008/447	制裁辛巴威；對高層軍事和政府官員進行武器禁運和旅遊及金融限制。	辛巴威內部問題不是聯合國安理會的職權範圍；制裁會妨礙協商且造成局勢惡化。	俄羅斯、南非、利比亞、越南

資料來源：聯合國安理會網站；Samuel S. Kim, *China,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orld 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Morphet, 2000; and Yitzhak Shichor, "China's Voting Behavior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China Brief*,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Vol. 6, No. 18, September 6, 2006.

中共和俄羅斯亦在安理會增加合作。2006和2007年，中共和俄羅斯在安理會的投票行為有相當明顯的關聯性。在蘇丹問題上，幾乎只要是施加制裁的決議案，即便在中共成功降低懲罰力道後(例如聯合國安理會1564、1591和1672號決議案)，俄羅斯都會與中共一起投下棄權票。特別的是，中共和俄羅斯在北韓和伊朗核子議題上已經發展出大致上的分工：在伊朗議題上，中共跟隨俄羅斯行

動；在北韓議題上，俄羅斯則跟隨中共行動。兩國合作通常是為了修改和調整美國和英國在安理會所主導的作為，阻止他們因為伊朗和北韓持續發展核武，對兩國施加制裁和懲罰。[170] 遏制美國針對伊朗和北韓議題推動懲罰性的決議事項，是「中」俄合作的明顯動機。

中共更願意對抗其他國家，亦展現其在聯合國安理會的自信，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共的行動已經變得更符合美國的政策目標。2006年，中共因為北韓和伊朗持續發展核武，開始支持有限制裁：北韓的案例是聯合國安理會1695和1718號決議案，伊朗的案例則是聯合國安理會1737、1747和1803號決議案。在一些案例中，這些決議案甚至包括引用聯合國憲章第七章所做出的制裁。2009年4月，就在北韓發射火箭之後，即便反對有約束力的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案，中共格外支持強硬的主席聲明。這項聲明相當全面且傳達強烈訊息；然而，其對北韓發射火箭所表達的「譴責」，是北韓違反1718號決議案(關閉一處衛星發射井)，同時要求不得再進行發射活動，以及對平壤加強進行制裁行動。中共這些行動明顯突破過去在聯合國安理會商議禁止擴散議題的策略。[171]

聯合國禁止擴散相關事務。中共積極參與聯合國軍備管制和禁止擴散事務相關論壇，例如日內瓦裁軍會議和維也納國際原能總署會議。中共透過這些論壇表達反對美國安全政策(例如美國飛彈防禦計畫)，限制美國在關鍵議題上的影響力，並推廣中共在禁止擴散和軍備控制的立場。

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期，裁軍會議是中共反對美國飛彈防禦計畫的主要場所。中共實質上凍結裁軍會議，直到美國同意

「授權」針對太空武器化進行協商；但美國長期反對這個步驟，傾向以非正式「對話」取代。中共希望運用它在裁軍會議的立場，讓國際共同反對美國飛彈防禦計畫，要求美國同意限制飛彈防禦的發展能力。中共瞭解這麼做沒有效果後，最後於2003年放棄該項立場，但中共也讓裁軍會議停擺數年。[172]

中共在國際原子能總署會議的行動已經變得更為合作且更趨近美國的禁止擴散目標。中共過去希望調整其他成員(通常是美國)的立場，避免他們推動國際原能總署採取更強大的防護措施，加強監視違反禁止核子擴散條約和國際原能總署協定的國家。例如，中共多年來反對國際原子能機構理事會(IAEA Board of Governors)向聯合國安理會「報告」違反案件，主張該項議題應由國際原能總署處理。中共擔心一旦這些案件送交聯合國安理會，某些國家，例如北韓和伊朗將會成為制裁和懲罰的目標。中共認為制裁措施不利協商解決方式，而這也是中共長期以來對制裁行動的看法。

然而，中共的態度大約於2003年開始改變。2003年2月和2004年3月，當北韓情勢升高，中共支持國際原子能總署的一致決議，向聯合國安理會報告北韓違反規定。北京在1990年代並不願意採取這種立場對付平壤。中共亦分別在2005年9月和2006年2月唱名投票時，先是棄權，然後投下「贊成票」，同意兩項向聯合國安理會報告伊朗違反規定的決議案。中共行為改變，是因為它日益關切北韓和伊朗的不妥協態度，以及更加關注核子擴散對東北亞和中東局勢的影響，或者說，中共體認到國際對核子擴散劇烈關切之時，中共卻逐漸脫離國際的主流看法。[173]

另一個中共在聯合國禁止擴散活動改變行為的例子，是它支

持1540號決議案，遏阻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擬定1540號決議案期間，中共強烈支持運用聯合國憲意第七章內容，稱大規模武器擴散為「威脅國際和平和安全」。然而，中共不希望決議案的內容將為武器擴散有關的封鎖行動提供法律基礎，因為中共政府認為這樣違反國際法。在中共和其他國家加入後，聯合國安理會1540號決議案從本來的反擴散倡議(不禁止封鎖行動)，發展成為一些必須遵守的法律責任，會員國必須防止擴散、提報國內禁止擴散的控制狀況和禁止擴散的多邊合作機制。[174]

總而言之，中共在聯合國內部運作日趨熟練，運用聯合國的議事程序追求其日益增加的全球外交利益，即便它與美國及其他主要大國有所衝突。北京當局對主導各項議題的意願亦與日益俱增；北京與莫斯科合作，使中共追求外交政策目標時，不會呈現孤立狀態或脫離國際公眾意見。以蘇丹和伊朗為例，中共反對美國倡議並且希望調整聯合國行動，避免中共實質利益直接受到侵犯。中共將持續採取各項步驟推廣它的全球秩序觀，而且如果可能的話，將在未來進一步遏制美國的外交操作和軍事力量──特別是中共利益受到破壞之時。

註釋

1 一些中共官方資料認為這個用詞是中共外交工作的「指導方針」；胡錦濤，2007年；楊潔篪，2008年；沈國放，2007年；阮宗澤，〈中國外交創造和平崛起平台〉，《瞭望新聞周刊》，第50期(2003年12月15日)，第14-16頁。以及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蔡武訪談錄，〈堅持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提高應對國際局勢能力〉，2005年6月21日。

2 針對這些原則做出的特殊批評，請參見王緝思，〈關於構築中國國際戰略的幾點看法〉，《國際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第1-5頁。

3 沈國放，2007年；以及2007年在北京及上海和中共官員及學者進行訪談。

4 2005和2006年，在北京及上海和中共官員及學者進行訪談。

5 這種外交政策的緊張關係，將會在第七章做更細部的討論。

6 2005和2008年，在北京及上海和中共官員及學者進行訪談。

7 大部分的中共國際關係主流分析，認為大國包括美國、俄羅斯、日本和歐盟。部分中共分析認為俄羅斯是中等大國，但將其視為大國是比較普遍的情形。

8 潘相陳，2004年，第807-808頁；《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2004-2005》，第114-133頁；以及張幼文和黃仁偉，2004年，第123-155頁。

9 王緝思，2004年。

10 小布希政府時期，美國官員提到美「中」關係是「合作的、建設性的和坦率的。」中共官員只使用前兩個用詞，並沒有使用「坦率的」。後面這個用詞是美國增加的。歐巴馬政府提到美「中」關係是「正面的、合作的和全面的。」

11 這個用語的來源，請見宮力，2004年；關於最新用詞，請見楚樹龍，〈中美關係：穩定壓倒一切〉，《環球時報》，作者引用公開資料中心(OSC)翻譯版本。這個官方路線亦可參考潘相陳，2004年。

12 王緝思，2005年；Swaine, 2004.

13 希望詳細瞭解中共這些國際活動，請參見John D. Negroponte,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參院外交委員會公開發言，2008年5月15日；及Thomas J. Christensen,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Shaping China’s Global Choices Through Diplomacy,” 美「中」經濟安全審議委員會公開發言，2008年3月18日。亦請參見Thomas J.

Christensen,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China's Role in the world: Is China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美「中」經濟安全審議委員會的證詞，2006年8月3日。

14 由於這些議題太過敏感，中共人士很少公開表達他們對美國遏制政策的看法，以及中共對美政策因此所面臨的困境。這些看法是在2005、2006和2008年，和中共學者官員訪談後得知。

15 王緝思，2003、2005年。

16 若希望瞭解新安全觀的完整論述，以及中共如何運用新安全觀，請參見David M. Finkelstein, "China's New 'Concept of Security," in Stephen J. Flanagan and Michael E. Marti, eds.,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China in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97-201.若希望詳細瞭解新安全觀的各種層面，請參見Carlyle A. Thayer, "China'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Diplomacy and Southeast Asia," *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Journal*, No.127, 2007, pp.16-32.

17 當然，中共追求這些外交目標有許多原因，例如獲取外國市場和天然資源。然而，中共希望超越嚴重依賴美國的困局，並擴大全球互賴和增強國際影響力，已經逐漸成為北京外交政策的主要動能。

18 中共針對「中」俄合作的最新說法，請參見〈中俄關係譜寫新篇章〉，張幼文和黃仁偉編，《中國國際地位報告2008》，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4-218頁；〈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新體現〉，張幼文和黃仁偉編，《中國國際地位報告2007》，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55-264頁；以及潘相陳，2004年。

19 潘相陳，2004年；Zheng Yu, "Strateg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China Strategy: China's Bilateral Relationship*, Vol.3,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ly 2004, pp.25-27；《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2004-2005》，2005年，第114-133、158-180頁；以及張幼文和黃仁偉，2004年，第123-155頁。

20 潘相陳，2004年，第842頁；這段引言源自2002年12月普丁造訪中共後所發表的聯合聲明。

21 潘相陳，2004年，第842-847頁。

22 針對2004到2007年「中」俄在安理會投票模式進行分析後，以及2007年2月在紐約與美國外交官和聯合國美國代表團進行訪談後，得出這個看法。可以參考美國國務

院的傑出年度報告 "*Voting Practices at the United Nations,* various years."

23 2007年4月在北京和中共學者進行訪談。

24 David L. Stern, "Security Group Refuses to Back Russia's Actions," *New Your Times*, August 28, 2008.

25 這些數字源自Yu Bin, "China-Russia Relations: Between Crisis and Cooperation,"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Vol. 10, No. 4, April 2009.

26 潘相陳，2004年，第847頁。

27 這些數字源自中共統計資料；Thomas Lum and Dick K. Nanto, *China's Trad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January 4, 2007, p. 44; 以及《2007年1-12月中國與歐洲國家貿易統計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08年1月24日。

28 Paul Holtom, "Russia and China's Defense Industrial Relationship and Arms Sales: Is the Party Over?" unpublished conference paper, April 2009.

29 潘相陳，2004年，第832頁。

30 Zheng Yu, 2004; on the February 2009 loan, see David Winning, Shai Oster, and Alex Wilson, "China, Russia Strike $25 Billion Oil Pact,"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18, 2009.

31 Elizabeth Wishnick, Russia,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Central Asia:Prospects for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Shadow of the Georgian Crisis,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February 2009.

32 2007年在北京和中共學者進行訪談。

33 若希望取得這個觀點的傑出研究，請參見Phillip C. Saunders and Erica Strecker Downs, "Legitimacy and the Limits of Nationalism: China and the Diaoyu Island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3, Winter 1998/1999, pp. 114–146.

34 Minxin Pei and Michael Swaine, *Simmering Fire in Asia: Averting Sino-Japanese Strategic Conflict*, Policy Brief No. 44,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November 2005; Peter H. Gries, "China's 'New Thinking on Japan,'" *China Quarterly*, Vol. 32, No. 184, December 2005b, pp. 831–850; and Benjamin Self, "China and Japan: A Facade of Friendship,"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6, No. 1, Winter 2002–2003, pp. 77–88.

35 Minxin Pei and Swaine, 2005; Gries, 2004, 2005.

36 這些資料源自於Evan S. Medeiros, Keith Crane, Eric Heginbotham, Norman D. Levin, Julia F. Lowell, Angel Rabassa, and Somi Seong, *Pacific Currents: The Responses of U.S. Allies and Security Partners in East Asia to China's Rise*,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MG-736-AF, 2008, pp. 33–35.

37 這個部分廣泛引用中共和西方資料：《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2004-2005》2005年，第181-200頁；《中國國際地位報告2004》，2004年，第136-143頁；《中國國際地位報告2007》，2007年，第265-271頁；《中國國際地位報告2008》，2008年，第207-213頁；以及下列著作部分章節：David Shambaugh, Eberhard Sandschneider, and Zhou Hong, eds., *China-Europe Relations: Perceptions, Policie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38 2004年5月1日歐盟增加諸多會員國，是歐盟成為中共最大貿易夥伴的部分原因。這些新會員國包括捷克、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斯洛維尼亞、馬爾他和賽普勒斯島。

39 Bates Gill,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a-EU Relationship," in Shambaugh, Sandschneider, and Hong, 2008, pp. 270–286; Bates Gill and Gudrun Wacker, eds., *China's Rise: Diverging U.S. and EU Perspectives and Approaches*, Berlin: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August 2005; David Shambaugh, "The New Strategic Triangle: U.S. and European Reactions to China's Ris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8, No. 3, Summer 2005, pp. 7–25.

若希望瞭解歐盟對中共採取的直接對抗政策，請參見John Fox and Francois Godement, *A Power Audit of EU-China Relations*, Brussels, Belgium: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9.

40 1993年簽署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後，歐洲共同體變成歐盟。

41 若要瞭解這個時期或更早之前的中歐關係，請參見Michael B. Yahuda, "China and Europe: The Significance of a Secondary Relationship,"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1994, pp. 266–282.

42 Franco Algieri, "It's the System That Matters: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Making of EU Policy Toward China," in Shambaugh, Sandschneider, and Hong, 2008, pp. 65–83.

43 Shambaugh, Sandschneider, and Hong, 2008; and May-Britt Stumbau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Decision-Making in EU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toward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GAP Schriften zur Internationalen Politik, Berlin, Germany: Nomos Publisher, 2009. 中共對中歐關係評估的改變，請見《中國國際地位報告2008》，2008年，第207-213頁。

44 2008年下半年開始全球經濟衰退，導致中共對歐盟出口急劇下滑，中共決策者認為歐洲和美國需求是否恢復，對中共出口市場至關重大。

45 中歐貿易與投資關係，可以到歐盟執行委員會網站查詢。

46 歐盟對中共發展援助的詳細情形，可以到歐盟執行委員會網站查詢。

47 黃仁偉，《國際體系的改變與中國和平發展道路》。

48 這些論點受惠於桑德(Saunder)的傑作，2006年，第21-22頁。

49 May-Britt Stumbaum, "The Invisible Ban. EU Maintains Weapons Embargo on China,"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December 2008, pp. 52–53.

50 2005、2006和2008年，在北京與中共學者進行訪談。

51 薩庫奇的對中政策，請參見 Willem Van Kemenade, "Between Beijing and Paris: From Abnormally Good to More Normal," *China Brief*,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Vol. 7, No.15, July 27, 2007.

52 中共國防工業的未來發展，請參見 Evan S. Medeiros, Roger Cliff, Keith Crane, and James C. Mulvenon, *A New Direction for China's Defense Industry*, Santa Monica, Calif.: The RAND Corporation, MG-334-AF, 2005.

53 趙穗生，"The Making of China's Periphery Policy"，趙穗生編，*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2004, pp. 256–275; 以及趙穗生，"China's Periphery Policy and Its Asian Neighbors," *Security Dialogue*, Vol. 30, No. 3, 1999, pp. 335–346.

54 Medeiros et al., 2008.

55 睦鄰友好外交「政策」是更廣泛的周邊外交「戰略」的主要內容。

56 下列討論引自這些資料：王毅，〈加強互信合作促進共同安全〉，2003年11月15日在北京「東亞安全會議」發表的演說；王毅，〈全球化進程中的亞洲區域合作〉，2004年4月在北京外交學院「東亞共同體」會議上發表的演說；王毅，〈王毅談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外交戰略〉，2004年。

57 Bruce Vaughn and Wayne Morrison, *China-Southeast Asian Relations: Trend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April 14, 2006, pp. 12–13.

58 關於貿易數字，請參見Kerry Dumbaugh,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Soft Power' in South America, Asia, and Afric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April 2008, pp. 91–97; World Bank, 2007.

59 2001年提議討論自由貿易協定。2002年中共和東協領導人簽署「中國—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同意於2003年初開始協商自由貿易協定，預定2004年完成協議，在2010年和原本的東協六國針對貨品貿易建立自由貿易協定，並於2015年讓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的新會員國加入。2004年11月，協商完成的自由貿易協定在中共—東協會議上簽署，包括「東協-中國全面經濟合作貨品貿易架構協定」和「東協-中國全面經濟合作爭端解決機制架構協定。」

60 《200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08年，第12頁。

61 "Top Ten Sources of ASEA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flow," 未註明日期的東協秘書處網站。

62 亞洲開發銀行將大湄公河次區域界定為柬埔寨、中共、寮國、緬甸、泰國和越南。1992年，這6個國家得到亞洲開發銀行援助進行次區域經濟合作計畫，俾加強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這項計畫有助於基礎建設發展，讓資源得以共享，並促進次區域間的貨品和人員自由流通，讓國際認為次區域的經濟正在成長。這些內容引自未註明日期的亞洲開發銀行網站。

關於水權議題，請參見Vaughn and Morrison, 2006, pp. 30–32; Alex Liebman, "Trickle-Down Hegemony? China's 'Peaceful Rise' and Dam Building on the Meko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7, No. 2, 2005, pp. 281–304.

63 Mathew Wheeler, "China Expands Its Southern Influence,"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June 2005, pp. 40–44; and Bronson E. Percival, "China's Influence in South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the US," 針對「中共增長的角色：目標和影響」的議題，在美「中」經濟安全審議委員會發表的證詞，2005年7月22日。

64 Joshua Kurlantzick,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65 Bronson Percival, *The Dragon Looks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New*

Century, Oxford, UK: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7; and Ian Storey,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EAN-China Relations: All Quiet on the Southeast Asian Front*,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October 2007, pp. 1–11.

66 這段引文出自Storey, 2007, p. 7.

67 Fravel, 2005.

68 〈中菲越聯合勘探南海石油〉,《新華社》,2005年3月14日。亦請參見Storey, 2007, pp. 24–27.

69 Cao Huayin,〈試析東北亞新框架〉,《改革論壇學報》,2004年第10期,第27–36頁;亦請參見,王緝思,2005年。

70 Alan Romberg, "The East Asia Summit: Much Ado About Nothing—So Far," *Freeman Report*,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anuary 2006.

71 這些目標請見張幼文和黃仁偉,2004年,第327-337頁;以及《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2003-2004年》,2004年,第235-241頁。

72 Ken Allen, "China's Foreign Military Relations: 2003–2004," *Chinese Military Update*,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Vol. 2, No. 5, December 2004.

73 在此節中,中亞國家只提到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塔吉克和吉爾吉斯。

74 中共和塔吉克針對帕米爾高原進行協商時,中共在2萬8,000公里的爭議領土中只得到1,000公里。M. Taylor Fravel, *Strong Nation, Secure Borde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75 2006年,哈薩克最大的出口市場是德國、俄羅斯和中共,最大的兩個進口國是俄羅斯和中共。Dumbaugh, 2008; Vladimir Paramonov, *China & Central Asia: Present & Future of Economic Relations*, Conflict Studies Research Centre, Surrey, UK: Defence Academy of the United Kingdom, May 2005.

76 Dumbaugh, 2008, p. 72.

77 Robert Sutter, "Durability in China's Strategy Toward Central Asia—Reasons for Optimism,"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 Vol. 6, No. 1, 2008, pp. 3–10; Matthew Oresman, "Repaving the Silk Road: China's Emergence in Central Asia," in Joshua Eisenman, Eric Heginbotham, and Derek Mitchell, eds., *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7, pp. 60–83; and Niklas Swanstrom, "China and Central Asia: A New Great Game or Traditional Vassal Rel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4, No. 45, November 2005, pp. 569–584.

78 趙華勝，〈中俄美在中亞能否合作？〉，《戰略與管理》，2004年3月，第34-107頁，作者採用國外廣播情報處(FBIS)翻譯版本。

79 2007年在北京與中共學者進行訪談。

80 「友好合作夥伴」關係大多會在聯合聲明中提及，但在烏茲別克的案例中，此種用語出現在2005年5月25日的條約之中。

81 Andrew Yeh, "Uzbekistan Signs $600m Oil Deal with China," *Financial Times*, May 25, 2005.

82 Enid Tsui and Francesco Guerrera, "China's CNPC Agrees to Buy PetroKaz for $4.2bn," *Financial Times*, August 22, 2005.

83 Isabel Gorst and Richard McGregor, "Kazakh Oil Arrives in China," *Financial Times*, May 26, 2006.

84 上海合作組織前身為1996年成立的「上海五國」，主要處理廣泛的安全和反恐議題。Pan Guang,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Prospects," *SASS Papers,* Vol. 9,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3, pp. 99–109.

85〈胡錦濤建議上海合作組織以安全與經濟為重點〉，《新華社》，2004年6月17日。

86〈上海合作組織五周年宣言〉，上海合作組織網站，2006年6月15日。

87 2006和2008年在北京與中共學者訪談；亦請參見John C.K. Daly, "Sino-Russian Split at Regional Summit," *Asia Times Online*, November 15, 2007.

88 "Washington Draws India in Against China," *People's Daily Online,* English ed., July 7, 2005 (originally in *Global Times,* July 1, 2005, in Chinese).

89 John W. Garver, "China's South Asian Interests and Policies," testimony before the U.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on "China's Growing Global Influence: Objectives and Strategies," Washington, D.C., July 21–22, 2005.

90 Garver, 2005; Waheguru Pal Singh Sidhu and Jing-Dong Yuan, *China and India: Cooperation or Conflict*, Boulder, Colo.: Lynne Reinner Publishers, 2003.

91 2005年在北京與中共學者進行訪談。

92 儘管這是目前中共與南亞最大的貿易額，但與中共和日本、南亞、東協和美國的貿易額相比就遜色許多。有趣的是，由於進口大量天然資源和工業產品，2003年中共

對印度有10億美元的貿易赤字。

93 Jagannath P. Panda, "The Impact of Sino-India Army Exercise on Bilateral Relations," *China Brief*,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Vol. 7, No. 15, July 2007, pp. 7–10.

94 特別的是，溫家寶表示：「中國一再強調，我們相當重視印度在國際事務的重要角色。印度是非常受歡迎的國家，也是非常重要的發展中國家。我們完全理解和支持印度在國際事務，包括在聯合國扮演更大角色的期望。」 "China Non-Committal on Backing India at UNSC," *Press Trust of India*, April 12, 2005; 以及2006年在北京與中共外交官員進行訪談。

95 這種競爭的最近案例，是中共和印度能源公司競相出價購買控制哈薩克大量油田的加拿大公司—哈薩克石油公司。Keith Bradsher, "China and India Vie for Company with Oil Fields in Kazakhstan" *New York Times*, August 16, 2005; and Tsui and Guerrera, 2005. 中共和印度亦在非洲競爭獲取石油供應。

96 關於這項看法的經典案例，請參見Van Ness, 1970.

97 迄2009年6月為止，中華民國23個邦交國有16個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這16個國家包括貝里斯(1989年)、多明尼加(1957年)、薩爾瓦多(1961年)、瓜地馬拉(1960年)、海地(1956年)、宏都拉斯(1965年)、尼加拉瓜(1990年)、巴拿馬(1954年)、巴拉圭(1957年)、聖克里斯多福維尼斯(1983年)、聖露西亞(1984-1997年、2007年)、聖文森暨格瑞納汀(1981年)、布幾納法索(1994年)、甘比亞(1995年)、聖多美普林西比(1981年)和史瓦濟蘭(1968年)。

98 中共的非洲關係，請參見Chris Alden, *China in Africa*, London, UK: Zed Books, 2007; 以及Princeton Lyman與David H. Shinn於2005年7月21日針對「中共增長的角色：目標和影響」的議題，在美「中」經濟安全審議委員會分別發表"China Rising Role in Africa"及"China's Approach to East, North and the Horn of Africa"兩篇證詞。

99 Dumbaugh, 2008, p. 119.

100 Dumbaugh, 2008, p. 121.

101 Dumbaugh, 2008, pp. 124–125.

102 Thomas J. Christensen,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and James Swan,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African Affairs, statement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African Affairs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on "China in Africa: Implications for U.S. Foreign Policy," June 5, 2008.

103 Christensen and Swan, 2008.

104《200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北京，中國：中共商業部，2008年9月27日，第60-65頁。

105 Christensen and Swan, 2008.

106 這個部分提到的中共對非投資模式，資料引自Vivien Foster, William Butterfield, Chuan Chen, and Nataliya Pushak, *Building Bridges: China's Growing Role as Infrastructure Financier for Africa*,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08.

107 Christensen and Swan, 2008.

108 Foster et al., 2008, p. x.

109 Lyman, 2005.

110 Foster et al., 2008, p. vii.

111 Glaser, 2007, pp. 2–5.

112 Report of an Independent Task Force, *More Than Humanitarianism: A Strategic U.S. Approach Toward Africa*,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ovember 2005, pp. 39–52.

113 Dumbaugh, 2008, pp. 20–21.

114 這些資料引自IMF's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2004. 亦請參見Claudio Loser, "China's Rising Economic Presence in Latin America,"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on "China's Growing Global Role: Objectives and Influence," July 21, 2005.

115 Dumbaugh, 2008, pp. 22–23.

116 拉丁美洲和中華民國擁有官方關係的國家包括一個南美國家(巴拉圭)，六個中美國家(貝里斯、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巴拿馬)，以及六個加勒比海國家(多明尼加、海地、聖露西亞、聖克里斯多福維尼斯、聖文森、格瑞納汀)，這些資料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

117 非洲和中華民國有官方關係的國家有四個：布幾納法索(1994年)、甘比亞(1995年)、聖多美普林西比(1997年)和史瓦濟蘭(1968年)。這些資料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

118 例如，中共六年內援助多米尼克1.22億美金，勝過中華民國對這個小國每年提供的900萬美金。Kerry Dumbaugh and Mark P. Sullivan, *China's Growing Interest in Latin*

Americ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April 2005.

119 Dumbaugh, 2008, pp. 16–30; William Ratliff, "The Global Context of a Chinese 'Threat' in Latin America," Miami, Fla.: China-Latin American Task Force, Center for Hemispheric Policy, University of Miami, June 2006b; William Ratliff, "Pragmatism over Ideology: China's Relations with Venezuela," *China Brief*,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Vol. 6, No. 6, March 15, 2006a, pp. 3–5; Amaury de Souza, "Brazil and China: An Uneasy Partnership," Miami, Fla.: China-Latin American Task Force, Center for Hemispheric Policy, University of Miami, June 2006; and Cynthia A. Watson,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on "China's Growing Global Role: Objectives and Influence," July 21, 2005.

120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rum: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December 11, 2003; 2000年10月舉行第一次部長會議，2003年12月於衣索比亞的阿迪斯阿貝巴舉行第二次。

121 Report of an Independent Task Force, 2005, pp. 39–52.

122 美洲國家發展銀行目前擁有35個會員國和60個永久觀察員。中共成為觀察員的決議受到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智利、哥倫比亞、秘魯、烏拉圭和委內瑞拉支持。"OAS Accepts China as Permanent Observer," *People's Daily Online,* English ed., May 4, 2004; on the IADB, see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Sign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Possible Admission to Membership into the IDB," news release, March 18, 2007.

123 中共中東關係的著作很少。最新的全面研究請參見John Alterman and John Garver, *The Vital Triangle: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7. Also see Geoffrey Kemp, "The East Moves West," *National Interest,* No. 84, September 2006, p. 75; and Lillian Craig Harris, "Myth and Reality 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Middle East,"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1994, pp. 322–347.

124 有趣的是，中共從1980年代開始從以色列進口武器，但以色列和中共直到1992年才正式建立外交關係。關於中共—以色列的軍備關係，請參見Yitzak Shichor, "Israel's Military Transfers to China and Taiwan," *Survival*, Vol. 40, No. 1, Spring 1998, pp. 68–91.

125 John W. Garver, *China and Iran: Ancient Partners in a Post-Imperial World*, Seattle, Wash.: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7, pp. 136–230; Evan S. Medeiros, *Reluctant Restrain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Nonprolifera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 1980–2004*,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97–174.

126 John Calabrese, "The Risks and Rewards of China's Deepening Ties with the Middle East," *China Brief*,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Vol. 5, No. 12, May 24, 2005. 更多的軍售資訊，請見Evan S. Medeiros and Bates Gill, *Chinese Arms Exports: Policy, Players, and Process*,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2000; and Yitzhak Shichor, "Decisionmaking in Triplicate: China and the Three Iraqi Wars," in Andrew Scobell and Larry M. Wortzel, eds., *Chinese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making Under Stress*,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5.

127 Garver, 2007.

128 Medeiros, 2007, pp. 131–174.

129 白潔、曹嘉，〈中國中東特使孫必幹：希望巴方加強內部團結〉，《新華社》，2007年8月2日，作者採用公開資料中心(OSC)翻譯版本。

130 "Commander Highlights Chinese Peacekeeping Force Role in Lebanon," *China Daily*, October 2, 2006.

131 "China Agrees to Cancel Iraqi Debt," *China Daily*, June 21, 2007.

132 Mao Yufeng, "Beijing's Two-Pronged Iraq Policy," *China Brief*,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Vol. 5, No. 12, May 14, 2005.

133 Tian Chunrong, 2007, pp. 14–21.

134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orld Energy Outlook 2006,* Paris, Franc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06, p. 101.

135 美國能源資訊管理局(The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推測，2030年中共石油進口將有53%來自石油出口國組織(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 2006*, June 2006, p. 34.

136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2005, p. 135.

137 Tian Chunrong, 2007, p. 16.

138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2000, p. 164;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5, p. 135.

139 "Egypt Seeks Stronger Trade Ties with China," *Asia Pulse*, September 11, 2006.

140 沙烏地阿拉伯不允許外國公司投資上游(探勘和生產)石油部門，但允許投資上游天然氣部門。伊朗允許投資，但不允許外國公司擁有相同股份。感謝鄧麗嘉(Erica Downs)提供這項資訊。

141 這項交易原本價值700億美元(後來變成1,000億美元)，因為中國石化起初答應未來25年將購買2.5億噸液化天然氣，後來天然氣購買價格預估將由700億美元大幅提高至1,000億美元。雅達瓦蘭大油田和天然氣購買亦從此脫勾。Steven Weisman, "Politeness of China Talks Can't Disguise the Discord,"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5, 2007.

142 Kemp, 2006, p. 75; and Don Lee, "China Barrels Ahead in Oil Market," *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14, 2004.

143 Li Shaoxian and Tang Zhichao,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ish ed., Vol. 17,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7, pp. 22–31;《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2003-2004》，2004年，第20-41頁；和《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2004-2005》，2005年，第21-42、223-241頁。

144 Li Shaoxian and Tang Zhichao, 2007, pp. 22–31; 華黎明，〈伊朗核問題與中國外交的選擇〉，《國際問題研究》，2007年第1期，第58-62頁；《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2003-2004》，2004年，第20-41頁；和《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2004-2005》，2005年，第21-42、223-241頁；2007年在北京和中共學者進行訪談。

145 例如，中共政策制定者逐漸體認到伊朗持有核武的危險性。華黎明，2007年，第58-62頁。

146 比較2000年和2002年中共國防白皮書可以明顯發現這種轉變。

147 最新的官方外交用語，請參見楊潔篪，2008年。

148 2005年在北京和上海與中共學者官員進行訪談。中共官方評論不斷強調和平、發展及「合作」是中共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則。2006年8月，重要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便重申這三個主題。〈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進建設和諧世界〉，2006年；以及〈北京舉辦中央外事工作會議〉，2006年。

更早之前的談話，請參見李肇星，〈和平、發展、合作：新時期中國外交的旗幟〉，2005年8月22日；中共外交部，〈外交部長李肇星在聯合國大會發表談話〉，第59屆

聯合國大會，2004年9月28日。

149 胡錦濤，《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聯合國60周年全體會議上發表演講，紐約，美國，2005年9月22日。

150 Samuel S. Kim (金淳基),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berg,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pp. 42–89.

151 楊潔篪，2008年；關於以往的其他描述，請參見李肇星，《2006年國際形勢和中國外交工作》，《求是》(網路版)，2007年1月；和李肇星，《為人民服務的新中國外交》，《求是》(網路版)，2004年10月。

152 2008年溫家寶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講，提到中共是「負責任的重要發展中國家。」

153 2005年在北京和上海與中共學者官員進行訪談。

154 Bates Gill and Chin-hao Huang, "China's Expanding Presence i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Roy Kamphausen, David Lai, and Andrew Scobell, eds., *PLA Missions Other Than Taiwan,*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April 2009, pp. 99–126.

155 Gill and Chin-hao Huang, 2009.

156 這些中共官方數據取自《2006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

157 Sally Morphet, "China as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October 1971–December 1999," *Security Dialogue*, Vol. 31, No 2, 2000, pp. 151–166.

158 Gill and Chin-hao Huang, 2009.

159 2005年4月在紐約和美國駐聯合國使團外交官員進行訪談。

160 James Traub, "The World According to China,"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3, 2006, pp. 24–29.

161 和參與聯合國安理會事務的美國官員進行訪談後，得知這些中共政策制定資料，紐約，2005年4月。中共從來不會單獨投下棄權票，而是聯合至少兩個國家。聯合國安理會1556號決議案，中共和巴基斯坦聯合棄權；1564號決議案，俄羅斯、阿爾及利亞、中共和巴基斯坦聯合棄權；聯合國安理會1590號決議案，沒有國家棄權；聯合國安理會1591號決議案，俄羅斯、阿爾及利亞和中共聯合棄權；聯合國安理會1593號決議案，阿爾及利亞、美國、巴西和中共聯合棄權。亦請參見Traub, 2006.

162 Christensen and Swan, 2008.

163 2005年在北京和上海、2006年在華府，與中共國際關係學者和分析家進行訪談。

164 王猛，〈達富爾危機：中國外交轉型的挑戰與契機〉，《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6期；2007年和2008年與中共學者進行訪談。

165 作者感謝鄧麗嘉(Erica Downs)提供後項觀點的資料。

166 相對之下，1972到2006年，美國使用了50次否決權(並不包括針對相同議題多次提出的多次決議案)。

167 2005年在紐約與美國駐聯合國使團官員進行訪談。

168 關於後者的描述，請參見Traub, 2006.

169 在緬甸決議案中，中共、俄羅斯、南非投下反對票；剛果共和國、印尼和卡達棄權。"Russia, China Veto Resolution on Burma Security Council Action Blocks U.S. Human Rights Effort,"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3, 2007, p. A12.
在辛巴威決議案中，中共、俄羅斯、南非、利比亞和越南投票反對；印尼投棄。Colum Lynch, "U.N. Zimbabwe Measure Vetoed by Russia, China," *Washington Post*, July 12, 2008, p. A09.

170 2007和2008年在華府與美國外交官員進行訪談，並且評估2004年以來，中共與俄羅斯在聯合國安理會的投票模式後，得出這項分析內容。U.S. Department of State, *Voting Practices at the United Nations*, various years.

171 Christensen, 2008.

172 Medeiros, 2007, pp. 205–209.

173 中共對禁止擴散的看法產生改變，請參見Medeiros, 2007, pp. 89–96.亦請參見Patricia McNerney, Principal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Nonproliferation,在美「中」經濟安全審議委員會針對「中共的禁止擴散實踐」做出證詞，2008年5月20日。

174 Merav Data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540: WMD and Non-state Trafficking," *Disarmament Diplomacy,* No. 79, April/May 2005.

第七章
中共外交挑戰

北京要達成五項外交政策目標將會面臨諸多挑戰。這些挑戰部分源自國內情勢對政府效能所造成的限制，另一部分則源自外界對中共國力增長所產生的反應。中共處理這些挑戰的能力，將是其外交力量和影響力的重要指標。

內部情勢轉變和外交政策決定

檢視中共國際行為演變必須考慮到一個重點：中共經濟和社會正經歷深遠的改變，甚而其政治事務亦有部分程度的轉變。經濟、社會和政治在結構與功能上的轉變，影響了中共外交政策本質和相關決策過程。這些國內變動對中共國際行為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力，而且未來只會愈來愈強。

中共外交政策與國內社會、經濟和政治轉型的連動關係，難以具體說明和量化，但這些連動關係卻又不斷呈現世人面前。法人利益團體和民族主義者的觀感(例如國營石油公司和反日民族主義團體)影響外交政策制定，便是最新的例子。[1] 鑑於共產黨缺乏穩定的統治正當性，中共領導人從事外交政策時，再也無法忽略利益團體(存在於共產黨內外)和公眾意見。公眾觀感可以且已經對中共領導

人的外交政策決定產生限制，特別是在具有爭議性的外交政策問題上，中共高層經常把公眾意見當成工具，在「集體領導」中爭奪權力。數十年來，此種為了狹隘的政治利益而存在共黨內部的政策機會主義，一直是中共領導高層之間的常態——而此種情況將會更加劇烈，因為沒有一個中共領導人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2]

值此社會和經濟迅速轉變之際，中共政策制定者面臨的相關挑戰，是如何精確評估外交決策，可能要付出何種內部代價和取得何種利益。隨著中共經濟改革持續演進，以及中共工業和社會變得更加多元，中共決策者進而更加難以在政策的利弊得失之間加以評估。中共決策者通常無法察覺內部究竟有多少利害關係人(在特殊外交政策議題上存在哪些看法)，亦不知道他們擁有多少利害關係，因為這種利害關係不斷在改變。根據和中共決策者及學者的訪談資料，這種情勢使胡錦濤的外交決策過程變得更加複雜，導致胡錦濤必須在各種外交相關決策上，努力增進跨部門協調，包括中央和省級政府之間。[3]

因此，接下來幾年中共國內情勢轉變的範圍和速度，將會持續形成讓外國觀察家感到中共外交決策者的行為似乎不太協調、不太合理和無法預測，甚或是相當不穩定的情況。2003至2006年這段期間，中共瘋狂地在全球各地尋找石油供應，便是這種現象的最新例子。[4]

這些觀察凸顯中共追求國際利益，有其一般和持續增加的限制。對研究中共的國外分析家而言，這項觀察使其能夠更加瞭解國內決策背景的重要性，據以對中共外交政策動機加以分析判斷，進而評估中共國際行為的未來趨勢。

浮現的挑戰

北京希望有效追求外交利益將會面臨諸多其他挑戰。第一，中共領導人可能面臨其他國家對中共更高的期望，即便這種情況尚未發生。中共過去受益於國際社會對其國際行為期望很低(例如回應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但現在國際社會逐漸希望中共能夠參與全球經濟和安全事務，並且做出更多貢獻。

隨著中共的全球影響力逐漸增加，以及北京持續將自己定位為亞洲經濟和安全事務的重要角色之時，中共的周邊國家和國際社會將對北京有更多期望，特別是在中共宣稱自己是「和平崛起」的「負責任大國」之時。中共過去受益於外界對其國際行為的期待相對較低，但現在鐘擺已經擺盪到另一個方向。

目前並不清楚中共是否有持續滿足此等期望的意願和能量，抑或中共的想法能與周邊國家相符。許多亞洲領導人懷疑中共能否真正以和平的方式「崛起」。中共的區域安全角色在一些東亞國家之間引發恐懼，而中共正在進行的軍事現代化可能會加深這項憂慮。[5] 中共是否願意為區域提供「公共財」，或是決定付出代價協助維持區域穩定？隨著亞洲和其他地區的穩定逐漸與中共利害相關，中共可能會做出這項投資。但是，中共領導人界定國家利益之時，鮮少願意犧牲短期利益，換取區域穩定帶來的中長期利益。一方面，中共增加發展和人道援助，象徵北京渴望做出此種貢獻。除了亞洲地區之外，2008年中共在亞丁灣部署三艘軍艦，致力國際打擊海盜，便是中共試圖表現出「負責任」的態度，並對全球安全做出

貢獻的明顯案例。另一方面，一些中共國營公司的商業行為，已經引起區域國家關切，認為中共變得更為自利，鮮少支持區域發展，特別是在非洲地區。

和上述限制有關的是，各界對中共能否崛起成為值得信任的大國存有疑慮之處在於，中共諸多(且持續增加的)貿易和安全承諾到底有多少誠信？這將是各國檢視中共意圖的重要指標。從北京過去在履行國際貿易、禁止擴散和人權問題的承諾時，如此良莠不齊的表現可知，這將是中共需要處理的問題。[6] 中共對某些貿易承諾上的解讀，已經和東協國家以及非洲經濟夥伴產生一些摩擦。[7] 如果這些國家開始質疑中共的信用，並在最後質疑起中共的意圖，中共與這些國家的關係將可能受到損害。

第二，中共處理台灣問題的方法將使得北京的形象更趨複雜。相較於其他國家，北京不時在台灣議題上採取對抗且激進的手段，顯示中共雖然致力表現得溫和良善，但仍然相當有限。儘管和過去相比，這種行為出現的頻率已經少了許多，最近十年仍有許多明顯的例子。2004年李顯龍即將接任新加坡總理，中共官員在他考慮決定訪台時公然放話撻伐，並在訪台之後給予嚴厲的指責。中共隨後停止所有與新加坡的高層對話達兩年之久。2005年3月，中共外交官員公然要求澳洲政府迴避涉入台海軍事衝突，儘管坎培拉在美澳紐安全條約中，對華府有所承諾。中共於2005年春天通過反分裂法，造成許多歐洲國家決定延遲取消1989年對中共實施的武器禁運。2006年春天，中共當時駐南韓大使寧賦魁公開建議南韓官員，限制駐韓美軍在防禦南韓方面的角色，同時不允許運用駐韓美軍處理區域偶發事件(例如台灣)。中共這項舉動觸動了南韓的敏感神

經，認為中共企圖干涉其聯盟政治，引發南韓內部開始辯論是否應該減少對中共的經濟依賴。[8]

北京這種行動和發言，顯示中共並非良性「崛起」，也讓各國不斷感受到中共運用強制外交的意圖。最後，中共任何以武力(有限或大規模武力)處理台灣問題的企圖，都會拉高潛存的疑慮，認為中共在區域事務影響力上升，將會威脅他們的安全利益，特別是那些歷經中共干涉和壓迫歷史的東南亞國家。

第三，中共棘手的政府管理問題，直接或間接造成外界對其產生負面觀感。[9] 中共最嚴重的政府管理問題——例如體制腐敗、中央和地方愈發緊張的關係、環境控制能力薄弱、醫療體系不健全、民族主義高漲——都阻礙北京在規模不斷擴大的經濟和黨國官僚機構中，控管各方問題的能力。這些缺點不但會制約政府有效管理內部問題的能力，同時也可能會禍延鄰國。中國大陸東南部發生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蔓延期間，北京在初期無法當機立斷控制疫情及後續草率的因應措施，引發東南亞各國政府質疑中共在公共衛生危機和環境問題上疏忽大意，可能會威脅他們的經濟情勢。2005年底，中共政府就無法迅速處理東北松花江的化學汙染，造成汙水流向俄國。中共充斥腐敗問題、中央和地方關係緊張，以及政府控制某些問題的能力普遍尚未發展成熟，造成各國相當擔憂中共無法履行各種承諾的能力。

第四項挑戰源自中共國安決策體系的弱點，特別是與危機處理有關的決策過程。中共過度保密，以及文官、情報和軍事單位各自為政的決策架構，缺乏文官和軍事組織協調機制，都對官僚體系進行國安決策造成阻礙。[10] 這種缺失的明顯案例，包括中共在

SARS事件期間，反應遲緩且毫無章法；共軍刻意誇大2001年4月所發生的EP-3偵察機碰撞事件，以及2007年1月發射直升式反衛星武器試驗時，官方回應緩慢且僅做含糊的解釋。隨著共軍的能力增進，並且在中共領土周邊以外從事軍事活動，例如引起各國質疑中共區域野心的潛艦巡航時，這些限制可能就會變成更加嚴重的問題。

第五項挑戰是中共沒有充分的國家資源可資掌握與調動，使其能在東亞扮演更積極的角色——特別是和美國及其盟國的資源相比。儘管其外交工具逐漸增加，但中共追求外交議程時，可資運用的國家資源仍然有限。2005年初發生東南亞海嘯時，中共對受難者的捐助相對較少，便是這種限制最明顯的例子。中共提供價值8,300萬美元的財政和物資援助。儘管這是中共有史以來付出最大金額的人道援助，但和美國、澳洲和日本花費數億美元從事救難行動相比，中共便顯得黯然失色。此外，美國部隊及其亞洲盟國(主要是印度和日本)載運援助物資的聯合軍事後勤能力，亦遠遠勝過中共。

第六，當中共「走出去」進行海外投資和購買天然資源，發展中國家可能會認為中共榨取經濟資源，卻對他們的國家發展毫無貢獻，這是北京所冒的風險。由於許多中共公司的海外運作模式，是為當地基礎建設計畫引進中國大陸勞工和商品，中共可能會逐漸面臨此種特別挑戰。在諸多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這種觀感已經逐漸浮現。[11] 對中共的這種觀點如果持續發展下去，將有損中共國際行為的核心特徵：定位自己要跟發展中國家站在一起，長期反對剝削資源的「新殖民主義」行為。

中共領導人的最後一項外交挑戰，是民族主義者的觀感限制了他們的外交政策選擇。儘管中共領導人過去經常把民族主義者的觀感當成工具，為政策制定塑造有利的國內環境，但他們亦面臨民族主義頑強難以操控的限制。特別是中國大陸反日情緒高漲，已約束中共決策者在「中」日關係上尋求更為平衡的政策——對北京的經濟和安全利益而言，格外需要和東京維持穩定友好關係。中共與日本、美國或者其他國家的雙邊關係發生危機期間，民族主義者的抗議舉動，已經且將持續減損政府降低情勢和達成解決方案的能力。

當然，中共領導人似乎已經體認到這項限制，因此相當重視管理公眾意見。最近幾年外交部和共產黨外事工作聲明，不斷提到外交「以人為本」和「統籌國內國際局勢」的重要性，兩者都提到在關鍵外交政策決定上應避免公眾反對，其中包括廣納建言等。[12]

註釋

1 有關法人團體的利益在能源政策上扮演一定角色的案例，請參見Erica Downs, "Business Interest Groups in Chinese Politics: The Case of the Oil Companies," in Cheng Li, ed., *China's Changing Political Landscap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pp. 121–141; Trevor Houser, "The Roots of Oil Investment Abroad," *Asia Policy,* No. 5, January 2008, pp. 141–166. 商業利益在禁止擴散事務上扮演的角色，請參見Medeiros, 2007.

有關內部政治在中共對日政策上扮演的角色，請參見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Six, 2007, pp. 140–180; and, generally, Gries, 2004; Downs, 2004.

有關中共公眾意見和外交政策的整體關係，請參見Joseph Fewsmith and Stanley Rosen, "The Domestic Contex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oes Public Opinion Matter?" 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51–190.

2 探討國內政治和外交政策之間連動關係的經典著作是Michael Swaine, *China: Domestic Change and Foreign Policy*,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MR-604-OSD, 1995; 有關中共內部政治生態的改變，請見Joseph Fewsmith, *Elite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2001; and Kenneth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2nd ed.,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 December 2003. On policy opportunism 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see 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8.

3 2008年在北京和上海與中共決策者和分析家進行訪談；關於胡錦濤針對外交政策努力增進政府內部協調，請參見Glaser, 2007.

4 Downs, 2008.

5 Bates Gill, Michael Green, Kiyoto Tsuji, and William Watts, *Strategic Views on Asian Regionalism: Survey Results and Analysi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February 2009, pp. 4–7.

6 有關中共在履行世界貿易組織承諾，以及在履行禁止核子和飛彈擴散議題承諾各項良莠不齊的紀錄，詳細記載於中共外交政策文件的談話；另外Economy and

Oksenberg, 1999諸多章節亦有談論。

7 Liebman, 2005.

8 Medeiros et al., 2008, pp. 70–71.

9 Shirk, 2007以此為關鍵主題。

10 中共決策危機的弱點詳細討論於Michael D. Swaine, Zhang Tuosheng, and Danielle F.S. Cohen, *Managing Sino-American Crises: Case Studies and Analysis*,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6.

11 Jorge I. Dominguez, *China's Relations with Latin America: Shared Gains, Asymmetric Hopes*, China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ialogue, June 2006. 對非洲進行剝削的觀點，請見Alden and Rothman, 2008.

12 楊潔篪，2008年；〈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進和諧世界建設〉，2006年；以及〈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2006年。

第八章
結 論

當前中共國內情勢顯然已經延伸至其國際行為。中共開始有效運用過去力有未逮的外交工具，並涉入以往利益無足輕重的議題和區域。毫無疑問，中共已經成為利益和影響力超越亞洲地區的全球「行為者」。其與各個國家、國際機構，以及世界脈動，處於交互形塑的狀態。中共目前還不能稱得上是全球「強權」，但根據各界的觀察，其成為全球強權可謂指日可待。等到這天真的來臨，屆時「全球強權」在概念和意義上，可能不會像冷戰結束後的美國一樣，在國際體系占據支配地位。

正如這份研究報告所指出，中共積極參與全球事務，顯然是受到一套截然不同的觀點、目標和政策所驅動──有些存在已久，有些則是近期才出現。中共已經擁有一套外交戰略，依照每個國家的情況加以執行。中共領導人長久以來所秉持的目標，是增進國家發展、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及確保中共獲致受到敬重的大國地位。為了達成這樣的目標，中共決策者精心制定了一套外交政策，希望達成五項「特定實質目標」：經濟成長和發展、安全保證、對抗遏制、資源多樣化、壓縮中華民國的國際空間。截至2009年夏天，中共傳統及新近目標，始終驅動其國際行為。

中共領導人持續透過國內事務的各個面向推展他們的外交政策和外交關係：外交政策如何協助日趨複雜的國內經濟和社會發展任務。然而，這並不代表中共是個封閉的國家，不理會外界或是中共領導人將外國事務擺在次要位置，因為中共國際行為根本無法在此種狀況下進一步獲得實質的推展。最近十年，中共國內和國際事務的聯結關係變得更加緊密，而且已經成為新的面向；但也正是這種聯結關係，對中共的外部行為持續產生顯著影響。

此種內外交互的聯結關係已經從被動轉為主動思考邏輯，因為國內成長和穩定需要積極的外交政策。對中共而言，地方性的行動如今必須以全球為著眼。中共外交政策不再像鄧小平於30年前提出的，僅是為了持續改革而創造安全穩定的外部環境。現在中共必須在外交政策上投入更多心力，才能解決中共最為迫切的發展挑戰：中共必須展開外交工作以取得市場、投資、科技和資源──這些都是持續成長不可或缺的。毫無疑問，不只是在改革的前20年，中共的國內需求迄今仍是其外部行為的動力和限制。

中共決策者普遍接受這種外交政策邏輯，而且可能會一直持續下去，但是更精確的說法是中共的國際目標會不斷演進。假使中共國內和國外事務的聯結關係沒有產生重大中斷，中共長久以來的外交目標(例如主權和領土完整)或是其較新的目標(例如全安保證和對抗遏制)近期之內不太可能改變。中共目前和下一代領導人在共產黨內部存有共識，認為應該優先增強綜合國力以促進國家復興；他們亦瞭解國內事務如何驅動外交政策。

換言之，隨著新的責任與負擔加諸在中共的全球交往之中，其利益和目標便會逐漸產生演進，特別是中東和拉丁美洲這種過去數

十年來，在中共外交政策計算中視為邊緣的地區。但是對於其外交政策而言，這些新的利益和責任仍無法跳脫以國內為主的思考邏輯範疇。例如，中共瞭解自身需要承擔新的責任，卻因為缺乏成功施展的專業知識，以及害怕會冒險消耗國內發展資源而裹足不前。

中共國際行為改變的本質在演進過程中，進一步反映出脫離原本所堅持的傳統外交原則，例如不介入其他國家的國內事務。中共新的觀點和利益已經促使其堅持的原則逐漸產生轉變——或者以中共說法是給予「彈性解釋」。中共已經在影響其經濟、安全利益和名聲的區域議題上採取這種管理模式(例如蘇丹達夫人道危機和緬甸政治動盪)。隨著中共在諸如非洲和東南亞等地區的勢力逐漸增加，中共變得更加能夠運用影響力進行改變，並開始理解在這些地區促進政治穩定和減少暴力的價值。美國、非洲國家和非政府組織以譴責方式給予外部壓力，亦催化中共進行這些修正。最後，中共領導人選擇在這些區域危機上，協助維持穩定和管理。

對區域和全球穩定的意涵

這份研究發現中共的國際行為對區域和全球穩定有三種意涵。第一，中共已經大規模在當今國際體系運作，俾達成外交政策目標。中共並未試圖破壞或大幅修改目前國際經濟和安全事務的集體規則、規範和制度。確切而言，應該說中共是想要對其進行控管，俾推進其國際利益——這個方式對北京當局而言，已經證明相當有效。

基本上，中共外交政策相當重視運用其經濟和深入參與多邊

機構──全球性和區域性──的規模、吸引力和期望，俾擴大中共的影響力和地位、增加經濟成長管道，並減少中共行動自由的限制。當中共深入參與某些區域和多邊機構時，希望能以有利於中共目標的方式形塑這些機構。中共在創立東協高峰會和上海合作組織的角色，以及努力阻止聯合國安理會擴大，便是中共運用多邊組織推進其特定目標的明顯例子。

中共已經成功以不迫切挑釁或威脅東亞和東亞以外國家的方式實施這種外交工作。[1] 持平而論，中共已經有效向許多亞洲國家進行安全保證，先期預防發展出尋求抗衡中共勢力的區域聯盟。從最近十年開始，中共的戰略已使其和美國外交政策形成特殊對比，因為美國外交政策對許多國家而言，顯得較為單邊、壓迫和軍事導向。許多國家感到小布希政府漠視國際制度且偏好軍事武力，反而使得中共相較於美國顯得更加致力於合作，且更具預測性。

迄今為止，中共形塑國際制度的作為相當有限且鬆散。中共逐漸接受國際規則的例子，多於抗拒並試圖修正(且成功)。中共在全球已經做出諸多貿易和禁止擴散的承諾，儘管遵守承諾的紀錄不一。甚至在東亞這個中共戰略周邊，當面臨區域國家反對成立由中共主導的多邊組織時，中共亦選擇退讓(例如東亞高峰會)。在東南亞，北京直到目前都顯得願意接受化解衝突的區域規範，並承諾和平解決海洋領土爭議。儘管針對這些領土爭議的最終行為尚不明確(包括一些挑釁活動)，中共的初期承諾仍是為了顧全安全保證，而在某種程度展現自制的重要指標。

中共形塑其他國家政策取向的作為亦同樣有限，只著重在中共特別敏感的議題，例如台灣和西藏問題。在這些例子中，只要目

標國家順著中共，通常付出的代價很低，得到的利益卻相當龐大。因此，少有國家願意做出付出重大代價的決定(為了他們的國家利益)回應中共的政策干涉。中共已經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之間相當有效地提升其地位；這些區域國家現在亦更加意識到中共的看法和利益。但是中共真正影響其他國家行為的例子仍然相當有限和鬆散。儘管中共的存在，以及和世界各國與國際機構的互動增加，中共卻很少成功運用外交手段改變其他國家的行為。

當然，中共對當前國際體系的一些特性並不滿意。其無法接受台灣所維持的現狀；防止這個島嶼進行「法理」獨立從中國大陸分離出去，仍然是國家安全的最高優先政策。然而，中共在此議題上的政策無法清楚顯示中共對區域抱持何種期待，例如那些與領土獲得有關的問題。中共解決陸地邊境的諸多領土爭議，以及最近十年來處理海洋爭議的方式，便成為中共如何看待領土取得這項議題，更加具體的觀察指標。因此，儘管中共尋求最終統一台灣，這個目標並不代表中共視領土擴張為完成國家復興，躋身強權的途徑。中共在海洋領土議題上的各項行為也值得持續關注，特別是南海問題。

此外，中共亦不滿美國在全球享有支配性的權力地位，因為中共認為美國企圖運用外交、經濟和軍事力量推廣自由市場的民主發展模式。小布希政府的民主推廣議程特別受到中共領導人關切，伊拉克戰爭和中亞的「顏色革命」則增加這種憂慮。美國後面這個方式使中共開始提防美國權力，害怕這種情形會指向中共。這個方式亦接著促使中共致力與其他國家合作，特別是俄國，以遏制美國向全球和亞洲推進。

多樣化

中共追求多樣化的國際戰略，部分是基於環境因素使然，部分則是出自刻意規畫；其手段則是透過同時擴大追求經濟繁榮、安全和地位的資源。

中共正運用外交政策擴大市場、投資、科技和資源的獲取管道——對經濟成長和現代化至為關鍵的來源。改革開放初期，中共經濟成長的外來資源，主要仰賴少數幾個大規模工業經濟體，例如美國、日本和西歐國家的貿易和投資。中共領導人在最近十年已然瞭解到，要持續維持適當高度的經濟成長，唯一方式便是更積極走向海外尋找新的市場、投資、科技和資源。中共和東亞國家廣泛進行經濟整合，同時也和非洲、拉丁美洲、中東的關係日趨緊密，便符合這個趨勢走向；在全球經濟衰退之際，擴大和後面三個地區的貿易關係，成為中共維持出口市場的關鍵。這讓中共得以減少依賴單一或甚至少數幾個經濟強權，例如美國。中共亦運用這種經濟關係產生政治影響力——例如創造對中共的依賴感——讓北京得以用來追求其他外交優先事項，例如使其他國家更重視中共的政策取向和利益。

中共亦藉由和幾個權力中心發展新關係和擴大現存關係，使其安全資源的來源變得更加多樣化。其藉由和已發展及發展中國家，以及像東協、歐盟和波灣合作理事會這種重要區域集團成立「戰略夥伴」和「戰略對話」，提升雙邊關係。事實上，中共已經參與世界各個地區的多邊機構，甚至還有一些創設區域性多邊機構的案例。其運用這些機構向其他國家再度保證自身的意圖，展現中

共崛起後的益處，最後擴大政治影響力——通常跟市場和資源的獲取管道有關。這種安全資源多樣化自然形成的結果，是中共不必那麼需要在安全問題上，仰賴和少數幾個強權維持穩定的正面關係，例如美國。藉由推行安全多樣化進程，中共目前已經產生影響力，避免其他國家的遏制，並且藉由各種不同來源獲得更大的操作能力。

最後，中共正努力使其國際地位和合法性來源變得更多樣化。數十年來，中共國際地位相當仰賴原始的衡量基準：龐大的領土和人口、享有悠久歷史和遺產的亞洲強權、身為聯合國安理會成員，以及擁有核子武器。現在，中共已經轉向強調近30年來的經濟成就，並展現與其他國家分享的意願。中共領導人也慢慢地重新定義他們的外在形象：他們對國際事務的看法，已經從和「霸權及強權政治」進行「鬥爭」，轉向強調「和平、發展與合作」以及「建立和諧世界」這種更為正面的看法。中共仍然是主張不干涉別國內政原則(即便已於近年來適度調整觀點)最有影響力的國家之一，這亦是中共在發展中國家間的重要地位標誌。對許多大陸人民而言，主辦2008年北京奧運是努力讓別國接受其為世界強權「俱樂部會員」的重要成就指標。

中共外交轉變

中共的國際行為正處在深刻的轉型狀態。中共的外交政策目標相當明確，而且被廣泛接受，但隨著其經濟、社會和政治產生改變，這些目標亦會逐漸演進。中共的內部事件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容易直接影響中共的對外行為，中共的國內情勢亦不斷產生變化。

中共的外交作為反映出內外需求相互競爭下的平衡措施，這種事情發生的次數和種類將會不斷增加。中共如何處理這種平衡關係，將直接影響其對外行為，不論是對政策產生助力或是因此產生限制。例如，中共在管理上所面對的各種挑戰，一直是有效制定外交決策並予以落實的障礙。

造成此種轉變現象的另一個因素是中共不斷變化的國際身分：對許多國家而言，中共經常在同一時間象徵著許多事物。對國際社會而言，中共兼具發展中和已發展國家身分，同時也是亞洲區域強權和全球角色。中共決策者正在摸索如何運用新的影響力、地位，以及承擔責任的方式。中共何時應該扮演領導角色，何時應該跟隨其他國家的行動？他們仍不斷在測試自身能力的效能和限制。儘管中共決策人士心中存有明確的外交政策目標，但他們在追求目標時亦會做出調整，以因應國內需求、內部限制、外部反應和國際安全環境動態的威脅和即將浮現的機會。這個轉變過程最終會提供國際社會——包括美國——影響中共行為演進的難得機會，但是這亦造成國際社會很難瞭解中共的利益會如何隨著時間產生演變。

對美國安全利益的意涵

這份研究報告發現中共的國際行為，對美國的全球安全利益、美國的亞洲利益、美「中」關係，以及未來美國對「中」政策具有諸多意涵。

全球挑戰

中共並不希望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超級強權。中共領導人亦不希望中共成為與美國並駕齊驅的全球強權——處於伯仲之間的匹敵競爭者。他們認為中共國內問題的挑戰太大，因此無法承擔與此角色相關的責任，他們亦體認到目前的物資尚不足以向全球投射並維持軍事和經濟力量。他們害怕扮演此種角色可能會過度消耗必要資源，並激起反撲力量。對中共領導人而言，試圖扮演這種角色等同打破鄧小平對於外交事務的正統看法——這是改變重大戰略的主要政治障礙，但並非絕對無法跨越。中共原則上不會修正路線，除非中共的外部安全環境產生劇烈改變——促使中共最高領導人突然決定重新進行全面的評估。此外，假使中共希望成為美國的全球競爭對手，其行為將會出現迥異現狀的表現，如同以下所論述。

中共外交政策並非沒有挑戰美國安全利益的面向。中共一些國際行為的目的，是削弱美國對特定區域和某些機構的影響力。中共外交政策的競爭面向，在亞太區域最為明顯。中共目前並未試圖把美國趕出這個區域。中共領導人體認到這種行為存在危險性且失敗的可能性極高，部分中共領導人亦承認美國的聯盟政策有助區域穩定。但是，中共正試圖增加「相對於美國」的權力和影響力。中共一項核心目標便是破壞美國遏制中共的能力；亦即中共希望尋求最大的行動自由和操作空間，阻止美國限制中共的選擇。中共希望尋求政治影響力，增加美國與其盟邦遏制中共所需付出的代價。

因此，中共試圖藉由減少美國相對的影響力來挑戰美國，但並不希望以逐出美國的方式與其進行正面對抗。如同上述，中共是以

加深和亞洲國家的經濟互動、參與多邊組織形成區域議程、擴大雙邊互動塑造這些國家的政策取向，以及針對中共的意圖和能力向周邊國家進行全面性的安全保證，俾減少美國的相對影響力。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共是以吸引多於對抗的方式──拉攏各國(以便綁住他們)多於要求他們脫離美國或是保持彼此之間的距離。

在中共眼中，即便這是他們最具競爭性的外交政策邏輯，本質仍然是防禦性的。中共希望尋求影響力，避免美國及其盟國聯合限制中共的選擇。例如，中共在亞太地區的行動，是希望創造一個環境，使美國現在和未來都無法遏制中共。儘管中共曾經試圖操作更具攻勢性的選擇，諸如提出區域安全的替代規則，但中共並沒有付諸實踐或追求它們。相對的，中共積極透過經濟外交、多邊互動和雙邊交往創造一個區域安全環境，期使各國不會將中共視為威脅，轉而更加注意中共所帶來的利益，同時也願意在一些議題上配合中共，進而不會串聯抗衡中共權力。對中共而言，這個方式相當成功。

審視未來，中共的主要挑戰是如何在挑戰和對抗美國利益之間維持適切平衡。儘管中共可能認為其行動是防禦性的(亦即不贊成主動針對美國的行為採取破壞行動)，但中共某些政策表現看起來卻好像在跟美國及區域的決策者進行對抗。中共的行動，例如軍事外交行動，可能會讓競爭關係顯得更為直接、劇烈或更加敵對。隨著中共更加積極參與全球事務，美國和中共的利益衝突和重疊之處將會增加。因此，華府和北京的政策挑戰是如何讓後者極大化，同時將前者極小化。迄今為止，華府和北京均設法維持避免負面結果的產生，但仍有更多考驗等著雙方。

美國的中共政策挑戰

對美國利益產生影響的第二個重大意涵，是中共的多樣化戰略正在轉變美國形塑中共行為的能力，而雙邊關係的運作也在發生變化。關係正常化數十年來，北京的優先要務始終是與美國保持穩定而正面的關係，而華府也善用這種看法，引導中共在國際經濟和安全議題上的政策做出改變。中共會接受與貿易投資、軍備管制、禁止擴散，以及區域安全事務的國際規則，美國政策可以說扮演著鼓勵(同時壓迫)的重要角色。後毛澤東時代，中共走向國際化，美國政策當然不是塑造這個進程的唯一因素，但美國經常扮演激盪及加速中共內部辯論的催化角色，包含強化中共內部倡議改變的動力。中共外交政策菁英曾經形容美「中」關係為「重中之重」——顯示在中共的世界觀及其外交政策上，美國扮演的重要性。但是，此種狀態正在逐漸改變。

隨著中共增進繁榮、安全和地位的來源開始擴大，中共領導人不再以美國方面的看法為主。北京配合美國政策取向的意願將逐漸降低，且將更有能力抵抗來自華府的壓力，甚至產生制衡的力量。美國仰賴雙邊關係塑造中共政策和行為的原則方法，現在已經面臨新的限制。

區域挑戰

中共在亞洲占有的優勢地位，正在改變美國與區域盟友之間的關係本質。隨著中共和美國的盟友在經濟、金融和軍事事務上的關連性加深，這些盟友對華府的需要和要求亦會跟著改變。隨著中

共對經濟發展和區域安全計畫的重要性持續增加，華府和其他亞太區域國家「設定合作議程」的能力亦將變得更加複雜。例如，這種情況可能造成這些國家拒絕某些政策，或是限制與美國進行安全合作；這對大約五年前美韓聯盟面臨的挑戰具有啟發作用──儘管新的南韓領導人上台後，這個問題似乎已經解決。因為這些趨勢將對美國處理台海可能爆發衝突的防禦計畫有高度關聯性。美國的亞洲盟友愈來愈有必要就華府和北京在見解與要求的競爭關係中採取平衡策略，而這個進程已經成為美國制定亞洲戰略的長遠挑戰。

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情況相似但轉變較不劇烈的雙邊互動狀態業已開始成形。中共在非洲的貿易和投資政策已經對西方增進人權和政府管理的努力構成挑戰(在一些案例中甚至是破壞)。中共已經有效運用和非洲國家的外交關係提升，推進在多邊論壇中所設定的目標，例如改革聯合國安理會的爭議。巴西、委內瑞拉、玻利維亞等國家在與中共進行貿易和金融互動時，所能獲得的選擇權和項目，是過去相當依賴和美國經濟互動及安全承諾時所不具備的。此種結果導致這些國家與華府的對話方式開始改變，美國外交因此變得更加複雜。委內瑞拉以和中共交好的方式打擊美國(並使之成為石油出口的替代對象)，便是此等現象的明顯例證。

中共參與區域事務之後不僅改變了區域情勢，中共的行為也因為參與區域事務而產生變化。中共和非洲國家的互動增加後，北京對其政策可能造成的結果更加敏感，使中共理解以合作方式促進非洲政府管理能力和鼓勵解決蘇丹達夫危機的價值。舉例而言，這些區域互動已經使得中共開始調整先前堅持「不干涉他國內政」的立場。

對美國而言，更廣泛的挑戰是如何監控中共積極參與全球事務的本質、範圍和步調。除了參與更多事務和區域互動增加之外，中共會如何並在何處積累其影響力？中共和區域貿易流通、投資、金融交易、科技標準和安全事務的關聯性如何？這是否會改變中共對區域和全球存有的野心，其慾望會變得保守許多還是更加擴大？美國外交必須積極評估中共累積真實影響力的方式，探討中共能否運作這種影響力，以及這些發展會如何塑造中共的意圖。儘管這種互動不必然是一種零和遊戲，美國決策者必須在亞洲及其他地區找出並塑造美「中」之間「影響力的平衡點」。

美國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如何在三種趨勢聚合之時確保亞洲區域穩定：中共國力上升、日本再度成為軍事強權，以及印度成為亞洲強權。儘管這份研究著重在中共的國際行為，但中共積極參與區域及全球外交事務，對中共和亞洲主要強權的關係亦有深刻影響。中共在歷史上曾經與日本和印度爆發領土衝突，而這兩個國家亦相當關心其與中共在區域領導地位的競爭。這些變動關係造成這三個國家長期相互猜忌，因此從一開始便形成安全上的困境。這三個國家的合作和競爭關係正在迅速演變，且通常是同時進行。美國的重要任務是盡其所能以外部平衡者角色塑造三國的關係，致力降低猜忌、減低爆發衝突的可能性，以及進行危機管理。

反事實分析法

在評估中共的國際行為及其可能對美國利益形成何種挑戰時，另一個有效的分析方法是檢視中共「並未」做些什麼。藉由凸顯中共沒有採取的政策選擇，可以對中共目前的觀點、目標和政策

做更深入的瞭解。

第一，中共並未透過擴張領土、軍事介入、海外長期部署軍隊、建立附庸國(包括透過各項軍售)、或是主導區域和國際組織的方式追求其核心外交政策目標。相較於現在的表現，中共在全球或區域的國際行為照理說會更具侵犯性。這不代表中共的行為不會挑戰美國利益，只是挑戰方式會變得更加特殊和難以捉摸。

第二，中共並未在亞洲推動激進的全球或區域觀點，並將其視為替代選項。中共並未向各國推廣用以取代「華府共識」的「北京共識」。[2] 儘管部分國家認為中共威權式的資本主義發展方式可加以複製，但這些國家通常是在國際間較不具發言資格的獨裁國家。事實上，從中共發展路徑看來，華府共識的價值不證自明，無需挑戰。2008年中所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更加證實自由市場政策(特別是金融部分)比中共在外交上所提倡經濟干預政策更具限制性。此外，中共已經參與多數重要區域經濟和安全機構；其政府機構參與交流的比率可謂空前的高。

在亞洲，中共不再積極推廣其「新安全觀」，因為北京瞭解希望和美國及中共同時尋求良好關係的亞洲國家，並不會對此概念產生共鳴。中共發展軟實力的方式，著重於向其他國家針對中共的意圖進行安全保證，而不是積極促使他們基於中共發展模式或區域安全而遠離美國。多數國家受到中共吸引，是因為其擁有規模龐大且持續成長的經濟，而不是其所提倡的想法。就像奈伊(Joseph Nye)一開始所界定的，中共是柔軟善用其硬實力，而非運用軟實力。中共推廣許多外交理念，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追求自由制度學派的傳統相當雷同(但明顯排除政治自由化)。換句話說，

中共著重在當今國際規則和制度內部運作，積累權力和影響力，而非加以反對或修改。

過去八年美國在小布希執政期間，中共的國際行為對某些國家而言，似乎像是美國以外的另一種選擇。很多國家認為小布希限制美國涉入國際組織，或在關鍵問題上繞過聯合國，或是積極施展民主推廣議程，且偏好使用軍事武力。中共恰於此時隱然和美國小布希的外交政策相成對比。然而，歐巴馬執政之後，中共是否有同樣的機會和美國外交政策形成強烈對比，已經變得較不確定。

第三，中共並未採取和美國對抗的姿態，即便對美國的單極地位和民主推廣議程感到不滿。縱使在小布希執政時期，中共領導人亦避免和美國對抗(例如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且致力穩定美「中」關係(特別是911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並尋求擴大實質合作範圍(例如北韓問題)。美國和中共領導人已經擴大他們的外交交流管道。在重大國際安全議題上，例如北韓、伊朗、蘇丹和緬甸問題，這些新的交流管道已經使中共的行為做出有限度的改變。中共的國際行為顯示其持續認為和美國的對抗關係，將對中共的安全環境，以及達成長遠和中期目標的能力產生非常負面的效果。

甚且，中共並未尋求建立平衡美國權力的反美聯盟。北京同時尋求和美國親密的國家，以及和華府疏遠的國家增進外交關係，但卻私底下拒絕委內瑞拉和伊朗領導人的拉攏方式。中共已經參與許多多邊組織，不論美國是否擁有會員資格。在區域組織之中，例如上海合作組織和東亞高峰會，中共並未尋求主導權，而且當成員國遭遇區域國家，包含美國盟友的抵制時，中共也會放慢推進腳步。

與此同時，中共亦在尋求挑戰美國優勢地位和行動自由的機

會。「中」俄關係明顯存有對抗美國的內涵，從他們不斷在聯合國採取動作限制美國行動，便可看出這個趨勢。中共不斷伺機運用美國外交政策面臨問題的機會，在美國付出代價之際推展中共的利益。中共在伊拉克戰爭之後將觸手伸至歐盟，試圖利用泛大西洋國家的緊張關係，促使歐盟解除對中共的武器禁運。2004和2006年，當菲律賓和泰國與美國陷入緊張關係，中共亦將觸手伸至這兩個國家。中共這些投機舉動有些遭致失敗亦有些獲得有限度的成功，相當值得省思。

第四，中共在亞洲並未試圖積極破壞美國聯盟關係。其並未透過向美國盟友提供安全保證和軍事合作的方式，取代和美國的安全協定。的確，中共在亞洲的雙邊外交上，軍事外交和國防合作或許是最薄弱的部分。中共並未毛遂自薦為可以取代美國的安全夥伴，至少目前為止，中共是把重點放在增加經濟合作，並透過參與區域機構和遵守行為規則的方式，對美國盟友進行安全保證。從十年前開始，已經有更多中共戰略家承認──撇開官方辭令不談──美國的安全承諾在亞洲扮演著維持穩定的角色。

關於這個問題的最後一個切入點，是思考中共若採取不同的平衡戰略，將會採取什麼樣的國際行為。中共可能會推廣全球和區域安全概念的替代選擇，且要求亞洲國家在美國及中共之間做出選擇。此種策略亦包含廣泛的安全援助──包括以大規模聯合演訓、重要情報交換和軍售方式以致力建立反美聯盟。中共亦可能向威權政府的內部安全單位提供科技援助，確保一黨統治和當前政權的穩定。目前這些活動的跡象並不明顯，但這些都是值得持續關注的地方。

中國大陸未來的變化？

自冷戰結束後，受到觀點和目標所驅策，中共大部分的外交政策力求配合美國權力，著重於逐步發展經濟力和軍事力，並且希望把外部威脅降到最低。未來的關鍵問題在於，隨著中共物質能力不斷增長，全球利益不斷擴張，這兩個同時發展的過程會如何改變中共的外交觀點、目標和政策。這些趨勢是否會加速中共外交政策的改變，例如對名聲問題或安全困境動態變得更加敏感，或者產生之前沒有見過的替代行為？特別是當中共的國家能力擴張之時，其意圖是否會改變，或是變得更積極對抗美國？

本研究報告的分析認為，中共未來20年不太可能發生這種情況，除非發生完全脫離中共當前發展軌跡的問題，諸如國內的動盪擴散，或者與美國，或者與亞洲強權國家爆發軍事衝突。這是為什麼？一言以蔽之：中共的國力只能緩步提升，因為修正外交政策所承受的內部壓力和外部限制仍然相當龐大。

未來20年，中共的權力和影響力僅會逐步且有限的增加，因為中共面臨諸多能力上的限制，使其無法持續強勁成長。對中共未來20年進行成長推測後，鮮少有分析報告認為中共能夠擁有充分的國家資源支撐大幅度的發展需要，還能同時突破現有的國際戰略，使之能夠輕易且不必付出代價地加速衝刺，最終達到與美國實力相當的全球地位。此外，中共的權力和影響力逐步增加之際，亦有其他亞洲強權正在興起，例如日本和印度，都在注視著中共並監視其進展。這些都是遏制和約束中共國際戰略產生重大轉變的實際因素。

中共領導人進行外交政策計算之時，由於國內挑戰將會愈來愈形龐大，因此外交政策不太可能有根本性的改變。中共眾多的國內挑戰不僅會持續存在，部分挑戰還會在未來20年變得更加嚴重，例如人口成長的限制，以及必須改以消費為基礎的成長模式。

對當前第四代領導人和第五代領導人而言，他們仍然會堅持共產黨的傳統說法，強調運用外交政策建立穩定的外部環境、取得市場和資源的獲取管道、將對外承諾減到最低，以及避免中共的選擇權遭到限制。中共領導人對於外交政策的見解，仍將持續以促進國內穩定和成長為著眼。如上所述，中共的國內挑戰已經逐漸成為外交政策的動力和約束力，因此中共的國家利益未來不太可能產生劇烈改變。

此外，中共領導人對於過去強權崛起所犯的錯誤小心翼翼，希望避免重蹈覆轍。他們研究日本帝國、德意志共和國、蘇聯時期的負面經驗，以及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崛起的正面經驗。他們從這些經驗得出結論，瞭解避免仰賴軍事力量確保國際地位，以及避免和支配性強權進行對抗的重要性，而是著重增強中共整體國力，做為確保國家復興的方式。他們瞭解這需要時間和國際空間才能達成。或許西方國際關係學者對於中共是否能夠在權力轉移過程中，避免發生變動的能力存有爭議，但中共領導人對於此類國際目標卻相當明確。[3]

當中共在追求目前的外交戰略時，其對當前國際體系存有的利害關係會隨之增加，且可能提供中共更大的綜合影響力。為了能夠獲得繁榮和增進自身安全環境，中共會想辦法確保這套體系可長可久。從中共在北韓、伊朗、蘇丹和緬甸問題的立場逐漸產生演

變，便可看出這個現象。在所有的案例中，為了管理這些問題或至少防止它們惡化，中共已經變得更願意採取之前拒絕的行動。中共對國家利益的概念產生改變，也可說是直接受到中共的國際化所影響。中共可能會以改變些許規則和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方式塑造國際組織(且可能的話進一步遏制美國)，但中共不太可能帶頭改變當今國際體系結構。

進一步的考量是即便中共的能力和影響力有所增長，對抗美國的代價依然相當高，而能夠得到的利益可能相當低，或是不甚明確。未來20年，即便美「中」雙方的相對能力差距縮小，美國的經濟和軍事權力卻不會呈現停滯狀態。美國不太可能公然對中共採取對抗的戰略，造成北京對於國際行為的利弊考量產生根本性改變。中共認為美國在其外部安全環境和國際體系結構中，仍將持續扮演重要角色(但不像之前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即便假設這個世界明顯變得更多極化，美國經濟和軍事仍將持續影響亞洲和全球事務。在這樣的世界中，中共仍會牢記對抗美國所須付出的代價。

這個論點並非意指未來20年中共的國際行為不會產生改變。隨著中共的能力逐漸擴張、國際體系變得更多極化、美國在全球事務的角色改變，中共的國際行為就會產生改變。中共外交可能因此顯得充滿自信與堅定。其他國家會更注重中共，中共則更敢於運用影響他國和國際機構的能力。中共亦會變得更敢於反對美國和抗拒來自美國的壓力。

這樣的政策挑戰使得美國必須密切掌握中共的國際行為，瞭解其發展軌跡。美國決策者亦需要思索創新的方式，俾達成諸多目標：包括減低中共破壞美國利益的能力，並嚇阻其採取激烈行動；

向中共保證美國不會將其視為戰略對手，俾緩合中共對美國意圖產生的強烈不安全感；創造機會使雙方能夠建立更堅實的夥伴關係，俾解決可能造成國際體系動盪的跨國爭議。

這項分析最後要指出的是，美國對中共未來發展軌跡的預期，不應在美國的行動無關乎中共的觀點、目標及政策的假設之下進行。美國對中共的政策，將持續深刻影響中共未來的國際行為，以及美「中」關係的實質內容和特性。對美國決策者而言，這項前提相當重要。即便中共的利益變得更多樣化，美國對中共的經濟和安全利益計算，仍然有相當重大，但並非主導一切的影響。若美國在政策上對中共採取高度競爭的策略，則雙方形成敵對關係就有可能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另一方面，美國努力擴大合作領域，可以向中共進行安全保證，並鼓勵中共拋棄原本狹隘的利益觀念，為區域和全球福祉著想。美國決策者應該竭盡美國權力的所有面向，向北京傳達接納或對抗美國利益可能面臨什麼樣的利弊得失。

與此相關的思考是歐巴馬政府外交政策和美「中」關係之間的未來發展。相較於小布希政府的政策，一個外界認為較不講求單邊、意識形態和壓迫的美國外交政策，將使中共無法與美國形成強烈對比──就成效而言，這將促成一個環境，使中共較難遏制美國的選擇。假如某項外交政策主張積極且適當運用多邊機構，並且在口頭及行動上強調協商解決的價值(包含那些不排除使用武力做為後盾的國家)，那麼美國的權力也就同樣比較不會被中共和其他國家視為威脅，藉此移除美「中」關係所面臨的安全困境，增加美國的全球吸引力。

政策建議

總結上述結論，謹在此向美國提出若干政策建議。就國家階層而言，美國對中共的政策應採取包含合作和競爭要素的「混合戰略」。特別的是，這種混合戰略應該包括交往、制度約束，以及安全平衡等三大部分。[4]

對中共尋求混合戰略的邏輯，源自中共國際行為的兩個面向：(1)中共對亞洲和全球的穩定繁榮日趨重要。(2)無法確定中共這個崛起中的強權未來將往何處發展，但可以確信中共的發展不是變得非常脆弱就是非常強大，而且都會對美國利益構成挑戰。後面這個中共對美國利益構成挑戰的觀點特別重要：美國採取混合戰略主要的著眼在於，分散美國安全的「籌碼」在尚不知其何去何從的中共身上。不確定性是採取這個方法的主因，而非為了隱藏美國瞭解中共意圖的計畫。

這個混合戰略的每一項要素都有特殊的政策構成要件。過去30年來美「中」政策已經成為美國和中共進行交往的一項既定事實。這是全球經濟現實，加上雙邊經濟與金融整合加深所使然。[5] 如果缺少中共參與，很多全球安全問題——包括傳統和非傳統安全——都無法解決。而且隨著中共涉入更多亞洲以外的事務，其對動盪局勢的管理亦變得更加重要，例如蘇丹達夫地區的人道危機。

尋求交往的同時，美國應設法引導和測試中共的意圖，這是鼓勵中共成為「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這個策略背後的政策邏輯。或許更重要的是，美國決策者可以運用交往政策向中共傳達美國不會尋求遏制中共、不會給中共帶來暴力的政治革命、中共的穩定繁榮

符合美國利益，而且美國願意接受和接納部分中共的利益。同時，美國亦可傳達對中共更多的期待，如果想要扮演更重要的國際角色，就應該挑起更多的責任。美國應該針對經濟、外交、國防議題擴大和中共進行雙邊對話的廣度和深度，確保和中共扮演的所有相關角色展開交往。歐巴馬政府和中共進行戰略與經濟對話，便是朝此方向邁進的重要步伐。未來美國和中共有效交往政策所面臨的挑戰，將是這麼做的同時，美國政策亦需保有較為競爭的面向，闡述如下。

除了「兩邊」交往，美國可以朝著多邊方向做更多事情。美國需要更積極參與亞洲區域外交，提升美國存在的可信度和合法性。過去五年，中共得利於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分身乏術，以及區域國家對美國的權力和想法有所懷疑，讓中共得到機會，使其得以塑造區域觀點並擴張影響力。因此，交往政策的一個重要要素，是美國應更加留意並時常出席亞洲的重要多邊會議，俾向盟友和夥伴傳達美國的承諾品質不變。這個方式將塑造中共崛起的區域背景。美國在東亞重新承諾走向多邊主義，包括參與東亞峰會、與東協領袖舉行高峰會、經常參與重大區域會議，長久以後將逐次改善區域國家對美國區域承諾的看法。

在經濟問題上，美國的政策應著重協商事務於高品質的區域貿易與投資協定，並對區域經濟危機管理機制做出貢獻。美國的政策必須確保自身成為東亞經濟體的核心。美國對中共政策和美國對東亞政策的論調亦相當重要。美國應該展現自信，主動追求區域交往與強化多邊主義的議程，而非基於對中共的疑慮而做出防衛性反應。美國無需參與每一個中共加入或成立的多邊組織。美國對中

共區域外交過度反應，將破壞美國的最終目標，使身為亞洲國家公共和個別利益重要提供者的美國，無法提升當前角色的可信度和合法性。

約束戰略(binding strategy)的中心前提，是巧妙運用中共對獲得一席之地和國際機構資源的渴望，使其必須做出承諾，進而加以限制。鼓勵中共參與國際事務亦兼有測試中共意圖的作用。究竟中共是接受普世規則還是想要改寫規則？重要的是，這種約束戰略是攤在中共夥伴國家面前所制定而成，因此將進一步提高中共背離國際規則和規範所需付出的代價。約束戰略無需採取壓迫方式，目的是開創契機，讓中共接受限制，俾換取國際社會接受部分其自身利益，並讓中共在區域和全球機構獲得資源及地位。

對美國政策而言，這意指著美國必須讓中共擴大參與重大國際和區域組織，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能源總署。美國可藉此向中共傳達願意給中共更多「發聲機會」的訊息，亦可幫助美國決策人士評估中共解決全球問題的能力。類似的美國政策亦對中共自1980年代早期迄今的貿易和禁止擴散承諾演進產生明確影響。展望未來，要成功針對全球氣候變遷、能源安全、流行疾病、其他跨國性的安全挑戰進行協商，中共的參與不可或缺。

混合式國家戰略的最後一個面向是安全平衡。由於中共軍事現代化並非這份研究報告的主題，因此這個話題不在此詳細討論。整體而言，在美國戰略中，安全平衡的組成元素，涉及加強美國結盟合作和美國對亞太區域安全承諾的可信度。藉由嚇阻任何國家採取激烈行動的方式確保區域穩定，仍是美國在此區域進行結盟和部署武力的主要目的。美國亦應增進區域安全合作的品質，俾確

保美國的同盟和安全夥伴不至於因為太過弱小而受到中共掠奪，同時也不會感到美國似乎要他們在華府和北京之間做出選擇。美國亦可運用這種安全合作，處理傳統和非傳統安全挑戰，擴大其存在的合法性。中共已經針對後面這項問題和亞洲國家展開交往，美國亦可透過自身的國防優勢跟進，這對美國而言也可從中獲利。

最後，美國不應以聯合對抗中共的方式進行安全平衡，因為這樣做反而會使關鍵的盟友和夥伴遠離美國。美國加強結盟合作之時，美國和中共以及美國盟友和中共之間，都應積極展開軍事交往計畫。這項努力有助減低安全困境的變動因素，同時亦可確保美國軍事能力可以持續嚇阻潛在威脅，並讓美國盟友及夥伴獲得安全保證。

註釋

1 日本除外，因為中共一直以某些作為造成日本損失，進而從中擴大其影響力。

2 北京共識這個名詞是由美國記者創立，很少有中共人士提倡這個說法。Cooper, 2004.

3 John Mearsh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 2001; Goldstein, 2005; Aaron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Fall 2005, pp. 7–45; and Thomas Christensen,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1, Summer 2006b, pp. 81–126.

4 技術上，這亦可稱為「避險戰略」(hedging strategy)，但這個術語在美國和中國大陸時常被誤解，僅偏重這個戰略的安全平衡要素，而非它真正的「混合」本質。
針對美「中」關係避險戰略的討論，請參見Evan S. Medeiros, "Strategic Hedging and the Future of Asia-Pacific Stability,"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05–2006, Vol. 29, No. 1, pp. 145–167; and Rosemary Foot, "Chinese Strategies in a U.S. Hegemonic Global Order: Accommodating and Hedg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2, No. 1, January 2006, pp. 77–94.
關於避險戰略的理論基礎，請參見Randall L. Schweller, "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1–32; and David Edelstein, "Managing Uncertainty: Beliefs About Intentions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Security Studies*, Vol. 12, No. 1, Autumn 2002, pp. 1–40.

5 美國是中共最大的貿易夥伴，而中共是美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美國和中共分別是世界最大和第三大貿易強權，而中共是世界最大出口國。2003至和2008年間，全球經濟成長將近有半數是由中共和美國帶動。中共握有超過1兆美元的美國債券。

參考書目

《2006年中國統計年鑑》北京，中國：中國統計出版社，2006年。

《2007年中國統計年鑑》北京，中國：中國統計出版社，2007年。

《2007年1-12月中國與歐洲國家貿易統計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08年1月24日。2008年10月8日引自網站：
http://ozs.mofcom.gov.cn/date/date.html?2632778198=4194528730

《200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北京，中國：中共商務部，2008年9月27日，2008年10月9日引自網站：
http://hzs.mofcom.gov.cn/accessory/200809/1222502733006.pdf

〈2007中國軍方軍事演習密度頻繁堪稱「軍演年」〉，《中國青年報》，2007年12月28日，2008年10月7日引自網站：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7/12-28/1117456.shtml

〈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建設和諧世界〉，《人民日報》，2006年8月24日，作者引用公開資料中心翻譯版本。

Alden, Chris, *China in Africa,* London, UK: Zed Books, 2007.

Alden, Chris, and Andy Rothman, *China and Africa: Special Report,* CLSA Asia-Pacific Markets, September 2008.

Algieri, Franco, "It's the System That Matters: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Making of EU Policy Toward China," in David Shambaugh, Eberhard Sandschneider, and Zhou Hong, eds., *China-Europe Relations: Perceptions, Policie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65–83.

Allen, Ken, "China's Foreign Military Relations: 2003–2004," *Chinese Military Update,*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Vol. 2, No. 5, December 2004.

Allen, Kenneth W., and Eric A. McVaden, *China's Foreign Military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Henry L. Stimson Center, October 1999.

Alterman, John, and John Garver, *The Vital Triangle: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7.

Asian Development Bank,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undated. As of October 6, 2006: http://www.adb.org/GMS/default.asp

"Backgrounder: Eight Steps China Will Take to Boost China-Africa Strategic Partnership," *Xinhua*, January 30, 2007.

白潔、曹嘉，〈中國中東特使孫必幹：希望巴方加強內部團結〉，《新華社》，2007年8月2日，作者採用公開資料中心翻譯版本。

"BBC Monitoring China in Africa Digest 26 January 2005," as translated by FBIS, January 26, 2005.

Bergsten, C. Fred, Bates Gill, Nicholas R. Lardy, and Derek Mitchell, *China—The Balance Sheet: What the World Needs to Know Now About the Emerging Super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

Blum, Samantha, "Chinese Views of U.S. Hegemon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2, No. 35, 2003, pp. 239–264.

Bowley, Graham, "Cash Helped China Win Costa Rica's Recognition,"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2, 2008.

Bradsher, Keith, "China and India Vie for Company with Oil Fields in Kazakhstan," *New York Times,* August 16, 2005.

Brahmbhatt, Milan, "Steering a Steady Course—Special Focus: Strengthening the Investment Climate in East Asia," East Asia Update, World Bank, November 2004. As of October 6, 2006:
http://www.worldbank.org.cn/English/content/eap10-04.pdf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蔡武訪談錄，〈堅持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提高應對國際局勢能力〉，2005年6月21日，引自2009年3月27日：
http://www.idcpc.org.cn/ziliao/wenzhang/0506.htm

Calabrese, John, "The Risks and Rewards of China's Deepening Ties with the Middle East," *China Brief,*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Vol. 5, No. 12, May 24, 2005.

曹華尹(音譯)，〈試析東北亞安全新框架〉，《改革論壇時報》，2004年第10期，第27–36頁。

Cao, Belinda, and Judy Chen, "China Will Expand Currency Swap Accords to Help Trade," Bloomberg News, March 31, 2009.

Carlson, Allen, *Unifying China, Integrating with the World: Securing Chinese Sovereignty in the Reform Er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在京舉行，胡錦濤、溫家寶作重要講話；吳邦國、賈慶林、曾慶紅、黃菊、吳官正、李長春、羅幹出席會議〉，新華社，2006年8月23日，作者引用公開資料中心翻譯版本。

〈中國維和部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09年1月22日引自網站：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test/2005-06/28/content_10554.htm

車玉明和周英峰，〈中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聚焦保增長〉，《新華社》，2008年12月8日，作者引用公開資料中心翻譯版本。

Chen Hui, "China's Diplomacy Is Moving Toward All Spectrum—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Wu Jianmin, Director of the Foreign Affairs Institute, and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cum Spokesperson of the CPPCC," *Zhongguo Jingji Daobao* [China Economics Daily], July 16, 2005, as translated by FBIS.

Chernyak, Igor, "Interview with Rosoboroneksport General Director Anatoliy Isaykin," *Rossiyskaya Gazeta*, April 10, 2009, as translated by OSC.

"China Agrees to Cancel Iraqi Debt," *China Daily,* June 21, 2007. As of March 23, 2009: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7-06/21/content_899679.htm

"China, France Hold Joint Navy Drill," *China Daily,* March 16, 2004. As of October 6, 2006: http://www.chinadaily.com.cn/english/doc/2004-03/16/content_315366.htm

"China Makes More Overseas Investment in 2005 Mainly in Asia," *People's Daily Online,* February 11, 2006, as translated by OSC.

"China Non-Committal on Backing India at UNSC," *Press Trust of India,* April 12, 2005.

"China Quarterly Update," Beijing, China: World Bank Office, April 2005. As of October 6, 2006: http://www.worldbank.org.cn/English/content/cqu04-05-en.pdf

China Relations European Commission Web site. As of May 14, 2009: http://ec.europa.eu/trade/issues/bilateral/countries/china/index_en.htm

"China Signs More Technology Import Contracts in 2005," *Asia Pulse,* January 9, 2006.

"China to Develop Iran Oil Field," *BBC*, November 1, 2004.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rum: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December 11, 2003. As of August 2005: http://www.china.org.cn/english/features/China-Africa/82189.htm

《中國外交》(2004年英文版)，北京，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第6頁。

《2002年中國的國防》，北京，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2年10月。

《2004年中國的國防》，北京，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4年12月。

《2006年中國的國防》，北京，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6年12月。

《2008年中國的國防》，北京，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9年1月。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北京，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5年12月。

China's Peaceful Rise: Speeches of Zheng Bijian 1997–2005,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5.

"China's Sinopec Reportedly Set for 51% Stake in Iran Oil Field," *Market Watch,* September 15, 2006.

Christensen, Thomas, "Chinese Realpolitik: Reading Beijing's World-View,"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6.

———,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on "China's Role in the World: Is China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August 3, 2006a. As of May 28, 2009: http://www.uscc.gov/hearings/2006hearings/written_testimonies/06_08_3_4wrts/06_08_3_4_christensen_thomas_statement.php

———,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1, Summer 2006b, pp. 81–126.

———,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statement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on "Shaping China's Global Choices Through Diplomacy," March 18, 2008.

Christensen, Thomas J.,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and James Swan,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African Affairs, statement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African Affairs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on "China in Africa: Implications for U.S. Foreign Policy," June 5, 2008.

楚樹龍，〈中美關係：穩定壓倒一切〉，《環球時報》，2006年4月19日，作者引用公開資料中心翻譯版本。

Collins, Gabriel B., and William S. Murray, "No Oil for the Lamps of China?"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1, No. 2, Spring 2008, pp. 79–95.

"Commander Highlights Chinese Peacekeeping Force Role in Lebanon," *China Daily,* October 2, 2006. As of March 27, 2009: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6-10/02/content_701079.htm

Cooper, Joshua Ramos, *The Beijing Consensus: Notes on the New Physics of Chinese Power,* London, UK: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Cui Tiankai,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Asia and China's Policy," speech delivered at Hong Kong University, Hong Kong, February 4, 2005.

〈大國的負責與大國的心態〉，《環球時報》，2005年8月15日。

Daly, John C.K. "Sino-Russian Split at Regional Summit," *Asia Times Online,* November 15, 2007.

Datan, Merav,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540: WMD and Non-State Trafficking," *Disarmament Diplomacy,* No. 79, April/May 2005. As of June 12, 2005:
http://www.acronym.org.uk/dd/dd79/79md.htm

〈上海合作組織五周年宣言〉，上海合作組織網站，2006年6月15日。引自2006年10月6日：
http://www.sectsco.org/502.html

De Souza, Amaury, "Brazil and China: An Uneasy Partnership," Miami, Fla.: China–Latin American Task Force, Center for Hemispheric Policy, University of Miami, June 2006.

Dittmer, Lowell,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Dominguez, Jorge I., *China's Relations with Latin America: Shared Gains, Asymmetric Hopes,* China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ialogue, June 2006.

Downs, Erica, "The Chinese Energy Security Debate," *China Quarterly,* No. 177, March 2004, pp. 21–41.

———, "China's Energy Requirements and Policies,"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on "China's Role in the World: Is China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Washington, D.C., August 4, 2006a.

———, *China*, the Brookings Foreign Policy Studies Energy Security Serie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December 2006b.

———, "Business Interest Groups in Chinese Politics: The Case of the Oil Companies," in Cheng Li, ed., *China's Changing Political Landscap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pp. 121–141.

Dumbaugh, Kerry,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Soft Power' in South America, Asia and Afric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April 2008, pp. 71–77.

Dumbaugh, Kerry, and Mark P. Sullivan, *China's Growing Interest in Latin Americ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April 2005.

Economy, Elizabeth, and Michael Oksenberg,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9.

Edelstein, David, "Managing Uncertainty: Beliefs About Intentions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Security Studies,* Vol. 12, No. 1, Autumn 2002.

Edgecliffe-Johnson, Andrew, Gillian Tett, John Thornhill, and Catherine Belton, "Wen and Putin Criticise Western Leaders at Davos,"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9, 2009.

"Egypt Seeks Stronger Trade Ties with China," *Asia Pulse,* September 11, 2006.

Evans, Peter C., and Erica S. Downs, *Untangling China's Quest for Oil Through State-Backed Financial Deals,* Brookings Policy Brief, No. 154, May 2006.

Fairbank, John K.,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19.

Fewsmith, Joseph, *Elite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1.

Fewsmith, Joseph, and Stanley Rosen, "The Domestic Contex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oes Public Opinion Matter?" 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51–190.

Finkelstein, David, *China Reconsiders Its National Security: The Great Peace and Development Debate of 1999,* Alexandria, Va.: The CNA Corporation, December 2000.

———, "China's 'New Concept of Security,'" in Stephen J. Flanagan and Michael E. Marti, eds.,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China in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97–201.

Foot, Rosemary, "Chinese Strategies in a U.S. Hegemonic Global Order: Accommodating and Hedg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2, No. 1, January 2006, pp. 77–94.

Foster, Vivien, William Butterfield, Chuan Chen, and Nataliya Pushak, *Building Bridges: China's Growing Role as Infrastructure Financier for Africa,*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08.

Fox, John, and Francois Godement, *A Power Audit of EU-China Relations,* Brussels, Belgium: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9. As of May 14, 2009: http://ecfr.eu/page/-/documents/A_Power_Audit_of_EU_China_Relations.pdf

Fravel, M. Taylor, "Regime In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plaining China's Compromises in Territorial Dispu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November 2005, pp. 46–83.

———, *Strong Nation, Secure Borde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Friedberg, Aaron,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Fall 2005, pp. 7–45.

Gao Zugui, "An Analysis of Sino-US Strategic Relations on the 'Western Front,'" *Xiandai Guoji Guanxi*, No. 12, December 20, 2004, as translated by FBIS.

Garver, John, "The Legacy of the Pas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93, pp. 2–30.

———, "China's South Asian Interests and Policies,"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on "China's Growing Global Influence: Objectives and Strategies," Washington, D.C., July 22, 2005.

———, *China and Iran: Ancient Partners in a Post-Imperial World,* Seattle, Wash.: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7, pp. 136–230.

Gill, Bat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a-EU Relationship," in David Shambaugh, Eberhard Sandschneider, and Zhou Hong, eds., *China-Europe Relations: Perceptions, Policie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270–286.

Gill, Bates, and Yanzhong Huang, "Sources and Limits of Chinese 'Soft Power,'" *Survival*, Vol. 48, No. 2, Summer 2006, pp. 17–36.

Gill, Bates, and Chin-hao Huang, "China's Expanding Presence i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Roy Kamphausen, David Lai, and Andrew Scobell, eds., *PLA Missions Other Than Taiwan,*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April 2009, pp. 99–126.

Gill, Bates, Michael Green, Kiyoto Tsuji, and William Watts, *Strategic Views on Asian Regionalism: Survey Results and Analysi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February 2009.

Gill, Bates, and Gudrun Walker, eds., *China's Rise: Diverging U.S. and EU Perspectives and Approaches,* Berlin: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August 2005.

Glaser, Bonnie, "Ensuring the 'Go Abroad' Policy Serves China's Domestic Priorities," *China Brief,*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Vol. 7, No. 5, March 8, 2007.

Glaser, Bonnie, and Evan S. Medeiros, "The Ecology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China: The Ascension and Demise of the Theory of Peaceful Rise," *China Quarterly,* No. 190, June 2007, pp. 291–310.

Global Policy Forum, "Key U.N. Documents," undated. As of March 27, 2009: http://www.globalpolicy.org/security/issues/sudanarchindex.htm

Glosney, Michael, "Heading Toward a Win-Win Futur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hina's Policy Toward Southeast Asia," *Asian Security,* Vol. 2, No. 1, 2006a, pp. 24–57.

———, *Meeting the Development Challenge in the 21st Century: American and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Foreign Aid,* China Policy Series, Policy Brief 21, New York: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August 2006b.

Goble, Paul, "Only Interests Are Permanent: Russian-Chinese Relations as a Challenge to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on "China's Growing Global Influence: Objectives and Strategies," July 21, 2005.

Goldstein, Avery,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宮力，〈鄧小平對美政策思想與中美關係〉，《國際問題研究》，2004年第6期，第13-17頁。

Goode, Erica, and Riyadh Mohammed, "Iraq Signs Oil Deal with China Worth up to $3 Billion," *New York Times,* August 28, 2008.

Gorst, Isabel, and Richard McGregor, "Kazakh Oil Arrives in China," *Financial Times,* May 26, 2006.

Gries, Peter Hay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 "China's 'New Thinking on Japan,'" *China Quarterly,* Vol. 32, No. 184, December 2005, pp. 831–850.

Grimmet, Richard F., *Conventional Arms Transfers to Developing Nations, 2000–2007,*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October 2008.

〈國際能源安全形勢與中國能源外交〉，《2004-2005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北京，中國：時事出版社，2005年，第45-62頁。

《2001-2002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北京，中國：時事出版社，2002年。

《2003-2004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北京，中國：時事出版社，2004年。

《2004-2005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北京，中國：時事出版社，2005年。

Harding, Harry, "China's Cooperative Behavior,"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1994, pp. 375–400.

Harris, Lillian Craig, "Myth and Reality 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Middle East,"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1994, pp. 322–247.

Holtom, Paul, "Russia and China's Defense Industrial Relationship and Arms Sales: Is the Party Over?" unpublished conference paper, April 2009.

Houser, Trevor, "The Roots of Oil Investment Abroad," *Asia Policy,* No. 5, January 2008, pp. 141–166.

胡鞍鋼，《大國戰略：利益與使命》，遼寧，中國：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

胡錦濤，《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聯合國60周年首腦會議上發表演講，紐約，美國，2005年9月22日。引自2009年5月14日：http://www.fmprc.gov.cn/ce/cehu/hu/xwdt/t213375.htm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報告於中共第17屆人大會議，2007年10月15日，2009年3月26日，引自：http://www.china.org.cn/english/congress/229611.htm

"Hu Jintao Proposes SCO Focus on Security, Economy," *Xinhua*, June 17, 2004.

"Hu Pays State Visit to Saudi Arabia," *Financial Times Information,* April 24, 2006.

華黎明，〈伊朗核問題與中國外交的選擇〉，《國際問題研究》，2007年第1期，第58-62頁。

Huang, Cary, "Record $1 Billion Yuan in International Aid Granted by Beijing in 2005,"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19, 2006.

黃仁偉，《中國崛起的時間與空間》，上海，中國：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2。

———, "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for a Rising China," *SASS Papers,* No. 9,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3.

黃仁偉，〈國際體系轉型與中國和平發展道路〉，《國際體系與中國的軟力量》，上海，中國：時事出版社，2006年。

Hunt, Michael H., *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nter- 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Sign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Possible Admission to Membership into the IDB," news release, March 18, 2007. As of April 1, 2009: http://www.iadb.org/NEWS/articledetail.cfm?artID=3696&language=EN&artty pe=PR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orld Energy Outlook 2006,* Paris, France: OECD/ IEA, 2006, p. 101.

International Energy Forum, "Global Energy Outlook: Issues and Challenges," April 2006. As of September 15, 2006: http://www.nog.se/files/IEA10thIEF2006.pd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2000, p. 164.

———,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2004.

———,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2005.

Jia Qingguo, "Learning to Live with the Hegemon: Evolution of China's Policy Toward the U.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4, No. 44, August 2005a, pp. 395–407.

———, "Peaceful Development: China's Policy of Reassuranc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9, No. 4, December 2005b, pp. 493–507.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報告於中共第16屆人大會議，2002年11月8日。

金熙德，〈中國需要大國心態〉，《環球時報》，2002年9月12日，第4版。

Johnston, Alastair Iai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a.

———, "International Structures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4th ed.,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8b, pp. 55–90.

———,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ring 2003, pp. 5–56.

———,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Kastner, Scott L., and Phillip C. Saunders, "Testing Chinese Diplomatic Priorities: The Correlates of Leadership Travel Abroad under Jiang Zemin and Hu Jintao," unpublished presentation a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Boston, Mass., August 30, 2008.

Kemp, Geoffrey, "The East Moves West," *National Interest,* No. 84, September 2006, p. 75.

Kim, Samuel S., *China,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orld 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berg,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pp. 42–89.

Kurlantzick, Joshua,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Lee, Don, "China Barrels Ahead in Oil Market," *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14, 2004.

———, "China Making Big Oil Moves: The Country's Steps to Secure Reserves Have Prompted Worries about Political Calculations," *Los Angeles Times,* January 23, 2006, p. C1.

Lewis, John, and Xue Litai, *China Builds the Bomb,*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Li Shaoxian and Tang Zhichao,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ish ed., Vol. 17,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7, pp. 22–31.

李肇星，《為人民服務的新中國外交》，《求是》(網路版)，2004年10月。

李肇星，〈和平、發展、合作：新時期中國外交的旗幟〉，2005年8月22日。

李肇星，《2006年國際形勢和中國外交工作》，《求是》(網路版)，2007年1月。

李志飛(音譯)，〈冷戰後的中國特使外交〉，《國際關係學院學報》，第三期，2008年5月。

Lieberthal, Kenneth,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2nd ed.,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 December 2003.

Lieberthal, Kenneth, and Mikkal Helberg, "China's Search for Energy Security: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Seattle, Wash.: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NBR Analysis,* Vol. 17, No. 1, April 2006.

Liebman, Alex, "Trickle-Down Hegemony? China's 'Peaceful Rise' and Dam Building on the Meko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7, No. 2, 2005, pp. 281–304.

Loser, Claudio, "China's Rising Economic Presence in Latin America,"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on "China's Growing Global Role: Objectives and Influence," July 21, 2005.

呂國增，外交部長助理，〈大力加強經濟外交工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服務〉，2004年12月18日，引自2005年8月20日：
http://www.fmprc.gov.cn/eng/wjb/zygy/gyhd/t176097.htm

Lum, Thomas, and Dick K. Nanto, *China's Trad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January 4, 2007.

Lum, Thomas, Hannah Fischer, Julissa Gomez-Granger, and Anne Leland, *China Foreign Aid Activities in Africa,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ast Asi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February 2009.

Lyman, Princeton, "China Rising Role in Africa,"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on "China's Growing Global Role: Objectives and Influence," July 21, 2005.

Lynch, Colum, "Russia, China Veto Resolution on Burma Security Council Action Blocks U.S. Human Rights Effort,"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3, 2007, p. A12.

———, "U.N. Zimbabwe Measure Vetoed by Russia, China," *Washington Post,* July 12, 2008, p. A09.

Mao Yufeng, "Beijing's Two-Pronged Iraq Policy," *China Brief,*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Vol. 5, No. 12, May 14, 2005.

McNerney, Patricia, Principal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Nonproliferation,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on "China's Nonproliferation Practices," May 20, 2008. As of March 26, 2009: http://merln.ndu.edu/archivepdf/china/state/105084.pdf

Mearshimer, John,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 2001.

Medeiros, Evan S., "Strategic Hedging and the Future of Asia-Pacific Stability,"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 No. 1, Winter 2005–2006, pp. 145–167.

———, *Reluctant Restrain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Nonprolifera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 1980–2004,*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97–174.

Medeiros, Evan S., and Bates Gill, *Chinese Arms Exports: Policy, Players, and Process,*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2000.

Medeiros, Evan S., Roger Cliff, Keith Crane, and James C. Mulvenon, *A New Direction for China's Defense Industry,*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MG-334-AF, 2005. As of June 11, 2009: 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s/MG334/

Medeiros, Evan S., Keith Crane, Eric Heginbotham, Norman D. Levin, Julia F. Lowell, Angel Rabasa, and Somi Seong, *Pacific Currents: The Responses of U.S. Allies and Security Partners in East Asia to China's Rise,*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MG-736-AF, 2008. As of March 27, 2009: 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s/MG736/

門洪華，《中國：大國崛起》，杭州，中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中共外交部，〈外交部長李肇星在聯合國大會發表談話〉，第59屆聯合國大會，2004年9月28日。引自2005年6月10日：http://www.fmprc.gov.cn/eng/wjb/zzjg/gjs/gjzzyhy/2594/2602/t163560.htm

Minxin Pei and Michael Swaine, *Simmering Fire in Asia: Averting Sino-Japanese Strategic Conflict,* Policy Brief No. 44,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November 2005.

Morphet, Sally, "China as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October 1971–December 1999," *Security Dialogue,* Vol. 31, No. 2, 2000, pp. 151–166.

Nathan, Andrew J., and Robert S. Ross, *Great Wall and Empty Fortress,*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 1997.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2002. As of October 6, 2006: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pdf

Negroponte, John D.,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opening statement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May 15, 2008.

Niu Jun, *From Yan'an to the World: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Steven I. Levine, trans. and ed., Norwalk, Conn.: Eastbridge Books, 2005.

"OAS Accepts China as Permanent Observer," *People's Daily Online,* English ed., May 4, 2004. As of June 23, 2005: http://english.people.com.cn/200405/27/eng20040527_144506.html

Oresman, Matthew, "Repaving the Silk Road: China's Emergence in Central Asia," in Joshua Eisenman, Eric Heginbotham, and Derek Mitchell, eds., *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7, pp. 60–83.

Pan Guang,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Prospects," *SASS Papers,* No. 9,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3, pp. 99–109.

Panda, Jagannath P., "The Impact of Sino-India Army Exercise on Bilateral Relations," *China Brief,*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Vol. 7, No. 15, July 2007, pp. 7–10.

潘相陳編，《最高決策：1989之後共和國重大方略》，北京，中國：中央黨史出版社，2004年。

Paramonov, Vladimir, *China & Central Asia: Present & Future of Economic Relations,* Conflict Studies Research Centre, Surrey, UK: Defence Academy of the United Kingdom, May 2005.

Percival, Bronson E., "China's Influence in South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the US,"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on "China's Global Influence: Objectives and Strategies," July 22, 2005.

———, *The Dragon Looks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New Century,* Oxford, UK: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7.

〈中菲越聯合勘探南海石油〉,《新華社》,2005年3月14日。

Pillsbury, Michael,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03–258.

"PRC Papers Criticize US over Sept. 11," *Taipei Times,* September 12, 2006, p. 4.

Pye, Lucian W.,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8.

錢其琛,〈新世紀的國際關係〉,《學習時報》,2004年10月18日。

Ratliff, William, "Pragmatism over Ideology: China's Relations with Venezuela," *China Brief,*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Vol. 6, No. 6, March 15, 2006a, pp. 3–5.

———, "The Global Context of a Chinese 'Threat' in Latin America," Miami, Fla.: China-Latin American Task Force, Center for Hemispheric Policy, University of Miami, June 2006b.

Ren Xiao,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etical Discourse in China: A Preliminary Analysis,* Sigur Center Asia Papers, No. 9, Washington, D.C.: Ellio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00.

Report of an Independent Task Force, *More Than Humanitarianism: A Strategic U.S. Approach Toward Africa,*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ovember 2005. As of October 6, 2006:
http://www.cfr.org/content/publications/attachments/Repost%2012_06_05.pdf

Romberg, Alan, "The East Asia Summit: Much Ado About Nothing—So Far," Freeman Report,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anuary 11, 2006. As of March 27, 2009:
http://www.stimson.org/pub.cfm?id=264

Ross, Robert,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eds., *New Direction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阮宗澤，〈中國外交創造和平崛起平台〉，《瞭望新聞周刊》，第50期(2003年12月15日)，第14-16頁。

Saunders, Phillip, "China's America Watchers," *China Quarterly,* Vol. 161, March 2000, pp. 41–65.

———, "China's Global Activism: Strategy, Drivers and Tools," *Occasional Paper 4,*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June 2006, pp. 21–22.

Saunders, Phillip C., and Erica Strecker Downs, "Legitimacy and the Limits of Nationalism: China and the Diaoyu Island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3, Winter 1998/1999, pp. 114–146.

Schweller, Randall L., "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Self, Benjamin, "China and Japan: A Facade of Friendship,"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6, No. 1, Winter 2002–2003, pp. 77–88.

Shambaugh, David, "Patterns of Interaction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1994, pp. 197–223.

———, "Chinese Hegemony over East Asia by 2015,"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Summer 1997, pp. 7–28.

———,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3, Winter 2004/2005.

———, "The New Strategic Triangle: U.S. and European Reactions to China's Ris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8, No. 3, Summer 2005, pp. 7–25.

———,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 "China's New Foray into Latin America," *YaleGlobal Online,* November 17, 2008.

Shambaugh, David, Eberhard Sandschneider, and Zhou Hong, eds., *China-Europe Relations: Perceptions, Policie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沈國放，〈中國新外交的理念與實踐〉，《世界知識》，2007年第13期，第42-44頁。

Shichor, Yitzhak, "Israel's Military Transfers to China and Taiwan," *Survival*, Vol. 40, No. 1, Spring 1998, pp. 68–91.

———, "Decisionmaking in Triplicate: China and the Three Iraqi Wars," in Andrew Scobell and Larry M. Wortzel, eds., *Chinese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making Under Stress,*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2005.

———, "China's Voting Behavior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China Brief,*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Vol. 6, No. 18, September 6, 2006.

———, "Blocking the Hormuz Strait: China's Energy Dilemma," *China Brief,*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Vol. 8, No. 18, September 23, 2008.

Shinn, David H., "China's Approach to East, North and the Horn of Africa,"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on "China's Growing Global Role: Objectives and Influence," July 21, 2005.

Shirk, Susan L.,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Shuja, Sharif, "Warming Sino-Iranian Relations: Will China Trade Nuclear Technology for Oil?" *China Brief,*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Vol. 5, No. 12, May 14, 2005.

"Sino-Arab Cooperation Forum Is of Milestone Significance: Chinese FM," *People's Daily,* January 31, 2004. As of October 6, 2006:
http://www.china.org.cn/english/features/phfnt/85844.htm

Stern, David L., "Security Group Refuses to Back Russia's Actions," *New York Times,* August 28, 2008.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s Arms Transfer Database,* April 2009. As of May 14, 2009:
http://armstrade.sipri.org

Storey, Ian, "China's 'Malacca Dilemma,'" *China Brief,*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Vol. 6, No. 8, April 12, 2006.

———,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EAN-China Relations: All Quiet on the Southeast Asian Front,*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October 2007, pp. 1–11.

"Students Again Make Beeline to US Colleges," *People's Daily Online,* April 5, 2006. As of October 6, 2006:
http://english.people.com.cn/200604/05/eng20060405_256030.html

Stumbaum, May-Britt, "The Invisible Ban: EU Maintains Weapons Embargo on China,"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December 2008, pp. 52–53.

———,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Decision-Making in EU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toward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GAP Schriften zur Internationalen Politik, Berlin, Germany: Nomos Publisher, 2009.

Suisheng Zhao, "China's Periphery Policy and Its Asian Neighbors," *Security Dialogue,* Vol. 30, No. 3, 1999, pp. 335–346.

———, "The Making of China's Periphery Policy," in Suisheng Zhao,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4, pp. 256–275.

Sun Lei, "China Plans Financial Diplomacy, Seeks Right to Have Say in Economic and Trade Matters," *21 Shiji Jingji Baodao* [21st Century World Economic Journal], April 26, 2006, as translated by OSC.

Sutter, Robert G., *China's Rise in Asia: Promise and Perils,* Oxford, UK: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a.

———, "China's Rise in Asia—Promises, 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Honolulu, Hawaii: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February 2005b. As of March 27, 2009:
http://www.apcss.org/Publications/Ocasional%20Papers/OPChinasRise.pdf

———, "Durability in China's Strategy Toward Central Asia—Reasons for Optimism,"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 Vol. 6, No. 1, 2008, pp. 3–10.

Swaine, Michael D., *China: Domestic Change and Foreign Policy,*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MR-604-OSD, 1995. As of March 11, 2009:
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_reports/MR604/

———, "China: Exploiting a Strategic Opening," in Ashley J. Tellis and Michael Wills, eds., *Strategic Asia 2004–2005,* Seattle, Wash.: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04, pp. 67–101.

Swaine, Michael D., and Ashley J. 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MR-1121-AF, 2000. As of March 26, 2009:
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_reports/MR1121/

Swaine, Michael, Zhang Tuosheng, and Danielle F.S. Cohen, *Managing Sino-American Crises: Case Studies and Analysis,*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6.

Swanstrom, Niklas, "China and Central Asia: A New Great Game or Traditional Vassal Rel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4, No. 45, November 2005, pp. 569–584.

Tang Shiping, "A Systematic Theory of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7, No. 1, March 2004, pp. 1–34.

———, "Projecting China's Foreign Policy: Projecting Factors and Scenarios," in Jae Ho Chung, ed., *Charting China's Futur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pp. 129–145.

———, "From Offensive to Defensive Realism: A Social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Security Strategy," in Robert S. Ross and Zhu Feng, eds., *China's Ascent: 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41–162.

Thayer, Carlyle A., "China'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Diplomacy and Southeast Asia," *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Journal,* No. 127, 2007, pp. 16–32.

田春榮，〈2006年中國石油進出口概況分析〉，《國際石油經濟》，第3期，2007年，第16-17頁。

"Top Ten Sources of ASEA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flow," ASEAN Secretariat Web site, undated. As of October 22, 2008:
http://www.aseansec.org/18144.htm

Traub, James, "The World According to China,"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3, 2006, pp. 24–29.

Tsui, Enid, and Francesco Guerrera, "China's CNPC Agrees to Buy PetroKaz for $4.2bn," *Financial Times,* August 22, 2005.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Monthly Summary of Contributors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Personnel,* undated. As of January 22, 2009:
http://www.un.org/Depts/dpko/dpko/contributors/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Web site, undated. As of May 14, 2009:
http://www.un.org/

U.S. Department of State, *Voting Practices at the United Nations,* various years. As of May 14, 2009:
http://www.state.gov/p/io/rls/rpt/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 2006,* June 2006, p. 34. As of March 23, 2009:
http://www.eia.doe.gov

Van Kemenade, Willem, "Between Beijing and Paris: From Abnormally Good to More Normal," *China Brief,*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Vol. 7, No. 15, July 27, 2007.

Van Ness, Peter, *Revolutio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eking's Support for Wars of National Liberation,*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 "China as a Third World State: Foreign Policy and Official National Identity,"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94–214.

Vaughn, Bruce, and Wayne Morrison, *China–Southeast Asian Relations: Trend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April 14, 2006, pp. 12–13.

"The Vital Triangl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 Conference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4, 2006.

Waheguru Pal Singh Sidhu and Jing-Dong Yuan, *China and India: Cooperation or Conflict,* Boulder, Colo.: Lynne Reinner Publishers, 2003.

Wang Gungwu, "The Fourth Rise of China: Cultural Implications,"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2, No. 2, September 2004, pp. 311–322.

Wang Hongying, "National Image Building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1, No. 1, March 2003, pp. 46–72.

王緝思，〈美國霸權的邏輯〉，《美國研究》，第17期第3卷(2003年秋季號)，第28-40頁。

———, "China's Changing Role in Asia," in Kokubun Ryosei and Wang Jisi, eds., *The Rise of China and a Changing East Asian Order,* Tokyo, Japan: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04.

———, "China's Search for Stability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5, pp. 39–48.

———, "Reflecting on China," *American Interest,* Summer 2006.

王緝思，〈關於構築中國國際戰略的幾點看法〉，《國際政治研究》，第4期，2007年，第1-5頁。

王猛，〈達富爾危機：中國外交轉型的挑戰與契機〉，《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6期。

王毅，〈加強互信合作促進共同安全〉，在東亞安全會議發表演說，2003年12月15日。

王毅，〈全球化進程中的亞洲區域合作〉，在外交學院「東亞共同體」會議上發表演說，2004年4月。

〈王毅談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外交政策〉，2004年9月4日，2006年10月6日引自：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xw/t83962.htm

王逸舟，〈樹立世紀之交的國家安全觀〉，《瞭望》，1999年9月13日，作者引公開資料中心的翻譯版本。

王逸舟，〈面向21世紀的中國外交：三種需求的尋求及其平衡〉，《戰略與管理》，1999年12月，作者引用對外廣播情報處的翻譯版本。

"Washington Draws India in Against China," *People's Daily Online,* English ed., July 7, 2005; also in *Global Times,* July 1, 2005 (Chinese). As of August 24, 2005: http://english.people.com.cn/200507/07/eng20050707_194676.html

Watson, Cynthia A., "China's Approach to Latin America,"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on "China's Growing Global Role: Objectives and Influence," July 21, 2005.

Weisman, Steven, "Politeness of China Talks Can't Disguise the Discord,"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5, 2007.

溫家寶，〈關於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新華社》，2007年2月26日，作者引用公開資料中心的翻譯版本。

Wheeler, Mathew, "China Expands Its Southern Influence,"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June 2005, pp. 40–44.

The White Papers of the Government, undated. As of March 23, 2009: http://www.china.org.cn/e-white/index.htm

Winning, David, Shai Oster, and Alex Wilson, "China, Russia Strike $25 Billion Oil Pact,"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18, 2009.

Wishnick, Elizabeth, *Russia,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Central Asia: Prospects for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Shadow of the Georgian Crisis,*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February 2009.

World Bank, *East Asia & Pacific Update,* April 2007. As of March 31, 2009: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EAPHALFYEARLYUPDATE/Resources/550192-1175629375615/EAP-Update-April2007-fullreport.pdf

〈胡錦濤在八國集團同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會議上的書面講話〉，《新華社》，2006年7月17日，作者引用公開資料中心翻譯版本。

吳建民，〈中國摒棄弱國心態還有長路要走〉，《中國青年報》，2006年3月21日，作者引用公開資料中心的翻譯版本。

Wu Xinbo, "The Promise and Limitations of a Sino-U.S. Partnership,"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7, No. 4, Autumn 2004.

———, "The End of the Silver Lining: A Chinese View of the U.S.-Japanese Allianc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 No. 1, Winter 2005/06, pp. 119–130.

Yahuda, Michael B., "China and Europe: The Significance of a Secondary Relationship,"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1994, pp. 266–282.

Yan Xuetong, "The Rise of China in Chinese Ey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0, No. 25, February 2001, pp. 33–39.

閻學通，《國際政治與中國》，北京，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Power Statu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 No. 1, 2006, pp. 5–33.

楊潔篪，〈改革開放依賴的中國外交〉，《求是》(網路版)，第18期(2008年9月16日)。

葉江，〈略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全方位外交中的大國戰略調整〉，《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第8期(2008年8月)，第38-44頁。

葉自成、李穎，〈中國所必須建構的大國外交心態〉，《環球時報》，2001年7月20日。

Yeh, Andrew, "Uzbekistan Signs $600m Oil Deal with China," *Financial Times*, May 25, 2005.

Yong Deng, "Better Than Power: International Statu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Yong Deng and Fei-Ling Wang, eds., *China Rising: Power and Motivation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Rowan & Littlefield, 2005, pp. 51–72.

———, *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 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Yong Deng and Thomas G. Moore, "China Views Globalization: Toward a New Great-Power Politics?"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7, No. 3, Summer 2004, pp. 117–136.

Yong Dong, "Hegemon on the Offensive: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U.S. Global Strateg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6, No. 3, 2001, pp. 343–365.

Yu Bin, "China-Russia Relations: Between Crisis and Cooperation,"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Vol. 10, No. 4, April 2009. As of May 14, 2009: 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0804qchina_russia.pdf

Zaborowski, Marcin, ed., *Facing China's Rise: Guidelines for an EU Strategy,* Paris: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06.

Zhang Baijia, "Chinese Politics and Asia-Pacific Policy," in Ezra F. Vogel, Yuan Ming, and Tanaka Akihiko, eds., *The Golden Age of the U.S.-China-Japan Triangle 1972–1989,*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 pp. 38–51.

———, "Chinese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in the 1990s," in Ezra F. Vogel, Yuan Ming, and Akihiko Tanaka, eds., *The Age of Uncertainty: The U.S.-China-Japan Triangle from Tiananmen (1989) to 9/11 (2001)*,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Online, 2005, pp. 61–81.

張清敏、劉兵，《首腦出訪與首腦外交》，國際政治研究，第106期(2008年4月)。

Zhang Wankun Frankl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Strategies under Mao and Deng: A Systematic Comparative Analysis,* Public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Working Paper Series,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8.

張幼文和黃仁偉編，《2004中國國際地位報告》，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4年。

張幼文和黃仁偉編，《2005中國國際地位報告》，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5年。

張幼文和黃仁偉編，《2007中國國際地位報告》，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7年。

張幼文和黃仁偉編，《2008中國國際地位報告》，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8年。

Zhang Yunling and Tang Shiping, "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pp. 48–70.

趙華勝，〈中俄美在中亞能否合作？〉，《戰略與管理》，2004年3月，第34-107頁，作者採用對外廣播情報處翻譯版本。

Zheng Bijian,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5, pp. 18–24.

Zheng Yu, "Strateg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China Strategy: China's Bilateral Relationships,* Vol. 3,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ly 2004, pp. 25–27.

〈中俄關係譜寫新篇章〉，張幼文和黃仁偉編，《中國國際地位報告2008》，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4-218頁。

〈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新體現〉，張幼文和黃仁偉編，《中國國際地位報告2007》，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55-264頁。

《中國自由貿易區服務網》最新資料，中共商務部，引自2008年10月7日：http://fta.mofcom.gov.c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共的國際行為：積極參與、善用機會、手段多樣／麥艾文(Evans S. Medeiros)著；李柏彥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史政編譯室，2011.05
面；　公分. --（軍官團教育參考叢書；623）
譯自：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ISBN 978-986-02-7846-0（精裝）

1.中國外交 2.外交政策 3.國家安全 4.經濟政策 5.二十一世紀
574.18　100008069

軍官團教育參考叢書 623

書名：中共的國際行爲：積極參與、善用機會、手段多樣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著作權人／中華民國國防部
發 行 人／岳宗義
作　　者／麥艾文(Evans S. Medeiros)
審　　訂／江樹人
複　　審／王文勇
翻　　譯／李柏彥
審　　稿／宋家駒
編　　輯／黃國賢
美術指導／張進龍
校　　對／林啓文
展 售 處／**五南文化廣場**　地址：400 臺中市中山路6號
電話／(04)22260330　網址：www.wunanbooks.com.tw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104 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02)25180207　網址：www.govbooks.com.tw
出 版 者／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電話：(02)25327399
印 製 者／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四〇一廠
定　　價／250元
中華民國100年5月出版
初版一刷
ISBN：978-986-02-7846-0(精裝)
GPN：1010001004

本書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

中共的國際行為

積極參與、善用機會、手段多樣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隨著中共經濟實力崛起，北京當局亦迅速擴大並深化在國際間的活動。
中共現階段企圖在依循既有架構前提之下，主導國際經濟與安全事務，
並利用國際組織與多樣手段達成其外交目標。相對於美國安全利益，
中共目前似乎表現得無意與美國相抗衡，然而假以時日，
中共的外交作為勢必在某些議題上變得更具擴張性，
而北京抗拒來自華府的壓力亦有可能愈演愈烈。
美國維持亞洲均勢的實力將在未來二十年之內備受考驗，
而區域內傳統盟國的配合度亦將逐漸降低。種種跡象不禁令人要問：
中共究竟能否突破內政問題的羈絆，並採取擴張性的外交作為？
而美國究竟能否持續對中共發揮既深且遠的影響力？

軍官團教育參考叢書-623

ISBN 978-986-02-7846-0

00250

9 789860 278460

GPN 1010001004 NT$250